

语言 与文化

论坛

Foru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主办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主编 朱文斌 庄伟杰

2019.2
总第16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19. 2/朱文斌, 庄伟杰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 - 7 - 313 - 21960 - 2

I. ①语… II. ①朱…②庄…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5756 号

语言与文化论坛(2019. 2)

主 编: 朱文斌 庄伟杰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制: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21960 - 2

定 价: 30.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 - 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3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 - 64366274

《语言与文化论坛》编委会

主 办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主 任 徐真华 费君清 (特邀)
主 编 朱文斌 庄伟杰 (执行)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晓宇 王 宏 王 峰 冉永平 孙玉华
孙绍振 齐沪扬 吴秀明 宋协毅 张 江
陈众议 陈 龙 陈思和 陆经生 陆建德
胡剑锋 修 刚 聂珍钊 贾文键 曹德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宗杰 叶兴国 史忠义 刘家思 许金龙
杨栋梁 李建英 李贵苍 吴国良 吴 笛
何海翔 余卫华 张仕英 陈蘅瑾 金健人
周颂伦 赵海峰 徐中意 栾 栋 戚宏波
葛金玲 魏大海 魏小琳
编 务 庄焕明 任 彩 陈俊伊

通讯地址 (312000)中国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会稽路 428 号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语言与文化论坛》编辑部
电 话 0575 - 89114475 89114479
投稿邮箱 yuexiuxuebao@163.com

目 录

论坛特稿

新人文主义研究概观 史忠义 栾 栋 李贵苍 / 1

文字与文化

汉字的反向性中蕴含着华夏文明传承密码 陈藩庚 / 7
论中华语文双轨发展机制及建构语文学的意义 周金声 王佳平 / 25
“信息人假说”的反思与重构 李文明 吕福玉 / 33

外语与教学

民办外语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师发展策略研究 王 钢 / 43
二语学习动机理论视阈下英语教学激励策略研究 张亚蒙 / 47
中德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文化维度 周芳蓉 / 52

专题探讨

省属本科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初探 王丽萍 / 60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优化策略探析 胡霞琴 / 65
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看“中国梦” 张 军 魏 清 / 70
话语分析与影视翻译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桂徐贵 邓 玲 / 76
康熙皇帝与祭禹新解 刘丽萍 / 82

中国文学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谢泰交等 5 位浙东地区作家为中心 朱则杰 / 88
王国维美学观之赏析
——读《人间词话》有感 王书慧 / 96
论海子和他的诗歌世界 雨 田 / 102
植物·器物·人物
——毕飞宇《枸杞子》的生态解读 闫建华 王旭群 / 123
到世界去：从《平凡的世界》到《耶路撒冷》 卢 铭 陈衢瑾 / 130

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播途径及影响

——以红杉林作家群为例

吕红 / 137

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蓉子文学创作论

白舒荣 / 145

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试谈非马诗歌艺术追求与思想内涵

何与怀 / 153

朱寿桐的从俗思维和脱俗写法

——析论其散文《从俗如流》

黄维樑 / 166

日常书写·文化溯根·原乡之旅

——论张奥列的跨文化文学书写

王小平 / 170

序跋评述

激情文字建构崇高审美境界

——评张忠亮散文《倾听大地的回响》

周思明 / 177

诗意地找寻家园的方向

——包容冰新诗赏读四题

王小敏 / 182

山谷往海洋的心灵挣扎

——评刘剑诗集《短歌行》中的海洋意象

韩庆成 / 188

编后记

编者 / 194

Contents

Forum Feature

An Overview of the New Humanism *Shi Zhongyi; Luan Dong; Li Guicang / 1*

Characters and Culture

The Revers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Inheritance Cod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hen Fanken / 7*

On the Dual-track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Literature *Zhou Jinsheng; Wang Jiaping / 25*

“Information Man Hypothesis” and Its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i Wenming; Lv Fuyu / 33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On the Developing strategies of the Teachers of English-related Majors in Private Colleges *Wang gang / 43*

A Study of English Teaching Incentive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ory *Zhang Yameng / 47*

Th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and German Class
Zhou Fangrong / 52

Thematic Discussion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Enrollment System Reform of Provinci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Liping / 60*

Research on Optimizing Strategie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Hu Xiaqin / 65*

On the Chinese Dream from Aristotle’s Practical Wisdom
Zhang Jun; Wei Qing / 70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ew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
Gui Xugui, Deng Ling / 76

The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Emperor Kangxi and Yu Sacrifice
Liu Liping / 82

Chinese literature

- The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 of Qingren Shiwenji Zongmu Tiyaoyao
—Focusing on Xie Taijiao & Other Five Zhedong's Authors *Zhu Zejie* / 88
- The Appreciation of Wang Guowei's Aesthetic View
—Perception and comprehension after reading *Commentaries on lyrical Work of the human world* *Wang Shuhui* / 96
- On Haizi and His World of Poetry *Yu Tian* / 102
- Plants, Gadgets, People: 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Bi Feiyu's *Wolfberries*
Yan Jianhua ; Wang Xuqun / 123
- To see The World: Form *World of Plainness to Jerusalem*
Lu Ming ; Chen Hengjin / 130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Ways of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Taking the Redwood Forest Writers as an Example *Lv Hong* / 137
- Traveling through Singapore and China: On Rong Zi's Literary Creation
Bai Shurong / 145
- More Modern Than Modernism, More Realistic Than Realism
—On William Marr's Pursue Of Poetic Art And Connotation *He Yuhuai* / 153
- Zhu Shoutong: Old-styled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Writing
—On His Essay "*Observing the folk funeral rites*" *Huang Weiliang* / 166
- Daily Writing, Cultural Traceability, Hometown Trip: On Zhang aolie's Cross-cultural Writing
Wang Xiaoping / 170

Comments on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 Constructing High Aesthetic Realm of Passion Text
—Comment On ZhangZhongliang's prose *Zhou Siming* / 177
- Seeking the direction of home with poetry
—on poems by Bao Rong bing *Wang Xiaomin* / 182
- The valley is struggling towards the ocean Comment on the marine imagery in Liu Jian's poem "*Short Songs*" *Han Qingcheng* / 188
- Informal Discussion on This Volume *Editor* / 194

新人文主义研究概观

◎ 史忠义 栾 栋 李贵苍

摘 要：本文概述了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发展阶段，以及几位作者在人文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人文主义思想 微薄贡献 努力方向及方法

一、人文主义源远流长

自从人类有了关于人的思想以后，便有了人文主义的萌芽；人文主义思想因而存在于所有文明中。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伏羲象物取则，创大易，成八卦，于开显中含敬畏。开天辟地之时，开大于收，辟重于合。神农号炎帝，继八卦作《连山》，山出山连，侧重揭蒙除昧。《连山》，朝阳兴象。群山积厚，底气深沉，大势磅礴，如日升腾。华夏人文根祖，巍巍，微微，博大而精深。开远，慎终，得天地之灵气，传万古之福音。然而山不能尽数，物不可恒开，有披露必有掩蔽，苟耗散定须恢复，收敛之德，见于黄帝《归藏》。伏羲从混沌出，阴阳集于一体；炎帝以农耕显，庚寅万象终始；黄帝由母系生，坤乾安之若素。领略黄帝《易》很重要。黄帝《易》，即《归藏》。《归藏》重坤守谦用隐，其中有真意，淹留黄帝真风貌，储存黄帝真行藏。黄帝与蚩尤战，大野逐鹿，不得已而为之。与炎帝盟，为苍生而和之。天下既定，任炎帝向东南、西南扩展，而轩辕则止戈勒马，退守西北，匿于大漠，隐于高原，葬于深山。黄帝精神是什么？是涵养，是厚道，是祥和，是归化，《归藏》本意盖在于此。

夏用《连山》。夏禹部族将《连山》的开显文化发挥到极致。大禹治水、刊山、安澜、列九州、铸九鼎以征天下，使民知神奸。殷商复用《归藏》。敬天礼地，刻骨铭心，金甲文字，文化深藏。最神奇的归藏莫过于甲骨文字，数千年后复见天日，把归藏的意蕴诠释得惟妙惟肖，诚可谓人类瑰宝。从《周易》及其传播来看，文武周孔对《归藏》精神都深有体会。文王重卦，乾坤虽然异位，母仪仍然显耀。武王鼎革，鬼神尸位有别，然而殷商庙享不除。周公摄政布德决不僭越。孔子设席教化述而不作，归藏的厚重品德一脉相承。梁漱溟和当代学者郭沂认为，商周之际，中国社会发生过一场人文主义运动。殷商宗教社会神灵崇拜的风气浓厚，至周代逐渐产生出一些理性思想，有了“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乃至“天不可信”等观念，周公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天爱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思想，这些便是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雏形。到了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进一步发展，孔子的“仁”“智”“泛爱众”“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进一步奠定了人文主义思想。

近年来的大量考古成果（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洼考古、良渚文化时期和红山文化时期的

大量考古发现等)充分肯定玉石时代和玉文化的存在也奠定了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华夏初民之所以崇拜玉石,因为后者代表一定的美德。这与《伊利亚特》所肯定的金子崇拜代表一定的财富思想和发财梦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体现了希腊人早期的人文思想。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展有四个备受学界重视的阶段,使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智者学派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将研究重点从自然界和神转移到人本身,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格拉,主张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探索的主题,特别强调人的价值;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感觉是判定一切的准绳,否定神的意志,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反对迷信,强调自由;在社会道德方面,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该强求一律。智者学派体现希腊文化人文主义的本质,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作用。苏格拉底主张“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想;提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教育对美德同样重要,它可以使人认识自己灵魂之内已有的美德;对人性本身的研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社会,代表作《理想国》,主张根据智慧品德而不是按照出身,把每个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其影响是鼓励人们独立理性思考,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提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充分体现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了解未知的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涵盖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之间的400多年,欧洲由野蛮的黑暗时代演进到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发展的时代,而这些领域的成就均超越了伟大的古代文明。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指重生或复活。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垄断全部知识教育,用封建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压制科学研究,文化陷入低潮。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追求生活享受,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知识分子借助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从各个方面冲击教会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文艺复兴”,其实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15世纪后期扩大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16世纪文艺复兴达到高潮。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巨人,以自己的作品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化,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自由,追求幸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主张“因信称义”和“先定论”,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代表人物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其主张“信仰即得救”,认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灵魂便可以获得拯救。每个基督徒都有直接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而非盲目听从教皇和教会的说教。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许多地方兴起,其实质是一场在宗教改革外衣掩饰下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神权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笔者以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时期。“17世纪,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分散的世界史变成了统一的世界史。西方文化能够产生现代社会,是与其崭新的哲学突破分不开的。以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突破,同西方的科技、经验、政治、艺术创新一道,带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化。与这相对照,这一时期其他大文化,如中国、印度、伊斯兰的哲学文

化,都只有自身文化史的意义,而没有世界性的意义。可以说,第二个大的世界史的转折,是以西方的哲学突破为标志的。获得突破的西方哲学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的主流哲学,各大文化当面临现代文化潮流的压力和自身的现代化任务,不得不学习、模仿、吸收西方哲学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包括大悲、大喜、大思的复杂过程。”^①

启蒙运动被视为人文主义的第四个重要时期。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封建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代表人物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卢梭主张“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康德主张主权在民,相信自由和平等是天赋人权,但坚持人要自律。

现代经济活动的人文理念愈来愈普遍、愈浓厚,产品和商品的审美色彩愈来愈浓。人文理念和审美追求几乎成为经济活动成功的必备条件。没有人文理念和审美追求的商品就缺乏竞争力,经济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小。现代社会的经济竞争除了产品质量的竞争、企业实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人文理念和审美追求的竞争;反之,人文思想也凭借经济活动得以推广。经济全球化与大国的全球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笔者以为,自从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人类就进入了第三次大的哲学突破或曰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经典杰作《资本论》,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体现后现代思维的某些哲学家为代表的西方当代哲学,中国第二、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重新肯定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构建全球和谐社会”等思想,还有转型经济学等,都是这次哲学突破或理论突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新时期成熟的人文思想,都是这次哲学突破或理论突破的重要成果。第三次哲学突破或曰理论突破还在继续,大约会在21世纪大体完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上的全球性互动,为这次突破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笔者同意张法先生的下述意见,即这次哲学突破不会像第二次哲学突破那样,是以西方的哲学突破来代表世界的哲学突破,而更像第一次哲学突破,是全球各大文化之间各自扎根自身传统而又积极面向全球而产生的一种既有文化多样性,又有全球整一性的哲学突破。“这次哲学突破与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不同的是,它不是各自文化间互不相连的分散世界史中的哲学突破,而是在各文化相互影响中的统一世界史中的哲学突破。……人类在新时代的意义,是由这种哲学突破来定义的。”^②上述我们提到的第三次哲学突破的组成部分,已经具有了这些特点。这次突破也构成了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二、研究成果

在国际国内人文学研究的大潮中,我们几位人文学科的学者,如今聚齐在浙江越秀外

国语学院的人文队伍中。回首过去,我们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做出了绵薄贡献。

早年获法国巴黎索邦第一大学哲学系人文科学国家博士的栾栋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哲学》《文学评论》、*Inharmonique*、*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等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兼通中外文史哲论文 100 多篇,出版专著《美学的钥匙——马克思劳动学说的美学意义》《感性学发微》《文学通化论》等 5 部,译著《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濒危的文学》等 5 种,主编出版“人文学丛书”3 辑共 35 册,“外国文学文化论丛”一套(已出 9 册),主编主笔《人文学概论》一部。先后主持国内外课题 17 项,获省部级奖励 10 多项。在中国古代文学、法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化、哲学美学等领域指导硕博研究生,主讲人文类一级学科建设的主体课程 6 种、配套建设课程 6 种。

吴国良教授先后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和国际期刊包括海外权威期刊、《当代语言学》《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40 余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 40 余部。专著代表作为《现代英语句法与语义》《英语术语翻译与译名规范研究》。译著代表作为大型工具书《英语准确用词词典》。主编进入人文社科国际检索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两部,由美国学者出版社出版。主持国家级和省市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省部级奖项 4 项,国际奖项 2 项,市级政府奖项 7 项,浙江大学一等奖 1 项。

李贵苍教授先后出版《英语写作实践教程》(“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汉诗英译教程》(21 世纪课程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The Birth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Revolutions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汉译英,美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2017 年版)、《绿色写作: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态内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等专著、译著和编著 15 部,发表论文 41 篇,主编《中国风:留学生汉语系列教材》(6 本,清华大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主编生态文学批评译丛(11 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6 本),主持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化读本外译项目(11 本,马来西亚出版社已出版 6 本),组织翻译近千万字的《剑桥非洲史》,基本完成初稿,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忠义教授 1992 年获瑞士洛桑大学文学博士,1996 年获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著有《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2012)、《问题学初探》(2017)、《中西比较诗学新探》(2008)、《20 世纪法国小说诗学》(2000)、《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的西方浪漫主义倾向研究》(法文,瑞士伯尔尼 Peter Lang 出版社 1993 年版)、《中西方梦的文学功能的比较研究》(法文,1996 年 11 月里尔法国国家论文制作中心微缩版)、《比较文学和诗学文选》(2008)。重要译著有《诗学史》(上下册,2001;修订版,2010)、《20 世纪的文学批评》(1998;修订版,2009)、《问题与观点,20 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合译,2000;修订版,2010)、《热奈特论文集》(2001)、《言语行为哲学》(2003;修订版,2010)、《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修订版,2010)、《文学理论的原理》(2012)、《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2012)、《文学与其修辞学》(2014)、《论问题学:哲学、科学和语言》(201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2015)、《道德的原理》(2015)、《差异 排斥 历史》(2015)、《修辞学原理》(2016)、《如何思考实在?》(2017,2018)、《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2017,2018)、《叩问小说,超越小说理

论的若干途径》(2017)、《何谓戏剧?》(合译,2018)等 24 部。中外文编著 15 部(其中《人文新视野》丛书已出 14 辑。主编法国《国际哲学与修辞学》杂志 2018 年第 1 期《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专号。组织并主持了《尤瑟纳尔文集》7 册的翻译(校对了其中 5 册的译文,2002)以及《经济学词典》的翻译。修改并校对了该词典 70% 词条的译文;(2012 年码洋列社科文献出版社第一,2013 修订版)。出版文学译作 3 部,发表学术译文 10 余篇,论文约百篇。近期重要论文有:《世界诗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后现代之后的当代性观念及其对现代性危机因素的消解》《符号学的得与失——从文本理论谈起》《问题学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新形态》《简析问题学哲学与梅耶和贝西埃的文艺思想》《略论梅耶双重三位一体的修辞观》、*Pour une expression plurielle des substrats d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et de ceux de la culture chinoise*、*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philosophiqu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等。获国家奖 2 项,省部级和其他奖励 6 项。与法国著名学者、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会长让·贝西埃教授创办并主编 *Nouvelles Humanités Chine et Occident* (《中西新人文》)杂志。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和东北亚研究基地聚集着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其他学者也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研究方向

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自己确定近期的研究方向,并公之于众,接受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

我们首先要宣传和弘扬的重要思想之一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观念。人类的各个民族本应该和睦相处,但总有人坚持冷战思维,导致有些民族之间长期对立,不懂得和则互利、和能“生财”的道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观念是保证世界和平、保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根本观念,需要世代地坚持下去。

我们需要宣传和弘扬的另一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证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民生 40 年的发展史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思想,值得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推介,资本主义国家也能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中获得众多启示。我们无意输出革命,无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但我们可以客观地介绍中国人民 70 年来的奋斗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近 40 年来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实事求是、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过程,诚心诚意地与其他民族交流和学习,共同前进。

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是促进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步步升级的长效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持续有利,需要长久地坚持下去。聚精会神地关注经济领域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和调节作用,及早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总结,精益求精,使人类的经济活动持久地良性运转,造福于世界人民。

生态文明的内涵极其丰富,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经过一个半世纪现代性发展的历练,思想认识和物质实践都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随着历史的演进,世界各国人民在生态文明的认识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提高,行动也将更加自觉。

为一切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社会价值、审美思想、文艺理论、各种知识和学问鼓与呼。

史忠义正在翻译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的代表作《叩问与历史性》。这部580多页的著作的上半部分通过回答范畴思考人类回答思维中的各种规律和原理,下半部分从叩问视角通过对历史性的分析,实际上阐释了西方文明的重大观念和发展事实。这个思路是宏阔的,但是使用的是作者的一套问题学的术语,这就为著作的理解增加了很大的困难。这一切如果用通俗语言表达可能更易于理解,但是我们又离开了翻译实践。著作给译者的启示是,我们可以用问题学和历史性概念的思路,阐释华夏文明的重大观念和发展路径。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但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多思考,并尝试在几年后的研究中将其条分缕析,行诸文字。

习近平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其中蕴含丰富的方法论成果,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和“一带一路”的思想,本身就有道路与方法的宗旨。我们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就是运用习近平“共同体导向论”或曰“共同体带路论”“以习解习”。概略地讲,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党治国的思想方略,其中既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坚守,也有对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路标的遵循,同时还有在全球化大潮中融会中西方优秀传统文化以造福人类且行稳致远的学术考量。

在方法论方面,我们还准备以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的问题学哲学作为贯彻习近平思想方法论的西学支点。该哲学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务实精神非常契合,而且很适宜向西方世界宣讲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具体而言,我们应重点学习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需要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们需要怎样层层深入地分析、论述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思路也体现了研究的顺序,可以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引导整个搜索整理、学习和研究过程。

鉴于我们的一部分研究针对的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解偏差,如何去除误区、误解和相关的对立观点,需要在一系列重要节点上做化解性的工作。为此,我们在践履上述基本导向和路径的前提下,特别开发了“化思”的方法,以疏通中西方不同文化的扞格。“化思”的要义是“化感通变”以纾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用“通和致化”和“精致”讲好中国故事,以此把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一带一路”美好的用意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② 张法:《后现代与中国的对话:已有的和应有的》,见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51页。

汉字的反向性中蕴含着华夏文明传承密码

◎ 陈藩庚

摘要：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语言符号，是具有形体美与灵魂美的文化生命体。本文则着重阐述汉字的灵魂美，从剖析笔画结构中所蕴含的儒、道、法与阴阳家等哲思，认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含有字德的文字。指出汉字的形体美与灵魂美、汉字在世界文字进程中反向性发展的活力美与固执美，是构成汉字强大的传承基因，是华夏文明五千年薪火不灭的重要密码。

关键词：汉字 反向 哲思 发展 密码

汉字在形、音、义之外，还是一个有国籍的生命。生命是指具有感觉、有知性、有繁衍能力的物体。每一个汉字都有形象被感觉，都有内涵被感知，汉字还有强盛的繁衍力，它的族员从秦小篆时的一万多字，扩张到现在的五万六千多字（尽管都是“人工繁殖”）。所以，从文化意义上说，汉字具备有生命（文化生命）的条件。

我们每天都在运用汉字进行信息沟通，有没有想过汉字的生命来自笔画结构？有没有想过笔画结构既是字形的骨肉还蕴含着字德与哲思？有没有想过我们怎样书写才是尊重这些精灵？有没有想过这些精灵每天都在潜移默化着我们的灵魂？有没有想过它们正通过我们每一个使用者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这些思考都是产生本文的背景。希望相关的探索，可以抛砖引玉，填补汉字研究乃至国学研究的空白，并开阔文化传承的视野。

一、汉字的反向性结构蕴含着先人哲思的密码

汉字反向结构的对称与均衡意识，除了在匡正汉字字块、统一笔画线状与运笔顺序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外，还蕴含着祖先多种哲思的密码。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鼎盛，百家争鸣，其中以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造诣最高。鲁国推崇儒学；齐地注重儒学、道学和阴阳五行学；楚地盛行道学与辞赋；秦地与三晋聚集法家与游说之士。作为传播文化载体的汉字，其字根及主要用字多出自这一时期。据《战国文字编》所录^①，战国时期被视为正字的18288个古文字中，已出现今天作为部首的所有字根及主要用字。其时的造字者，在字形的建构中，是否反映出先秦的文化态势？是否传递出当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否融入了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的哲思？从小篆中，我们得到一份肯定的答案——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在汉字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的汉字是集当时文化精华的重要符号，它不但能以句、段、篇的群性组合书写当时的文明，而且在单位字形内，也能展示出先人的哲思。

秦统一天下,独尊法家,以暴力焚书坑儒,废除儒、道、阴阳五行等诸家文化,并授命法家中坚、时任丞相的李斯整治文字。但秦代法家在整治文字、推行小篆时,竟然在文字中保留了儒、道和阴阳五行学等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自扇耳光,不是讽刺,而是个智慧,是个值得探究深思的课题。

究竟小篆中蕴含着儒、道、法和阴阳诸家的哪些智慧?融合了哪些文化价值?

(一) 汉字的反向性结构折射出儒家、道家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核心是“中庸之道”。《论语·庸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视为高尚品德。“中”是标准,是目的;“庸”是态度,是方法。《中庸》视“中”为权重,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一步指出“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是天道。古人认为天道不可违,人要顺应天道。而要顺应天道,必须以“和”为天下共行的大道。在这里“和”是“庸”的延伸演绎,是达致目标的途径。以“和”去达致目标,需要人的经营,这是人道。通过“和”这样的人道,可以致“中”,达到“与天地参”,即与大自然融合,也就是后来儒家所说“天人合一”的圆满境界。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得更明确:“中,上下通”“庸,用也”。这里的“上”指天,“下”指地,亦指人;“用”,就是适用,可行的路径。“和”的目标宏大,不仅要与天地“和”,还要与左右“和”。“中庸”就是找到持久适当的良方,使事物处于上下通彻、左右兼顾的稳定和谐的状态。

“天人合一”最早是庄子阐述的,庄子是道家,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这一阐述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儒家后来以此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天人合一”是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核心观念。只是重心有别,道家重自然,认为要解放人性,顺应自然,必得怡然;儒家以天道为德,认为天道是德行之本,人类道德修行要符合天道。

汉字的字形中可不可以蕴含着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核心思维“天人合一”呢?可不可以使字形体现道家的法于自然以达至感觉怡然呢?可不可以于笔画之间传递儒家“上下通”或“与天地参”的“中和”理念呢?或是说可否找到适当的字形结构,营造上下通彻、左右兼顾的气场呢?

这个挑战不需要我们去面对,两千年前,祖先已经找到方法,在字形中达致“天”“地”“人”的“中和”境界。

早期以象形为主的汉字中,有各种与“天”“地”“人”相关的字形符号。《说文解字》指出那时造字的灵感主要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就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对客观世界观察的角度,多是正面或侧面的,因而象形字中,模拟事物的形象也多是正面或侧面。“天”“地”“人”中有些事物在人们心目中地位至尊,向至尊者敬意要正面施礼,所以,代表至尊者的字形当然要赋予正面的形象。但如何造字,才能既有正面形象,又能表达敬意,还能达致“上下通”即“天人合一”的境界呢?这需要大智大慧。古人在世代摸索中,发现一种造字形制可以达致上述的愿景。

这个形制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反对应的笔画结构形制,即对称性的笔画结构形制,简称对称性结构。含有这种结构的字叫对称字,或叫全角反向字。这些字既能呈现上下通

彻、左右兼顾的“中和”态势，还能使字形和谐、稳重与庄正。

“天”“地”“人”中哪些事物是至尊的？先人经长期观察，认为“天”“地”中，即自然界中，有三类至尊者，它们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三类至尊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类基本要素，即：显示事物的基本位素、构成万物的基本质素、呈现万物的基本色素。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数以“九”为大，地数以“五”为大。指天的，有“九天”“九霄”“九星”以及传说中的“九个太阳”等；指地呢，用什么代表大自然的三大要素呢？他们创设了三个“五”，即“五方”“五行”和“五色”，简称三“五”。三“五”是至尊者，是祖先早期对大自然的基本认知与描述。

五方：“东西南北中”，是五个地理的基本方位，用来判断事物的位置与变动。根据风向或日月星辰的位置，可以掌握时间与气象的变化，可以适时耕牧渔猎，还可以在出行往返时找到定位，在迷路时走出困局。

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古人认为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质素，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饮食与灌溉需要水，煮食与取暖需要火，制作器具需要木和金，耕牧与栖息需要土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五行”。

五色：“青赤白黑黄”，指呈现万物姿彩的五种天然颜色。三千多年前，祖先就以“五色土”来认知华夏广袤大地的土质。赤色是黏土，黄色是硝土，白色是碱土，黑色和青色是含腐殖质的土，青土还表示能常年生长青绿植物或青山绿水之地。（“五色土”之说在《山海经》《禹贡》《周礼》《史记》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

古人认为三“五”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五行”中蕴含“五色”，金——青色，青铜之色；木——黄色，木质主色；水——白色，浪花之色；火——赤色，焰舌之色；土——黑色，沃土之色。“五色”也可以表示“五方”，青——东部沿海，青山绿水之地；赤——岭南大地，红土之乡；黄——中原，黄土高地；白——西部，贫瘠的大漠与戈壁；黑——塞北，沃土草原。古人用“五色土”表示中华五个方向的疆土，显示地大物博，多姿多彩。古人还用“五行”为天上五颗较明亮的星辰取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因为他们观察到，金星色白、木星色青、水星色灰、火星色赤、土星色黄。除外，他们还用“五行”对应人体的五脏，以示相辅相生之理：肝属木，藏血以济心；心属火，热以温脾；脾属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肺属金，清肃下行以助肾；肾属水，精以养肝。古人这些认知，说明三“五”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是古人心目中权重性的要素，即至尊者。

如果三“五”是“天道”中的至尊者，那么“人道”的至尊者是谁呢？

“人道”中的至尊者就是能导引“天人合一”的圣贤与他们的伟绩。传说中的圣贤“五帝”就是最受敬仰的至尊者。古人认为这些至尊者是顺应“天道”、受命于“天道”的，是“天人合一”的代表。所以，他们也用“五方”“五行”和“五色”来象征“五帝”，以表达对圣贤的敬重。如：东方青帝伏羲，木帝；南方赤帝神农，火帝；中央黄帝轩辕，土帝；西方白帝少昊，金帝；北方黑帝颛顼，水帝。（又一说指金帝颛顼，木帝帝喾，水帝尧，火帝舜，土帝禹）

对三“五”的敬畏，对圣贤的敬重，先秦时已反映在字形创造中。从《古文字谱》^②《战国古文字典》^③《战国文字编》汇集的古字所见，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三“五”各字。每个字都有十多种形态，都呈现出以反相对应性为主的结构。以“东西南北中”五个

一个指称人主的“君”字，周时有写成“𠄎”“𠄏”等对称形字，秦小篆改为王者侧坐的象形字“君”，篆以后的各字形都定为“君”，是部件式反向字。

把指称上述众多至尊者的字形设计为对称性的，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先人深思熟虑后的成果。以对称性的端庄，表现出敬畏与尊重；以对称性的平衡，展现了稳重与对结构美的追求；以对称性的上下透彻，左右兼顾，体现出“中和”的取态。这种对称不是折中，不是和稀泥，也并非平庸、死板，而是向中看齐，向中靠拢，向中调适，不偏不倚，使两个左右极端呈现对称性。只有对称才能显示正面形象；只有正面展现，才能表现端庄；只有端庄，才能蕴含敬意；也只有对称，才能平衡；只有平衡，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和谐。在小篆中，我们看到先人以精心设计的对称性，来建构“天道”中的三“五”字形；以致诚的“人道”，表现“天人合一”，达致“中庸之道”所追求的境界。

除了三“五”字形与人主字形外，还有许多大自然元素及人类基本活动也多用对称字或亚对称字来表达，我们从中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和”的境界。如：

与大自然有关的，如天体：对称的𠄎(天)、日(日)、星(星)、雨(雨)、雷(雷)等，亚对称的云(云)。地理：对称的山(山)、丘(丘)、岗(岗)、嵩(嵩)、岳(岳)、谷(谷)、穴(穴)、川(川)、泉(泉)等。生物：对称的草(草)、木(木)、竹(竹)、果(果)、卉(卉)、牛(牛)、羊(羊)等。物态：对称的大(大)、小(小)、高(高)等，亚对称的平(平)、宽(宽)。

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造环境：对称的有田(田)、井(井)、宫(宫)、室(室)、舍(舍)、台(台)、门(门)、窗(窗)等。农耕产品：对称的有米(米)、豆(豆)、粟(粟)、茶(茶)、苗(苗)等，亚对称的禾(禾)。人造器物：对称的有车(车)、鼎(鼎)、杯(杯)、盅(盅)、缶(缶)、丝(丝)、矢(矢)等。人类动态：对称的有行(行)、立(立)、坐(坐)、来(来)、去(去)、言(言)、喜(喜)、乐(乐)等，亚对称的哭(哭)、笑(笑)等。

手数：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八(八)、十(十)。“七”，秦之前多作对称的“十”字形，后为了避免与“十”字撞字，改“丨”划为弯，成了“弌”。还有“九”，因古音同“勾”，仿勾为形，未作对称字形。

这些字都与生活息息相关，除了上述对称字与亚对称字外，还有数量更多的部件反向字。以《说文解字》录字统计，在9353字小篆中，全角对称字就有947个，虽然只占总数约10%。但其中111个作为字根，既可以成为部首又可以成为从件，与它们相关的字，不管是全角反向字还是部件形反向字，都成为含有对称结构的字，字数多达7272个，占总字数77.75%。就是以现代简化字的几个常用工具书统计，反向字也都高达总字数75%以上。统计表明对称性结构形制在汉字中占有主导地位，也说明“中庸之道”在汉字“书同文”工程中的重要影响力。

反向对应字形结构是充满智能的汉字形制。有了这种形制，书写者在书写时会以“中正”意识自律，不管字形中有无中轴笔画，都会努力使字形的左右或上下相应的笔画表现出“中和”的字德。对称性结构中所传递的中正、平衡的意蕴，方正性的字块中所展示的中和、稳重的字态，二者互相呼应，形成一方安宁祥和的气场。如把对称的左右视为兄弟，那么就是兄弟互敬；如视为夫妻，那么就是夫妻对拜。如把对称的上下视为父子，那么就是

父行子随。这些是人们可以从对称字中感受到的字德。字德可以陶冶人德,可以折射人德。以“中正”“中和”的心态书写文字,可以修心悟性。与这些对称字相处日久,书写者与阅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中庸之道”的熏陶,感受到“和谐”的愉悦,心理的修养会潜移默化。以三“五”对称性字为例,有心者或智者还可以从中悟出“中庸之道”等更高的哲理,如:对天下而言,要敬畏自然,维护尊者;对治国而言,要树立中央意识,以中央为依归;对生活而言,不能偏激也不能偏弱,不能偏取也不能偏废,适可而止;待人处事,要和谐共生,一视同仁,强能扶弱,弱亦尊严……对称性意境留下很大的领悟空间,这是世界上其他字形所没有的气场。

除了字形的反向对称性折射出汉字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涵外,还有字块的正形化,也有这一效应。汉字正字的形范,成就了汉字端庄、平稳、安宁、持重的主体形象,也蕴含着是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字德。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中庸之道”所推崇的“圣人不动情”、注重内心、不发生喜怒哀乐偏激情绪是一致的;与道家的清静释然、“万物与我为一”的追求也是和合的。

秦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企图摧毁儒家、道家、阴阳家的人德,但却在小篆中保留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字德,甚至通过反向对应形制,使这种字德更加系统、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东汉时,儒家董仲舒推行“独尊儒术,抑黜百家”,排挤打压道家,但也藉道家“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出儒家的思想体系。历史往往惊人相似,说明了历代的改革者在文化继承上对政敌的精华观念都具有慧眼,都能巧妙地予以汲取,甚至发扬光大。

秦以后的隶、楷、魏、宋等字体,仍然恪守着这种字德,都使反向对应性成为汉字的主体特征。自秦以降,反向性对应形制能够经受两千多年历史风浪的冲击,坚固不溃,是因为它具有科学性与哲学性的活力。这种活力,使汉字成为有形体、有灵魂的文字生命。

汉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表现植物的基本字根多是对称性或近似对称性(亚对称性)的,是以正面形态的象形字为主的,如对称性的木(木)、艹(艹)、艸(竹)、米(米)、果(果)、茶(茶)、苗(苗)等,亚对称性的禾(禾)、黍(黍)等。但表现动物的基本字根,除了牛(牛)、羊(羊)外,多是不对称的,是侧面形态的象形字,如:人(人)、虫(虫)、鸟(鸟)、犬(犬)、马(马)、虎(虎)、豕(豕)、鹿(鹿)、鱼(鱼)、象(象)、龙(龙)、鼠(鼠)、龟(龟)等。先人这种设计,不等于轻视动物。因为植物是静态的,赋予对称性与正面形态可以展示它们扎根于土壤的稳固生态。而动物是动态的,用侧面可以显示动感的足、爪、角、鳍、角、翼等肢体,能展示其栩栩如生的活泼性。至于牛(牛)、羊(羊)是正面形态,因为古时祭祀多以牛首、羊首为主祭品,所以取正面首部为敬。这些形象的建构,说明造字者找到了最适当的方法来表现大自然的生物,完全符合“中庸之道”之“庸,用也”的内涵,体现善“庸”(善用)的高深智慧。

(二) 汉字的均衡形态蕴含着阴阳学、易经的哲思

均衡性是汉字另一特征,也是反向对应结构形制所产生的,是小篆及而后所有字体所共有的。《论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还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

均,指均匀、公平、势均力敌;衡,指权衡、掂量、比较。

均衡概念源自阴阳学。阴阳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它的历史比儒、道、法还要早一千多年,对儒、道、法都有影响,更成为道学的理论支柱之一。四千多年前的夏朝《连山》(亦称《连山易》)中已有“阴爻”和“阳爻”之说。《易经》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亦指“阴”和“阳”。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间万物万象内部都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属性,他们借用阴、阳代表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两方,并把万物万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周文王的《周易》在演绎《易经》时,就是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论证和描述其中的运行规律。阴阳学说重视阴阳均衡,认为宇宙是阴阳二气相辅而成,阴阳二气掌管万物;还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阴阳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样阴阳才能长期共存。阴盛阳衰,或阴衰阳盛,都不吉利,只有阴阳均衡才能维生旺命。这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正如《周易·系辞》所言:“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这种阴阳对应的均衡法则,对许多领域都产生影响。如:在居家上,讲究阴阳平衡的环境风水,以利家兴业;在政治上,阴阳平衡体现为刚柔并济的治理之道;在建构上,寻求阴阳平衡的意识更进一步发展成追求结构上对称平衡的美学观念;在医道上,认为体内阴阳调和,才能维持健康。《素问》有“德旋周普,五化均衡”,讲的就是体内阴阳互补互济,互相平衡。

既然万物万象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的阴阳两种属性,都需要均衡性。那么文字是否也是这样?汉字虽然是人造的,但也是一个有形有魂之物,它有阴阳吗?如果有,是怎么体现的?是怎样界分的?

阴阳的最初含义很朴素,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到气候、时令、方位、性别、动态等,泛指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方。如:昼为阳,夜为阴;暖为阳,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外为阳,内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动为阳,静为阴;白为阳,黑为阴等。依照阴阳这种延伸的定义,我们不难划分出汉字字形的阴阳两界。借用“田”字格套字,每个字形都可以分成左右两区,左为阳,右为阴。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不论是左右结构还是左中右结构,不论是上下结构还是上中下结构,不论是全包围结构还是半包围结构,都可以作左阳右阴划分,使界限立明。

阴阳分出来了,均衡性又体现在哪里?

在全角对称字中,左右笔画是反向对应的,均衡性是容易感受到的,如“田”“串”“柰”“吕”“晶”“鼎”“燕”等字,不管字形有没有中轴笔画,左右的均衡感都十分明显。但在非全角对称字中,左右笔画并不一定反向对应,如“勾”“女”“匠”“海”“征”“疤”“边”“虎”等字,它们有均衡性吗?

在汉字中,均衡与对称是两个概念,均衡与字形对称性所具有的平衡并不相同。字形对称性平衡是指形的平衡,是字形中对立双方的笔画结构具有反向对应性,具体说就是反向双方的对应笔画具有等长、等高、等斜、等角等特征。而均衡是指势的平衡,是对立双方具有对等或近似的气势,具体说就是双方的分量、阵容、气场具有同等或接近的态势。对称性是形状展示,是画面,是显性的特征,可以直观看到的;而均衡性是因字制宜的过程,是隐性的特征,要借助“田”字格作审视才容易感受到。均衡需要因字制宜,这个过程符合

《说文解字》中“均,调也”和“衡,平也”的原则。只有通过调适部件的形态,才能使字形左右两方达到势的平衡,也就是阴阳均衡。

例如“槽”与“槽”两字,两字的左右都有部件“木”与“曹”。“槽”字左窄右宽,但给人均衡感;“木曹”字虽然左右同宽,但有失衡的感觉。这是因为在“槽”字中,左边笔画少,右边笔画多,左轻右重。而在“槽”字中,笔画多的部件“曹”,有一小部分越过中界,加强了部件“木”的位势,使笔画少的左侧分量与阵容都得以增强。经过这样因字制宜的调整,使整体字形有了阴阳均衡性。

左右结构的字,如果两边笔画数量悬殊较大,都需要这种调配,以使左右趋近均衡,具稳定感,有视觉美,不会令人感到重力歪偏。

对称与均衡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共融于一体。前面提到的全角性的对称字就是二者的共同体。在这类字中,均衡中含有对称,对称中兼有均衡。不过,这种对称字只占总字数10%左右,近90%的汉字不是对称字,后者中有的字虽然某个部件具有对称性,但并未令整个字呈现对称性。还有些字所有部件都没有对称性。这些字中,对称与均衡也不同体,而是各司其位。这种态势说明,全角对称字的字形含有均衡性,但均衡的字形中不一定都含有对称性。对称性是全角对称字与部件对称字的特征,即占75%以上的主体字形的特征。而均衡性则是全体汉字所共有的特征。均衡性弥补了对称性的不足,使左右两边笔画不对称的字形也能表现出和谐的态势,令字形的正形性更为稳定庄重。

均衡的稳定感是人类在大自然中长期观察中形成的审美观念。符合这种审美的造型艺术才能产生美感,令人愉悦,否则,看起来就不顺眼。

今天被广泛应用在构图、建筑、经济、医道中的均衡观念,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已经被先哲们所重视,到了秦国更是被娴熟地运用在整治文字中。

阴阳学、道学的“均衡观”,与儒学的“中庸之道”以及他们所共有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汉字的生态环境。确保这种生态的常规化,是秦统一中国后法家的治字措施。由法家强势推行的小篆中,竟然蕴含着他们视如寇仇的儒家、道家与阴阳家追求的境界。这不是一种讽刺,而是一种智慧的融合。因为秦兼并六国之前,文字已有千多历史,商朝的金文、石鼓文,西周太史籀整理的大篆等,已经为文字的笔画结构打下一定的基础。那时百家著述,留下《易经》《周易》《诗经》《论语》《九歌》《吕氏春秋》等众多经典。其文字出自各家之手,字形有正形的也有不规则形的,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有均衡的也有不均衡的,各有风格,并不统一。秦国治字,不是灭他国之字再创新字,而是清理字形乱象,简化、优化、规范之前的文字。以秦字为主,吸收他国文字之长,删减异体字,推出字形正形化、笔顺规范化的小篆。通过小篆,以均衡性为全体结构,以对称性为主体结构,统一字形风格,达致“书同文”的法治效果。这一改革,客观上承继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均衡观”为汉字灵魂的观念。这一种融汇性的智慧,表达了法家也注视实际效应、取他家之优为已所用的政策取向。

秦之后,随着时代的演变、字形的发展,汉字中对称性的权重因一些字形的简化而有所削弱,对称字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均衡性的权重却未受丝毫影响,所有正字的字体都坚

守均衡法则。均衡性不但规限旧字,而且制约以后的所有新字。

(三) 汉字的反向性展示出强势法治的密码

先秦古字繁杂,不但字类多、字形多,而且异体字也多。西周周宣王曾推出大篆,但未能统一文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室权崩,诸侯割据,各行己政,各有字款,不统于王,使繁杂的字局更加混乱。秦统一中国,以法家为中坚,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进行一系列强势改革,包括对文字的整治。大刀阔斧删除异体字,为官定文字小篆的书写立范,严格规定了字形的块状、笔画线状与运笔顺序。一系列严厉的整治措施,都折射出法家的施政魄力。

1. 从秦人精简文字中看反向对应形制在治字中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异体字众多,据《战国文字编》收录,战国时被列为正字的古文字有 18 288 个,分属 5 618 字目,平均每个字目有 3 种以上异体字^④。其中 3 560 个字目都有 10 种以上的异体字,有的多达数十种。而根据《古文字谱》所录的先秦异体字,现象为更严重,如“皇”“七”有 20 多种异体字^⑤;半“平”有 40 多种^⑥;“子”“尊”有 60 多种^⑦;“寿”“阳”更超过 100 种^⑧。这种现象给各国之间文字的辨认与交流带来诸多不便。

秦灭六国后,取消了六国大量的异体字与生僻字。东汉《说文解字》收集小篆 9 353 字,绝大部分源自秦代,其字数与已知的战国时期 18 288 个不同字形的古文字相比,精简了近 9 000 字,成果卓然。这一措施,加快了以秦字形为主的汉字的流通使用,也提高了国人对新法、新律文本的认知,有利于以法治理统一后的国家。同时,还可以削弱六国的文化痕迹,淡化了六国的情结。

通过《说文解字》与《战国文字编》《古文字谱》的文字对照,可以发现被秦国精简的近 9 000 字中,除了笔画较复杂的字外,多是外形不规则的字。保留下来的,除了笔画较简外,多是形块较庄正或含有反向对应性部件的字。这些字经过进一步规范,更加突出字形的反向对应性。对字形的这种取舍与改良,说明规范化与反向对应形制在秦人治字中的重要地位,是治字成功的法宝之一。

2. 字块正形化传递出令行禁止、天下守规的管治威严

先秦的字形除了部分大篆具正形性外,其他字体多是不规则形状。秦实行“书同文”时,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笔画,改良形块与运笔方法,发展出标准字小篆。小篆字块呈正长圆形,即水平端正的长圆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块形状的追求,它在当时无疑是一项令行禁止的条律,是结束战国末期文字形态各自为政的措施。正形的字块都受到一方无形边界的限制,字形内所有的笔画的末端都不能越出无形的边界。正形的边界犹如一座城池,字形笔画则如城内的街道,受制于城墙城门,不能延伸到城外。今天,书写的初学者被要求在“田”字格内习字,不容出格,这与秦代对字形正形化匡约的影响不无关系。

字块正形化,除了追求字块统一方正外,还宣示了在国家在管治上卫戍四方、约束行为、不容踰越雷池半步的法规意识。对字形的规管,是对文字用户的规管。文字用户都是有识之士,都是容易影响社会的人士。他们对字块形状的恪守,对字规的遵从,无形中会产生对立范的政权臣伏的意识。这种意识发酵后,可以加快秦王朝对社会规管控制的步伐,这是字块正形化的延伸效应。

字块正形化对后来字形的发展影响深远,隶、楷、宋、明体等字形虽然不再呈长圆形,隶书为扁方形,楷书及其后的各字体都追求正方形,匡约字形的几何形状虽然不同,但都是受正形化的约束,都呈现水平端正的形态。不论是竖排还是横排,都给人庄重、齐整、和谐的美感。每一个正形化的字块都像扎稳阵脚、沉着持重的金刚,这是其他民族文字所没有的气势。当千百个同级的方正文字,成行、成段、成篇排列组合时,犹如训练有素、身高统一、实力雄厚的军团方阵。如果没有统一的正形字块,那么,字群排列时,就会高矮参差、宽窄不匀、粗细混编、行列凹凸,杂乱的阵容似若组织涣散的乌合之众。

3. 笔画结构的对称性显示出以中央为尊的集权意识

小篆是以反向字为主的字群,反向字共占小篆总字数 87% 以上,不论是全角反向字还是非全角反向字,每个字至少含有一个对称性的部件。在对称性部件中,不论有无对称轴,部件左右两边的笔画都是对称的,也就是都以中间有形或无形的中轴为对称标杆。对称性的笔画从美学角度看是一种形体结构美,如从政治角度看则有更深的含意,它与环卫中央、向中央看齐、以中央为准的政情相吻合,是秦朝以中央唯尊意识在字形上的一种体现。

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只流行了五十多年,到了汉代不久,就被笔画更简单、更易书写的隶书所取代。小篆后来只作为书法艺术而存世。尽管如此,笔画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与规范化意识仍然主导着汉字的发展。除了行、草二书外,后来所有的正字字体,笔画结构基本没变,中央唯尊的意识没变,改变的只是运笔风格与笔线艺术不同而已。西汉延续了这种意识,还把文字规范化列入国法,吏民上书写错字要判罚。这一严厉措施进一步确保了汉字的形制、强化了规范化意识,影响深远。

除对称性部件外,小篆每一笔的书写规则也蕴含这种意识。小篆运笔要求中间落笔然后两边展开。也就是先中间,后左右。中间落笔——体现了中轴主导的思维,方便营造显性的中轴笔画,或产生隐性的中轴意识;两边展开——可以把握左右的反向对应,尤其是进行对称性的建构。这种运笔规则,除了方便表现反向对应性结构外,客观上也宣示了中央主导、周边拱照、左右互相制衡等中央权威。

4. 运笔规范化透析出施政有序、律法严明的治国方略

小篆要求“中间落笔、两边展开”的书写法则,除了具有容易表达反向对应的功能外,还使笔画线状统一,呈现线性之美,为文字运笔规范化开了先河。秦国重视运笔顺序与线状匀称的意识,影响了后来各字体的书写。小篆后,各字体虽然不再采用“中间落笔、两边展开”的书写方法,而采用先横后竖(如“干”)、先撇后捺(如“八”)、从小到大(如“主”)、从左到右(如“林”)、先进后关(如“田”)、先中间后两边(如“水”)、从外到内(如“回”)等书写顺序,但重视运笔规范化的意识成为固有的取态。不同字体的运笔各有风格,但都以上述顺序为规范,并注重起笔、收笔与边角笔触的形态美。如:隶书起笔如蚕头,收笔似雁尾,右端及下端笔锋外露;楷书笔画平直,规矩整齐,折画与钩画的折处行笔先顿再折;魏碑笔力雄劲,棱角分明、点画峻厚,有斩钉截铁之气势;颜体方正雄浑,笔画横轻竖重,笔力圆厚,气势庄严;宋体与明体尊正端庄,点、撇、捺、钩笔画都呈现尖端棱角,横画笔端与钩画转角都有装饰角。各字体严谨的书写态度,都有着秦国对文字严格要求的遗风。

综上所述,汉字字形中的正形意识、对称意识、中央意识,都与秦国法治的理念与措施相呼应。以反向对应形制为主导,推行字形规范化,体现了以法治字、以法治文的理念,传递出在法规面前一视同仁、任何人都要绝对臣服的信息。这是以法治国、以法治世政治方略在文化领域的投影,折射出秦国统一四方的气概。如果没有这一书写运笔规范化的法则,秦国难以实现“书同文”的宏图。“书同文”与“车同道”“度量衡的统一”等措施,互相支持,增强了社会对国家统一的认同。这些意识,也融进了汉字的字德,两千多年来成为每个汉字的基因,也成了书写者自律的潜规则。

二、反向性是汉语传承不息的重要密码

(一) 汉字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仅存的硕果

世界文字历史源远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欧多瑙河谷罗马尼亚的 Cucuteni 及周边多个村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泥板、陶人等文物,上面压写的古文字,把人类文字史推前了一千多年,使长期以来四大古文明的说法,要重新洗牌。以年代久远排序,新的四大古文明是多瑙河古文明、两河古文明、尼罗河古文明和印度河古文明。如果计入黄河古文明,则是五大古文明,或叫五大流域古文明。之所以不称为五大文明古国,是因为那时多瑙河流域还没有国家与等级制度。发掘出来密集的遗址显示,那时已经有了近似城市的群居社会,有矿址,也有了工艺制作坊;出土的数以千计泥板与陶件上的刻画,显示男女平等,更重要的是有了文字符号。^⑨

五大古文明中,黄河古文明虽然出现较迟,但却是硕果仅存的一员。黄河古文明中最令人骄傲的汉字,是世界文字中流传最久的语言符号。

汉字为什么源远流长?它传承不息的生态与它的反向性是否有着内在联系?要探索这一空间,首先要简明梳理五大古文明的文字发展:

7 000 多年前,多瑙河河谷的文字已经从绘图记事、象形文字,进入表意、表音的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有 700 多个字符,是世界已知最早的文明。字符的线段大多结构简单,有的类似今天的 V、U、L、F、Y、M、X 等字母,有的像楔形符号(见图 2)。^⑩



图 2 刻着类似英文符号的多瑙河谷陶人



图 3 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

6 000 多年前,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已走过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1 000 年后,其文字更进入象形文字逐渐消失、向着类似字母的楔形符号——古巴比伦文字演化(见图 3)。当时的文字可以用以记述史事、法律、贸易、医学、文学、碑文、祷辞及数学列表等大量高度文明的信息,甚

至可以演算一元二次方程。那时,黄河流域正处于文明萌芽期,先人用结绳记事。

5 000 多年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字,也进入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文字书写从圣刻体(或称圣书体)到僧书体(或称僧侣体),再到世俗体。由庄重书写向草写方向演变,而后又发展出一套音节系统,出现了字母的萌芽。同一时间,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图画与形符、意符、音符混用的印章文字,也向着类似字母的表音文字发展。那时,黄河流域进入了夏代,处于文字史初期,有了绘图记事,开始出现表形、表意的象形字符,先人可以在龟甲或牛骨上以数十个字刻记单一事件。再过 1 000 多年,出现了篆书,文字开始向系统化与规范化发展。这时,拉丁美洲的玛雅文字也开始形成。



图4 埃及象形文字与僧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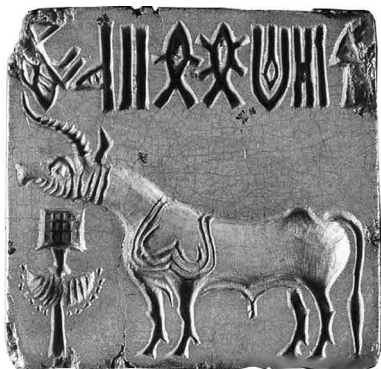


图5 图画与形符、意符、音符混用的古印度印章

多瑙河古文字流行了 1 500 多年后,随着移民潮的到来,在南欧与西亚字符的冲击下,逐渐被淘汰^①;两河流域的楔形字符风行了 1 000 多年,后来被更为简约、更为字母化的阿拉伯文字所取代;埃及古文字流行了 3 300 多年,最后败在闪米特人更简易的科普特体(古希腊字母)之下;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也存在了 1 200 多年,在类似字母的表音文字阶段突然消失了,有学者认为消失的原因与雅利安人的迁入及印欧语的传播有关,但有待进一步考古。在汉字之后兴起的玛雅文字流行了 1 500 年也退出舞台。只有黄河流域的汉字及其文明一枝独秀,穿越 5 000 多年时空,今天依然健存,充满活力,今后仍将传承不息。

(二) 反向性发展造就了汉字不可替代的丰富性

世界文字发展的主流是从形的书写向意的书写、再向声符的书写方向发展。如作细分,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绘图记事—以表形为主的象形文字—表形与表意混合的象形文字—形音义混合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与表音的抽象符号混合的文字—抽象声符(字母)。

文字书写的这种流向符合语言活动的发展规律。语言活动有两个台阶:一是话语活动,二是书写活动。话语活动是第一台阶,先有话语活动,然后才有书写活动。话语活动产生了记录思想情绪、记录事物等会话交流的需要。于是,便有了绘图记事,进而衍生出字符。话语活动产生无形的声符,书写活动则产生有形的字符。

为什么书写活动从声符表达的需求出发、最后到达字母阶段的过程,是世界文字发展的主流呢?这是因为话语活动是若干个基音与声调组合的表达活动,字母阶段的书写活动是用少量的、可以书写的、有形的声符来表达无形的基音,以取代曾经用过的、繁杂的意符。当书写活动与话语活动都能用若干个基本音符来表述时,二者自然合拍,为世界大多数民族所接受,并成为文字发展的主流模式。

全世界的文字都经历了前期的四个阶段,但进入了形音义混合的表意阶段时,汉字与西方文字分道扬镳,逆向发展。

西方文字在表意文字阶段后,都往抽象的声符字母方向发展,有的文字(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甚至滑过表意文字与表音抽象符号的混合阶段,直接由表意文字跳到抽象的字母。多瑙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诸多古文字消失,都是把舞台让给新兴的或外来的更简单、更易写、更抽象的声符字母。这一进程符合了上述语言活动的规律与需求。

汉字在前期的四个阶段中,从大篆到小篆,再到隶书,字形从繁到简,笔画从难到易,字数从多到少,也是朝着减少字符与易于书写的世界主流方向发展。如:改圆转笔画变为直线笔画,字符从战国时的 18 288 个大篆骤减到秦汉的 9 353 个小篆(据《战国文字编》与《说文解字》字数比较统计)。但在秦汉以后,汉字停留在表意阶段,再也没有跟随世界文字的潮流前行,而后更是背道而驰——当其他古文明的文字都淡出表意的江湖,朝着抽象字母的山顶进发时,汉字却固守山下表意的营垒,而且大张旗鼓、增兵扩军、拓展地盘。

当其他文字的笔画越来越简单(如英文字母简至不超过四画)时,汉字却以多笔画文字为主力(最长达三十一画)。尽管 20 世纪也简化了数以千计文字的笔画,但仍保留了五万多个笔画超过四画划的文字。

这种生态,使汉字偏离以声符字母书写的主流方向越来越远。

当其他文明的文字数量越来越少、少至只有二十多个声符字母时,汉字却反向发展,不断壮大以意符为主的字群。其数量膨胀之快从以下统计可以见到:公元一世纪时东汉有文字 9 353 字(据许慎《说文解字》收录),到了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有 22 509 字(据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收录);公元十四世纪的明朝永乐年间,增至 33 179 字(据明·梅膺祚《字汇》收录);公元十七世纪的清朝康熙年间,再增至 48 847 字(据清《康熙字典》收录);到了 21 世纪,更多达 56 100 多字(据《汉语大字典》1 992 年版收录)。

统计可见,从东汉到清朝约 1 900 年间,汉字增加了 39 500 多字,平均每百年增 2 000 多字。其中以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最甚,仅三百年间就暴增了 15 000 多字,平均每百年增 5 000 多字(见表 1)。文字数量如此膨胀,是世界文字中绝无仅有的。

表 1 古今主要工具书收录汉字数量比较表

工具书名称	编者/出版年代	字体及字数
《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	仅录小篆 10 516 字(异体字 1 163 字,实为 9 353 字)
《字林》(已佚)	(西晋)吕忱	仅录小篆 12 824 字
《玉篇》	(南朝·梁)顾野王	仅录楷书 22 509 字

(续表)

工具书名称	编者/出版年代	字体及字数
《字汇》	(明)梅膺祚	仅录宋体 33 179 字
《康熙字典》	(清)张玉书、陈廷敬	宋体 51 742 字(重复与错置 2 892 字,实为 48 847 字),另录小篆 10 293 字
《中文大辞典》	1968 年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宋体 49 905 字(部分含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草书等比较)
《辞源》	1979 年版(商务印书馆)	宋体 12 890 字
《汉语大字典》	1992 年版(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	宋体 56 100 多个。含部分小篆、隶、行、草、宋体比较。其中小篆 9 800 多字。
《辞海》	1999 年版(中华书局)	宋体 19 485 字
《战国文字编》	2001 年版(福建人民出版社,汤余惠主编)	宋体字 6 915 个,相关古文字字形 20 054 个。
《新华大字典》	2004 年版(商务印书馆)	10 100 字。含小篆、隶、行、草、宋体比较。
《新华字典》	2011 年版(商务印书馆)	宋体 11 200 字

表意文字在汉字与西方文字之间命运的反差,是因为西方的表意文字大多与声符分开,表意文字加声符才能满足语言表达的需求。当表意文字无法适应语音语法变化的活泼性时,而抽象声符字母的拼写又可以表达语言的需求,文字当然就朝着字母方向发展,表意文字自然被剥离、被淘汰。而汉字的表意文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无须另加声符,即可表达语言。而且,汉字语音与语法的需求不如西方文字活泼,如不需要前置词,不需要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等。汉字语音与语法的基本需求在表意阶段已经得到满足,所以不需要再朝字母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汉字在表意阶段停滞不前,还因为字形的正形化、结构的均衡化在小篆阶段已经成形;笔顺的规范化、笔画的直线化在隶书阶段也已基本定性。表意字形的结构形制更加成熟,不再需要进一步质化发展的空间。隶书之后的 2 000 多年间,尽管增生了数万新字,尽管出现了楷、魏、颜、宋、明体及现代大量的美术字与电脑字体,但它们都遵从之前的结构形制,不同的只是笔画风格。这一态势也使汉字的持续发展失去动力。汉字的生态,使世界文字形成了表意的形符与表音的声符两大模式。西方文字都以抽象的声符承载语言的需求,而汉字则孤军固守,继续以形音义混合的表意字符承载语言的表达。

汉字的个体字符绝大多数都有字义,甚至有表词功能。西方的个体字母则没有字义、更没有表词功能,只能以声符的拼写呈现词意。在这一点上,汉字比西方的字母拥有绝对的优越性。但在不断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新需求面前,汉字就处于劣势。西方文字仅仅应用已有的数十个字母的组合(有的少至 26 个,如英文字母),就能轻易生成各种新词汇。而汉字则显得无力招架,原有的个体字符无法表达新的概念时,只有造出新字符,才能满足新的需求。如化学周期表传入中国时,许多元素都要靠造出新字来表达。“氦”“氩”“镅”“铀”“碲”“砷”等新字,就是这样出现的。还有,为了满足词语细分的新需求,汉字也要增加字数。如第三者称谓的细分,英语是“he”“she”“it”,汉字则细分出“他”“她”“它”,繁体字中还有“牠”(用于动物)与“祂”(用于神祇)。西语的细分以 h、i、t、s 组配拼

写,都是运用已有的字母,并没有增加新字母,但汉语却要造出新字。这也是汉字数量越来越膨胀的原因之一。

所以,明朝之后,当西方文化东进渐强时,当社会急剧发展时,汉语新字就井喷式地暴增。虽然二十世纪汉字曾有过数次简化笔画的工程,但并没有废除被简化的繁体字,而是简繁共存,结果,推行简化字后,汉字数量不减反增。汉字这种反向的发展还在继续,只要有新概念、新事物、新需求,字数还会持续增加。

汉字的反向发展,带来了字库不断膨胀的烦恼。二十世纪,语言专家曾尝试改变这种大步倒退的生态,企图以注音或拼音取代汉字,但都无功而返。最后,注音或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读音标识,辅助汉语初学者的学习,并不适合出现在日常书写中。

汉字的反向发展,字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学习汉字更为艰难,需要调动更多的记忆。这种畸形生态,是一种固执。但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却造就了汉字的丰富性,反而衍生出一种优势,强化了汉字的不可替代性,成了汉字传承不息的密码与华夏文明的基因。所以,从传承意义上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较劲,反而成为一种美——文字生命的固执之美。

另外,为了管理数以万计的汉字,先人在造字早期时,就梳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文字,作为字根,进而发展成部首,并把所有的文字归辖于相关的部首。部首的运用,令繁杂的文字变得身份明确,归属有处,提高了汉字的系统性。使汉字虽然字数众多,但阵容不乱,检索方便。这些也优化了汉字族群的质量,进一步增强了汉字的不可替代性,使汉字的反向发展,仍有生命的坚韧性,仍有在世界文明中继续存在的空间。

(三) 反向对应形制造就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

除了字汇丰富性不可替代外,汉字的反向对应形制,也是汉字传承基因的组成部分。反向对应形制使汉字形体具有方正美、均衡美、稳重美与主体的对称美,还使笔画结构能蕴涵儒、道、法、阴阳学等智慧美。这些也是世界其他字母所无法承担的。这些美强化了汉字的个性,使它的华夏文明传承力更加倔强。

虽然汉字的书写不如字母那样轻巧、简便、流畅,但汉字所具有的内涵质量是字母望尘莫及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汉字强大的表意字汇,主力来自反向字形。没有这些字形,汉字就没有这么丰富的表达功能,就没有这么顽强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说汉字庞大而丰厚的字汇是繁茂的绿叶,那么字形的反向对应形制,则是汉字粗壮的树根与坚韧的树干。反向对应形制使汉字展示出不可拒绝的魅力,具有抵御外来文字侵蚀的反制力,能牢固地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为五千年长青不衰的丛林,自成气候,撑起一片蓝天。汉字的土地也曾被他族入主,也曾受到入侵文化的冲击,但汉字没有被外来文化所淘汰,没有在曾经的亡国中灭绝,反而被非汉族的统治者所青睐,使其气场阵容更加壮大。深究其因,正是由于具有上述的不可替代性与执着性。

综上所述,反向性所成就的汉字形态美、灵魂美与活力美、执着美,铸成了汉字不可替代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支持着汉字生命的基本结构和性能。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支持并传承生命现象中基本结构和性能的主要物质,是基因

(遗传因子)。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分子结构,它的外部是一对互相缠绕的螺形骨架式的磷基,内部是成对的、水平相系的硷基。磷基与硷基之间纵向与横向的有机结合,组成生命的基因。汉字也有类似的特性,形体美与灵魂美犹如一对螺形骨架的“磷基”,互相依托;而活力美与执着美则是内部成对的、水平相系的“硷基”,相互维护。汉字这种“磷基”与“硷基”的有机结合,相互缠绕,相辅相成,共同建构着汉字的体肤、骨骼、品格与性能,支持着汉字家族的繁殖。它们是人工培育的汉字基因,这些基因还衍生成华夏文明五千年薪火不熄的重要密码。

(四) 汉字的持续发展需要维护反向对应性与规范性

在谈及汉字的发展时,需要指出一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展开的汉字简化工程,不是一个全面类推与全面规范化的工程,其法则只适用于后来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8 105字,只满足于现代语言生活常用字的需要,即只考虑8 105字的通用性、现代性和规范性。由于是局部性的简化与规范化,所以允许《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繁体字不作类推简化,可以保留使用繁体字,这就造成了工具书与行文混乱的局面。在内地出版的字典中,除了仅收录简体字根的小字典(如小学生《新华字典》)外,所有在万字以上简繁字并录的大字典,都有部首不统一之弊。以《汉语大字典》的“言”部首为例,其所辖的1 115字中,有1 012字的左旁是“言”部首,另有103字的“言”部件在字的右旁或下方。如照简化法则,1 012字的左旁“言”都以可简化为“讠”。但字典中只有143个左旁为“言”部首的字获简化,其余869字则保留繁体字形。如果含有“言”部首的字,简化的及保留繁体的两种字形共处一文,势必带来了偏旁部首不统一。这仅仅是“言”部带来的不规范的苦恼,还有“门”(門)、“钅”(金)、“贝”(貝)、“页”(頁)、“车”(車)、“丝”(絲)等部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文字简化是书写的需要,也是发展的方向。但汉字既然要固守表意文字的身份,在简化时就不能弱化表意文字的鲜明个性。汉字的表意特征除了形音义外,反向对应形制也是一个重要特征。历史上,汉字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简化工程,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把18 288字精简成9 000字,把笔画复杂的大篆简化为简单的小篆。这是一次全面的、规范性的简化工程,简化后的字不但没有削弱字形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反而强化了,增加了更多的对称字。小篆后来虽然被更易书写的隶书、楷书所取代,但新字体都固守反向对应形制。特别是具有对称性的部首,两千年间中从未被易容,一直是众多部首中的亮点。

秦国成功的汉字简化工程,为文字改革发展树立了典范。祖先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汉字可以改革,可以简化,但不可以削弱它的表意特征,特别是不可以削弱它的主要特征,即反向对应形制,尤其是不可以为了减少笔画而摒弃反向对应性。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强化它的表意特征。

但二十世纪汉字的简化工程,却不尽如人意。简化字中,有成功的,也有败笔。成功的是既简化了笔画,又维护了、甚至加强了均衡性与对称性,如“态”(態)、“变”(變)、“画”(畫)、“灭”(滅)、“关”(關)、“阳”(陽)、“数”(數)、“继”(繼)等字;败笔的,多是摒弃了原有部件的均衡美与对称美,如用源自草书的“门”“讠”“钅”“贝”“页”“车”,取代正体字的对称

部首“门”“言”“金”“贝”“页”“车”。虽然减少了笔画,但使相关的字形都失去生动的形象美或会意美。结果,既削弱了汉字的反向对应形制,也削弱了它的表意特征,还弱化了字形的内涵与历史感,特别是弱化了汉字中儒、道、法及阴阳学等先人智慧对读写者的潜移默化,得不偿失。其中,“门”“讠”“钅”“贝”“页”“车”六个偏旁部首所辖的字,如都依例类推加以简化的话,受影响的字就有 3 834 字(以《汉语大字典》录字计)。这种文字生态的变异,使民族文化的精彩符号蒙受损失。在毁誉参半下,虽然有文字改革部门果断停用了后来几批的简化字方案,但还是伤害了数以千计汉字的反向对应性。更尴尬的是,这种只简化常用字但不简化其他同部首文字的局部措施,增加了汉字字典编辑工作的难度,也使含有较多非常用字文章的书写出现了不能统一规范的局面。汉字这种尴尬的生态,使文字改革进退两难。目前,只能保持通用层面常用字的稳定性,难有全局规范性的作为,除非重新洗牌,进行全面的规范化改革。这个教训,是一个苦果,对今后汉字的改革与持续发展有着警示作用。我们不能让汉字—祖先的宝贵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弱化了特性,大失光彩;也不能只考虑当下的需求,只作局部的文字革新,而不作历史的、全局的考虑,更不能进一步加剧整体字库规范化的混乱,影响了华夏文化传承的质量。

三、结 语

汉字是祖先高度智能的产物,是世界上唯一至今仍在使用的古文字。汉字之所以传承不灭,与字形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以及汉字反向性发展息息相关。反向对应形制,在汉字字块的正形性、字势的均衡性与部件的对称性中,都起着导向性、制约性的作用。它不但造就了汉字形体的视觉美,而且赋予汉字灵魂美。视觉美,使字形具有中正、稳重、平和的形象;灵魂美,使笔画结构之间折射出儒家、道、法与阴阳家等先哲的智慧,酿造出千古字德。其中,具有强烈个性的对称字,成为世界文字中独特的亮点。而汉字的反向性发展,更使汉字具有活力美与执着美。活力美给予汉字旺盛的繁衍力,成就了汉字的丰富性,壮大了字群的阵容;执着美,给了汉字持久的逆向力与固化力。形体美与灵魂美,活力美与执着美,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汉字的骨骼、品格与性能,支持着汉字家族的繁殖。它们的有机结合,不但组成了汉字的基因,而且衍生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密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汉字反向性的研究,是国学不可忽略的重要财富。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第 3 页、第 23、177 页、第 77-78、401-403 页、第 1170-1175、1194-1196 页、第 706-708、1130-1134 页。

② 沈康年:《古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⑨⑩ [德]海拉·哈尔门(Harald Haarmann):《文字的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 der Schrift*),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 1998 年版,第 12、22-25 页、第 120-122 页。

⑪ 上世纪七十年代,多瑙河谷古文字的发现因为是前苏联考古家的成果,受到西方的冷落。而后苏

联政权解体,考古一度搁置。上世纪末,相关的文物在欧美多地展出,重新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目光。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海拉·哈尔门先后在《欧洲早期文明与文字识读——文字在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连续性探论》(*Early Civilization and Literacy in Europe: An Inquiry into Cultural Continu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 1995 年版)、《文字的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 der Schrift*)(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 1998 年版)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七千年前多瑙河谷的古文明。

(陈藩庚,男,1946 年 3 月出生,籍贯福建省福清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教授,已退休。研究方向为国际华文文学、汉语及反向思维。)

论中华语文双轨发展机制及建构语文学的意义*

◎ 周金声 王佳平

摘要:在全球语言领域中华语文是最独特的一种存在,其语言与文字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独立的体系:中华语言是用音节声调表达意义的音频系统;中华文字是用笔画构形表达意义的线条符号系统。从中西语言发展史看,英语为代表的语言是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体系。而中华语文没有像拼音文字那样弱化了以形表意的功能,而是始终保持了示形标音的特点,最终赢得了语音向文字靠拢的结果,形成了“一字一音一形一个概念”的总格局。可以说汉语是以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学体系。现行所称的汉语言学应该是中华语文学(包括语言学与文字学)。我们应从中华语文生活和实际出发建立中华语文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语言文字 中西比较 中华语文

中国古代汉语是以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构成的语文学研究体系。而近百年的现代汉语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舶来的语言学理论系统套用到现代汉语实践的,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梳理复杂的现代汉语现象发挥了不小作用,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周清海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处在“汉语大融合时代,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更宽阔的视野,去研究语言和语言教学问题”,并认为“华人和中国人,在语言文化上的认同,远远超过政治上的认同”,由此提出“大华语”的概念,促进“各华语变体趋近趋同”,从而构建起“全球华人共同语”的理论体系。^①香港大学英文学院教授童庆生也认为:“重新认识、理解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理念和实践既是全球化的要求,也是在文学、文化领域对全球化的反应。……我们自然而然地重新将目光投向语文学的传统和汉语观,汉语因而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直接接触的纽带和媒介。”^②本文想就中西两种语言体系做一些历时比较,发现汉语独特的发展规律,希望对创建具有中华文化本色的中华语文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语言与文字

语言产生于何时,怎么产生的,一直是个谜。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认为大约公元前7—前3万年产生了语言、公元前7000—前5000年发明了文字。^③推想早期智人在群体活动过程中需要合作交流,总是会借助声音和动作表示需求意念,所有动物都会如

* 本文系2017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字本位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成果之一。

此,比如雄性求偶都会鸣叫或者跳跃舞翅,有的还会借助一些物品表达意思。或许因为张口即来的原因,语言系统发展比较快。人类随着直立活动解放了双手,智力和生理能力获得发展,学会了用复杂的表意声音系统进行交流。可以推测,与之相伴的各种肢体动作甚至使用一些物品形态协助表意方式也一定很丰富。比如在《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甲骨文和金文都保留有结绳记事方式的痕迹。金文的数目字“十”就写作“𠄎”、二十就写作“𠄎”,明显是从结绳实物发展来的,也有认为数字最初是从手势发展来的。而且,大多数动物的视觉触觉敏感度都十分高,直立人的视觉分辨能力也一定很高。当时人们常常通过辨识野兽的足迹判断其类别、走向、大小,决定避险还是捕获,就是现代一些深山猎人也总是凭借动物的脚印判断这个动物的大小体重、雄雌甚至年龄,他们运用这类视觉触觉形态的东西进行交流表达有时比语言还要多。因此,原始人借助音意约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借助形意约定的视觉形态表达能力应是同时发展的。这些视觉形态经验自然而然地积淀于远古壁画中和有某种表意作用的契刻线条中,逐步地转变为约定俗成的某种符号化信息系统。许慎《说文·叙》就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图腾形象、某些岩画、宗教仪式或者肢体舞蹈等都是借形表意的模式,都会对文字符号的产生造成影响。这个过程比语言的形成更加困难,经历过几万年的时光才有了文字的雏形。

《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说:上古时候,很早就有了语言,而且天下人都说一种语言。于是人们聚集起来要修一座高耸通天的城塔,以显示人们的力量和团结。塔很快建起来了一半,惊动了天庭的耶和华。他见到塔越建越高,暗自思忖,天下的人们都说一种语言,团结一致,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那神还怎么去统治他们?耶和华就施魔法变乱了人类的口音,使人们无法用同一种语言沟通,高塔最终没能建成。这个关于“通天塔”的传说,说明语音语言发展快,最早的人类至少是欧洲人的语音是接近的,可以无障碍交流,与共同的形体物象表意的一致便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个一致就有了通天塔的故事。

所以世界上最早最古老的圣书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都是象形的,都是沿着借形表意的系统独立发展而来的。借音表意的语言系统与借助肢体动作或者某些物象表意的系统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很难知晓,但一定有联系,比如当人用手招呼队友的时候自然会发或是“lai lai”或是“Come on”的呼声,不同族群招呼的动作可能一样,但发声不一定相同。所以最初造字未必都有声音,就是有声音也未必只有一个音。诚如赵元任先生所说:“世界上古今的文字跟语言,虽然一直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密切的程度在各时代各民族很有不同的。”文字的语音都是人为加上去的。^④约定的形义大约相对稳定,而形音未必一样或者未必都明确。就像现在的哑语,有一系列动作表情表意,甚至也会伴随一些声响,但表意形体动作是传情达意的主体。远古时期的智人很可能就是从这种形体动作和结绳绘画逐步创造了表意的文字。有的应该会与语言匹配表达,有的未必都有语音,或者各族群语言语音对应的文字符号也不尽相同。甲骨文就有许多形意相近而书写不尽相同的文字,其发音就更不一致了。所以可以推测,远古的语言音义关系紧密,而后起的文字形意关系密切,有形音关系但不是很紧密。可以说,语言与文字是分别在联系不是很密切的两个渠道发展的。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⑤这个发展关系线索可以用图1

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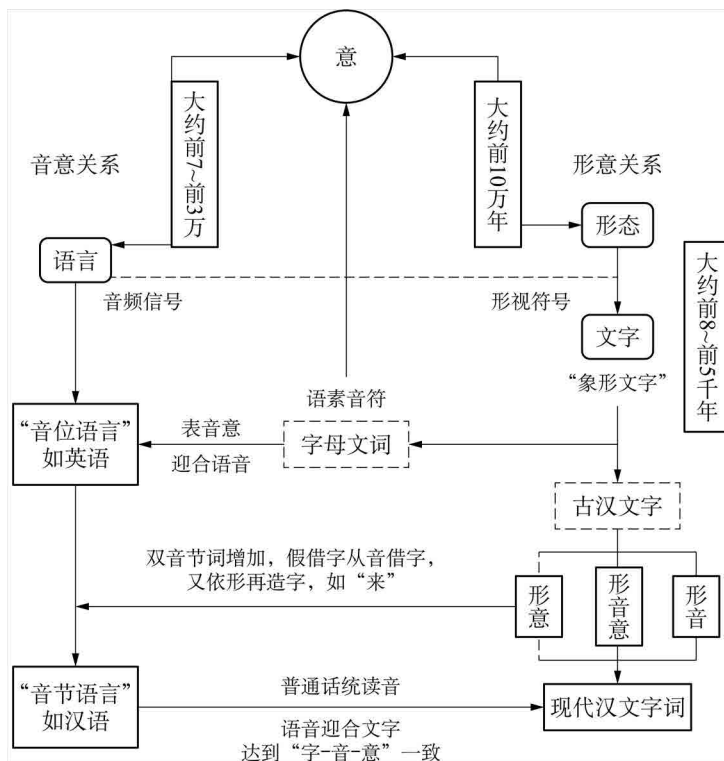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与文字发展关系示意图

借音表意的语言发展与借形表意的文字发展路径仿佛是两股铁轨，两者之间存在条条枕木，有多重联系，都以表意为旨归，但绝不是同一轨道。正如赵元任所说：“文字与语言不是一个东西，但是文字跟语言的关系的密切，是用不着说的。”^⑥索绪尔也曾说过：“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⑦而后来西方人却从原来的表形音义关系的文字系统中抽象出表音的字母符号，只用字母表示语音音素来表达语义，削减了或者说淡化了形意表达的功能，而强化了音意功能，逐步形成了后来的表音文字，即“用26个字母来记音的文字，希望并且能够达到准确记音”的文字。^⑧可以说是文字向语言缴械的结果。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的理论，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⑨结果是一种语言就形成一种文字，从局部说达到了语言文字的一致，便于认读了；从人类说就分裂成了许多小群体，最终没有形成合力造成通天塔。而“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即在于汉字图象先于声音。图‘象’而非‘图像’，是汉字发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象形’‘象意’之‘象’，是汉字符号具有审美特质的重要标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最大不同，在于汉字是以图象为先导、为先在的‘图一式’，所以，具有更丰富复杂的涵茹。与其他文字相比，具有的文化含义更加丰富。图象，是汉字演化孳乳的源头，也是汉字存在的主要

方式,还是汉字发展的重要动力。”^⑩

2000年,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哈里斯(Roy Harris)出版了《文字再思》,提出“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与语言是两种平行的符号系统,从交际角度看,文字远比语音更有权势”。^⑪

二、中华语文的独特性

中华族群的表意方式是一直沿着语言与文字天然的渠道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今天的,没有走西方拼音文字转向语言缴械的道路,始终保持了汉语言与汉字两股轨道并行发展的向度。汉语言从先秦的雅言到近代的白话国语,再到今天的普通话,逐步走向大一统;汉字依然保持着以形音意协同运用的本质特征。汉字虽然千百年来受到语音甚至外来语的影响很大,由原来的单音节字词占主流到现在多音节字词比重更大,但始终没有脱离以形表意的主体轨道。诚如申小龙所说:“认读拼音文字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认读方块汉字却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汉字不怎么依赖语音,可以由字形直接到达意义。”“文字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字形和字义的统一。文字可以‘形入心通’。”^⑫

进入信息时代,尽管有人认为“语言就越来越成为安卧在硬盘里或奔流在光缆电话线中的0和1组成的序列比特”,但这个序列比特依然绝对是建立在人们对音意和形意关联的约定俗成关系之上的。概括起来说,汉语发展还有以下几个本质特点。

(一) 汉语音方言多元,而汉字始终一脉相承

牛津大学语言学系前主任罗伊·哈里斯认为:“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王立军先生说:“‘音’在甲骨文时代和‘言’是同一个字。……金文以后,人们为了区分‘音’和‘言’,便在‘言’字的部件‘口’内加上了一个小短横以表示区别。”^⑬鲁川、王玉菊《汉字信息语法学》也认为“汉语的文字和语音是平等的”。^⑭从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来看,不要说多民族语言存在差异,就是汉民族都存在十里方言相异的情况。文字初创时期也是多种写法,各国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命李斯主持统一了文字,功劳概莫大焉。从此汉语汉字就有了统一的标准,也为孔子推崇的“雅言”(官方语)提供了参照。之前孔子奔走列国,特别需要各国都便于接受的通用语即当时的雅言,但那时各地的语音一定不尽相同,想必甲骨金文起了不少重要的交流作用。统一文字后,各郡政令交接就主要依靠统一的篆文,后来出现了隶书、楷书,而且不断地规范和简化,直到今天的简化规范汉字。纵然千百年来出现了约8万个汉字,但在任何时代经常使用的汉字不会超过5000个。“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譌其说。”(许慎《说文解字·叙》)由于汉字承担着主要的文化传承作用,纵然历经3000年,书体数变,读音差异更大,甚至由文言到白话文,其常用字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如图2所示。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标准字体
甲骨文·10·1	中山王鼎	说文解字	曹全碑	敬使君碑	范仲淹	智永	印刷字体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标准字体
前 10·1	中山王鼎	说文解字	曹全碑	敬使君碑	范仲淹	智永	印刷字体

图2 “手”字、“仁”字字体的演变

如今虽然甲骨文字大多数还无法确认,但现代汉字中有许多可以从甲骨文中找到字源字根,有的字还可以从更早的图画契刻遗迹找到根据,充分说明汉字产生以来一直是沿着原生态的逻辑发展演绎的,最终统一到小篆。这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凝聚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二) 由多样到统一,由繁到简,基本形态未变

就汉字本体来说,最初的甲骨文书写各国不同,一个字常有几种写法,比如:“学”字就有8种写法,如图3所示。



图3 甲骨文中“学”字的写法

虽然形态各异,但基本形象是两只手在操作什么。有人认为是双手在结绳索,既是劳作的形象,意味劳动实践获真知,也是在结绳记事,意味着知识获取和积累。唐兰认为“就像两手布爻的形状”,其中“x”就是“五”,“人”形就是“六”字,可以理解为双手摆弄算筹之形。无论表达什么含义,都是基于其基本的形态表意的。纵然初期有多种形态的写法,最后都归于篆楷隶统一形体。^⑮

从书写体式来看,繁简写法都有,但大多数是先繁后简,由繁至简。比如车的写法如图4所示。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繁体标准	简体标准	简化方案		
									采用简体楷书字形(利用草书字形整体简化。)		
铁 1603	铁 980	车且丁爵	顿若车节	说文解字	汉隶书	颜真卿	颜真卿	唐寅	智永	印刷字体	印刷字体

图4 “车”字的简化

甲骨文的书写很像简笔画,尽管写法不尽相同,但明显看得出来所指物象。后来逐步简化规整一致,形成了现代汉字。

即使由于概念的丰富发展,滋生出更多的字,往往有许多字来自同根同源,诚如许慎所说:“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比如“电”“神”“伸”字的演变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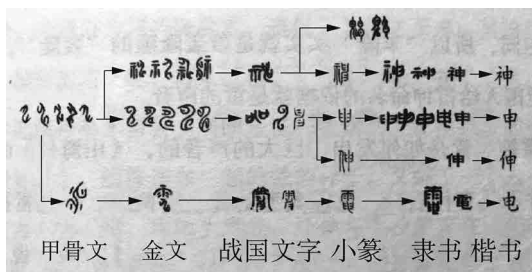


图5 “电”“神”“伸”字的演变

甲骨文中的“电”“神”“伸”可能是一个字兼备三意,就这个字的写法也有七八种之多,虽有异同,但都是以曲线为主体,左右分别有一条曲线蜿蜒伸出。线条上下折曲,仿佛闪电撕裂、伸缩不定的样子。后来为了区分三者的意思,分别在这个字根上加雨字头,而写成“電”,加上示字旁就成了“神”,加上单人旁就有了“伸”。^⑮无论怎么发展,其字根的形态没有改变,这就为后人传承汉字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充分显示出汉字的规律性和科学性,表现出中华先贤高超的智慧。

(三) 汉语语音趋向普通话,普通话统读音趋向汉字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分为音韵学和小学(文字学),研究发现:“语言是不固定的,一代一代都不同。”^⑯文字发展相对稳定,传承线索清楚,而“在漫长的语音发展过程中,有的不止发生一次音变”,常常“音随字转”,一个字的语音往往受各种形体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的是因为其本身形体变化而造成读音的变化;有的是受与之形近的另一个字的影响或同声符的一组字的读音的影响而发生音变;有的则是因为误认声符而改变读音;有时候则是因为人们误认两字为一字异体,使得两个字的读音互相影响。也有“字随音变”的情况,文字受音的影响而造成形体上的变化。^⑰但大多数音变“要紧的是有规则的,不管转得有多远,所以中国往往说某某字就是某某字,因为都是‘一声之转’。……可以说‘一声之转’,是一个字”。^⑱进一步说:“用一个文字单位写一个词素,中国文字是一个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一字一言的,就是中国文字。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用是多数字——所谓叫拼音文字,他不是一字一言,是一字一音。”而“‘字母文字’——文字的基本性质就是写音位不写词素的文字”。^⑲

考察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一方面是“文字这个东西既然成立了一个制度,它就有自己的独立的趋向”。另一方面“在口语里头,从古时候到现在,许多音变得简化了。……同时口语里头,用复音词的时候多,所以说话时候,并没有感到什么说话不懂的时候。可是你要照古文,多数一个单音语素就是一个独立词,在那种情形啊,照现在的古文今读,不但同音字多,连同音词也多了。所以结果就有光听声音不够分辨的问题”。赵元任先生举出了三个例子,很能说明离开了字有的语音就无法明辨。^⑳所以汉语语言一方

面在不断简化,一方面多音节词语增加。简化的趋向一直发展到当代普通话统读音的推广,将社会上对某一字词多种发音的情况经过统计归纳和选择确定一种读音,以减少重复音节的混淆,通过法定程序加以推广,最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反复论证选择,最终达到了现代普通话相对统一的读音,而这个统读音基本上是按照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设想和呼吁发展而来的。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也就是说,统一的国语离不开文学文本,语言的语音统读要依赖文本字词的确认。所以不难看出,中国语言的发展最终是向“字”靠拢的,是依据字为载体的。最后真正达到了徐通锵先生所说的汉字的结构格局“是通过‘形’表现出来的‘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境界。^②

三、结 论

牛津大学前语言学系主任罗伊·哈里斯认为:“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③即使西语在产生初期也是这样。后来西语文选择了拼音文字化的道路,以音意表达系统为主体,文字成为记录语音的符号,依附语音,本身的形象性很弱,不足以借形传情达意,需要借助音义约定俗成关系,依赖句法结构弥补语言音意容易混淆的不足,最后形成了结构语言模式。所以,西方称研究语言的学问为“语言学”名至实归。而汉语语言与文字一直保持两条轨道并行发展的格局,相辅相成,既各自独立又互动互补。从古音韵学、文字学(小学)到今天的学科发展应该依然有“语言学”和“文字学”两门学科,统称为“语文学”,不能简单地与西语“语言学”等同视之。中国语言界研究的权威的杂志之所以叫《中国语文》《语文教育》,道理就在这里。

汉语发展最终的趋势是语言向文字靠拢,形成“一字一形一音一个概念”的格局,只要明白了每一个字的形意关系(本意和引申义)怎么组合都能进行交流,可以说汉语是一种“合意语言”,不是特别需要依赖结构表达的语言。诚如著名汉学家白乐桑先生所说,中文是一种典型的以表意文字为基础、没有时态文化的语言,这对人类来说很独特,西方永远也不会有以这样一种语言文字为基础思维方式。这就是中华语文区别于西方语言的根本之处。

综上所述,借鉴潘文国先生对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④我们认为可以再加以概括“语言文字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认知的信息系统”,华语是“以音节声调表达意义的音频系统”,中华文字是“以笔画构形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两者共同构成中华语文体系。中华语文教育侧重于对修习者进行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语文运用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上升到语文文化和文学教育,这就是中华语文教育与华语文学教育的关系。

注释:

① 周清海:《“大华语”与华文教学》,《国际教育学报》2017年第1期。

② 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

③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兴出版集团2014年版。

④⑥⑦⑨⑩⑪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0页、第8页、第129页、第133-134页、第144-145页、第149-150页。

⑤ 杨雄:《发言·问神》。

⑦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页。

⑧⑭ 鲁川、王玉菊:《汉字信息语法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第5页。

⑨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6页。

⑩ 骆冬青:《图象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51页。

⑪ 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哈里斯独自重新译注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撰写了两部研究索绪尔的专著。

⑫ 申小龙:《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11、225页。

⑬⑮⑯ 王立军:《汉字的文化解读》,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97页、第75页、第61页。

⑰ 叶玉英:《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⑱ 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⑳ 转引自潘文国:《汉字是汉语之魂——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8页。

㉑ 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周金声,男,1957年出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湖北工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人文教育、国学研究;王佳平,1982年出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信息人假说”的反思与重构*

◎ 李文明 吕福玉

摘要:人性假说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出发点。不同的人性假说,会产生不同的人文理论。人性假说的演变,势必导致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推陈出新。既有“人性假说丛林”已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需要,依据它们而形成的相关“理论丛林”,也遭逢难以突破的困境。因此,将人性假说从经济、社会维度拓展到信息维度,在“人性假说丛林”中,反思与重构“信息人假说”:信息人是出于天然信息本能、独具强烈信息欲望、拥有多元信息需求、要求明晰信息知晓、本为中性信息人性,以信息的生产、加工、处理、传输、服务为主要活动方式,并通过这些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自我发展的人类群体;信息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活动,均出自其信息人性及其发展之需要。“信息人假说”的当代适用性,在于增强对“数字原住民”这一新“物种”的认识,为发展信息学奠定学理基础,并为信息生活的进一步数字化做好必要准备。

关键词:“信息人假说” 信息本能 信息欲望 信息需求 信息知晓 信息人性

有研究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提升人类文明层次的三大动力分别为:食欲、性欲和“信欲”。^①这里所谓“信欲”,指的是对信息的渴望与追求。人们常说的“求知欲”,即源于这种“信息欲”。此乃人的生命持存之必需,亦为人的发展之首要源泉。可以说,信息欲是人更为基本的欲望。古之所谓“食、色、性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但这显然局限于人的自然属性,或曰动物属性。“信欲”,纯粹是精神的,而且是无限的,它将整个世界,推进到前所未有的信息文明时代。当代人对手机信息的依赖程度,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人对信息的欲望,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需要与追求。不仅如此,无论是作为社会个体还是社会整体,人无不在追求“必要信息”的基础上,刻意追求“充分信息”。从整体上看,全球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道路上稳步前进:^②2011—2016年,全球信息社会指数(ISI)年均增长2.76%,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6年网络传播研究院校级招标课题“发展信息学引论”(YA2016002)、四川网络文化研究中心2017年度开放课题“网络文化生态综合治理研究”(WLWH17-16)、四川理工学院产业转型与创新研究中心课题“产业转型与创新的信息机理研究”(CYZX201707)的阶段性成果。

预计2018年,全球将整体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中国信息社会发展尚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但是近年来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可以说,从移动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当代社会人类对于信息孜孜以求的生动写照。按照百度总裁张亚勤的说法,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索引(action),可以在真实世界将人与服务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工作或生活(Smart Plus)。^⑤信息技术的进步,势必使人的信息化浮出水面,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世界的信息时空与思维方式,乃至人的本质属性。

一、“人性假说”的学术范式

人性假说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出发点。^④不同的人性假说,会产生不同的人文理论。人性假说的演变,势必导致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推陈出新。

(一)“人性假说丛林”扫描

人性假说,亦称人性假设。古今中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无不以人性假说为基本前提。^⑥若按时间顺序,则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人”假说(1776)、梅奥(George Elton Mayo)的“社会人”假说(1933)、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自我实现人”假说(20世纪50年代末)、沙因(Edgar Henry Schein)的“复杂人”假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等。此外,还有诸如“工具人”“生物人”“理性人”“成就人”“道德人”“文化人”“博弈人”等人性假说,共同构成“人性假说丛林”。其中,除“经济人”假说“社会人”假说广为人知外,“自我实现人”假说认为,人的需要之顶级层次,乃是以高效与完整的方式表现其丰富潜力;“复杂人”假说则揭示,人是极其复杂的,人的个性不仅因人而异,而且还因时、因地、因地位和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异。

人性假说尽管纷繁多样,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经济人”假说和“社会人”假说。所谓“自我实现人”“工具人”“生物人”“理性人”假说,可以归结为“经济人”假说,因为“经济人”包含了个人价值实现等因素。但“经济人”假说不能将人与动物决然区别开来,因为“经济人”假说侧重强调人的个体性与私人利益,有忽视他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嫌。更何况,当今社会,人性维度已不限于经济之一隅。所谓“复杂人”“成就人”“道德人”“文化人”“博弈人”假说,则均可归结为“社会人”假说,因为“社会人”包含了文化创造、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

既有的“人性假说丛林”已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网络社会、虚拟世界和智慧地球的需要,依据它们而形成的相关“理论丛林”,也遭逢难以突破的困境。

社会选择理论的领军人物、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提出“信息扩展”的理念,其实质是修正理性人假设,承认社会选择中价值、伦理、感性等因素的作用,旨在实现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统一。^⑦受此启发,笔者提出“扩展信息”的构想,将人性假说从经济、社会维度拓展到信息维度,在“人性假说丛林”中,反思与重构“信息人假说”。

(二) “人性假说”的学术范式

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均建立在有关“人”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之上。^⑦“人论”或“人学”,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学术范式。

然而,正是对人的研究,遭遇到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因而,研究复杂事物的路径,总是呈现为自由度的缩并。经典经济学研究生产发展的复杂性,就是首先将人的各种需求抽象为“经济人”而实现自由度缩并。然而,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经济人抽象已无法概括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多维追求,也就是无法实现信息化社会人类选择的自由度缩并。

当今世界,信息化正在使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越来越高水准地实现有序化。^⑧在这样一个高度有序的社会中,当我们重新审视在这场巨大社会变革过程中人性之特质时,不难发现,“经济人”“社会人”等既有假说对人性的描述,已因偏于一隅而凸显过时,唯有“信息人”更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中国文化情景中的人性假说,更是内在多维的、立体的和对称的,只有在信息人理论上,才能准确概括。迄今为止,如果要用一个维度的人性假说来概括人的立体化的多维选择之本质的话,那只能是信息人。因为信息的抽象程度最高,只有在信息层次上,才能抽象出各个维度的内涵本质,从而整合起来表达为信息人。实际上,信息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新的人性假说所代表的人性需求,既是保证信息科技发展的现实依据,也是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与不竭动力。

二、“信息人假说”的理性反思

与“经济人”“社会人”这些专指名称相比,“信息人”还是一个较新的提法,属于尚未加以深入研究与系统讨论的概念。

(一) “信息人假说”的提出与演进

信息人假说的理论背景,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九世纪。当时盛行机械唯物观。在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眼中,“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游丝,关节不过是一些齿轮”;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La Mettrie)则提出“人是机器”的命题。

1. “信息人假说”的提出

历史上,最早提出信息人概念的,是美国情报学家兰卡斯特(F·W·Lancaster)。按照他的观点,信息社会中的关键因素,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人——信息人。^⑨在他看来,成为现代信息人的必要条件是:敏锐的信息意识、良好的信息能力和合理的知识结构。由此可见,兰卡斯特所说的信息人,系狭义的信息人,即具有一定信息意识、信息素养和文化知识水平的人,并特指专门从事信息工作的人。

在国内率先明确提出信息人概念的,是卢太宏教授。他认为,在信息时代与信息文化的生态环境下,人逐渐形成某些具有共同性的信息行为与信息心理,它们构成了人的一种后天性的特质。于是他提出,当我们撇开人的其他方面而专门讨论这种特质时,可以把人

看作或抽象为信息人。^⑩

在国内较早提出“信息人假设”的是朱红,不过她使用的是信息人的特指含义,就信息工作人员而立论。^⑪

2. “信息人假说”的演进

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国际上对信息人概念的运用越来越通行,国内也开始关注“信息人假说”,并对此展开论证。

(1) 信息基质说。余潇枫教授即从人的本性出发研究信息人,指出信息需求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本能。^⑫作为“信息动物”,人不仅生活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人自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这是一种广义的“信息人假设”。这种说法侧重从人的生存状态中信息交换过程的角度分析,除论证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外,还断定信息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特定“基质”,并认为人的本质提升取决于信息交换方式。

按照这种说法,正是信息基质决定了人在根本上是信息人,或者说信息人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2) 人性嬗变说。这一说法侧重从信息化时代人类对信息的依赖性论证,不管是物质需求、精神消费,乃至关乎人类意识层面的自信,都同信息获取息息相关,因而人类是信息人。

持这一说法者李德昌先生,还运用信息向量,从“货币信息”“权力信息”“知识信息”“情感信息”“艺术信息”和“虚拟信息”等多个维度构建信息力学模型,力图解释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困惑,并断定从本质上说,当人们的信息消费超过食物消费时,人类就从“物质人”嬗变为信息人。^⑬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⑭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3.9万亿元,同比增长22%。^⑮这些数据,为信息人嬗变提供了实证依据。

3. 现有“信息人假说”的根本缺陷

立足信息时代的多元化现实,我们可以发现,现有“信息人假说”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4. 狭义“信息人假说”缺乏学术张力

国内学者对信息人的定义,与国外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大多指狭义的、后天的信息人,与人后天形成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信息能力、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平等信息心理与信息行为密切相关。有时还特指专门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员。

这样的“信息人假说”流于简单而缺乏学术张力,不能突破“经济人”与“社会人”假说的局限来论证人的信息特质。

5. 广义“信息人假说”疏于严格论证

广义“信息人假说”提出,信息人就是信息场空间中的六维信息向量,即“货币信息”“权力信息”“知识信息”“情感信息”“艺术信息”和“虚拟信息”,并认为六维信息向量既独立又统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⑯问题是,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知识信息”与“艺术信息”之间难以厘清界限,连“货币信息”也呈现出虚拟化的趋势。从数字支付的日益普及到比特币进入交易市场,着实让“数钱数到手抽筋”变得“过时”,也让“钱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串数字”草根化了。至于“虚拟权力”“虚拟知

识”“虚拟情感”“虚拟艺术”等“虚拟信息”，也足以同实体的“权力”“知识”“情感”“艺术”等实体信息分庭抗礼。

更缺乏论证的，是所谓“信息复杂全息人”假设(Information Complex Holographic Person, ICHP)，^⑩也就是把人看作是一个全息性、量子化的以及具有自主意识和自适应性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巨复杂自适应智能系统(Giant Complex Adaptive Intelligent System, GCAIS)。这种基于“格赛思”的“信息人假说”，更是难免过于复杂而疏于论证。

三、“信息人假说”的跨学科重构

将人理解为信息人，有利于更加有效地破解信息时代的人类生理、心理、行为、情感和思想以及人怎样在与各种信息的交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的奥秘。^⑪对信息人的研究，将是多学科、多角度、多目标的。因此，有必要跨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对“信息人假说”的基本框架进行全方位研究。

(一) “信息人假说”的基本内涵

“信息人假说”的重构，应实现信息人概念的深化与扩充，即将原有的“从信息需求到信息知晓”这一链条，向前延伸到“信息本能与信息欲望”环节，同时向后延伸到“信息人性”环节，^⑫从而建构将“信息本能—信息欲望—信息需求—信息知晓—信息人性”一线串珠的“信息人假说”。

1. 信息本能：人体即信息

信息人(information man)是“社会人”的高级形态，具有“社会人”的心理特征与“自然人”的生理属性。^⑬换句话说，人首先具有一种天然的“信息本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模仿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说法，明确提出“人体即信息”，即将人整体地看作是一个拥有庞大信息库的信息综合体，其存在是由信息构成的，并以信息的接收与在此基础上的反应为活动方式。

这一信息人维度，可以从基础性本体论去把握。^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在世”必须从“实际性”来理解，这个实际性就包括“身体”。身体的概念，强调身体对现实环境的感知与互动。身体总是处于特定的场所、情境和语境之中，与周围的事物产生包括因果、关联在内的各类互动。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身体—主体”概念，试图克服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缺陷。“身体—主体”这种延伸就是知觉。这种回归身体、知觉的哲学本体论，对“信息人假说”的重构极富启发意义，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体”。

由图灵所导致的多媒体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根本变化，就是揭秘人类行为者的相互关联性，即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实际上，人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已经把自身信息体化(inforgize)了。自古已有的形体语言表达，到如今“小鲜肉”“颜值”走红，无不印证着人体即信息的信息本能。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与物联网的发展，作为信息体的人，若想不被智能机器挤得无业可就，而是能够驾驭智能工具为社会服务，就必须切

实提高自身的信息处理潜力与效能。^②

2. 信息欲望：人是信息处理机

信息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作为个体的人，犹如一台电脑，实际上是一部处理信息的机器。大脑，就是人的“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人体由各类细胞组成并构成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各司其职，在大脑的统一协调下支持生命整体运行。人体细胞各有不同的寿命，然而只有脑细胞，才几乎伴随人之终生：^③

表1 部分细胞平均寿命的参考数据

细胞	寿命	细胞	寿命
红细胞	120天	精子	2—3天
血小板	10天	骨细胞	25—30年
胃细胞	2天	脑细胞	约与人寿命相同
皮肤细胞	19—34天	肠壁细胞	1周左右

脑细胞几乎终生相伴，使人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信息欲望，令这台信息处理机近乎日夜不停地忙于信息的选择、获取、加工和处理等一系列活动。由此可见，人脑在本质上不是物质系统，而是信息系统。换言之，人在本质上是信息人。脑细胞的活跃，导致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开辟出虚拟世界的广阔天地，更是让人得以将梦想照进现实，营造出“两个世界，多种梦想”的立体化境界，极大地满足了人的信息欲望。

由于人是信息体，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信息圈”这一概念由意大利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弗洛里迪还提出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对应于“重组”(re-engineering)。由于“信息圈”对应于“生物圈”(ecosphere)，因而其所指范围可大可小。当代社会流行的微信“朋友圈”，本质上就是一个基于实名制的熟人之间的虚拟“信息圈”。在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比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个人的行为不仅影响着自己，而且通过“信息圈”影响着他人。^④信息关联式的融合，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建基于“人类信息共同体”，也就是信息人联合体。正因为如此，人类有必要通过信息网络的有效治理，构建良性的“信息生态”(information ecology)。

3. 信息需求：信息化的精神自我

如果通过更加广义的信息化洗礼，就可能出现信息化的精神自我，即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人。^⑤这种信息人，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或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说的信息人(information literate)。人是信息活动系统的主导因素，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利用者，具有一定的信息意识与信息能力，侧重于表达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

信息人的主体化与精神化之所以能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是这一时空中的虚拟物质与虚拟能量，也是信息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信息的依赖性需求，使信息演变成一种超物质的能量，形成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并造成难以避免的信息鸿沟，出现信息优势与信息劣势的马太效应，造就出不断累积的虚拟财产，将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分裂成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

4. 信息知晓：当代人的重要素质

作为“信息元(源)粒子”，人的信息潜能足以转化为信息功用。当人可以持续地生成信息、传递信息、消费信息、监管信息，即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带有共性的信息认知与信息行为时，就可以具备当代人在信息方面的重要素质。^⑤尤其是在遭遇信息过剩的境遇时，能够以面向未来的心态，在崇尚个性的同时，尊重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提升自我实现的应有能力。在选择与利用信息的过程中，不但遵循最小努力的信息经济法则，而且注重信息价值的选择过程，以实现适度满足的信息诉求与自我发展的长远目标。^⑦

值得指出的是，伴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搜索日益便捷，相对而言，对个人记忆的要求不再像以往那样苛刻。这或许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这有可能削弱人的个体记忆能力；另一方面，则为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拓展出更大的可能性。因为人得以从繁重的记忆任务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解脱，因而有可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对信息的理解、感悟及别出心裁的排列组合，导致思维的活跃、灵感的闪现甚至思想的碰撞，从而引发各种宝贵的创新，尤其是形形色色微创新，并积小步为大步，不断取得突破性的创新。

实际上，所谓互联网思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信息思维。当人具备信息思维之后，就将习惯地、充分地吸收信息，尽可能地内化信息，以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信息人”，逐步积累自己的信息资本^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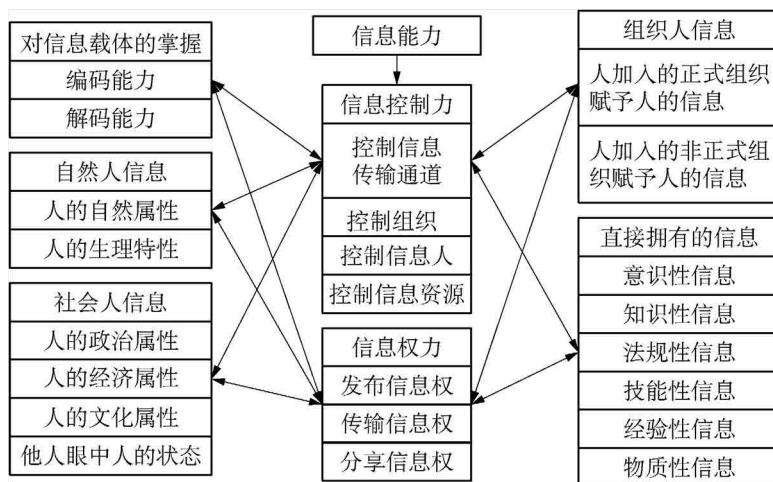


图1 信息人可拥有信息资本示意图

由图1可见，信息人可拥有的信息资本包括：信息能力、信息控制力、信息权力、信息载体、自然人信息、组织人信息、社会人信息以及信息人直接拥有的信息。

5. 信息人性：由中性而分善恶

关于人性，历来有“性善论”“性恶论”等截然相反的研判，并由此生发出不同的经济、社会和管理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人性依据，并起到了不同的教化作用。然而，平心而论，现有的相关理论无不有失偏颇。

无论是作为信息本身的信息人、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信息人，还是基于社会进化的信

息人,从人性本质而言,一开始都是中性的,善与恶的习性,均是后天接触、处理和接受不同信息的结果。由此可谓:“人之初,性本中;性相近,习相远”。这也正是在信息传播领域必须重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与切实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不被非法利用的根本理由之所在。信息化社会的局域对称性,把“信息子”强加在当代信息人身上,使其具有相应的“信息力”,并希冀其发挥应有的正能量,倡导在人性范畴实现向善、向好、向上。

综上所述,信息人是出于天然信息本能、独具强烈信息欲望、拥有多元信息需求、要求明晰信息知晓、本为中性信息人性,以信息的生产、加工、处理、传输、服务为主要活动方式,并通过这些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自我发展的人类群体。作为信息交流的动物(Information communicating animal),信息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活动,均出自其信息人性及其发展之需要。信息人以信息自由为最高目标,以信息共享与信息开放为基本权利与基础义务,具备能动的信息意识、充分的信息能力和合理的信息行为。^④

(二)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适用

“信息人假说”的反思与重构,不仅对于超越传统人性假说、重新认定人性本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新学科的产生与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信息社会的全面实现与网络伦理、全球伦理的全面拓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1. 增强对“数字原住民”这一新“物种”的认识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阶段之后,信息技术如同过去的供电、供水、供气等技术一样,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对全球各国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信息化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从2012年的第36位,迅速攀升至2016年的第25位。^⑤信息人已不再只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新“物种”——数字原住民。

信息人的形成,是以数字化为前提的。^⑥从80后、90后到00后甚至10后,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从有线网络到无线上网(WiFi),从网站到应用程序(APP)、二维码,从文字、图片到音频、视频,从影视动画、网页动画(Flash)到动漫,从博客、微博到微信,从转播、录播到直播,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到混合现实,从指纹识别到读脸支付,从经典计算机代量子计算机,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到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不仅使年轻一代成了网络与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原住民,也让先前所谓的“数字移民”的概念有了新解——数字时代的移动互联用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保持着这样的规律,即每10年更新一代,每一代系统都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供更高速的数据传输与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推动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和应用的革新,为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尤其是近年来,借助智能手机、移动网络及无线宽带的发展,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在国内取得井喷式发展,在全球范围走在前列。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高达97.5%。

然而,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宽带状况》报告指出,在全世界48%的人口已经可以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仍有39亿人与数字世界无缘。^②传统的“代沟”,在信息人面前,化作了巨大的“数字鸿沟”,而移动电话快速普及,将成为缩小全球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全面而深入地研讨“信息人假说”,显然有利于增强对“数字原住民”这一新“物种”的认识,并有助于缩小其同传统“数字移民”之间的“数字鸿沟”。

2. 为发展信息学奠定学理基础

既有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等发展研究体系,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的客观需求。在这种情势下,反思与重构“信息人假说”,可以为适时推出发展信息学这一利用信息来推动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信息人假说”的提出与论证,不仅为现实情势下人本理论及其学术规范提供了依据,也给予人类在不断反思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中新的人性启发。

3. 为信息生活的进一步数字化做好必要准备

数字生活是中低收入国家信息社会建设的主要抓手。根据美国《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人脑—电脑”界面将会允许我们用思想控制数码设备,使它们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③也就是说,人成为去除了“肉体效应”的纯粹信息人。^④此时在人的生存上,一种真正的“后物质文化价值观”,将彻底而全面地体现在这种信息人的存在上。

总之,进入信息社会,信息获取已经从“大海捞针”进入“私人定制”模式。只有确立“信息人假说”,才能为人类信息生活的进一步数字化做好必要准备。

注释:

①③ 李德昌:《人类本性的嬗变与理性信息人假设的现代意义——信息人社会与势科学理论研究之三》,《阅江学刊》2012年第1期,第12页。

② 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6年5月15日,第1-2页。

③ 《百度总裁张亚勤:互联网未来发展的三个维度》,《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2月24日。

④ 张天波:《量子信息生态工程管理理论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23期,第17页。

⑤ 于晓霞、秦延国:《管理的人性论反思及意义》,《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第79页。

⑥ 杨义凤:《从理性选择到感性选择——评阿玛蒂亚·森“信息扩展”对社会选择研究的理论贡献》,《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71页。

⑦ 李德昌:《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管理学报》2010年第4期,第489页。

⑧ 徐志成:《“信息人假说”及其当下的伦理审视》,《现代交际》2013年第10期,第94页。

⑨ F. W. Lancaster: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In: The Infrastructure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B. El-Hodidy and E. E. Horoe ed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North-Holland), 1984, p. 411 - 419.

⑩ 卢太宏:《信息人与信息心理法则》,《情报学报》1989年第8期,第208页。

⑪ 朱红:《建立在信息人假设基础上的信息人力投入产出核算》,《生产力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6-107页。

⑫ 余潇枫、张彦:《“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第17-23页。

- ⑭《统计局：中国恩格尔系数30.1%接近富足标准》，《南方日报》2017年3月1日。
- ⑮《2016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达3.9万亿元远超传统消费的增速》，中国新闻网，2017年05月14日。
- ⑯李德昌：《人类本性的嬗变：从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到信息人》，《理论月刊》2005年第5期，第90页。
- ⑰张李良：《软实力视域中的“美丽”概念分析——基于“信息复杂全息人”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7-18页。
- ⑱王茜：《简述在信息加工理论基础上的“信息人”假想》，《科学导报》2013年第12期，第7页。
- ⑲肖勇、张沅哲：《论当代图书情报学（LIS）研究的新规范——信息人规范》，《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23期，第40页。
- ⑳陈曙：《信息生态研究》，《图书与情报》1996年第2期，第13页。
- ㉑吴标兵：《信息哲学视阈下的物联网隐私本质及其困境》，《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第38页。
- ㉒胡明川：《复制对作为信息体的人的影响》，《天府新论》2017年第1期，第73页。
- ㉓李剑锋：《当哲学问题遇上意识科学：来聊聊“我是谁”》，新浪，2017年08月04日。
- ㉔王亮：《何以可能与何种变革：哲学信息转向的深层拷问》，《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558页。
- ㉕肖峰：《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页。
- ㉖张学浪、赖风：《信息风险与“信息人”的伦理责任》，《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84页。
- ㉗刘军燕：《信息环境的演变》，《现代情报》2010年第10期，第40页。
- ㉘程楠、赵兆林、韩莉：《信息人可拥有信息资本的分析》，《科技博览》2010年第2期，第311页。
- ㉙胡晓萌：《信息人的实践与德性》，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0页。
- 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2016年11月，第6页。
- ㉛黄正泉：《论“信息人”与创新教育》，《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6期，第15页。
- ㉜朱旌：《报告称全球仍有39亿人无缘数字世界》，《经济日报》2017年09月15日。
- ㉝《2016—2045年值得通信信息业关注的十大技术》，《人民邮电报》2017年3月9日。
- ㉞肖峰：《信息大于物质：信息文明的价值取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2页。

（李文明，男，1955年生，四川自贡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吕福玉，女，1965年生，山东威海人，四川理工学院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经济）

民办外语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师发展策略研究*

◎ 王 钢

摘 要: 高等院校专业教师的职业发展是教学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到民办院校,其教师发展又具有民办院校自身的特点。而随着英语类专业招生及培养方式的改革,民办外语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师发展策略成为我们关注的课题之一。

关键词: 民办院校 英语类 教师发展

教师是高等院校发展的核心。教师的发展则紧密联系着高等院校本身的发展。而民办高等院校与公办院校相比,其教师发展又具有众多民办院校所固有的特点。具体到外语类民办院校,由于其同时具有民办院校的总属性与外院院校的行业属性,其教师发展又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于外语教师发展的研究,前人已经做过若干研究。孙学章^①从外语教师发展与外语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其核心观点为:外语教师发展对外语学科有促进作用,外语学科建设对外语教师发展有积极影响。实际上这是从互动的角度对于外语类教师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对于外语院校来说,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是外语类教师发展所依托的学科,而本学科的发展自然也要依托外语类教师本身的发展。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学科要发展,其核心的内涵往往不是可以随时添置的硬件条件,而是在于其软实力。而发展软实力的核心则在于教师本身,例如,外国语言文学中某一领域的领先研究地位,如某些具有领军人物地位的专家学者等。这些软实力的实际内容是教师发展。外语教师的发展同样也要依托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发展可以给外语教师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对于外语类教师来说,其专业发展可能有各个方向,如科研、教学、社会推广等。从科研方面来考虑,学科发展所能够提供的条件不言而喻。青年教师的成长需要前辈的指导,而一个完善发展的学科则可以在此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从广度上来说,完善发展的学科可以提供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尽可能多的发展方向供青年教师选择,而完善的学科发展则需要院校多年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的积淀。从深度上来说,优秀的领军学科带头人可以迅速将年轻教师引向本学科国际发展的最前沿,为青年教师的发展铺平道路。

汪晓莉与韩江洪^②认为现在的外语教师发展存在瓶颈。其主要观点为学科建设、博士研究生教育、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队伍建设、学术期刊平台建设 4 个方面对于外语教

*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2017 年年度课题“民办外语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师发展策略研究”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N2017001

师来说存在瓶颈。文中对于学科建设的研究主要采用数据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其重点学科的数量,其中特别提到了国家重点学科数量这个数据。从博士教育角度,主要研究了目前博士培养的数量及博士培养的能力;从学科带头人的角度来看,目前外语类的专业带头人及专家学科依旧有待充分发展,文章中主要采用正高级职称教师等数据作为研究方法;对于学术期刊平台的研究,文中主要采用 CSSCI 期刊数量等数据进行研究。总体上,汪晓莉与韩江洪用实证数据表明,目前外语教师的发展存在瓶颈,且克服瓶颈的过程需要艰辛的努力。

汪艺^③从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影响的角度研究了外语教师的发展。她认为实现外语教师发展的路径主要有如下几条:转变观念,积极参与教学法研究;善于进行教学反思;科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这是从教师微观的角度研究了外语教师的发展。其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这一条将外语教师保持在现在教育技术的最前沿地位,但是这又需要教师本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与提高。

徐美娥与李翔一^④认为提高高校外语教师的发展可能涉及以下因素:坚持打造人格魅力与学习理论知识相结合;坚持改革教学方法与创新科学研究相结合;坚持开展内在评价与接受外在评价相结合;坚持传统本土化与现代国际化相结合。其中人格魅力实际上与师德相关,而师德本身在教师发展中当处在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地位。理论知识所包含的层面则较为宽泛,对于外语教师来说,理论知识既包含外语本身的语言知识,也包含如何教授外语的教学法知识,对于高校来说,外语教师在教授基础语言知识之外,还具有语言研究的职能与任务。因此,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英语文学的知识、语言学的理论以及翻译学科的理论也应当成为要学习的知识理论。对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际上与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相关。改革的基础是要对于学习者的基本情况有清晰的理解。因而,教学方法改革实质应当是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对于教学方法所进行的改进,而非盲目的对于时髦教学方法的跟随。所谓创新,也是如此。创新的实质也应当是在对于学习者的基本学习情况有清晰掌握的情况下对于现有教学方法的更新,而非直接对于新方法的套用。

对于教师的评价,笔者认为不同的高校、不同的专业以及不同的学习者当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研究型高校与教学研究型高校的评价标准当有差异,而教研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评价标准又有不同,至于高等职业教育相关院校,则又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对于教师本身的发展来说,单独参考一种评价标准是稍显武断的。外语类教师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在特定的院校中的外语教师也有其特定院校背景的特点,李航^⑤对于体育院校外语教师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由于学校涉及行业背景,其中特别讨论了 ESP 理论的应用。江世勇^⑥从外化与内化的角度,研究了外语教师的发展。其核心部分为反思性教学的应用。其观点为反思性教学对于在职教师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庆华^⑦认为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应包含如下几个方面:较强的教学能力;一定的科研能力;至少有一个稳定的研究方向;适当具备从事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笔者认为,这几个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高校外语教师,较强的教学能力是作为教师的基础,而一定的科研能力则是在教学能力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稳定的研究方向则是高校教师作为教

学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的要求,跨学科研究则是将来外语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外语学科本身的发展也要求我们不断进行学习,紧跟学科与科技发展的趋势。

对于外语教师的发展,前人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是对于外语院校教师的发展,通过相关检索我们发现还较为薄弱。对于民办外语院校教师这样一个特定群体的发展,相关研究更为薄弱。如果将研究定位于某个具有特定行业背景的城市,就更加具有创新性。我们努力将研究做到本地化与有针对性。对于高度特定的群体所做的研究,不仅具有相对较高的创新性,其实用程度也相对较高,可以直接应用于决策参考。

笔者发现,民办外语院校的教师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由于受到学校民办属性的影响。民办属性有可能对于民办外语院校教师发展有着积极影响的一面,也可能包含消极影响的一面。积极影响可能包括若干因素,例如机制灵活等,但是消极影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发展。如何利用积极因素与如何应对消极因素,成为我们研究的核心。二是,外语院校本身的属性对于教师发展的影响也成为我们的基本思路之一,其中包括外语院校本身的特点、外语院校对于教师发展的影响等。在研究本地化的背景下,我们趋向于将此研究放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定的背景下进行。

第一,外语类院校教师发展有其本身的特点。外语类院校的教师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征。外国语类院校在传统意义上被归类于文科院校。实际上,在当今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外国语学院更加趋向于行业院校的特征。在实践中,外语院校的专业是与某些固定行业有特定联系的,例如,文学研究工作、语言学研究工作、国际贸易、翻译、出版、编辑、导游、外交官、外语教师等等。具体到英语类专业的教师,以上的行业特征几乎可以被完全覆盖。因此,英语类教师的职业发展策略基本上可以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来进行发展,以研究和教学作为基本的方向;其二,作为一个行业工作者来进行发展,根据教师自身的背景特征,结合社会行业需求特征,教师可以初步以“双师型”作为起步发展其第二职业(专业)特征。

第二,民办属性可能对于教师发展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民办属性具有双重属性。其一,从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上来观察,民办院校的教师队伍流动性明显,这并不利于民办院校英语类教师的长期职业发展。但是从另一面来看,民办院校的现实条件往往能给予青年教师相对超前的锻炼发展机会。我们发现,在某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中,青年教师承担以往通常由资深教授承担的一些科研教学以及行政管理任务。这对于青年教师的发展有着可以预见的益处。在这些环境中得以锻炼的青年教师往往以相对超前的速度成长,在业务中迅速成熟,成为教学科研以及行政管理中的骨干力量。

第三,定位于应用型本科的外语院校的教师发展与研究型外语院校的教师发展具有差异。“应用型”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具体到英语类专业中,与行业接轨是一个重要特征。与应用型相对应的是研究型,研究型教学强调厚重的文化底蕴的熏陶,在对于“英语类专业”的定义上,研究型院校更加愿意将“专业”往“学科”的方向上靠拢。与此同时发生的,自然是与“行业”的相对偏离。对于应用型高校的英语类专业来说,“应用”意味着教师的教学重点不仅要以学科理论作为基础,更要以市场作为导向,行业需求作为抓手。这对于应用型高校英语类专业教师的意义,就在于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科方面的发展,更要注重

“市场”与“行业”的发展。“双师型”可能只是第一步,将行业特征引入学科范畴,进而进行研究、归纳、推广、发展,这将成为民办院校外语类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对于民办外语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师发展策略研究本身来说,这些结论具有跨学科的属性。从研究教师发展来看,具有教育学学科属性;从研究外语院校的层面来看,又具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属性。因此,对于这两个学科的理论发展具有意义,同时对于两学科的交叉发展也具有理论意义。结论可以直接应用于普通民办外语院校的教师发展政策制定之参考,教师发展决策之参考。对于普通民办本科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的研究实际上以本地化的形式进行,涵盖民办、外语、本科、应用、特定行业背景等要素,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本校相关政策理论研究之参考。

注释:

① 孙学章:《外语教师发展与外语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探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68-70页。

② 汪晓莉,韩江洪:《基于实证视角看中国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及发展瓶颈》,《外语界》2011年第3期,第44-51页。

③ 汪艺:《外语教师发展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影响》,《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6年第4期,第65-66页。

④ 徐美娥,李翔一:《浅议促进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对策》,《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29期,第66-67页。

⑤ 李航:《基于ESP理论的体育院校外语教师发展策略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第157-159页。

⑥ 江世勇:《从外化到内化:谈外语教师发展的方向》,《继续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第68-70页。

⑦ 李庆华:《外语教师发展问题探析》,《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3年第8期,第1-3页。

(王钢,1985年出生,浙江嵊州人,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

二语学习动机理论视阈下英语教学激励策略研究

◎ 张亚蒙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大学英语教师对激励策略的感知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通过《高校英语课堂中使用的激励策略调查问卷》,收集某大学 120 名大学教师,某省三所学院 120 名学生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教师非常重视激励策略在课堂中的作用,然而感知重要的策略并不是等同于最常使用的策略;教师与学生对激励策略重要性的感知存在差异,而男生与女生之间对激励策略重要性的感知基本保持一致;只有极少激励策略的重要性很高,且使用频率也很高;虽然采用的激励策略有所不同,但是教师均认同激励策略最终需要导向让学生感知教师的策略使用目的,并且提升自身学习二语的积极性。

关键词: 激励策略 重要性 使用频率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研究人员开始重视在课堂中应用激励策略。从那以来,已经进行了各种研究,制定语言学习者的激励实用原则,虽然已经形成了相对健全的理论基础,但还需通过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来分析如何激发学生进行语言学习。在中国,这个问题直到 21 世纪初才引起很多关注。大多数出版物是对国外做过的工作的回顾或激励策略发展的总结,如季明雨,2003;^① 秦晓晴,2005;^② 文秋芳,2003;^③ 王初明,2004;^④ 赵娜,2005^⑤。他们努力找出教师推荐认可的激励策略,认为这些策略非常重要,并根据调查问卷中教师教学实践的反馈,提出了一些实际原则。但是,教师使用什么策略可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如今对大学教师在国内课堂上的激励策略的研究有助于改善教学质量。由于问卷是一种流行和方便的方法,笔者倾向于在实证研究中使用它。虽然国外版本的问卷在某些教育背景下被证明是有效和令人信服的,但由于文化差异,它可能不利于在国内环境下的有效教学。因此,有必要为中国高校教师制定一个情境依赖激励策略的问卷。

Dornyei(2007)^⑥ 制定 51 项激励策略量表,通过测试激励策略的重要性及使用频率来寻找激励学生学习二语的最佳策略。其后来对这 51 项激励策略量表进行进一步筛选及更新,完成了 35 项激励策略的量表。

Dornyei 根据我国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形进行删减修改后总结为 40 项激励策略量表,并且采用此量表对某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进行问卷测量,从而得出其所在学校的激励学生学习二语的最佳策略。它可能更加有助于大学老师在国内语境更全面地了解通过怎样的方式去激励学生,因为用于收集定量数据的问卷是专门针对目标受试者根据中国的实际

情况而展开的。

Dornyei 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激励策略体系。这分为四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得到了一些宏观战略的支持和一些具体的动机技术。

第一,创造基本动机条件:适当的教师行为、愉快和互助的课堂气氛、具有群体规范性以及凝聚力的学习者群体。

第二,产生初始动机:提高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关联价值观和态度,提高学习者对成功的期待、增加学习者的目标定位。

第三,维持和保护动机:进行学习刺激,以激励的方式提出任务。

第四,鼓励积极回顾自我评价:促进激励归因、提供激励反馈、增加学习者满意度,以激励方式提供奖励并取得成绩。

Dornyei 和 Csizer 根据收集到的定量数据,总结了一套宏观策略,即“激励语言学习者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 for motivating language learners)。这十项推荐的激励策略如表 1 所示:

表 1 激励语言学习者的十诫(Dornyei & Csizer, 1998)

(1)	设置一个以自身为标准的榜样。
(2)	在课堂里创造一个愉快,轻松的气氛。
(3)	正确呈现任务。
(4)	与学习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5)	增加学习者的语言自信。
(6)	使语言学习变得有趣。
(7)	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
(8)	个性化学习过程。
(9)	增加学习者的目标导向。
(10)	让学习者熟悉目标语言文化。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述个人信息,如性别、教育背景、授课内容、所授课学生的大学年级和水平。在第二部分,120 名选定的教师将被要求回答问卷中 30 个激励策略的重要性程度评分,以及他们在课堂上使用过的频率程度评分。同时,120 名选定的学生将被要求回答问卷中 30 个激励策略重要性程度评分,以及他们认为教师使用激励策略的频率的评分。评分标准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在重要性的评分上将采用从“不重要”到“很重要”来进行表述,而使用频率的评分将采用从“很少”到“很经常”来进行表述。

表 2 激励策略重要性前十位排序

序号	激励策略重要性排序前十
(1)	适当地准备课程。
(2)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3)	在课堂里营造一个愉快和鼓舞人心的氛围。
(4)	给予积极的反馈和评价。

(续表)

序号	激励策略重要性排序前十
(5)	使课堂目标结构更具合作性而不是竞争性。
(6)	使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衔接。
(7)	使学生熟悉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
(8)	避免对学生进行任何的比较。
(9)	选择有趣的任务。
(10)	带来幽默、笑声和微笑。

表 3 激励策略使用频率前十位排序

序号	激励策略使用频率排序前十
(1)	适当地准备课程。
(2)	如果条件允许,应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语言教学。
(3)	给予积极的反馈和评价。
(4)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5)	避免对学生进行任何的比较。
(6)	使课堂目标结构更具合作性而不是竞争性。
(7)	在课堂里营造一个愉快和鼓舞人心的氛围。
(8)	使学生熟悉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
(9)	指出错误:它们是学习的自然组成部分。
(10)	使用肢体语言辅助语言教学,例如眼神接触或手语。

重要性和使用频率问卷的前 10 个策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激励策略,分别是:第一,感知到重要并经常使用的激励策略;第二,感知到重要但未充分利用的激励策略;第三,感知不太重要但常用的激励策略。

下文将进行分别讨论。

1. 感知到重要和常用的激励策略

感知到重要和经常使用的激励策略是指在表 2、表 3 中出现的激励策略,内容相同但顺序不同。

这些策略是:给予积极的反馈和评价;在课堂中营造一个愉快和鼓舞人心的气氛;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避免对学生进行任何比较;适当地准备课程;使学生熟悉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使课堂目标结构更具合作性而不是竞争性。

教师相信这些策略可以有效地激励语言学习者,并经常将它们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课堂气氛是学生非常学习的因素。如果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他们将渴望表达自己学习新知识的愿望,反之就像“喋喋不休的孩子一样”。“对学习情境的态度”是众多复杂动机中的关键性决定因素。任何老师都知道,由紧张的氛围所造成的学生焦虑是破坏二语学习动机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通常鼓励教师通过信任学生并经常赞美他们来创造愉快和激励人心的气氛。

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被认为是教授学习者最有效的方式。当学生觉得自己不优秀时,

他们通常不愿在教室里展示自己。如果教师在这个时候不断鼓励他们,学生的表现可能比他们认为自己能做的要好得多。教师应该在教学实践中遵循实用的原则,即避免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比较。面对同学压力,大多数人,特别是相对较弱的人,可能会紧张或尴尬。它有时会导致语言焦虑。语言焦虑已经被发现是阻碍二语学习的一种普遍现象(尤陈静,1997^⑦)。有这样的心理障碍,学习者肯定是被动的。面对大学生,教师不仅要注重引入目标语言知识的方式,更要注意学生的心理世界。

这些策略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也就是说,他们都关注学生的心理过程,并反对对学生进行比较。此外,前者非常重视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当学生可以组成小组时,教师可以定期执行一些基于小组的现实任务。每个学生都有共同的责任来完成它。当一个人缺乏动机时,学生可能会想象未来将落后于周围的同学甚至被同学嘲笑,因此而促使他们加快学习的步伐。这样,老师成功地将同伴压力转化为同伴支持来激励学生。同时,加强了同伴关系和团队合作精神。

2. 感知重要但未充分利用的激励策略

感知重要但未充分利用的激励策略是指出现在上述重要性表中但未在频率表中列出的激励策略。这些策略是:使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衔接;选择有趣的任务;带来幽默、笑声和微笑。教师认为这些策略可以有效地激励语言学习者,但很少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使用它们。

这可归因于一个原因:“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据推测,支持者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许多解释: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些激励活动;教室太小,不适合某些教学活动;这些激励策略是多余的;大学生作为成年人应积极学习更多知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进行教学活动,决定课堂教学模式的是教师,教学相关事情取决于他们自己。也许有些教师能选择有趣的任务,使教学与学生的需求联系起来,或是把幽默带到课堂上,但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是最需要提倡的。

3. 感知不太重要但常用的激励策略

感知不太重要但常用的激励策略是指出现在上述频率表中但未在重要性表中列出的激励策略,它们是:如果条件允许,应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语言教学;指出错误:它们是学习的自然组成部分;使用肢体语言辅助语言教学,例如眼神接触或手语。

虽然这些策略不是重要性表的一部分,但它们在频率表中的高位可以显示其实际意义。

这些策略都利用外部力量来协助语言教学:多媒体技术和肢体语言。有一些话是很难说出来的,但你可以借助一段视频或音乐,或一些手势。这是微妙的,有些教师没有意识到在应用它们的过程中的激励策略。

总之,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致力于研究如何激励学生,而不是如何激励教师。与教师的自我报告和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的激励做法的反馈,是一个很少谈到的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开发针对适合实际情况和特定群体的激励策略的实用和系统列表,或者进一步确认已经开发的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注释:

- ① 季明雨:《关于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动机策略运用的调查》,《外语界》2003年第3期。
- ② 秦晓晴:《成功英语学习者特征分析》,《外语教育》2005年第3期。
- ③ 文秋芳:《英语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国外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
- ④ 王初明:《自我概念与外语语音学习假设》,《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
- ⑤ 赵娜:《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的再思考》,《雁北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
- ⑥ Dornyei:《The Use of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Language Instruction: The Case of EFL Teaching》,《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2007年第1期。
- ⑦ 尤陈静:《Fine Mapping of the Human Renal Oncocytoma-Associated Translocation》,《Breakpoint》1997年第2期。

(张亚蒙,女,1982年3月生,籍贯浙江绍兴,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外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人社类)

中德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文化维度

◎ 周芳蓉

摘要: 非语言交际在教学中发挥的重大影响。教师运用不同的非语言交际手段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能抑制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对比中德两国课堂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中体现的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教学模式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维度。认识两国不同的文化倾向,了解两国不同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对于参与跨文化教学的教师而言尤其有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德两国课堂上的非语言交际的异同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维度的差异。

关键词: 非语言交际 课堂 文化维度

一、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一) 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根据非语言交际这个概念,我们可知交际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语言交际,另一种通过非语言交际。何谓非语言交际,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定义,即为:“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的交际”。较为具体的定义是:“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供职的人的属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地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地发出,由接受者有意识地接受并有可能进行反馈。”^①

(二) 非语言交际的种类

在非语言交际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者也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种类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在《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一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学者现今比较统一的一种划分方式,可以将非语言交际粗略地分为四大类进行对比研究。^② 本文依循的也是此种划分方式,具体如下:

(1) 体态语。

包括基本姿态(姿势和身势)、基本礼节动作(如握手、亲吻和拥抱、微笑、体触、女士优先的礼节动作等)以及人体各部分动作(如头部动作、面部动作、目光交流、臂部动作、手部动作、腿部动作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

(2) 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

(3) 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家具和车辆所提供的交际信息。

(4) 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如拥挤、近体距离、领地观念、空间取向、座位安排等)、时间信息、建筑设计和室内装修、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

前两类可以称为“非语言行为”,后两类可以称为“非语言手段”。

(三) 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写道:“文化以深刻而持久的方式支配着人的行为,我们对这样的制约是浑然不觉的,个人意识不到这样的控制。”^③文化的触角伸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人们的交际方式,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文化支配着人的交际方式;反过来,人类的交际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群体的文化。和语言交际相比,非言语交际更能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传递文化信息。弗洛伊德早就对非语言行为传递信息的能力做出了肯定:“他认为,行为传递的意义胜过言词。他不信赖人的言词。他的许多思想都基于这样一个设定:言词隐匿的信息多,透露的信息少。”^④美国学者萨莫瓦曾说:“绝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的确,非语言交际在交际中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忽略了语言交际的力量。在具体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是相辅相成的,失去非语言的辅助和配合语言交际则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非语言行为也只有在一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⑤本文研究的是非语言交际在中德课堂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以及其表现出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二、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表现

(一) 身姿语

身姿语是课堂中与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和学生的举止动作等都包括在内。中德学生在课堂中的坐姿站姿,与教师的互动方式等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此外,师生间的目光交流和对于体触的接收程度也反映了各自文化的特点。

1. 教师在课堂中的身姿和动作

教育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中国课堂的氛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教师这一职业也是十分崇高而令人敬畏的。几千年来教师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因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控制课堂氛围,保持课堂严肃性也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职能所在。中国教师在课堂上讲课范围一般局限在讲台与黑板之间的这个区域,将讲课重心放在说清知识要点上,而不会经常走进同学中去。与此相反,德国教师或者说欧美教师更习惯于走入同学中间,在学生中间讲课,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会随意地坐在课桌上进行讲课。但就中国而言,很多地区的中小学都有不成文规

定,教师不允许随意坐着上课。

此外,中国教师与德国教师在课堂上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也有较大的区别。中国教师为了维持课堂纪律会对学生的动作有一定约束,同时也对自己的仪态动作有约束。因此在课堂上他们的面部表情比较单一,不太会随着所讲的内容作出较大改变,手部动作也较为简单,以指点黑板为主。但是德国教师为了增强课堂表现力和感染力会采取多样化的表情和动作,有时甚至会手舞足蹈,用不同的表情和动作来表演授课内容,增加趣味性。当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中国教师希望营造的严肃、认真、有约束的课堂气氛。因此一般传统的中国教师并不会采用这种“有失教师体统”的授课方式。

2. 学生在课堂中的身势和动作

在中国,为了维持课堂纪律和统一性,学校往往会对学生(尤其是一二年级学生)在课堂中的身势和姿态作出诸多规定。例如,学生应挺起后背只坐半个椅子,不能将身体整个靠在椅背上;教师进教室开始上课前学生应集体起立向教师问好。在德国则无对于课堂纪律和学生上课姿势的具体规定,学生可按照个人喜好和习惯采取不同的坐姿等上课。课堂上的纪律相对松散,与中国课堂上严明的纪律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中德两国学生在举手提问或回答问题时采用的手部动作也有较大区别。在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用手肘支在课桌上将手抬起,一般手不会高过头,动作幅度较小。但是,在德国学生为了让教师能够注意到自己,会伸出食指指向上方,并将手高举过头。相对于中国而言,德国学生的动作幅度较大,动作更加夸张,更能显示学生的个性。

3. 师生间的目光交流

中国和德国或者其他欧美国家在看待和实践目光交流这一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英语国家的人比中国人目光交流的时间长而且更为频繁。它们认为缺乏目光交流就是缺乏诚意、为人不诚实或者逃避推脱,也可能表示羞怯。中国人却为了表示礼貌、尊敬或服从而避免一直直视对方。”^⑥中国人在面对上级、或比自己地位更高年龄更大的人时,尤其会避免一直直视对方。

这一点在课堂中也有具体体现。在中国,学生不以注视着老师来表示自己正在认真听课。上课时,学生会低头看书,或是看着黑板,而不会与教师产生直接的目光交流。即便偶尔学生与老师的眼神恰好交会,学生也会立即避开以表示礼貌和对老师的敬重。在德国则有很大不同,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中的目光交流会更为频繁,并且这种直视表示学生正在跟随教师的思路认真听讲,而不会产生不礼貌或不尊重等不良的影响。教师也希望从学生的眼神中获得授课的反馈。因此,当一个德国的教师为中国学生上课时则会在这一点上产生矛盾,学生低头或眼神闪躲在德国教师看来是没有认真听讲的表现。他可能会怀疑中国学生是否对于他所讲述的内容没有兴趣,因而拒而不听。如果事先不了解中国人在目光交流上的习惯和态度,就可能会引起双方的误会。

4. 师生间的体触行为

体触是借身体间接触来传达或交流信息的交际行为。因为体触已经进入了最敏感的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因此更要慎重对待,否则容易产生敏感反应或造成误会。在不同的文化中体触的发生频率也不同,有的体触频繁,有的体触较少,西方学者根据这一差别将

不同的文化划分为“体触文化”和“非体触文化”。^⑦根据这一划分标准,中国应属于“体触文化”,而德国属于“非体触文化”。

在中国,教师在课堂上为表鼓励,拍拍学生的肩膀属于普遍现象。或者,当女教师看到学生衣服穿少了可能会着凉,为表关怀会摸摸学生的衣服,也属正常。但是,在德国人看来这两种行为都进入了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这种体触行为并不恰当。尤其对于一些已经成年的学生而言则更有可能是对他们个人的冒犯。因此,当一个中国女教师在相同的情境下摸摸德国学生的衣服,则可能引起对方反感而产生误会。

(二) 副语言

副语言一般的是指伴随话语而发生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沉默也属于副语言的范畴。课堂当中的沉默现象是一种重要的副语言,如处理不恰当极有可能引起误会。

1. 课堂中的沉默现象

“沉默,在此指在讲话和交谈中不明确地做出有声的表态,而是做出无声的反应或停顿。”^⑧著名人类学家霍尔就把“沉默”作为划分他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一条重要标准。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可以通过语境来判断某一句话某一个词甚至某一种沉默停顿的含义;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则更依赖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人们不习惯运用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进行交际。在中国,沉默在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对某一话题难以启齿时,人们往往会用沉默的方式应对。沉默和停顿可以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也可以是无声的抗议;既可以是欣然默认,也可以是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也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⑨西方民众则对人际交往中的沉默不甚理解,尤其是不了解东方人沉默的含义。在他们看来,听懂了问题却不回答是十分不礼貌、不尊重对方的行为。

在课堂上,中国学生的沉默也可代表多重的含义,例如: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对老师所讲述的内容表示赞同;对于老师讲述的内容有不同看法,但不直接提出反对;等等。在德国的课堂上则很少出现沉默的现象,即便是不知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也会直接说出:“我不知道。”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只要是听懂了对方的提问,那么必须作答,否则可能被视为对提问者的一种蔑视。如果没有听懂对方的提问也要做出反应,请求对方再将问题陈述一遍或解释一遍。

当一个不了解中国式“沉默”的德国教师在中国课堂中提出问题,而中国学生面露难色,不回答问题也不说明理由时,就会给德国教师带来很大的困惑。他并不知道中国学生对于问题的态度如何,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他的问题,从而影响课堂教学。

2. “Umm”音在中国课堂中的不同含义

“Umm”这个音属于非语言声音。非语言声音是一种无固定语义却可以传递交际信息的声音,这类声音不是分音节的语言,而是发出声音的“副语言”。^⑩“Umm”是在课堂上常见的一种非语言声音,也被用于不同的语境当中,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回答问题时,学生低头翻书并发出“Umm”的声音,此时的“Umm”表示学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为

了缓解紧张和尴尬的氛围,学生会习惯性地发出“Umm”这个音;在听课时,学生看着黑板频频点头并发出“Umm”的声音,此时的“Umm”表示的是学生听懂了上课的内容,并对此内容表示赞同和理解;当学生看着老师,紧皱眉头,并发出“Umm”的声音,则可能是学生对老师讲述的内容有异议,但又不好直接打断老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而发出“Umm”的声音,此时的“Umm”是一种话轮请求的提示,表示发音者希望获得他人注意,希望打断说话人表达自己想法的意愿。

(三) 客体语

客体语一般指一切有意和无意展示的人工用品,其中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及其他耐用和非耐用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具备双重功能,即实用性和交际性。“从交际角度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因此个人用品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媒介。”^⑩课堂当中能够展现使用者文化特性的主要指教师和学生的衣着、饰物和发型等。

1. 教师的发型和着装

在所有的文化当中,人的衣着服饰都应该符合本身职业的特定。在中国,教师传授的不仅是课业知识,同时是学生道德修养、礼仪规范的表率,“为人师表”一直是教师肩负的使命。因此在着装发型方面,教师也要遵守这些规范,恪守教师本分,以维持其严肃庄严性,不能过于追求时尚,而以庄重、明快和自然为宜。仅这一点而言,中德两国的教师没有太大的区别,如:女教师不能穿超短裙,裙子长度一般以及膝为宜,夏天不能着无后跟凉鞋,不能穿无袖衣服等;男教师不能着背心、短裤等。

在德国,由于有少数族裔和不同宗教信仰教师和学生,因此教师是否能够穿着或佩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的衣物和配饰一直是德国社会一个讨论的热点。尤其在穆斯林女教师能否在学校内佩戴头巾这个问题上有很大争议。德国各个州对于此问题有不同的规定,但巴登符腾堡等多个州均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校内禁止佩带表明宗教信仰的服饰和配饰。这一规定不仅针对伊斯兰教的头巾,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服饰。^⑪2003年,曾有穆斯林女教师就这一问题上诉联邦宪法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她败诉,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德国教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范畴,而公务员代表的则是国家,国家在宗教方面不应有倾向性,因此他们不能在学校内佩带或穿着任何表明宗教信仰的服饰和配饰。^⑫

2. 学生的发型和服装

在中国,为了维持校内的纪律性,养成学生的集体观念,方便校方的统一管理,对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服饰和发型都有明确规定。在2010年实施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第2条即对学生的着装发型作出了具体规定: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前不遮眉,后不过颈,侧不过耳),女生不穿高跟鞋。此外,一般中小学都规定学生在校应穿着校服。德国学生在发型和服装方面的自由度很大,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和习惯进行穿着打扮,以彰显个性,表现个人独特性,即学生可以通过不同风格的服装和发型等表现自身的个性和爱好。这与中国的学生有着很大不同。

(四) 环境语

“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声音、信号和建筑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以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可体现文化特性。”^④教室内桌椅的排列方式是课堂内重要的环境语。

桌椅的排列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教学模式,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一般常见的排列方式有三种:传统式、马蹄式和模块式。”^⑤传统式中讲台处于教室最前方,学生横排就座,都与讲台的方向平行。这种方式便于学生听课,所有学生都能够方便地看到教师和黑板。同时,这种方式也有利于教师控制课堂纪律,教师能够直观清晰地看到每个学生,便于教师控制课堂教学,维持课堂规范。马蹄式,即学生在教室内围坐成一圈。这种座位方式比较适合小班化的讨论课和兴趣课,学生们能够看到其他所有同学,便于相互交流和讨论。模块式,即学生经过分组之后,每个组的组员围坐在一起。这种座位比较便于进行小组讨论。

在中国的中小学中最为常见的座位排列方式即为第一种传统式。这种排列方式较为单调,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但却是最便于教师管理课堂的一种方式。在德国也有采用传统式排列的课堂,但也有很多课堂采用的是马蹄式,以方便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三、课堂非语言交际体现的文化价值维度

(一) 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维度

霍夫斯塔德在对文化差异的调查中将文化主要分为四个维度:权利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和女性度。在本文中主要涉及的是两种文化价值维度,即权利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利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个人主义”是指一种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集体主义”是指一种紧密结合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就与强大而又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⑥根据中德课堂内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可以看到中德两种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文化价值趋向。

(二) 师生间的“权力距离”

学校也是一种组织的形式,师生间的关系或距离也可以被理解为“权利距离”。根据前文对中德在教师的身势和动作、学生的身势和动作、师生的目光交流以及教室内座位的布置等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国文化在“权利距离”方面的差异。

在中国的课堂中教师讲课的位置一般离学生较远,不太会走入学生中去。而学生在课堂中则因教师的权威和学校的规定等一般保持比较拘谨严肃的坐姿,在教师上课之前

还要向教师起立致敬。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目光交流也较少,为表示对教师的尊敬,学生一般不会直视老师。中国课堂中通常采用的传统式排列方法也便于教师对于课堂的控制。这些都体现了学生和教师之间较大的“权利距离”。在学校或者课堂这个组织中,权利主要集中在教师手中,教师对于课堂教学形式、学生行为规范、课堂内容等多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学生所扮演的则是这些“权威”的听从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教师处于“上级”的位置,学生处于“下级”的位置。在课堂当中,教师的权力的地位占主导,它们所拥有的支配和管理的权利被广泛地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教师权力的实施有利于对于课堂的管理,学生能够更好地听从和学习教师传授的知识和行为规范等。但是这种较大的“权力距离”所带来的弊端是:学生不太会突破这种“距离”,也不会违背或挑战教师的“权威”,因此学生虽然能够很好地学习教师所传授的内容,但是却不会对此进行反思,不太会提出异议,不会对事物产生自己的想法。这种“距离”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在德国课堂中教师常常走入学生中间,能随意地坐在课桌上讲课,学生上课的坐姿等也没有具体规定,课堂内部没有具体规范约束学生行为;师生之间有更多的目光交流,学生可以直视老师而不会给人不礼貌的印象;同时教室内座位的布置也可以便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便于教师对于整个课堂的管理。由此看出,德国师生之间的“权力距离”比较小。教师在课堂中并不是一个“权威者”的形象,并不完全是课堂中的主导者,学生的交流和参与也是课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课堂中往往给人纪律松散的印象,不像中国传统认知当中课堂严肃认真的形象。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较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在学生的学习当中会有更多机会去发现问题,提出不同想法。

(三)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普遍穿着同样的校服,遵守统一制定的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集体主义精神。反映到学校,则学校也是一个紧密联结的组织。学生认同个人是学校的一分子,学生与学校是紧密相连、荣辱与共的。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群体中的个人有较强的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他们普遍认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相互负有责任,他们期待被“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照顾,被这个大集体照顾,同时也对于所在的群体保持忠诚和服从。群体性标志例如学生的校服显然要比彰显个人个性的标志更重要。群体内的成员希望通过统一的特征来划分“群体之外”的人员和“群体之内”的人员。即使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个人并不认识,但是一旦他们发现大家都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时,便会对对方产生相应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学生与学校、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会更深厚,但是很多学生自然的个性容易在一个庞大而统一的群体中被埋没。

在德国,学生可以穿着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服装来上课,其服装也是个人特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愿意穿着统一的服装来隐藏自己的特性。个人主义在其中得到了体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学校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被削弱了,而学生作为个体的力量被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没有像中国的学校那么强,但是学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被广泛认可,在

这样一种环境中,学生更容易走上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四、总 结

本文中主要论述了非语言交际在课堂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中德两国课堂上的非语言交际的异同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维度的差异。教师运用不同的非语言交际手段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能抑制学生的积极性。美国著名文化学者库珀说:“必须记住,每一信息都包含内容和关系两个方面。……姿势、面部表情、体触行为等等,都会对信息内容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传递交际关系的信息主要是通过非语言形式。所以,学生会通过对教师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分析去辨明教师对师生关系的看法。”^⑩可见,非语言交际在教学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对比中德两国课堂中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中体现的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教学模式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维度。认识两国不同的文化倾向,了解两国不同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对于参与跨文化教学的教师而言尤其有意义。不了解这些非语言交际背后的文化原因则很有可能错误地解读学生想要表达的信息,也有可能在不自觉中表达了某种信息而造成学生的误会,引起双方的误解。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⑩⑪⑭⑮⑰ 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第 6 页、第 3 页、第 26-27 页、第 42 页、第 47 页、第 51 页、第 59 页、第 71 页、第 153 页、第 154 页。

③④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第 59 页。

⑨ 范蕴华、李杰群编著:《实用体态语》,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⑫ <http://www.spiegel.de/unispiegel/jobundberuf/0,1518,603617,00.html>: Kopftuch im Unterricht bleibt verboten, 2009. 01. 26.

⑬ <http://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pressemitteilungen/bvg71-03.html>: Leherin mit Kopftuch, 2003. 09. 24.

⑮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格特·扬·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249 页。

(周芳蓉,女,1988 年 10 月 12 日出生,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德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教学法、跨文化交际)

省属本科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初探*

◎ 王丽萍

摘要: 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应使适龄考生的创新潜能成为现实,以促进社会进步。省属本科高校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主体力量,目前较为单一的招生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对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等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有必要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的改革,充分利用历史文化积淀的基因,以保障质量为许可基准,多元主体参与,学术权威主导,层层嵌套法律承认许可主体,确定大学独立法人身份,使招生制度改革走向特色化、科学化、法治化道路并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

关键词: 省属本科高校 自主招生 法治化

中国共有本科、高职、独立学院和成人高校等近 3 000 所,从数量上看本科院校总量仅次于高职院校位列第二。本科院校担任着教学育人、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重任,据其主管部门和财政拨款来源不同,又分为部属高校和省属本科高校。“985”和“211”高校大多属于部属高校,基本上都是重点大学,数量大概为 115 所左右,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尖端部分,服务于国家高端科研创新,培养顶尖高素质人才。省属本科高校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大多数靠地方财政供养,由地方行政部门划拨经费,是国家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主要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着力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但目前较为单一的招生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对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等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有必要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的改革。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招生制度上,除了普通高考录取之外,多年来本科院校根据各自办学实际,实施了形式多样的特殊招生录取办法:艺术类专业、体育类专业、高水平艺术团或高水平运动队、农村专项招生、国防生等,但是自主招生、保送生等招生形式目前仅限在重点大学先行先试,并未赋权给省属本科高校。长期以来,省属本科高校作为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招生制度较为单一和保守。笔者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应使适龄学生的创新潜能成为现实,省属本科高校培养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是创新型

*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重点资助课题“省属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XJK08JKZB054)成果之一。

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有必要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的前提下赋予其更多的招生自主权,有步骤地推进自主招生制度改革。

一是坚持政府宏观管理,健全社会监督,保障公平公正。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精神,省属本科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要以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科学培养、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为基本出发点,实施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科学高效和灵活多样的考试招生制度。^①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可以确保招考改革朝着公平公正的目标有序推进,保障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建言献策、积极监督。

二是消除体制壁垒,构建“政产学研用”贯通的人才遴选机制,建立创新型人才自主招生选拔通道。区域经济发展既要培养当地支柱产业亟需人才,也要培养支撑新兴产业的高素质人才,归根结底需要创新型人才。这类人才的选拔既需要把握科技创新的内在特征,更要遵循创新型人才的遴选、成长规律,在选拔模式设计上要体现有机衔接,既要发挥原有的统一高考的体制和组织优势,更要正视并克服方式单一的缺陷,突出市场导向,打破不同单位之间的信息壁垒和利益藩篱,健全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各相关创新主体联合行动,构建全社会合力推进创新型人才的高校自主选拔模式,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选拔人才的考核评价体系。

三是以生为本,提供多元创新人才选拔方式,促进素质教育。是否能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是教育成败的关键。^②中国已经以立法形式将素质教育作为教育目的,但纵观当前教育现状,尤其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选拔方式,导致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等功利性目标一叶障目,学生应考压力巨大,家长的焦虑心态带来社会的集体焦虑。全国各省的考试招生工作早已实现了分省命题和省级招生委员会负责制,省级行政部门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考试招生制度经验,省属本科高校也已经在招生实践中积累较为成熟的经验,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果。为了使人才选拔更加紧密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元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彰显地方特色和高校特点,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与选拔规律,以考生为本,提供多样化的创新型人才选拔方式,使学生拥有多途径深造的机会,反过来也能促进素质教育,使学生全面健康并富于个性地成长。

二、改革的基本原则

省属本科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应充分利用当地历史文化积淀的基因,利用办学积累,服务于创新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以保障质量为许可基准,多元主体参与,学术权威主导,行政权力推动科运行,层层嵌套法律承认许可主体和大学独立法人身份,使招生改革走上特色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道路。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体现招生改革的特色化。省属本科高校的改革方案要把国家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各省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贯穿始终,既落实国家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向、思路和重大决策,又善于总结各省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经

验,根据各校办学历史积淀的特色、所在区域的经济产业需要,做出招生制度改革的具体设计。

二是坚持质量为先,体现招生改革的科学化。省属本科高校的招生改革承担着为高校选拔人才和引导基础教育顺利实施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服务于为经济社会发展选拔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是以是否具备从事相应学科的科研潜质或工程创新才能,为了保障公平,有必要建成多元主体参与、学术权威主导、行政权力保障运行的选拔机制,自主招生录取的最终决策权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这一最高学术决策权威,与学校其他治理机构之间建立明确的权力界限。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体现招生改革的法治化。省属本科高校招生改革始终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关键环节,对可能出现风险和寻租的环节从制度上进行免疫,制度缺陷是产生寻租风险的客观条件,要研究自主招生过程中寻租行为的发生规律、主要原因和可能环节,将各环节层层嵌套法律承认许可主体,加强大学独立法人的身份和责任意识。依法招生是自主招生的核心内容,主要领导要带头依法办事,推进招生行为的合法性和程序化,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设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招生工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真正实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三、改革的基本方向

统一高考的人才选拔方式一直以来让人爱恨交织,有人指责其为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认为考试形式单一,重要程度过高,“一卷定全体,一考定终身”给考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高考指挥棒使中国教育被功利性包围,助长了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的教育怪象,生命教育、素质教育和劳动品德教育成为教育盲点。在省属本科高校实施多元创新生源自主选拔制度是对目前业已成熟的重点大学自主招生的有益补充,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重视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省属本科高校可以将目标定位为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特殊创新人才的需要,以学科能力、创新思维、综合素质为主要考核内容。该招生制度的改革必将带来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改变,使学生从对知识的识别、记忆、背诵转化为理解知识、运用知识;该改革不要求考生对所有学科知识有面面俱到的理解,只需要具有特殊潜质或者特殊才能,就将获得录取的机会,打破“唯分数论”的束缚。它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将使教育的重心聚焦到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上来,从而努力认识到自己的潜质并使之成为现实。实施自主招生时,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推进:

一是以统一高考为主,积极有序推进自主招生。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宏观层面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加强统筹规划,分类赋权,有序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省属本科高校可大体分为:①省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②地方重点院校(省部共建高校);③地方普通院校;④地方新兴院校。对上述学校赋予招生自主权可以先从办学基础扎实、制度建设完善、招生声誉良好的重点大学、省部共建高校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分项目、分步骤逐步探索、有序推进。比如高校对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特色专

业和国家特殊需求的艰苦专业先行试点自主招生,提升改革的效果。另外省级行政部门还要结合实际情况,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科学把握好改革的进度和社会的承受程度,确保积极有序推进。

二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完善多元考试制度。除高考之外,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一年多考制度、分类考试制度、联合考试制度等。水平考试与竞争性高考不同,是对学生学习效果是否达标的考察,目前许多省份已经实施了水平考试和普通高考外语科目两次考试的机会,学生可以选择最好成绩使用,减轻了学生集中应考压力,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一年多考制度为考生提供多次试错机会,减轻考试压力。联合考试制度可以在实施自主招生的省属本科高校中推行,各校的笔试考试可由社会第三方实施,面试则由各校负责,考录分离,既使部分考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又能高效选材、兼顾公平。上述措施将有效地引导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考试负担,增加学生成长发展的选择性。

三是系统设计招生方案,多元录取考生。各高校要对照国家自主招生制度改革和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根据办学水平、资源和特色,设计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考试招生改革方案,并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认可,其中要统筹考试、招生、录取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综合改革,要对考试形式、考试范围和内容、自主招生录取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评价标准和方式等做出详细阐释。高校根据学生的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联合考试或院校组织的面试成绩等,通过多元方式录取考生,使其兴趣、特长在中学阶段就得到充分的培养。多元录取还可以改变高中阶段“齐步走”的教学组织管理方式,使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自主选课和个性化学习更为普遍。尤其是“综合评价录取改革”,基本上是高校在面试环节基础上认真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学生的一次性、终结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实现了用多把尺子“量”人才。当然,在此过程中各高校对考录程序将要求更加严格规范,录取方式也将持续改进优化,以上录取方式在促进招考公平、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意义,可以显著提升人们对高考权威性、公平性的认可和满意度。

四是坚持公平底线,深化阳光招生。“公开”是惩治高考招生腐败的撒手铜,将自主招生置于全社会的关注监督之下,加大改革的社会参与度,促进公平公正有助于改革成功。部、省、高校和中学四级信息公开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要将招生改革的信息通过官方途径及时公开,使招生工作全程留迹、可监督、透明、真实、有效;要通过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和管理、完善高校招生自律机制、深入实施“阳光工程”、杜绝人情、金钱和权力因素,切实落实公平公正的招考价值观;要监督完善公平公正制度,确保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维护考试招生的公平公正;要将招生改革思想传播和落实到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等各个教育阶段,坚持维持考生的知情同意权、公平竞争权,维护招考安全生态。

五是加大违规惩处力度,惩治招生腐败。要加大管理和违规惩处力度,要使高校自主招生始终在有效管理范围之内,列出招生工作禁令,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事中、事后纠错机制和腐败惩治机制。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斗争呈高压态势,人们对招生中诸如收受财物等“显性腐败”的警惕性比较高,对请吃拜节送礼等“隐性腐败”却常常以人情来往为

遮挡放松了警惕,其实以上招生腐败不仅具有其他腐败的危害性,而且因为涉及教育,其危害性更甚。一个社会的公平首先在于教育的公平,“招生腐败”无疑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公平,从而影响了“社会天平”严重倾斜。由于“招生腐败”活生生地呈现在那些高中毕业生面前,他们还没有走进大学校门就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阴暗面,会对他们今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 响。惩治“招生腐败”关乎教育大计,关乎社会的未来,必须要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四、结 语

立足于选拔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省属院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关系广大考生根本利益的系统工程,并将深刻影响教育基本制度,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环节的闪失都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甚至引发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同的责任主体应该担负起各自的主体责任、审慎操作。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设计师,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改革的推动者和管理者,要从宏观层面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切实做好全面指导、管理、监督、防范等工作。省属本科高校是改革具体方案的设计者和执行人,要充分理解和落实政策要求,将改革具体化,努力做到各方满意。社会各界尤其是考生本人是改革的对象和受益者,要保持对改革的关注,通过正规渠道反映改革诉求、反馈改革效果、反映改革问题,维护自身权益,促进公平公正的改革生态。通过各方共治一定能在 2020 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注释:

- ①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
- ② 徐瑞英:《改革招生制度促进素质教育》,《江苏高教》1996年06期,第83页。

(王丽萍,女,1975年出生,籍贯湖南醴陵,哲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教管理、中西方文化比较等)

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优化策略探析^{*}

◎ 胡霞琴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媒体快速打破原有媒体格局,传统媒体地位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民办高校舆情引导的重心也从传统媒体转移到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媒体上,民办高校舆情传播呈现出舆情渠道、主题、形式多元化,舆情主体集群化,舆情扩散机制复杂化等特征。这些特征,对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工作带来更大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工作困境,对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工作的优化策略进行探讨。

关键词: 民办高校 舆情引导 优化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①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人。同时,手机网民占网民数量的比重大幅度增加,2018年占比高达93.8%。^②这预示着我国移动互联时代进入爆发式成长期,传统的电脑端信息交流模式逐渐被取代,舆论引导媒介发生改变,以微信、微博为核心的微媒体平台成为舆论场中心,而这些超时空性媒体也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便利。

2017年伊始,随着互联网呈现移动智媒化加速发展的态势,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化布局,传媒行业走向新的跨产业融合阶段。新媒体终端不断地衍生,舆情发酵有了多元化的途径,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态势。同时在新媒体时代,舆论内容变得多样化,舆论发展变得复杂化,舆论引导边界变得模糊化,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拥有引导舆论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民办高校舆情传播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对大学生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以维护民办高校稳定发展为出发点的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工作,必须重视并提升自身舆情危机应对能力与引导能力。

一、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特征

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信息媒介特征既继承了传统媒体及普通网络媒体的

^{*} 本文系2017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课题(项目编号: N2017023)“网络舆情演变情境下民办高校舆情引导探析”成果之一。

特点,又衍生出其自身特质。大学生是高密度聚集、渴望表达意见、极易被影响的复杂群体,同时他们能够极其迅速地接受新鲜事物,熟练地运用各类社交媒体。因此,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拥有鲜明特征。

第一,新媒体时代舆情渠道、主题、形式呈现多元化。因具备廉价、实用、便捷、时尚等特点,在热衷新事物的青年学生中,微媒体(微信、微博及各类手机应用)具有数量巨大的拥护者。而微媒体的崛起,给青年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表达空间,舆情的丰富性、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丰富性,既表现在舆情内容及主题更加广泛,也表现在传播和表达的渠道更为多样。传播媒介、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舆情主题的多元化,在给民办高校信息传播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舆情管控的难度。

第二,舆情主体高密度聚集。由于在校大学生人员密集,群体性行为 and 集体性情感极易“交叉传染”,作为“三观”尚未成熟的青年学生,缺乏独立研判的能力,导致“快餐式”的信息阅读和“吸毒型”的媒介使用。一旦某种情绪或行为产生共鸣,很容易会在真实性的甄别、质疑、处理上丧失理性,从而使得不良信息得以“复制”式传播,纵容其发酵、扩大,形成舆论危机,引发非理性的传播,甚至加速谣言的产生,诱发学生的集体性行动,甚至引发群体极化现象。

第三,舆情扩散机制复杂化现象凸显。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有摄像头”的微媒体时代,对某一热点话题的追评、不同观点看法的争论与博弈调动了学生群体主动参与传播和评论的积极性。学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校园各类新鲜事,这也使得舆情的扩散速度前所未有。同时,媒介的超时空性决定了舆情扩散机制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可控,舆情的产生、发酵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学生都可以利用自己身边便捷的移动设备进行拍摄、发布、直播,同时舆论风向也可能因为一些微小因素改变“风向”。

二、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存在的困境

总体而言,随着高校舆情事件的频发,各大高校尤其是学生更为活跃的民办高校,愈来愈重视高校舆情的重要性,从被动发布新闻变为主动引导,甚至将舆情引导提升至战略角度,但就目前现状而言,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工作仍有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微平台数量裂变式的增加,影响舆情引导的统一。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微媒体平台创建的低成本、低门槛,使得民办高校涌现出一大批包括微信、微博在内的微媒体,仅以笔者所在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例,除去学校官方平台,还拥有多达68个微信、微博微媒体平台、36个网站平台。各部门、各学院、各学生组织纷纷都在建设其官方微平台,一大批微媒体平台孕育而生,并各自为政,拥有一批“铁杆粉丝”,由此导致官方微媒体平台对于舆情联动有心无力,对待舆情回应的速度、内容不尽相同。同时,校园内不仅存在各级官方媒体平台,还存在一些非官方平台,他们推送内容质量不高,运营者新媒体素养参差不齐,信息发布鱼龙混杂,同时发布内容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当发生一些重大舆情事件时,会出现学校微媒体平台众口不一,难以形成统一口径,最终导致谣言的滋生。

其次,把关人缺位,运营者媒体素养欠缺,直接影响舆情引导的效果。目前,各主体都

在积极开发新媒体,重视微媒体平台的宣传作用,但存在宣传舆论队伍非专业化、人力不足等问题,导致高校官方信息发布不及时,内容公开性、透明性不强。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这些媒体平台多数都是学生在运营,最后交由老师审稿,甚至有部门媒体平台老师都不过目便直接发布,可以说学生成为最后的把关人,但学生对某些舆情缺乏核实、认证,不做客观判断,只做主观评价,舆情信息夹杂大量个人观点和情绪,舆情信息的内容和表述更加多元、多变。可见,在突发事件爆发时,把关人的缺位,也为谣言的扩散提供了便利。

再者,网络匿名环境形成治理真空,参与总体呈现无序化。目前,部分新媒体平台即使完成实名制,但是对普通民办高校而言,其数据较难获取。就目前而言,大部分意见表达仍是通过匿名或者化的方式发布的,在虚拟环境下,学生容易放松对自身的要求,甚至放纵情绪,当各种观点交融交锋,舆情参与者对事件的认识、看法和言论存在爱憎偏好的倾向性,甚至倾向“恶”的情绪更容易放大。特别当“意见领袖”进行恶意情绪煽动时,一些缺乏理性的网络言论被层层转发,迅速蔓延,有的甚至被加工、演变成谣言,引发舆论热潮,这大大增强了民办高校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

最后,舆论热点频出,舆论话题多元,舆论“易燃点”凸显。各类新媒体平台的产生,快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格局,传统媒体权威性和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舆论引导难度面临空前挑战。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提出“群体极化”时特意强调,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极端了。^④网络民意并非社会现实民意的真实反映,网络空间充斥着非理性的情绪宣泄,理性声音在网络空间中被群起而攻之,在“沉默的螺旋”效应影响下逐渐弱化。

三、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对策

笔者认为,新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舆情引导不仅要从专业的舆情收集、分析、预警、跟踪、干预、反馈等处着手,同时针对民办高校舆情的特殊性,着重关注青年学子的媒介素养提升,打造一支可靠的网络舆情队伍,发挥青年朋辈教育作用。

第一,加强课程思政工作形式创新,发挥青年朋辈教育作用。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利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通过规范有效的教学,让学生对网络媒体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方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通过实践获得政治参与能力。同时,发挥群团组织在政治参与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网络媒体中“三新组织”评选活动,对政治参与团体和个人进行评优挂牌。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群团组织,各级团组织要带动、激励青年群体,对于优秀的青年人特别是政治参与能力强、网络影响大的青年精英,要引导其积极向群团组织靠拢,将他们吸纳进党组织,并借助这些网络精英扩大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政治立场的影响力。

第二,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表现为人们所具有的媒介认知能力、媒介使用能力、媒介批判能力和媒介创造能力的知识结构。^④培养大学生对媒介和信息的认知、批评性解读和使用、参与能力,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树立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大学生只有具备扎实的媒介素养,才能在新媒体时代成为信息的主人,在危

机事件中显示出精准的信息判断能力,抓住真实重点信息,不受迷惑和蛊惑,不传播不良信息及谣言。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需要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及讲座,普及媒介素养知识;还需要大学生强化自身学习意识,通过微课、慕课等多种形式和途径的学习提升媒介素养,做到“自律”和“他律”的结合。

第三,加强网络舆情监控队伍建设,为长效的舆情监控提供有力保障。要整合多方力量,建立专业化、体系化的舆情管理组织机构。建立部门统筹、师生结合,由学校分管领导、主管部门、专业教师、骨干学生四级组成的体系化的专业管理队伍。各司其职,细化舆情管理内容分工,实现维护、发布、监管、引导由专人负责,做好舆情的监测、研判和预警,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培养自己的网络“大V”作为意见领袖,充分发挥他们成为网络舆情监控和引导的作用,从而实现民办高校舆情引导工作成效的提升。

第四,构建网络舆情全程监控机制。除了要加强应对突发舆情事件外,集中、高效、合理应对突发事件,还应该建立网络舆情全程监控机制,对传播过程予以重点把握,设置强大的议题,通过信息流的构建将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还原事情的真相,从而实现舆情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前行。为此,要变以往结论式报道为现如今的过程性报道,通过官方媒体持续性的信息流构建未影响舆论走势,还原真相。

第五,多媒体联动全面提升官方媒体的网络引导力。将学校各官方媒体联动运营,统一发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强大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学校微媒体平台要紧跟微时代潮流,积极运用动图制作、美拍、微视频等新型微技术,打造新颖活泼的沟通方式。注意灵活运用微语言,构建融洽的舆情沟通关系。同时,创造富于本校特色的卡通微形象,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解读舆情事件、公布校方信息,有效拉近沟通距离。

第六,最为重要的是畅通学生意见表达途径。积极建立包括微信、微博、邮箱、手机应用在内的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学生与校领导、职能部门在微平台上直接对话的机制,畅通发声渠道,提高学校的包容性、开放性,实现良好的意见互动,同时要及时收集整理学生意见,总结提炼主要观点,并及时予以回应,从人文关怀角度贴近学生需求。同时,可以设立“校长书记面对面”等制度,定期邀请学生与所在学院院长、书记、教师,甚至可以邀请校长、学校党委书记,与学生面对面沟通,倾听学生意见,解读相关政策,让舆情在良好沟通中得到有效控制。

四、结 语

互联网以其扁平化的组织模式、非时空限制性、匿名交互性等优势,成为公共信息最快捷的集散地和民意表露的最常用的平台。但网络舆情引导与监控机制还有所欠缺,同时把关人的缺位、运营者整体新媒体素养不高,导致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为民办高校舆情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民办高校在舆情管理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工作形式创新,发挥青年朋辈教育作用;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加强网络舆情监控队伍建设;构建网络舆情全程监控机制;多媒体联动全面提升官方媒体的网络引导力;畅通学生意见表达途径,积极构建民办高校舆情管理工作的有效措施及机制,以更好地推动该

项工作健康发展,营造网络空间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助推民办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为民办高校全面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任务做出积极贡献。

注释:

① 马昌、曹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26/c1024-30591056.html (2019年1月26日),2019年3月20日访问。

② 金可:《中国网民规模首超8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9365103739835457&wfr=spider&for=pc(2018年8月21日),2019年2月25日访问。

③ [美]凯斯·桑坦斯:《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④ 蒋晴云、朱璐:《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若干理论讨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胡霞琴,女,1991年生,浙江绍兴人,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高校舆情)

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看“中国梦”^{*}

◎ 张 军 魏 清

摘 要：“中国梦”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追求，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情景的整体感知、辨别与顿悟，对中国精神的彰显。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向的“中国梦”，融合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现了说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是实践与智慧的统一。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解读“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我们从根源和本质上认清“中国梦”的理论旨趣，对于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实践智慧 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此后，在多次讲话中又谈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实践智慧的角度来看，“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概括，是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标志着党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是新时期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

实践智慧是从实践的角度探讨智慧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最明确论述这一概念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德性就是理性(logos)”，实践智慧指的是知识与德性的统一，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有德性的知识或有知识的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实践智慧”这一概念，并区分了人类认识事物和表述真理的五种能力，他在肯定实践智慧的本质是践行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同于普遍性知识的特点。

首先，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实践智慧的五个特征：“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善于正确考虑的人，谁也不会去考虑那些不可改变的事物和他无能力去做到的事物。践行的领域是可以改变的。”^②也就是说，实践的主体应当是具有正确认识的，并且实践的对象是可以改变的；“在可改变的事物中我们要区分制作和践行，制作和践行是两种不同的活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科学到哲学——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19NDJC284YB)阶段性成果；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批判话语的当代延续——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2015N144)结题成果。

动……旨在践行的活动不同于旨在制作的反思活动”。^③也就是说,实践智慧是一种不同于生产或制作的践行活动;“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人善或不善的事物,因为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但践行却不是这样,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④也就是说,实践智慧具有目的性,而且其本身就是目的;“所谓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正确考虑对自身的善或有益的事,但这不是就部分意义而言……而是就整个意义而言,指对于整个善良而幸福的生活有益”。^⑤也就是说,实践智慧具有善的目的,具有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旨归;“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东西的知识,它更应当通晓个别事物,因为他的本质是践行,践行必须与个别事物打交道,从而许多人虽然对其能力没有科学知识,但干起来比起那些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出色,其他领域也这样,都是具有经验的人占先。”^⑥也就是说,实践智慧不仅关注普遍知识,也关注特别事物的知识,尤其注重经验的作用。

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纯粹科学、技术或应用科学与实践智慧的区别。一方面,纯粹科学研究的是不可改变的东西,“科学所认识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凡是出于必然的东西,当然能被科学地认识,凡是出于必然而存在的东西,当然无条件永恒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既不能生成也不能灭亡”,而实践智慧研究的是可改变的而且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物;纯粹科学追求的是单纯的真理,实践智慧关注的是人的具体生活,追求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善”。另一方面,实践智慧与技术或一般的应用科学在本质上也有所不同。技术的本质是制作或生产,而实践智慧的本质是践行;技术是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存在于制作或生产之外,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它关心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实践智慧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它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践行的领域是可以改变的;它所以不是技术,是因为践行和制作种类不同。所以结论是,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善或不善的事物。因为在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但践行却不会是这样,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⑦

概而言之,实践智慧也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是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它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制作智慧”。两者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但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于生产对象的可塑性。同时,实践智慧表征了那些知道怎样生活得更好的人,是一种走向善的行动趋向,具有技术倾向所缺乏的道德意识,而且实践智慧和道德品性是一种互惠关系。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了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现实的实践之中,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人与世界的互动。一方面,人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改造世界,正是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主体的建构,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在此,解释世界与“是什么”相关联,内含了人对世界的经验知识,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表达;改变世界则内含了“应当成为什么”的价值关切,主要是一种实践理性的体现。相比之下,在实践智慧中,“是什么”的理论理性与“应当做什么”的实践理性获得了统一: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提供现实的根据,而实践理性则为理论理性提供价值引导。与之相

联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也获得了辩证的统一,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前提,而改造世界的历史需要则为认识世界提供内在动力。简言之,“以变革世界的实践关切接引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以解释世界的理论观念范导对世界的实践变革,构成了实践智慧的内在特点”。^⑧“中国梦”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承载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伟大历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似锦。“中国梦”的提出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之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世界文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恢复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更是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复兴是针对曾经的衰落而言的,正因为我们有过往日的辉煌,也有过曾经的屈辱,所以才会有复兴的宏愿。正是在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才提出了复兴的梦想,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梦想提出的理论前提;同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好愿望也为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实践接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解读,以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总结引导伟大复兴的实践变革,体现了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了新一代党的领导人的实践智慧。

其二,“实现人民幸福”体现了价值追求与价值追问的统一。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既体现于了解何物对自我是有益的,同时也涉及“合乎逻辑的、真实的能力形态”,并以此“为人的利益而行动”。^⑨同时,实践智慧应该指向“一种好的生活”,并关注“总体上的有益生活”。^⑩在此,合乎逻辑体现了实践的理性品格,而“为人的利益而行动”则内含了实践的价值诉求,它以改造世界并使之合乎人的发展需要为目标,体现了说明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内在关联。同时,基于存在的本源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更加善于考虑“总体上的有益”,而不仅仅限于特定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时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持续改善民生,打好复兴之基,共筑中国梦。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几十年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党和政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始终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行动原则,以改善民生为宗旨,将全体人民的“有益生活”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始终,旨在使全国人民过上“一种好的生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体现了实践的理性品格,同时也内含了实践的价值诉求,是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实践智慧在价值目标上主要体现为成己与成物。成己是指个体的自我完成与群体的价值实现;成物旨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以成己与成物为内容的实践智慧,内含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追求和“为何应当做”的价值追问的辩证统一。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实践智慧的目标指向往往有所不同,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关注个体的完善与群体价值的实现。“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⑩“个人梦”和“国家梦”有着内在的联系，个人的奋斗离不开国家，“个人梦”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梦”的实现；同时，“国家梦”的实现又有赖于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个人梦”是“国家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⑪同时，“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⑫在此，“中国梦”既关注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也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成就祖国伟大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个人的梦想，而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追求与价值追问的辩证统一。

其三，“坚持中国道路”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实践的目的决定了实践的方向和途径。方向与价值取向相关联，体现的是价值理性；途径与方式方法相关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工具理性层面的考虑。在实践智慧中，两者呈现为彼此交融的形态，两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同时也是根据目的选择手段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说：“实践智慧使我们选择正确的手段。”“没有实践智慧，选择就不可能正确，正如没有德性，选择就不可能正确一样。”^⑬因此，我们可以说，目的与手段的沟通过程就是实践智慧在思维过程中的实现过程。同时，目的中的价值原则暗含了普遍性的内涵，而手段的具体运用则与特定的情境相关联。实践目的的实现无疑需要普遍性观念的引导，但是，由于实践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实践的背景和境遇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如何实现普遍的原则规范与具体情境的协调沟通，是需要诉诸实践智慧的。在实践智慧中，一般原则的抽象性和教条化得以扬弃，在特定的情境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特定品格，同时，经验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得以克服，在一般的原则下获得自觉的品格。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践智慧不仅考虑普遍，而且考虑特殊，后者由经验为人所熟知。”^⑭黑格尔也认为：“为了能够实现，善还必须得到特殊化的规定。”^⑮在此，特殊化同样蕴含着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现实化问题。伽达默尔在论及实践知识时也提到实践知识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⑯可见，实践智慧具有沟通一般原则与具体情境的内在特点。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发展战略，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新时期，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也没有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结合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实践表明，“中国梦”作为普遍观念，其抽象化得以扬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获得了具体的内涵与特定品格；同时，在“中国梦”的规范指引下，中国道路避免了自发性和盲目性。以中国梦为规范引导，以中国道路做实践路径，体现了新时期党的决策的实践智慧。

其四，“凝聚中国力量”体现了价值追问和价值主体的统一。在谈到实践智慧的特点时，亚里士多德指出：“那些理性的形态都可能被遗忘，而实践智慧不可能被遗忘。”（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40b25）^⑰理性的形态与具体的知识经验相联系，实践

智慧则表现为“知的能力”，它形成于现实的实践过程，同时内在于实践主体之中，具体化为人的存在规定，制约和影响人的实践过程。同时，实践智慧呈现出综合的特点，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与德性相关。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德性。”^⑩这里的德性既有本体论的意蕴也有价值论的内涵，既可理解为与人同在本体论规定，也呈现出一种善的品格。就实践过程而言，它需要主体之间观念上的沟通与理解，行动中的协调与配合。实践目标的确认、实践计划的制定，在实际行动之前都属于观念层面的形态，与之相关的一致和共识也属于观念层面的沟通。要实现这种沟通，既需要倡导者的引导与说服，也需要参与者的理解与接受，而这些都是以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之间的关联为前提、以实践主体之间的沟通为基点的。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实践环境，如何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以协调不同实践主体的行动，同样离不开实践智慧。以沟通“应当做什么”与“应当如何做”为内容，它是协调实践主体活动的内在依据。可见，无论是观念层面的理解与沟通，还是行动中的协调与配合，都内含了实践智慧。“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13亿中华儿女的力量，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中国梦是亿万人民的梦，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各阶层的同心同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为此，党中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⑪以上各种原则和指导方针显示了党在新时期的建设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同时，为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而采取的各种发展战略，实现了“做什么”与“如何做”的沟通，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提供了内在依据。“中国梦”的提出为不同主体之间的观念沟通提供了思想支撑，同时保证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而这些都是实践智慧的指导之下做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向的“中国梦”，是在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追求，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情景的整体感知、辨别与顿悟，是对中国精神的彰显，融合了理论理性（认识功能）和实践理性（意志功能），体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其中，既包括“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内含“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既关注“是什么”理论追求，也注重“怎样做”的价值追问。基于发展的理念，“中国梦”既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注重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将普遍的理论指引与具体的情景分析相结合，展现了独特的方法论取向。同时，作为德性与能力相统一的中国梦，始终以人的存在与发展作为本体论前提，内在于人并与人同在。可见，中国梦的理论旨趣，意在将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为方式和存在者融为一体，最终形成统一的观念性形态并凝结于中国人心目中，并通过特定的实践方式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基础，它具有实践与智慧的双重品格，是实践与智慧的统一。

注释:

①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网,2012年11月29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19744088)

②④⑦⑨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p. 1026 - 1027.

③⑤⑩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26.

⑥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28.

⑧ 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6页。

⑪⑫⑬⑰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3年3月18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0819130)

⑭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p. 1034 - 1036.

⑮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30.

⑯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7页。

⑰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6页。

⑱⑲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27.

(张军,男,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魏清,女,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外语与课程思政)

话语分析与影视翻译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 桂徐贵 邓 玲

摘 要:如果对影视翻译研究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综述,就不难发现:影视翻译研究大体呈现出从侧重语言本体研究到重视文化语境研究、从强调文本研究到突出话语分析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从语篇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与话语权力理论出发,对影视话语结构、影视翻译研究方法和影视翻译策略等内容进行新的观察,成为影视翻译研究发展所呈现的一种新趋势。而不少研究也表明:通过对话语标记语等衔接与连贯结构的深入考察、引入语料库等定量研究方法、加强从意识形态视角的权力操控分析,是影视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影视翻译 话语分析 权力 意识形态

一、关于影视翻译研究

影视翻译(Film Translation, 或译 Screen Translation, ST),也称视听翻译(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VT),是从文学翻译发展而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①影视翻译的出现和发展是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传播方式,影视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广受瞩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应地,影视翻译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

经历过语言学理论和文化交际学理论观照的影视翻译研究,迎来了新的注重话语分析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简述影视翻译研究和话语分析理论主要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别从影视话语结构、影视翻译研究方法和影视翻译策略等角度探讨语篇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与话语权力分析理论对影视翻译研究的影响和启示,从而阐述在影视翻译研究领域业已出现的若干新趋势。

一般认为,影视翻译研究约始于20世纪60年代,自90年代在欧洲兴起,并在最近10多年得到蓬勃发展。在西方,主要在西欧,影视翻译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电影翻译—屏幕翻译—视听翻译—多媒体翻译”的发展过程。^②

^{*}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6年度校级课题(D2016002)和浙江省文化厅2016年度科研项目(ZW2016016)的部分研究成果,得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启动资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话语全视域下的国产影视作品英译研究”(2016QDA005)。

长期以来,影视翻译研究的话题主要有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教学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等。^③在国内,影视翻译研究除部分成果侧重于教学研究之外,其余大多属于实践方面的探讨分析;尤其是在中国影视翻译研究的早期,在引进海外影视作品、满足国内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专家、学者多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影视译制的经验出发,从不同的微观层面探讨了影视翻译的语言处理问题,如:张春柏、钱绍昌就较早地论述了影视翻译的语言特点及其与一般文学翻译的区别,李运兴具体指出了字幕翻译的适用策略,赵春梅分析总结了译制片翻译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麻争旗则从语言编码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配音片译制的技术处理和翻译方法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影视翻译研究的滥觞之作,为中国影视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带来巨大影响。^④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影视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国内影视翻译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具体来说,进入 21 世纪的影视翻译研究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专题分析和综合研究。在专题分析方面,相关成果主要涉及:配音译制、台词字幕翻译、片名翻译、译者和字幕组研究、影视翻译与改写研究、教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综合研究方面的成果则主要包括:影视类型翻译研究、影视翻译研究综述和案例研究等。

概括而言,西方影视翻译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出从语言本体研究到文化话语分析、从文本研究到多模态分析的发展态势。而国内的翻译研究成果则多局限于本体研究,一般多囿于语言比照和文化交际层面,在意识形态、权力建构和社会话语分析等跨科、跨界研究方面存在不足。

二、话语与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近年来语言学、翻译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学者对其定义和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分别从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多方位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不同主张。

根据黄国文、徐珺的观点,有关话语和话语分析的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大流派,即:发端于英美学界的“英美学派”,也称“应用语言学派”;肇始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并侧重于话语实践和权力秩序建构研究的“福柯学派”;以及受以上两种话语理论启发而侧重于文化批评和社会实践的“批评话语学派”。^⑤

首先,话语和话语分析的诞生与语言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早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从索绪尔到布龙菲尔德——都过于强调对语言内部结构的描写,突出了对词法和句子结构的分析,把语言视作一个封闭的静态系统加以研究,将言语行为排除在外。纯粹的语言文字结构分析和句法研究无法解释语言应用的众多现象和问题,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承认语境的重要性,摒弃脱离语境研究语言的方法。基于传统的句法分析所面临的挑战,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首次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中提出: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存在于连贯的话语中;明确了语境分析和言语研究的重要性。

其次,受索绪尔符号系统、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以及尼采权力观念影响,法国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话语权力理论。他认为:在狭义上,话语的一般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通过对人类临床医学、知识文明史的史学梳理,福柯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本质所在。他认为:话语不仅是一种言语实践,更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和权力控制的工具;所有权力都可以通过话语来实现。^⑥与语言学关注的重点不同,福柯更感兴趣的是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和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等话语实践和权力建构问题。

最后,随着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出现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学派和功能语言学等社会学、语言学的发展,一种反主流语言学的批评性语言学思潮开始崛起。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由罗杰·福勒等人(Roger Fowler)在《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最早提出,并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其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费尔克劳夫(N. Fairclough)等人的相关研究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基石。从尚在萌芽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正处形成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批评话语分析从其诞生伊始就与影视话语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息息相关,他们不仅深刻揭示了电视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还着重分析了受众对电视内容的符号解读和影视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建构。

从研究的基本内容、根本目的和具体方法来看,整体上,“话语分析”理论大致经历了从应用语言学层面的“语篇分析”到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的“意识形态研究”、从“知识秩序建构”到“文化话语批评”、从定性研究到定性定量结合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话语分析理论的这些发展显然也对影视翻译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呼应了影视翻译研究在意识形态、权力建构和社会话语分析方面的内在需求,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影视翻译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因此,话语分析理论和影视翻译研究的结合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话语分析与影视翻译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限于时代和自身发展的原因,中国的影视翻译和影视翻译研究起步都较晚。无论是从民国初年国产商业无声影片插入双语字幕算起,^⑦还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译制片制作开始起算,^⑧国内影视翻译发展尚不足百年历史,影视翻译还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引和丰富的方法支撑。与传统的影视翻译只重视语言本体分析不同,话语分析理论关注的不仅是单纯的语言文本,还包括对情境语境、文化语境、话语权力、身份认同、文化霸权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分析。这里的“话语”在广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在语言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中的一个概念集合,即:话语不仅是任何大于句子、有交际功能的言语材料,也是构建权力的各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所以,话语分析,无论是“英美学派”(“应用语言学派”)的“语篇分析”,还是“福柯学派”的“话语权力”理论,抑或是“批评话语学派”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都可以给现有的影视翻译研究在翻译目标、策

略、方法、内容和评价等方面带来新的思考,从而引导影视翻译研究走向新的发展方向。

(一) 语篇分析与话语标记语研究

语篇分析一般主要运用于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包括特定情境中的语言结构使用和文化语境下的体裁分析等,如:衔接(Cohesion)与连贯(Coherence)就是语篇分析的两个重要内容,也是影视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部分。韩礼德(Halliday)首次提出“衔接”的概念,并随后提出了指称、替代、省略、连词和词汇衔接5种重要的衔接手法。而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作为用来标示话语之间各种逻辑或时空关系的词或短语,多用于语篇的连贯。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强大,常见的可以作连接语、话轮转换语、确定提示语、亲密暗示语、话题转换语、界限标示语、填充语、激发语、修复语、态度标志语、模糊限制语等。话语标记语的翻译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交语境和文化背景来确定。

Chaume(2004)通过语料分析,对影视翻译中的话语标记语做了定量研究;并重点考察了“Now”“You know”“(You)See”“Look”“I mean”等标记语在策略修复、问答过渡、加强语气、诉说机密、分享信息、澄清话题等方面的语用功能。^⑩相应地,汉语也有许多类似的话语标记语,如“这个”“那个”“看你”“不是我说你”“嗯”“好”“然后”“是吧”等。

很显然,作为程序意义的一个典型例证,话语标记语是一种特殊的衔接和连贯手段,在话语建构方面具有明显的引导、制约、转换、修复和补充等功能。因此,话语标记语可以作为影视翻译研究的一个考察对象。谢楠(2009)就在这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通过把美国著名影片《飘》的源语和译语文本进行语料分析,以详细的统计数据论述了话语标记语“well”的不同语用功能,并分析了这些话语功能的汉译特点和意义特征。^⑪

(二) 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实证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种理论背景的批评话语分析因为其跨学科的开阔视域而备受关注,但也因其分析的对象和内容常不具代表性而受人质疑。^⑫20世纪90年代,深受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影响的Stubbs等人开始尝试利用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 CP)研究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由此,开始了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⑬

根据乐明(2006)的观点,影视话语可以被归类为广义上的一种“传媒话语”(Media Discourse),在研究传媒话语的过程中,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一种新的语言哲学观念,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的语言分析模式,这是因为“在传媒话语分析中系统地使用语料库和语料库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分析语言的组成成分和相互关系,而且可以联系发话人和受话人的语言认知策略和文化价值观念,往往能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⑭

语料库不仅可以考察句长、词频、搭配、衔接、连贯等,而且可以对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性的分析,为实证研究提供基础。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语料库翻译学在译者风格、翻译规范等研究方面也成效显著。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翻译,影视翻译研究在批判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将大有可为,如:Perez-Gonzalez, L(2014)就

通过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指出了影视翻译研究的过程模式、比较模式、因果模式的研究路径和进行语料库实证研究的方法。^⑭

(三) 话语权力分析与意识形态研究

如果说基于语篇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影视翻译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明性的研究的话,那么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核心的影视翻译研究应该可以更多地归类为解释性的、规范性的研究,其相关成果可以用来解释和规范影视翻译实践。这是因为话语权力理论可以更多地从宏观的跨学科的开放系统角度而不是微观的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影视翻译研究,从而使影视翻译研究脱离了原先的狭小的文本中心论或情景语境中心论,进入更加广泛的多元性的文化和社会语境。

本质上,影视翻译研究是一门涉及文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神经学、认知学等多学科门类的综合研究。所以,单纯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无法全面地分析和解决影视翻译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只能就所谓的形式对等、信息(内容)对等、意义对等在语义翻译法、交际翻译法或直译法、意译法的范畴进行讨论;其影视翻译的评价标准也只限于传统的“信、达、雅”和“对等”原则。而对于影视翻译中普遍存在的增译、减译、不译、转译甚至是改写、操控现象,除了从所谓的“美学”角度加以解释之外,就难以进行深入的论述和分析。这就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话语权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话语和知识的意识形态特征及权力建构本质,为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翻译研究——从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奠定理论基础;进而能更好地解释一些诸如源语文化话语、目标文化话语、译者话语、资本话语、受众话语、身份建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自主性和自我与他者等话题,并为影视翻译和话语权力分析提供策略和方法。这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1985)的操控理论就深受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和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1976)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的思想影响。金海娜(2017)在考察早期中国无声电影外译的主要翻译模式时,曾深入地剖析了不同模式中所呈现的不同赞助人对电影外译策略、方法和效果的影响。^⑮此外,关于译者话语和赞助人研究,著名的国产影视英文翻译贾佩琳(Linda Jaivin, 澳籍)在接受学者专访时也特别提到了影视片导演对影视翻译话语的限制和制约。^⑯

四、结 语

综上,基于多学科理论基础的话语分析可以为影视翻译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认识、描述和解释影视翻译的特征和实质。具体来说,影视翻译研究可以从语篇分析入手(语言学视角),通过重视意识形态操控和话语权力分析(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视角),引入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研究方法(语言学、翻译学视角)来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注释:

① 董海雅:《西方语境下的影视翻译研究概览》,《上海翻译》2007年第1期;刘大燕:《析 AVT 名称演变:从电影翻译到多媒体翻译》,《上海翻译》2010年第4期。

② 同注①。更多可参考:吕洁:《2000—2012年间西方视听翻译的研究》,《上海翻译》2013年第9期;王晨爽:《国外视听翻译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外语学刊》2017年第1期。

③ Orero P: Topic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Babel, 2009, 55(2), p. 196 - 201.

④ 邓微波:《从电影翻译到视听翻译——国内视听翻译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探究》,《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

⑤ 黄国文等:《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0期。

⑥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⑦⑮ 金海娜:《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雏形:中国无声电影外译模式探析》,《现代传播》2017年第8期。

⑧ 钱绍昌:《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

⑨ Chaume F.: Discourse Marker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ng, Meta, 2004, 49(4), p. 843 - 855.

⑩ 谢楠:《视听文本中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及其汉译中的信息缺失现象》,《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5期。

⑪ 徐赓赓:《话语分析在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4期;施旭:《文化话语研究简介》,《中国外语》2013年第3期。

⑫ 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

⑬ 乐明:《用语料库方法进行传媒话语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⑭ 覃江华:《影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探索空间——〈视听翻译:理论、方法与问题〉介评》,《中国翻译》2016年第3期。

⑯ 金海娜:《〈霸王别姬〉到〈一代宗师〉——电影译者 Linda Jaivin 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4期。

(桂徐贵,男,1979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话语分析;邓玲,女,1980年1月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学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学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教育管理)

康熙皇帝与祭禹新解

◎ 刘丽萍

摘要：康熙帝是清朝第一位亲祭禹陵的皇帝。他对祭禹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清代黄河改道的客观需要。因此，其在当政期间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祭禹旧制的学习、祭祀新规的制定以及亲祭禹陵、遣官祭禹都力行躬行，对后代帝王影响深远。

关键词：康熙祭禹 沟通满汉 黄河改道 祭禹制度

康熙皇帝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最长、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当政期间积极学习汉族祭祀文化，加强了满汉两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比如其祭禹，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对禹祭旧制礼仪的学习、到祭祀新规制定的审慎思考，再到亲身赴会稽祭禹、遣官祭禹，都说明了康熙对华夏开国皇帝大禹的重视。

一

为什么要祭祀？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政策；二是清代黄河人工改道的需要。

先谈谈康熙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国策，在祭禹方面的种种作为。

（一）康熙对周代以来中华祭祀文化制度的学习和肯定

依据《礼记·祭法》：“‘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①又《礼记·祭法》中“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颛顼而宗禹”。^②大禹已经成为祖先神接受后代的祭拜，夏朝开国以来对黄帝、鯀、颛顼和大禹都是举行帝王大祭祖先神的仪式的。周代设立了古代成为祀主的五大标准，并且将尧舜禹汤文武并列，为后代帝王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康熙亲祭大禹前曾在礼部的谕旨中提到“兹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德隆盛，万世永赖，应行亲诣旨，以展企慕之忧”，表明对汉族奉祭圣王标准的认可。

祭禹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团结民众。《国语·鲁语上》陈述了古代圣王制定祭祀制度的法则，称述了大禹因为以德修鯀之功，位列“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鯀而宗禹”之中，接受后代占祭；另“少康中兴”的季杼，率领大禹的后裔恢复夏后氏的天下，依靠的就是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原文如下：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③

正如何仁富教授在《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④文中，提到的儒家所重视的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三祭的宗教价值与意义是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调的宗教精神；是“人之本心本性即天性天心”之天人合德之教。中国传统之宗教性的三祭，因其不重祈求而重报恩，故此祭中之精神，为一绝对无私之向上超升伸展，以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求与之有一精神上之感通。

（二）康熙是帝王祭禹史中的实践者

先秦时期，夏禹与黄帝、尧、舜同列祀典。自汉以后，累代在京师立庙，奉祀先代创业之主、有道明君，夏禹均在其列。会稽（绍兴）是大禹陵寝所在，自夏启肇始，祭会稽大禹陵成为历代官方祭祀大禹最重要的场所。历代王朝祭祀大禹，逐渐形成皇帝遣使祭祀、越州长官致祭的制度。“祭禹”这种古老的仪式，传承和发扬了大禹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美德，有利于激励民心和祖国的统一。

夏启，绍兴帝王祭禹传统首先发起者。《吴越春秋》云：“启使岁时祭禹于越，立宗庙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无余于越，使祠禹。至勾践迁都山阴，立禹庙为始祖庙，越亡遂废也。”（案：今禹庙在会稽山下）启遣使每年祭日来越祭禹，并在南山（今南镇会稽山）上建立了宗庙。大禹以下第六代君王是少康，曾封自己的庶子无余到越地来，成了守陵人。以至于到了春秋时的越国勾践正式“立禹庙为始祖庙”。

秦始皇，帝王亲祭大禹先行者。秦代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上会稽，祭大禹”（《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是到大禹陵亲祭大禹的第一位皇帝，其意义重大，由此开启了祭禹祀典的最高礼仪。秦二世胡亥继位后，为彰显其父始皇帝的功德，也于二世元年（公元 209 年）春至会稽祭禹。《史记·封禅书》：“二世元年（前 209）春，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此后大多是皇帝派遣官员的遣祭、官祭。

康熙一帝王亲祭禹陵传承者。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都曾至绍兴禹陵亲祭大禹。《清史稿·本纪第七》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圣祖“二月辛丑，上驻苏州。……辛

亥,渡钱塘江,至会稽山麓。壬子,祭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康熙以“三跪九叩”——祭祀最高的礼仪“大祀”大禹,又书“地平天成”勒石,可见其对大禹功绩的认可,对祭禹传统的认同和意义的深刻认识。

除此之外,康熙在位时,十次派遣官员到会稽祭禹:

康熙七年(1668年),遣周之桂致祭;

康熙十五年,遣李廷松致祭;

康熙二十一年,遣徐诰武致祭;

康熙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神主升祔太庙礼成,特遣色特告祭;

康熙三十五年,遣王材任致祭;

康熙三十六年,皇帝“亲征漠北,荡涤寇氛,廓清边徼,永靖兵革”特遣王焯告祭。

康熙四十二年,遣李旭升致祭;

康熙四十八年,皇帝初患“剧疾”,后“平复如初”,特遣卢起龙告祭;

康熙五十二年,“适当六旬初届,所幸四方宁谧,百姓义和,稼穡岁登,风雨时若”,特遣周起渭告祭。

康熙五十八年,孝慧章皇后神主升祔太庙礼成,特遣田文镜告祭。^⑤

(三) 康熙在位时修订了祭禹的制度

唐代曾在《旧唐书·礼仪四》的礼制中对历代先王祭祀进行了梳理,确定了其祀主帝王、配享功臣以及祭祀地点。其中,关于大禹的内容是“夏禹,伯益配,祭于安邑”。^⑥配食就是附祭,配享。配食并非合葬,这是两种行为。配食是让亡灵在同一祠庙里共享子孙的祭品,让后死者附于先灵合祭。为什么配食的是伯益呢?《史记·夏本纪》中提到伯益曾是助禹治水成功的功臣。“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⑦祭祀地点为什么定在山西安邑呢?因为安邑是古代是夏朝都城之一,位于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

那么康熙祭禹为什么不去山西安邑,而到浙江会稽呢?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在位“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又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⑧所以说大禹葬所定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下是有史可查的。康熙应是仔细考察大禹史料后才做出决定的。这里补充一下后代帝王定立祭禹地点时的史料分析,《旧唐书》将禹庙设在河北县;《宋史》《金史》《元史》将禹庙建于黄河一代的平阳、河中府(今山西运城一代),禹祠则建在绍兴会稽。到了《明史·礼四》中才出现“四年,礼部定义,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⑨由此,从明代开始大禹的祭祀才正式定立在浙江。相关信史资料如下:

乙丑,次陕州,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

——《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下》

丙午，诏吴越立禹庙于会稽。

——《宋史·卷二·本纪第二》

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

——《金史·卷三五·志第一六·礼八》

夏四月丙戌朔，大军树栅凿堑，围瓊于济南。丁亥，诏博兴、高苑等处军民尝为李瓊胁从者，并释其罪。庚寅，命怯烈门、安抚张耕分邢州户隶两答刺罕。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

——《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

到了清代，康熙考察汉人旧制认同《明史》所修。其祭禹会稽，既上承其父顺治帝，又下启其孙乾隆帝，又不断完善补充祭禹制度，深化了对华夏一统的凝聚作用。依据可参考《清史稿·礼三·吉礼三》对顺治帝时期制定帝王陵寝祀典制度的完整的记录：从伏羲帝到明代崇祯皇帝对历代帝王及其祭祀地点进行了规定，凡二十八地、陵寝四十处；浙江祀会稽大禹陵寝。并且规定“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如原文：

（顺治帝）八年，定帝王陵寝祀典，淮宁伏羲，滑县颛顼、帝喾，内黄商中宗，西华商高宗，孟津汉光武，郑周世宗，巩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赵城女娲，荣河商汤，曲阜少昊，东午唐尧，中都轩辕，咸阳周文、武、成、康，泾阳汉高祖、唐宣宗、咸宁汉文帝，长安宣帝，富平后魏孝文帝，三原唐高祖，醴泉太宗，蒲城宪宗，鄠神农，宁远虞舜，会稽夏禹，江宁明太祖，广宁辽太祖，房山金太祖、世宗，宛平元太祖、世祖，昌平明宣宗、孝宗、世宗，各就地飨殿行之，或因陵寝筑坛，惟元陵望祭。十六年，幸畿辅，亲酌崇祯帝陵，谥曰庄烈愍皇帝。

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康熙二十年，滇乱平，遣官致祭，颁册文、香、帛，给黄伞一，御仗、龙熏各二，凡成武功，皆祭如典。二十三年，南巡，道江宁，诣明太祖陵，拜奠。谕有司巡察，守陵人防护。越五年，巡会稽，祭禹陵，祝文书御名，行三跪九拜礼。躅江宁，祭明太祖陵，如祀禹仪。凡时巡祭帝王陵寝，仪同祭庙，率二跪六拜，兹盖殊典云。

（乾隆）十六年，选妣氏子姓一人，授世袭八品官，奉祀禹陵。

——《清史稿·礼三·吉礼三》^⑩

（四）康熙时期建立的祭禹新规及其对后代帝王的影响

清代按例，至会稽夏禹陵寝致祭的，有皇帝（朝廷）遣使祭，有司岁春秋二仲月祭。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凡登基授受大典，上尊号、徽号、万寿节，皇太后万寿节，册立皇太子，凯旋奏功，皆致祭陵庙。祭文香帛，遣官自京斋送。凡是巡祭帝王陵寝，仪同祭庙，一

律二跪六拜。但是康熙、乾隆巡会稽,祭禹陵,均破例行三跪九叩之礼。甚至到了(乾隆)十六年,选妣氏子姓一人,授世袭八品官,奉祀禹陵。康熙帝祭祀大禹的行为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清一朝,共有8位皇帝遣官祭禹。康熙和乾隆两位是亲祭的皇帝;遣官祭禹自从顺治帝1651年首开先例后,康熙朝共10次遣官来祭;雍正朝共3次;乾隆共18次;嘉庆共6次;道光共3次;咸丰1次;光绪3次。可以说康熙是清朝在祭禹方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为后世皇家认同汉人祭祀文化做出了表率。

二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河工破坏严重,黄河经常泛滥决口,给沿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又严重威胁着漕运的安全。这就直接关系到清朝经济的生命线,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因此,治理黄河成为当务之急。

早在顺治皇帝时期,黄河几乎是年年决口。《清史稿·河渠一》中载顺治一朝18年中仅大的决口多达20次。^①黄河每年都会发生决口,甚至一年数次决口,在同一个地方数次决口也时有发生。黄河大的决口主要集中在中游的河南以及山东和安徽的交界处。康熙初期河患有增无减,特别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任河道总督以前,黄河连年决口,有时一年数次。如康熙九年,绝曹县牛市屯;又决单县谯楼寺,高邮运河之茶庵清水潭,江都运河之东堤四浅。在康熙元年至十五年(1676年)期间,黄河决口就有67次。^②黄河决杨家庄200余丈,至康熙二十年才堵塞这个决口,给沿河两岸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其中河南、苏北广大地区深受水患之苦。此时,黄河的河患也使得长江下游江浙的情况严重起来,危及运河及漕运的畅通。随着靳辅在康熙十六年对黄河大修的开始,到了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大修各堤工的完成,再就是康熙帝的六次南巡,重视河工,黄河水患大大减少。此后,黄河虽有决口,但危害已经减小。黄河约50年没有大的危害。

清代《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登载了一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拜谒大禹陵时写的诗《谒大禹陵》:

古庙青山下,登临晓霭中。
梅梁存旧迹,金简纪神功。
九载随刊力,千年统绪崇。
兹来荐繁藻,瞻对率群工。^③

康熙的此次大禹陵拜谒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当时的重要背景是黄河治理已经初见成效。自从康熙十七年到二十年,三年共完成导黄入海,改移清口、高家堰、清水潭、归仁堤、皂河等六大工程。由于主管治理河务的靳辅和兵部尚书等巡河大臣在治河问题上意见龃龉,才导致康熙此次南巡。在历查河道之后,康熙于返京的前一个星期,拜谒了大禹陵。应该说,此次拜谒,康熙的心情是兴奋的。千百年来黄河水患终于有了初步治理的显著成果,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康熙自问比起大禹,或许尚有不及处,但这毕竟

是千百年来圣王帝君少有之作。所以，康熙怀着豪迈兴奋的心情肯定大禹“九载随刊力，千年统绪崇”，这是对大禹治水随山刊木，墮土浚川的功绩的认可，同时也暗含了对自己治黄业绩的高度肯定。大禹治水的“疏导”思路是“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把洪水导入长江，排入大海；与此同时，用堵塞之法，迫使水流改道以保证河流按照预定轨道进入大海。同理，康熙面对黄河水患，不仅仅吸收了大禹疏导和堵塞的双重办法，还发明了以水治水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洪泽湖水和淮水共挡黄河之水，从而解决黄河倒灌问题，确保一方平安和漕运顺利。至今仍在禹陵禹庙的楹柱上留有当年康熙御题的对联“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体现了康熙对大禹治水和治国思想的精粹概括；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代帝王永远缅怀疏导江河淮汉的大禹，永远思念其人其德；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总能感受到那种精粹统一、顺从天理的精神。

三

康熙帝上承顺治帝，下启雍正、乾隆，其作为盛世的缔造者在沟通满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是清朝第一位亲祭禹陵的皇帝，他对祭禹的重视，一方面是满族入主中原，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的国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清代黄河连年河患、影响漕运，急需如大禹般治理水患以便安邦的客观需要。因此其在主政期间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祭禹旧制的学习、祭祀新规的制定以及亲祭禹陵、遣官祭禹都毕力躬行，对后代帝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 ①② [元]陈澧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6 页、第 525 页。
- ③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5 页。
- ④ 何仁富：《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年第 7 期，第 64 - 68 页。
- ⑤ 沈建中：《大禹陵志》，研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 页。
- ⑥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909 页。
- ⑦⑧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51 页、第 83 页。
- ⑨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292 页。
- ⑩⑪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525 - 2526 页、第 3715—3768 页。
- ⑫ [清]靳辅：《治河奏绩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79 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49 页。
- ⑬ [清]《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绍兴县地方志委员会 1936 年，第 2 页。

（刘丽萍，女，1981 年出生，籍贯山西阳泉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先秦文学、神话学）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谢泰交等 5 位浙东地区作家为中心

◎ 朱则杰

摘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即根据平日读书所得,对其中谢泰交、王自超、任侠、杜肇勳、胡浚 5 位浙东地区作家的有关问题予以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关键词：清诗 作家 考证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清人别集总目》
浙东

在清代诗歌(包括散文)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世纪之交相继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先生所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两部巨著。^①两书均为 16 开三大册,各著录清代作家近两万人,别集约 4 万种。特别是《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更可以说是后出转精,代表着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不难想见,即以《提要》而论,涉及这么多的对象,各种疏忽、缺漏乃至错误,自然也是难以尽免的。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其难度恰恰也是最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订正和补充,正可以使两书更趋完善。特别是关系到《提要》本身以及日后《全清诗》《全清文》等内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问题,^②更是解决一处是一处,完成一家多一家。因此,笔者在日常读书的过程中有所发现,便随时将它们记录下来,并陆续整理成文,相继分组发表,提供给编撰者以及其他有关读者参考。本篇取谢泰交等 5 位浙东地区作家,仍旧按照《提要》著录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有些同时涉及《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附此一并予以指出。

一、谢泰交(卷五,上册,第 85 页)

谢泰交,《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③

按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四十五有为谢泰交而撰的《谢天童孝廉墓志铭》(天童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14ZDB076);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清诗总集序跋汇编》编纂”(1874)的阶段性成果。

号),但没有直接记载生卒时间,而说:

君……丁酉,举顺天乡试。将用于世矣,乃从南官不第归。逾岁,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八。^④

这里,“丁酉”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谢泰交中举。次年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参加“南官”亦即礼部主持的会试,“不第”而“归”。再“逾岁”即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竟以病卒”,享年只有48岁。由此逆推,其生年则为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墓志铭在“丁酉,举顺天乡试”之前,曾叙及“年……四十,贡入京师,卒業太学”。而据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三十五《谢天童孝廉传》,谢泰交于“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贡入太学”。^⑤假如由本年40岁逆推顺数,那么其生卒年将是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至康熙元年壬寅(1662),比前说整体晚3年。然而这样一来,墓志铭中的“逾岁”就相当于过了4年,时间跳跃的幅度太大。倒是这里的“四十”,有可能其后脱漏了一个数字,或者仅仅是一种泛言。

又《吴梅村全集》同卷下一篇为谢泰交长兄谢泰宗而撰的《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给事中天愚谢公墓志铭》(天愚其号),记载生卒时间十分具体:

君卒于康熙纪元丙午[五年,1666]十二月之十六日[公元1667年1月10日],上距其生戊戌[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二十二日,为年六十有九。^⑥

同时叙及其父“封司理公[谢瀚]有五[六]子”^⑦，“天童其季弟也”^⑧。而谢泰宗《天愚先生文钞》卷四《先妣周[太]孺人述略》曾说:

太孺人弃不孝五十年于此。……健育不孝辈六人、姊一人,俱自乳。……方观察公将携不肖壹读京邸,十二龄耳。……三年归,就童子试。……报子持喜帖至,乞冠军赏。……时太孺人方乳第六弟,适遭重疾……不意谒圣先一日辞世矣。^⑨

这里的“第六弟”应该就是谢泰交。谢泰宗约15岁“童子试”“冠军”,正当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此时谢泰交“方乳”,与本年出生至少并无抵牾。

又谢泰宗《天愚先生诗集》初刻本,卷三“七言律诗”有《挽天童弟六首》^⑩。据卷首目录(部分作品有目无诗),^⑪此题前面第一题、第十二题为《亚岁》《己亥九日》,后面第四题为《上元值雨》。假如有关排序准确不误,那么不但同样可以佐证谢泰交的生卒年,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推测其具体的谢世时间大约在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的“亚岁”,亦即冬至节以后,只知道于公元是否也像谢泰宗一样已经进入下一年(该年十一月初九日冬至,十九日即为公元1660年元旦)。

《提要》本卷刚巧将谢泰交排在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出生的作家之末,这样处理应该是不成问题,至少是不无依据的。

另外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四《人物·七(孝友·二)》“宁波府·国朝”谢泰交本传引据《乡贤留祀册》，有关叙述说：“丁酉，举顺天乡试。逾岁卒，年四十八。”^⑭以此与前引墓志铭比对，可知“丁酉，举顺天乡试”之后脱漏了次年“南宫不第归”。假如由此推算“逾岁”，那么谢泰交的生卒年就会被整体提前一年，而这至少从墓志铭来看不值得采信。

附带关于《提要》卷六及《清人别集总目》著录的谢泰履^⑮，虽然生卒年不详，但他既然如《提要》所说同为“伯兄”谢泰宗之弟，则其排行肯定大于季弟谢泰交。因此，谢泰履在《提要》中的位置，应当移到谢泰交之前。

以上文字写成之后，从《稀见清代四部辑刊》读到《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著录谢泰交《谢天童先生集》的影印本，卷首“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春二月同邑友弟薛士珪拜撰”《孝廉时际谢君传》(时际其字)不但有生卒时间的相关叙述，而且比墓志铭更为确切：

己亥闰三月寒食，于先公墓田遇风而抱病，卧床者数日。而吴公[伟业]有使自娄东来，君犹起拜读其书，越宿而君已逝矣。……君没年四十有八。^⑯

这就可以断定，谢泰交的生卒年确实应该是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至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唯这里关于谢泰交得病的时间，“闰三月”与“寒食”似乎不无抵牾——该“己亥”年正三月十四日即为“清明”；“寒食”正常在“清明”前一两天，自然还不会进入“闰三月”。不过取其大略，谢泰交具体的谢世时间总在这两个月相交之际。前述谢泰宗该组挽诗，在同年作品的排序中可能不大准确。

另外《孝廉时际谢君传》曾经提到“仲兄天怀”，^⑰则谢泰履(天怀其字)在《提要》中的位置，确实应当移到谢泰交之前。

二、王自超(卷六,上册,第115页)

王自超，《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⑱

按已故黄裳先生很早以前有一篇文章《记王茂远(柳潭遗集)未刻逸文》，起初发表在《学林漫录》集刊第二集；^⑲后来又有增订，收入《翠墨集》。^⑳该文关于王自超(茂远其字，或作懋远)及其著作的资料非常丰富，其中就涉及生卒时间。

首先，关于谢世，这个时间比较确切。该文介绍“《柳潭遗集》稿本一册”，“自第七卷起，收序、碑记、疏奏、论表、启赞、杂著等文”，接下去说：

卷尾有《自诀》文，题下有编者小字附注一行云，“丁亥夏四月客湖上，书存篋中，六月遂果其言。”可知自超死于丁亥六月。^㉑

这里的“丁亥”，是清顺治四年(1647)。王自超因为曾经投降李自成，为人不齿；又加上清兵入关，定鼎中原，所以最终愤而自尽。

其次，关于享年与生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该文紧接着说：

其文云，“谪来人世有三十年”云云，亦可知其年寿。

但是，后面介绍“书牋一卷中有乙酉《与张大行》一札”，^④所引王自超语却说：

弟生年二十有六，前路颇宽，求一良死非难。顷已作自祭文并挽歌一章，须旦夕有可以死者即死之……^⑤

这里，“乙酉”为顺治二年(1645)；假如该年王自超才26岁，那么两年之后“自诀”就只有28岁。而前引《自诀》文“谪来人世有三十年”，这个“三十年”不应该是28岁的约数，或者预备再过两年才自尽。倒是这里的“生年二十有六”，“六”字很有可能会是“八”字的形近之讹，这样与享年30岁正相吻合。例如，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志·六(乡贤·二)》“明”王自超本传，就明确说他“年三十卒”。^⑥至于黄裳先生该文末尾所引《柳潭遗集》前六卷刻本陶履卓序称王自超“年未三十，离愁以死”，^⑦则大抵含有夸张与惋惜的成分。如此以顺治四年丁亥(1647)王自超30岁逆推，其生年应该是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另外，储大文《存砚楼文集》卷十四《书仲舅户部公像》，提到储大文的“伯舅”，亦即另一位为《柳潭遗集》前六卷刻本撰序的王自超进士同年徐徵麟，还曾经“手定”有一篇《茂远传稿》。^⑧这应该是关于王自超比较翔实的传记文章，但不知现今是否还流传于世。

附带关于王自超主要以八股文为世所重，并且确实很早就已经崭露头角。倪元璐《倪文贞集》卷十六有一篇《题王懋远孝廉近艺》，^⑨不知《柳潭遗集》稿本是否曾予收录。

又黄裳先生该文及嘉庆《山阴县志》王自超本传附带提到的其父王亶，笔者将在另文考察。

三、任侠(卷六,上册,第141页)

任侠，《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⑩

按任侠生卒年未能确考，但可以推知一个大概。

成书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的《绍兴府志》，卷五十八《续人物志二十一·乡贤》“隐逸”本传开头说：

任侠，字五陵，会稽人。少长京师，以宛平籍隶于庠。性落拓不羁，年二十一即弃举子业，欲遍游宇内为畸人。始客天津……^⑪

又约略同时，蒋鸿翻《寒塘诗话》说：

任侠，字五陵，一字瘦叟，会稽人。少长京师，因以宛平籍游庠，时崇祯壬午岁也。

已,乃弃去,奋志游宇内。始客沧州……^⑳

这里,“壬午”为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任侠刚刚“游庠”。其“弃举子业”,自然不可能早于这一年。而联系“弃举子业”的年龄,则可知任侠只能出生于天启二年壬戌(1622)以后。这就是说,任侠在《提要》中的位置,以移到下一卷比较合理。

又,该府志本传末尾说:

年八十二,自绘小影,理后事毕,谓其子曰:“吾将逝矣。”至期卒。^㉑

即任侠享年82岁。如此由天启二年壬戌(1622)下数,其逝世应该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以后。

另外,胡浚《绿萝山庄诗文全集·诗集》卷八《题任五陵诗稿》二首之二,首联云:“风雅何人主?先生七十年。”^㉒这里的“七十年”,如果大致从十几岁开始写诗算起,那与享年80岁以上倒基本一致。

四、杜肇勳(卷六,上册,第141页)

杜肇勳,《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㉓

按杜肇勳生卒年仍旧不详。不过,近年其同乡张岱有些原见于稿本、钞本的诗歌作品被陆续发现,整理问世;其中一首七言古诗《杜功王八十寿》,似可借以推知杜肇勳(功王其字)生活的大致时段。

先说夏咸淳先生辑校的增订本《张岱诗文集》,内《张岱诗集》卷三均为“七言古诗”,从标题带有年份的作品来看,总体上符合写作时间的先后次序。其中《杜功王八十寿》一诗,^㉔前面第六题为清康熙五年(1666)所作《丙午长至,为赵我法七十三初度》,^㉕后面第一题为康熙七年(1668)所作《戊申正月晦日,金乳生禹陵胜会,载笔记之》。^㉖

再说路伟、马涛两位先生共同点校的《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七言古”内部标题带有年份的作品总体上也符合写作时间的先后次序,但相关作品的排序有所不同。其中《杜功王八十寿》一诗,^㉗前面第一题倒是《戊申正月晦日,金乳生禹陵胜会,载笔记之》。^㉘

如此两书综合起来判断,《杜功王八十寿》一诗大约作于康熙七年戊申(1668)前后,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由此逆推,杜肇勳大约出生于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前后,享年则在80岁以上。

另外从这首诗的口吻揣测,杜肇勳要年长于张岱。而张岱生年确切,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㉙则杜肇勳比他大8岁左右,这应该是正常的。因此,杜肇勳在《提要》中的位置,应当前移至卷一才是。

附带关于上及《张岱诗文集》的《前言》,第五部分开头在介绍版本时,曾提到清“顺治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张岱“时年六十四岁”。^㉚但从张岱生年下数,本年应该是58岁,可参见书末所附《张岱年谱简编》。^㉛

又《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七言律”内，有为杜肇勳而作的《涉园新柳，为杜功主索咏》二首^①。该标题中的“主”字，应该是“王”字的形近之讹。

五、胡浚(卷二十，上册，第 510 页)

胡浚，《提要》已定其生年为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而“卒年不详”。

按胡浚《绿萝山庄诗文集·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卷首第一篇孙人龙序，开头部分已经叙及胡浚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召赴玉楼”，^②亦即享年 72 岁。

附带关于胡浚的生年，江庆柏先生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注有其依据，^③为胡浚《诗集》卷三十一《七十自述》。^④同卷后面第三题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南窗试作》，^⑤即以此逆推其生年为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至于《诗集》卷三十反而已见有《乾隆廿二年[丁丑，1757]驾幸浙江，二月廿四日臣浚恭迎于王江泾，进呈排律六十韵》，^⑥编排次序明显参差，则姑且忽略不计。

需要注意的是，此前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卷二十三胡浚小传说：“生年以《丙子七十自述》推之，为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⑦这很可能是在计算过程中把公元纪年“1687”写成了“1678”，所以导致了年号纪年的错误。而《清人别集总目》著录胡浚，^⑧生年标注为“1678”，则又显然是受了《清人诗集叙录》的误导。

又，《清人别集总目》胡浚名下，列有 5 种传记资料的线索：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十一《县学生胡君传》、程鸿诏《有恒心斋集·文集》卷八《胡、吴、汪、俞，附诸死事传》第一人胡浚传、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三]、秦瀛《己未词科录》卷一、陈澹然《江表忠烈[略]》卷十七。其中第四种《己未词科录》，所录都是康熙十八年(1679)荐举博学鸿词之人，胡浚尚未出生，自然不可能在内。而第一种、第二种两篇传记文，传主胡浚字深如，安徽黟县人，秀才，咸丰五年乙卯(1855)反抗太平天国被杀，^⑨显然是另外同名之人；第五种《江表忠略》，无须再查，肯定也是如此。只有第三种《鹤征后录》，才真正录有这个胡浚。^⑩

又，近年问世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42—243 册影印《绿萝山庄诗文集》，依例在前面添有一篇作者小传。但是，该小传称胡浚“生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又所列“参考文献”为“《鹤征后录》[卷三]、《柏堂集续编》卷一一、《有恒心斋文》卷八、《己未词科录》卷一”，很明显都是从《清人别集总目》转抄而来，除《鹤征后录》之外实际上都没有查看原书。

另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之十一著录胡浚“绿萝山房文集二十四卷、诗集三十三卷”，^⑪集名“山房”的“房”字不知原系笔误还是确实另有版本依据。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68—269 册影印本，其底本都是“山庄”而新添扉页及总目却仍称“山房”，则明显表里不一，恐怕并不妥当。

注释：

① 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 ②《清人别集总目》虽然按作家姓氏笔画排序,但各家小传也力求注明生卒年。
- ③《清人别集总目》见第3册第2302页。
- ④⑥⑦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册第935页、第942页、第940页。
- ⑤ 黄与坚:《愿学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 ⑧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册第941页。又《谢天童孝廉墓志铭》也曾叙及:“父……凡有子五人,而君为其季。”此外卷五十二为谢瀚而撰的《谢封翁传》,亦称“翁故五子……其季泰交”,见下册第1050页。
- ⑨ 谢泰宗:《天愚先生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7-468页。
- ⑩⑪ 谢泰宗:《天愚先生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180页、第146页。
- ⑫ 雍正《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册,第5212页。
- ⑬《提要》见上册第118页,《清人别集总目》第3册,第2302页。
- ⑭⑮ 谢泰交:《谢天童先生集》,《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第八辑第87册,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2-23页、第15页。
- ⑯《清人别集总目》第1册,第123页。
- ⑰《学林漫录》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99页。
- ⑱⑲⑳㉑ 黄裳:《翠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9-77页、第61页、第65页、第65页。
- ㉒ 嘉庆《山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37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713页。
- ㉓ 黄裳:《翠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6页。此处“陶履卓”的“履”字误作“覆”,可参见《提要》本条。
- ㉔ 储大文:《存砚楼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 ㉕ 倪元璐:《倪文贞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8页。
- ㉖《清人别集总目》第1册,第468页。
- ㉗ 康熙《绍兴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百三十七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册,第4777-4778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八《人物·八(义行·中)》“绍兴府·国朝”本传转引府志,“年二十一”作“年二十”,盖脱漏“一”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册,第5324页。
- ㉘ 蒋鸿翻:《寒塘诗话》,《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册,第989页。
- ㉙ 康熙《绍兴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百三十七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册,第4778-4779页。
- ㉚④③④④⑤ 胡浚:《绿萝山庄诗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第1页、第424-426页、第427页、第415-419页。
- ㉛《清人别集总目》见第1册第688页。
- ㉜③③④③③③ 张岱:《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第78页、第82页、第27页、第550页。
- ㉝③⑥④④ 张岱:《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页、第65-66页、第135-136页。
- ㉞ 可见《提要》卷二,上册第23页。
- ㉟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2页。

- ④⑥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册，第 791 页。
- ④⑦ 《清人别集总目》第 2 册，第 1571 页。
- ④⑧ 方宗诚：《柏堂集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7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6 - 317 页；程鸿诏《有恒心斋集》，同上第 678 册，第 234 - 235 页。
- ④⑨ 李富孙：《鹤征后录》，《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2 辑第 23 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73 - 674 页。
- ⑤⑩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下册第 1672 页。

（朱则杰，男，浙江永嘉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清代诗歌）

王国维美学观之赏析

——读《人间词话》有感

◎ 王书慧

摘要：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史学家和国学大师，他的代表作《人间词话》有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是他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从“境界本也”“唯真即美”“摘句法”“诗人之眼”等几个角度入思，对《人间词话》中部分重要的美学观点进行理解与赏析并简要地阐述其理论思想对于当代文艺批评的借鉴意义，浅谈从中的所感所悟。

关键词：“境界说” “唯真即美” “摘句法” “诗人之眼” 当代意义之思考

引言

王国维先生，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字静安，号观堂，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从事文史哲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先生之文艺美学观念，提出了词之“境界说”的美学评判标准。他运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概念、术语并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与方法，所总结的理论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至今仍闪烁其睿智的光彩，拥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意图赏析《人间词话》中部分重要的美学观点并简要阐述其理论对当代文艺批评的借鉴意义，浅谈笔者的收获与感悟。

一、境界本也

“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观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一切诗词，凡上乘之作，都应该是“有境界”的。“境界”论诗，当始于《诗经》之“思无疆”，言其之思深广无穷也。思无疆，意无穷，也就是所谓“意趣高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情趣与艺术技巧结合的品格，包含着诗人的禀赋、胸襟和才学。^①中国历代“能自树立”的豪杰之士无不在力争这“第一义”的“境界”，可见“境界”于诗词的美学价值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人间词话》的“境界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笔者经过归纳总结，认为主要包含了如下的几个方面。

其一，格调之雅。刘熙载《艺概》云：“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同样，王国维也非常看重诗

人的人格品质,他说:“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内美”是指人高尚的道德品格。“王国维曾赞颂彪炳于中国文学史的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等大诗人‘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他将‘人格’置于境界之首,故论文天祥词,谓‘风骨甚高,亦有境界’。‘风骨’即由‘文格’所表现的‘人格’,惟‘人格’与‘文格’统一才称得上‘有境界’。”^②王国维对创作主体的“内美”的强调,体现了他对主体人格的审美取向。^③“‘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④人格之境界来自心灵之涵养,是诗词作家对于道德品格的内在要求,对人生崇高境界的坚定追求,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的综合呈现。高格的作品来自美丽之心、高尚之品,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为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可见王国维对词人人格品质之看重。

其二,胸襟旷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苏轼、辛弃疾是两宋词人中的大家。“旷”和“豪”说的既是他们的性格特征也是两人词的风格。王国维认为“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所谓“胸襟”即二人浩然旷达的英雄气概。苏、辛词似天马脱羈,以阔大堂庑、超迈气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让人读来荡气回肠,词境更为深邃廓大,清雄淡远。^⑤“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⑥王国维谓之“雅量高致”,其意可作这样理解:一是意趣不凡,气度之旷达宏阔;二是秉直高洁,情致之雅正不阿。苏、辛是忧生忧世的热血男儿,心中正大光明,词中自有正气充盈其中,“不平之鸣,随处辄发”,“骨劲气猛,自成高风”。所谓“有境界”即他们的诗词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的“人格”力量。

其三,气象万千。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除了看重诗词的“高格”外,特别推赞诗词之气象。“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⑦李白的《忆秦娥》结句意境开阔,气象沉雄悲壮,使人在对景象的凝望中慨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悲悯的沉痛中陷入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繁华之景一一略过眼前,昔日煊赫的业绩已成过往,短短8字使人感到空间的广阔和时间的悠长,营造出一种穿越古今的时空感,大气而雄浑。“所谓‘气象’,王国维不是一般指景象,而是与他所强调的‘境界’相关联,即‘境界’中的一境——气象之境。这种‘境’,侧重于‘气’,而抒由‘境’激发的一腔之情,吐萦绕于胸的满腹感慨。故这里的‘情’,既非‘柔’的浅吟,又非‘软’的低唱,显得豪放俊逸,大气磅礴。”^⑧同样,王国维认为李后主的词也充满了“气象”,“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人的忧愁感慨已不仅限于一己之沉痛,而是对国亡家破,人生兴衰的万千身世之感,显得阔达雄深,构成了沉哀高远的意境。这种意境中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自是“高格”之作,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词之有境界”的重要衡定标准。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准则——“真”,他十分看重词之“真实”,认为这是古今第一流之作品所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真实之美”包含了真切自然、真情真意、真实不伪。

二、唯真即美

其一,真切自然。“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

荷举”。这些诗句不事雕饰,客观真切地呈现出自然之美,就好像脱口而出。王国维尤爱这种自然真切的表达,称之为“不隔”。“不隔”之作,作者能够体物真切,由形传神而又不破坏自然本身的特征,从而能够深切地感染读者。学者叶嘉莹在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写道:“作者有真切之感受,且能做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不隔。”“不隔”之作质朴晓畅、明白如话,其写景必能传达出自然的本性,其抒情必能传达真实的心声。反观“隔”之作品往往雕琢玩味、刻削太过、用典颇多,给人“有心为之”的感觉,“有心为之”则“真”的纯度打了折扣,少了自然之趣,难免给人“矫揉妆束”“隔雾看花”之感,让人亲近不得。

其二,真情真意。“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⑨王国维认为李后主是拥有“赤子之心”的真性情之人,虽为人君但内心葆有纯真,恰“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后世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写出“非人力所能及”的“天籁”,在于他“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⑩“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⑪王国维在谈到“屈子文学之精神”时,以两字括之,曰:纯挚。在他看来,“丰富之想象”必须附丽于“纯挚之感情”,方可产生像《离骚》这样伟大的诗篇。诗人词家必须以真感情观人事物,这样他的作品才不辜负于自己的心声。敢发真声,敢言真话正是诗人气骨之彰显。除却诗人、词人,王国维本人之学问、之文章亦皆可以“忠实”二字当之,他的成就无不自“忠实”,来自内心的真情、真意、真思想。艺术创作要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以真情济之。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⑫。

其三,真实不伪。在《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三十二则,王国维提出“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这是一个很超卓的美学见解。他要求我们评判一则词的美学价值的高低要透过其现象来观其本质,不仅要关注其外在的语词表达,更重要的是词中所呈现出的思想内涵,其词品是否高雅,其所表现的人物品格是否美好,情感是否真挚,而非拘泥于其语词形式是否“淫鄙”,由此词之高雅浅俗即可判别。与之相联系的需提到他对“淫词、鄙词、游词”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淫鄙之尤”如《古诗十九首》中“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轹轳长苦辛”,也能够流传百世,关键在于其不失为“真”——真实地抒发了“荡子妇”之心声,真实地活现了那批精通“市侩哲学”占据“要津”的高位者的嘴脸。故而读之不觉其淫,但觉其“亲切动人”,不觉其“鄙”,但觉其“精力弥满”。而“游词”如《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则“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显得虚伪又轻浮,故孔子讥之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与“淫词、鄙词”相较来看,宁要前者之“真”,而弃后者之“游”。由此可见,王国维在词的本质既区分雅俗,又主张“雅而不避俗”,而评判雅与俗的关键在于“神之真”与否。因此对于“淫词、鄙词”是否低俗,不可妄下判断,其与那些“假清高”之作相比较却要真实的多,而王国维真正要否定和批判的是虚伪的“游词”。

三、物转心则凡,心转物则圣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一个很鲜明的创作特征——“摘句法”,即“断章云尔”,

善于拈出诗词中的个别语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主张或赋予诗词以新意达到一种再创造的意境之美,以此来抒发自身对诗词独特的哲理感悟。

其一,他的“摘句法”表现在论证词人的“词品”上,“于其词句中求之”的论证方法显得十分具有说服力。“‘画屏金鸂鶒’,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已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⑧王国维采用他擅长的“拈”出法,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三位词人的词中各“拈”出一句来区分他们各自的词品,这种方法抓住了不同词风的特征,不仅饶有形象而且言简意赅,生动地活现了温词之“艳”,韦词之“直”,冯词之“深”,真可谓是妙评,堪称一大创造。此外,他在论证“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的观点时,分别拈出了属于同一诗(词)人的两首诗(词)中各一句来作比较,而非选择不同流派的不同诗人,如此既有说服力,又带领人们窥见诗(词)人创作风格之多样化,可见先生说理论证十分之严谨细致。

其二,表现在“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在浩瀚如烟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精言妙语,不可胜数,先生能取前人词中名句独创其理论,是因他胸罗万卷,殚精竭虑。尤为典型的就是他借古人的诗词名句来表现他独特的对人生三重境界的感悟。诗词的境界亦是人生的境界,先生在评词的同时品评的也是人生的不同境界。人生的境界亦是诗词的境界,先生在诗词中读懂人生,感悟人生,他的解读赋予了诗词深刻的人生哲理内涵,这种对词境界之再创造,无疑使这份感悟带有了佛性的意味和色彩。其感受之丰富细腻,思想之深远博大,故而成就了“三境界”说不朽的学术名论。

“《红楼梦》里有句名言,叫作‘编新不如述旧’。‘述旧’即引用古人的诗文来传情达意,抒写自己的志趣、意念、追求。”^⑨物转心则凡,心转物则圣。在人的内心中需有一份定力,能将所见的“外物”经由自己的“心”转化为自己的独到见解,长此以往可形成自身独到的世界观,而不是被纷呈的外像牵着鼻子从而迷失本性。王国维堪称“心转物”的高手,在他对诗词意境的再创造中带着创造性的背离和超越性的见解,同样自成意境和高格,自成“我之境界”,是“古人亦为我用”之典范。

四、诗人之眼

《人间词话》手定稿之十一则中提道:“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王国维之所以认为冯延巳之词而非温之词当得上“深美闳约”,是有他深刻认识的。温庭筠是“花间”一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词多抒写闺怨之情,尤擅长于对女性容貌服饰的描绘,擅写居室中陈设的堂皇,色调耀光闪彩,炫眼夺目,可谓情采缤纷,精艳绝人。但冯之词虽也落笔于闺情但往往寄托着个人的感慨,有时在浓丽的哀伤中会出现俊朗高远的佳句。“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之意境不同于“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鸂鶒”而显得深沉曲折,笔细而情深。他的情感已不再寄托于具体的客观之物上,而是着重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及对人生意义的深切体验,逐步地脱离了妇女的闺愁之阕,上升为一种抽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之情,使情感带有了—定的普遍性。

故王国维又说其词“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可见其词境的宽阔。

同样,王国维提到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南唐后主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⑤李后主的词无论题材和意境都突破了花间词派的范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所写的不仅不再是歌辞之词所热衷于的美女与爱情,也超越了冯延巳所表达的人内心中的一种惆怅的情绪,而是把古今所有人类的无常的悲慨,对宇宙人生运行规律难以把握的无奈囊括进短短词句中,是对人世间兴衰沉浮之无常的慨叹。这种情感超越了一己之阈,其眼界之开阔、感慨之深沉,“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⑥李后主命运的不幸却促成了他在词风上的无心之改变,始变为歌女立言的“伶工之词”为言情述志的“士大夫之词”。这种由“歌辞之词”向“诗人之词”的变化,无论从视野和意境上都使词具有了更深广的意蕴。诗人之眼,需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不囿于“一时”的“物质上之利益”,而为人类谋“精神上永久之利益”,发“人类全体之感情”,引发古往今来人类对命运体验与思考的共同感慨。这正是大词人、大诗家之伟大而珍贵之处,同时也是王国维先生如此珍视这些大家之缘由。

五、当代意义之思考

王国维先生对于诗词的品评其实就是他的美学观念、美学思想的鲜明表述,他对于“美”的理解,对于什么是“美”的看法,有着十分确切的答案和十分坚定的准则。《人间词话》与其说是一部诗词的批评论著,不如说是创作者审美理想的寄予。其中关于“美”、关于“境界”的品赏标准以其丰富而具真理性的内涵于当代社会中仍在沿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判断与选择,经久而不衰。《人间词话》于词是如此而评赏各类艺术作品亦是如是,当今社会为何难有经典之作,有高原而无高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了“高格”少了“境界”。王国维是很看重词之思想精神境界的,消费社会中人云皆云之作颇多,而在艺术创作时却很少注重艺术作品所应当具备的高雅情调和高尚品格。“词格”亦“人格”,而为了经济效益一味媚俗,是以放弃创作者自身之“格”为代价的。没有真实,没有气骨,没有格调的作品,那也只能是泛泛之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艺术创作,作品于其思想“境界”上之高雅应当是每一个创作者所追求的。在这一点上艺术工作者应当要进行深切的反思。

此外,王国维对于雅俗的见解于当代也很有启发意义。“雅而不避俗”,即使艺术作品在形式上显得通俗、浅俗,只要不失其“真之美”,亦可接受。先生在这里无疑放宽了标准,让我们突破固有偏见以更加宽容的视角和宽广的胸襟来观照艺术作品之多样表达,由此可见先生善意之胸怀,正直之人格,而这是后世之人所更应当仰重和学习的。我们需认真审视,《人间词话》于当代艺术创作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不要将经典弃于一旁而不顾,视“光辉”而无睹,任凭我行我素。如果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深思并不断改善无疑将会推动文艺作品创作向更加有境界的道路发展。

结 语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①诗词的意境之美就在于其含蓄蕴藉、气韵无穷，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美学理想的演变，更是中国古代文人人格和气骨之彰显。王国维身处乱世潮流，却能气定神闲地带人们走进美的领域，感受中华古典文化中那最幽微深隐、缠绵往复、浩渺如烟的诗词意境，他所身处的黑暗的时代却更加深了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对真理探求的执着信念，可见文化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精神之引领。《人间词话》之美，美在其真，作者之言之真，词话之理之真，寥寥数语而能烛照真理；美在其创，“拈句法”的运用展现的是作者对古典诗词掌握得游刃有余之功力，尽显其洒落飘逸之风采。先生以他参悟古今的睿智，感悟天人的纯情，对自然、对词人、对宇宙人生之真理无不进行着感受、触摸和探寻。其忠实自我之真诚，追求真理之精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继承。诚如陈寅恪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②

注释：

①②④⑤⑧⑩⑭ 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3、3、281、131、31、49、79 页。

③ 罗云汉：《〈人间词话〉中“内美”的人格内涵》，《剑南文学》2012 年第 3 期，第 211 页。

⑥⑦⑨⑪⑫⑬⑮⑯⑰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9、5、9、65、3、7、8、10、46 页。

⑱ 汪泽：《百年的等待——评叶嘉室先生〈人间词话七讲〉》，《博览群书》2014 年第 12 期，第 71 页。

（王书慧，女，1991 年 5 月 27 日出生，山东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艺术学）

论海子和他的诗歌世界

◎ 雨 田

摘 要：本文对海子的诗歌进行了解读，追忆了海子与四川诗人的交往过程，海子的感情经历并分析了海子自杀的原因。

关键词：海子 死亡 诗歌世界 走向远方

2009年3月26日是诗人海子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我在西南科技大学主持“诗意的春天——纪念诗人海子逝世20周年诗歌朗诵会”时，开始就朗诵这首《亚洲铜》，在这里我同样将《亚洲铜》作为今天的开场白：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 亚洲铜
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 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 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

亚洲铜 亚洲铜
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一、我看海子的诗歌

海子的《亚洲铜》是1985年我在由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读到的。同时，这本《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刊载有北岛、杨

炼、顾城、徐敬亚、周伦佑、欧阳江河、廖亦武、岛子、赵琼、翟永明等 40 多位诗人的原创作品和翻译诗歌。在这之前，我从未读过海子的诗歌，也不知道中国有叫海子的诗人。

《亚洲铜》是海子的成名作，也是最早为海子带来广泛声誉且奠定他日后在中国诗坛重要地位的杰出诗篇。全诗所包蕴的深邃丰富的历史文化及生命情感内涵，使它在海子数量众多的充满纯粹抒情色彩的诗篇中显得卓尔不凡，分外引人瞩目。作为一个统领全篇的核心意象，“亚洲铜”在此具有深刻的双重象征含义，它既是贫穷祖国形象的精妙比喻（“亚洲铜”在视觉形象上容易让人联想起北方贫瘠广袤的黄土地，而海子本人又常常把北方当成心目中的祖国），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形象命名与概括（“亚洲铜”这个名称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表达了诗人对于民族苦难生存景况的深沉广阔的文化反思。

全诗分四节，海子在第一节就点出“亚洲铜”（黄土地）是“祖父”“父亲”和“我”的“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暗示出贫瘠的黄土地是我们世代无法逃避的生存背景，它包含了我们命运中的全部苦难、屈辱与辛酸；他在第二节则用“青草”在海水“淹没一切”的荒凉背景中“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这一自然意象，传达了诗人对于民族苦难命运内在的深沉思索以及隐秘的反抗意向；而第三节顺承第二节的思想脉络，通过“白鸽子”转化成“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的大胆联想，以及“穿上它们”的热烈恳求，流露了诗人对于以屈原为代表的、为着祖国的幸福前途而不惮勇敢殉身的崇高人格的由衷敬慕与礼赞；第四节对前三节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给予进一步的深化，它通过一场想象中的“击鼓”舞蹈（仪式舞）所呈现出来的表面狂欢图景，与内在深层的痛苦中传达出我们对于生命和生存的虔诚祈祷与美好憧憬，有力地揭示了作品的深刻主题。

《亚洲铜》意象鲜明生动，画面感强，联想丰富而大胆，比如“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节奏张弛有效，极具情绪感染效果，与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堪称互映生辉，构成了《亚洲铜》的艺术魅力。

有写作经验的作者都清楚，“反复”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现象，它是诗人抒发情感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是通过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所谓反复，是指诗歌的段落之间由相同或相近的诗句，造成一种连环性的效果，一层一层地、层层递进地抒发感情。诗歌具有一唱三叹的特点，所以运用反复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已经形成一种套路，一般性的运用已经使人觉得不新鲜。因此，这方面需要有作为的诗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海子无疑是这样素质和能力的一位诗人。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海子 1980 年写的这首《九月》吧：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无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九月》便运用了反复手法,但是和以往诗人的用法不一样,用得非常自如,出神入化,使人浑然不觉。短诗只有十行,却用了两种反复。一处是“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这一句,先在首段中间出现,随后又在首段末尾出现,接下来又在第二段第三句出现反复。此诗的第二处反复是两段的段首部分,显得更加隐蔽,因为不是整个句子重复,而是部分词语“死亡”“野花一片”重复出现,也可以说是意象的反复。短短十行诗,创造了反复手法的新形式,是值得更年轻的一代诗歌写作者认真体会和仔细研究的。

海子无疑是这个时代青年诗人中最具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在他短短的25年生命历程中,严格地说是1982—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以诗歌为主的近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诗歌在青年人中广为传阅。由他的同学、诗人西川编选,作家出版社在2009年3月出版的《海子诗全集》是迄今最全面的选集。该全集除收录海子的抒情短诗、长诗诗剧、诗学提纲、日记小说外,还补充有他的早期诗作、散文作品,诗歌异文、手稿画作等。

1985年底,我从《亚洲铜》开始第一次接触到海子的诗歌时,我认为海子是天才性的诗人。他的《村庄》《秋》《九月》《四姐妹》等作品是值得反复吟诵的佳作。过去的很多个夜晚,是“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这些诗句伴随着我度过的。

90年代,不少青年诗人仿效海子的诗歌,其作品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海子风格”,“马匹”“泪水”“雨水”“野花”“麦地”“山冈”“草原”“死亡”“荒凉”“王”“姐姐”随处可见,但他们学习不到海子诗歌中的那种黑暗、悲伤与绝望,因为诗人的内心世界和悲伤与绝望本来就是只能靠自己体验而是无法复制印的。

因为对海子作品的喜爱,这里我只能把部分注意力停留在了海子的诗歌上。

海子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令我欣慰。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在这百年中,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而青少年却对现代诗越来越陌生,不能说与教材中所选的作品老化、跟不上人们的审美需求无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不长,现引用如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第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第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海子代表作，它语言优美，意蕴悠远。但从艺术角度上说，这只能算是海子中上水平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海子还有不少作品比这首诗艺术含金量更高，但这些作品要么太长，如《弥赛亚》《祖国》；要么太短，如《村庄》《秋》，虽然之后也被列入高中二年级语文的辅助阅读篇目；要么“消沉”得近乎绝望，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如《春天，十个海子》《九月》《七月不远》；要么深情得足以令人想入非非（不入选的理由可能和前面一样），如《四姐妹》《日记》；还有的太热烈，如《麦地与诗人》；太“先锋”，如《黑夜的献诗》《找钟》……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那些充满了死亡、黑暗、宿命、忧伤的诗歌中少有的语言干净优美、节奏明快（特别是最后一节，明快得近乎俗气）、主题健康向上（考虑到读者主要是高中生，教材编者有必要把这一点放在首位）的一首。在海子的诗歌中，具有与其相近质地的，大约只有《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祖国，或以梦为马》等有限的几首。所以，教材的编选者在选海子的诗时也是费尽心机的，可能是多种因素折中的结果。

选择海子的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是编者对诗歌形式的理解问题——比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诗歌要讲究语言优美、意象贴切、意境优美等，海子的诗歌几乎都满足了这些条件——还是想抓住海子传奇的生活经历这一“卖点”？如果是在“选人”而不是“选诗”，那也还罢了，如果是“选诗”，那么北岛、杨炼、多多、西川、欧阳江河、周伦佑、廖亦武、翟永明、雨田、于坚、韩东等人就不应被忽视。这些诗人创作了很多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优秀的作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首诗已被好心人谱成了歌曲，有一次我偶然听到过，曲作者把好端端的一首诗给糟蹋了，它变得深情而近于矫情，而实际这首诗的情感底蕴应该平和而淡泊。在“歌迷”多如牛毛而“诗迷”凤毛麟角的今天，再优秀的诗歌也不会比四流歌曲更受人关注，中学校园更是如此——对于这首诗歌，学生们是否会像平常日子一样，以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代替了对原著的阅读？我还担心中学教师对诗歌的理解能力，不能进行更为精到的讲解，从而无法让学生对作为“流行歌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作为诗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区分开来。

从诗歌风格而言，也在遗憾之处。既然选了一首“华美”的诗作为教材，为什么不再选一首有思想性的诗呢？8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作品的影响并不比以海子为代表的那一类

诗歌小,比如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西川的《夜晚穿过广场》和雨田的长诗《麦地》早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在诗歌发展史的意义以及在文坛上的影响都不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下,它们进入中学教材资格绰绰有余。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学语文教材选取了海子的诗歌是试探性的、有所保留的,除了考虑诗人的影响,更考虑作品的风格意蕴等方面的因素。当然,应该肯定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入选,是向前迈了一步,至于更为精到、更能体现中国现代诗发展大潮的作品入选,我们不妨寄希望于下一次。

其实,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国人的生活及纯文学状况,就可知道海子的诗的受欢迎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人们腰包渐鼓,精神领域却闹饥荒,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品位的重要,开始寻找真正能浸润灵魂的佳作,但正因为商业的冲击,严肃作家们要么一窝蜂地改写通俗小说、纪实小说,要么就退缩到书斋里埋头创作脱离现实、曲高和寡的“探索性作品”。这时候,海子那空灵明快、意境高远、充满乡村气息的诗歌引起了他们的注目,另一方面,青年人中热爱海子诗歌者极多,他们对这个早逝的诗才心怀敬意,而对海子所知不多的更年轻的一群也不会放过了解这位传奇诗人的机会。

海子离去我们将近21年了,可是,死亡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年里,尽管诗坛风起云涌,各种“流派”和“主义”争奇斗妍;尽管商海的潮流时时冲撞着诗人们颠沛的灵魂,但海子纯粹的歌声一直没有被淹没,甚至更为清晰。是啊,垃圾永远无法理解金子的美,开在俗物中的鲜花只能更鲜艳。80多年前,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写下他的代表作《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今天重读这首诗,我觉得好像也完全适用于海子——这个大地之子。

二、海子与四川诗人的交往

其实,海子没有来成都之前就与四川诗人徐泳有过交往。这个叫徐泳的诗人,原籍四川万源县,1983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大。徐泳和海子同年,大约是1986年春夏之间,徐泳去拜访海子,还在昌平住了好几天,两人还一起步行到过十三陵,一路上谈论诗歌。徐泳当时是北大《启明星》主编,写过80年代有影响的诗歌《矮种马》。1987年大学毕业,徐泳被分配《四川日报》社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地属达县的《巴山文艺》的刊中刊《启明星诗卷》突然大量发表国内最为前卫的一批诗人的作品,也是他替《巴山文艺》主编李祖星代为约稿的。

80年代,中国的诗歌重镇除了北京就是四川。1988年3月,海子带着自己的《土地篇》来到四川,他此行的目的是想会一会之前通过书信联系的四川诗人们,想听听他们的意见。那时流行“以诗会友”。海子那次在四川面见了众多在中国诗坛有影响的四川诗人,和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谈论诗歌话题。

3月底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尚仲敏当时在成都水电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等;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0元一瓶

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但是海子却遭到了四川诗人的批评,幸亏当时尚仲敏给了他鼓励。回到北京以后,他对骆一禾说“跟他们谈不下去”。至于后来尚仲敏公开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使海子发出“人怎么是这样的呢?”的感慨。

那次四川之行,欧阳江河认识了海子。欧阳江河当时住在四川省军区大院,当时他是军区政治宣传干事,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读过的深奥的理论书中的内容,而且让人感不到是在背诵,好像那些内容都是他思考出来的。从80年代的《悬棺》《玻璃工厂》《汉英之间》起,欧阳江河的诗歌写作强调思辨上的奇崛复杂及语言上的异质混成,强调个人经验与公共现实的深度联系。欧阳江河当时刚从北京回来,和海子的同学、《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见过面。

后来欧阳江河回忆,是《四川工人日报》的钟鸣把海子带到他那里去的,去前海子在和石光华、万夏他们几个喝酒。石光华、尚仲敏他们几个就批判他的长诗《土地篇》,弄得海子很难受,就喝了很多酒。海子本来把这首诗带到成都来,是因为在北京得不到承认,想在成都找同行承认。他拿到欧阳江河这儿来,欧阳江河认为海子最好的诗是他的短诗,但是当时欧阳江河看了这首诗之后倒觉得这首长诗尽管不成熟,还是体现了一种抱负。海子到欧阳江河那儿的时候酒也有点喝多了,就在欧阳江河那儿倾诉苦衷,然后在那儿发牢骚。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欧阳江河当时闻到酒味,就把窗户打开,结果风一吹,两三分钟海子就呕吐了,欧阳江河赶紧打扫,钟鸣之后就离开了。欧阳江河和海子就到另外一个单间,聊到4点钟。欧阳江河问他对四川的看法,醉意中的海子说你们成都的植物太嚣张。分别时,欧阳江河送给海子一张照片,上面写了“海子留念,欧阳江河。1983年9月摄于九寨沟”。

4月份,他来到乐山,在大佛前留影,是因为海子喜欢宋渠、宋炜的长诗《大佛》,这也是海子唯一在佛前的留影。然后继续南下,到了川南沐川,宋渠、宋炜两个兄弟诗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给了他一个小房间,海子在宋家的房山书院住了近两星期。海子在宋渠面前表演过气功。在沐川,据说算卦很准确的宋炜给海子算了一卦。宋炜的结论是:海子的诗歌对他自己形成一个黑洞,进去以后很难出来;海子有女朋友在四川,但他们不可能在一起。海子听后没有表示。

房山书院门口是一条小溪,背靠郁郁葱葱的青山。它共分四部分,进门是一坐小巧的花园,接着便是几间大瓦房,其中两间用着藏书和居住;穿过几间大瓦房,就是一座很大的花园和一排厢房,花园里有几棵樱桃树和一些花草。海子在那里留过影。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海子在这里继续他的《太阳》创作。

两星期后,海子到成都,住在万夏处。万夏当年坐北朝南地住在成都的古卧龙桥街成都市物资局宿舍,街左边是整体主义理论家石光华,街右边是非非主义创始人蓝马。海子在和万夏喝茶的时候说自己已经打通了小周天,还将自己的手虚放在万夏的手上,问万夏感觉到气没有?万夏说有气啊。但这个话题似乎没有深入。

海子当时还参加了西南财经大学的一次诗会。在女诗人翟永明发言后,主持人介绍海子是从遥远的北京来,应该让他说点什么,可海子腼腆地谢绝了。吃饭时大伙比赛想象

力：天堂是个什么样？天堂里的什么？后来海子回北京跟骆一禾和西川吹牛：他的想象力最棒，他把别人全“灭”了——这是一个骄傲的海子、人性的海子。

但是海子 1988 年上半年来成都，四川诗人表现得不很热情。钟鸣在他的《旁观者》一书中说他曾经见过海子一面，他说海子给他的印象是太过纯粹，另外曾对海子说他的短诗写得很好，但长诗、史诗没什么价值，海子听了以后非常失望。这是因为四川诗人的恃才自傲，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子本人的沉默少言和过于内敛的性情所致。当年的诗坛纯粹是一个江湖，所谓大侠辈出，各种豪杰横空出世，诗人相见往往对酒当歌、壮怀天下。而海子则显得玉树临风、儒雅得太书生气。尽管他才气逼人、智慧的光芒在举手投足中仍能划过那个时代的黑夜，但他的确与四川诗人显得格格不入。海子更多的时候像个知识分子、像个思想者、像个人类苦难的守护神。尽管他当时穿着一身牛仔服，头发还很长，外表时尚而叛逆，但在本质上仍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1998 年 4 月 25 日，海子找到《十月》的骆一禾，谈论到四川的感受，海子觉得受到非常多的委屈。

没有见到海子之前，我在 1985 年由万夏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读到海子的短诗《亚洲铜》，后来又在《十月》、内蒙古《草原》杂志的“北中国诗卷”读到过海子写乡村的一些诗歌。说句心里话，除《亚洲铜》外，他的其他抒情诗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1988 年 11 月，我流泪写出长诗《四季歌》《麦地》，感觉整个身体像被掏空一样，我又一次爬上北上的火车，再次赴北京流迹。就是 1988 年 11 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十月》编辑部会客室和朋友骆一禾交流时，骆一禾对我说，“海子知道你到北京了，他这几天心里难过，你们四川尚仲敏写文章在批评他。”说着骆一禾就进他的办公室拿出刚收到不久的《非非》理论卷和作品卷（指诗歌），翻开理论卷给我看那段文字，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骆一禾的劝说下，我第二天上午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京郊外的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去看望在那里当助教的海子。我们之前没有书信往来，但我们那次一见如故，好像有多年的老交情，什么话都谈，诗歌、女人、戏剧和北京诗歌界互相争夺话语权的丑闻。当海子看了我随身带的长诗《麦地》时赞不绝口，于 1988 年 11 月 25 日特写信推荐给深圳的徐敬亚——他当时正筹备编《中国现代诗十年选》。

这封信是著名批评家、诗人徐敬亚 2009 年 3 月接受《深圳商报》纪念海子逝世 20 周年专版采访时公布海子手迹原稿：

敬亚兄：

你好。

寄去的稿子想已收到。

四川绵阳的雨田是一个好兄弟，诗也好，我把他介绍你。并让他寄一些诗给《中国现代诗十年选》。

紧握

海子

88.12.25

本来我和海子约好1989年夏天他放暑假,我陪他去登剑门关,然后再步行去九寨沟,结果等来的却是他自杀的消息,接着朋友骆一禾去世。1990年,为了纪念我和海子、骆一禾之间的文学友谊,我写过一篇长达万字的文章《死去的中国诗人》发表在《名城诗报》上,竟惹来追星者千里之外跑到绵阳偷走海子当年送给我的签名照片,后来那个追星者复印几张把原照片又寄还给了我。

1990年9月,我向《青年诗选》的编辑韩亚君推荐海子、骆一禾等诗人的作品。10月5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韩亚君寄给我的《青年诗选》约稿函空白处写下这样的文字:“雨田兄,请按要求将一禾、海子的诗作及其他整理好并寄给我,我将尽力而为。说心里放,你让我感动。当今之时,人在世都很难交往,何况已故去了的人呢?”这是因为此前我特别推荐诗人朋友海子、骆一禾、陈虹、何小竹等几位朋友的诗歌给韩亚君,希望《青年诗选》第六集能收入他们的作品。书出来没有海子的作品,朋友韩亚君来信说他按我的要求编选了我寄给他的海子的诗歌,终审时被拿了下来,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海子是自杀死亡的。

其实,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总编辑许岱在1992年9月13日写给我的信已经说明一切。这里我将此信抄录下来“你的挚友海子的诗,由于非所属年代,不好收集,抱歉。从这里可以窥视您重情谊,这是令人感佩的。”

事隔20多年,几乎每年三月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海子的诗歌活动。说句发自内心的话,人们对海子诗歌的纪念行为我是很多敬佩的,正是这种纪念,使我们这些热爱诗歌的人再一次继续收获这位不幸者之死亡的诗歌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新的启示。今天我们无论是谈论海子的诗,还是谈论海子这个人,都会感到时代的沉重,也感到一种对生命对天地物的敬畏。

三、爱情河流中的海子

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那个女孩,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海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只为她们破碎。”海子的《四姐妹》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中三个女巫的开场白异曲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啊/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海子曾经爱恋的这4个姐妹现在肯定还在人间,不知她们是否幸福?

海子的4个恋人,我只认识一个,而且还见过。下面,我把她们“四姐妹”分成A、S、C、D。

A就像海子当年的诗歌一样纯真、美丽,命运注定她必须出现在青春的海子面前。

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星尘诗社一般定期开展活动,有时去郊外踏青,有时在学校安排一个活动室或在草坪上朗读诗歌,有时请专家、诗人讲座。作为诗社顾问的海子被经常邀请去参加这些活动。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在同学的要求下,海子朗读了自己的诗歌《历史》:“你是黑色衣服的人/在野地里发现第一枝植物/脚插进土地/再也拔不出/那么寂寞的花朵/是春天遗失的嘴唇……”当他用带有浓厚安庆口音的普通话朗读完毕,回到座位后,旁边一位女同学主动和他聊起天来。简单的交谈中,海子了解了姑娘从内蒙古大草原来,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是83级学生,在《诗选刊》杂志担任编辑的诗人薛景泽(笔名雁北)是她姐夫。海子感受到她不一般的文学修养,1986年8月《给你》里,“我相信这一切/我相信我俩一见钟情。”两个人谈话兴趣很浓,爱情不约而至。

这个人就是海子诗歌中不断出现的A。海子对她爱得很深,为她写了很多诗歌。甚至可以说,A与海子的全部生命直接有关。但是在1984年的这个冬天,爱情敲开两个年轻人的心房,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无法预知未来的秘密。

关于交往的具体时间,海子在日记、诗歌中曾经透露出一点信息。1986年11月4日记中说:“两年来的感情……”说明海子认识A是在1984年;在1989年1月7日《遥远的路程》里,他说:“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还是四年以前的我。”说明时间也是1984年。海子第一首长诗《河流》第三篇《北方》,有“想起你的时候”一个片段,也有“你/就是我的妻子”的句子。海子从1984年开始诗歌里出现了“妻子、求婚、新娘、王后、爱我的人”等词语。这些爱情中的词语,也许是渴望爱情的心理成熟的表现,也许是开始真正恋爱。

为什么说他们认识在冬天呢?在1986年8月的一首诗歌《给你》中,海子这样写道:“冬天的人/像神祇一样走来/因为我在冬天爱上了你”。说明他们在冬天两情相悦。1984年12月海子写了《爱情故事》,说明他们已经比较确定关系;同月的《跳跃者》里“沉默是因为爱情”,这是比较微妙的爱情心理。而1986年8月的《给你》里,有“我曾和你在一起/在黄昏中坐过/在黄色麦片的黄昏/在春天的黄昏/我该对你说些什么”——这也许是记录他们后来某次约会的难忘的场景。

20多年过去了,A对此事从来没有开口。我们应该都很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这次爱情,对海子来说,产生了一生的影响。

首先,就是海子对爱情标准的确立,或者说,是A唤醒了海子的爱情标准。A的父母均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从小生活在文风极浓的家庭,所以A对诗歌颇有兴趣——以后海子的恋爱对象,都是喜欢诗歌的。另外一个因素,A的草原背景和海子写作的题材暗合,也使海子对她产生爱情;而后来海子的几次恋爱的分分合合,似乎和诗歌写作联系比较密切。

其次,两种不同的家庭背景,加重海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立的感受,进而影响海子对自身贫穷和孤独处境的审视,尤其是后来A的父母直接对海子施加压力,连海子父亲也了解海子初恋的结束的原因:“是娘老子嫌我们穷。”如果不认识A,也许人生就相对比较单纯,他也许就没有这样的标准和感受——当然我们也无法这样假设。A给海子的爱情标准,使海子一生无法超越。

也可以说,A是海子一生的标准。

但当时,他们在一起,是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在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去了北戴河,有

一本海子传记的书上有 A 的照片,使人们看到一位热诚的女孩:个头不高,娃娃脸,扎一个当时常见的马尾巴,连衣裙。海子《海上婚礼》里,“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也许就是生活的投影。在 1986 年以后,海子有时候一个人去北戴河,可能就是怀念 A。

爱情如果是一帆风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思念、苦恼、倾诉、等待。爱情如果是一帆风顺,海子的爱情诗歌也就失去了很多滋味。海子对 A 的感情以及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使海子的爱情诗歌出现了挣扎、回避,乃至影响他的诗歌观念和人生观念。

海子的感情世界迅速打开。因为丰富敏感,海子处在触一发动全身的心境中,他的感情幻想力(或者燎原说的“心理繁殖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年纪。但此时除了爱情,他还不断在诗歌创作中突破,现在他的视野由中国扩大至世界,我在北京昌平的海子藏书里发现了一套 1984 年《世界宗教研究》和一套《国外文学》。他大量阅读了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等,这些基础积累,使海子写长诗的信心十足。

在他们的爱情中,海子还获得了一个笔名——海子。这是内蒙古等北方人称呼湖泊的话。海子 1983 年打印的第一本诗集《小站》署名还是他的本名查海生。

在此前认识海子的人,一般都叫他“小查”;一些大学同学,偶尔叫他“冬子”;在此后认识他的朋友,基本都叫他“海子”。称呼的变化表明身份的变化,什么人称呼对方什么,也体现对对方身份的认可。对母亲来说,海子永远是自己的儿子“海生”。

星尘诗社也有一些活动,海子和 A 一起参加。但这样的爱情,是干净的、纯净的、美好的。所以海子的诗歌里,身体欲望还没有出现。如果一个人参加,他很少说话,总是静静地来,悄悄地走,谁都没有在意过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老师。和 A 一起的时候,他写过一首《自画像》:“镜子是摆在桌上的/一只碗/我的脸/是碗中的土豆/嘿。从地里长出了/这些温暖的骨头”,意象的出色运用,又带有些高兴的顽皮和天真。这里出现了“骨头”这个意象,非常奇怪。

A 也常常坐车从老校区到海子的房间,来看海子和他的诗歌。有时 A 和海子一起坐校车,A 就将头靠在海子身上,海子在同事的玩笑里只是呵呵地笑。对女孩的初恋和深爱、对诗歌的深爱,这两件事情都使海子兴奋。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离不开这两样:A 和诗歌。沉浸在爱情中海子好像是一个顽皮十足的孩子,在诗歌里出现很多快乐的、戏谑的色彩:诸如“老鼻子橡树/夹住了我的蓝鞋子”,(《跳跃者》);“两个猎人/向这座城市走来/想王后走来身后哒姆哒姆”,而这两个猎人原来是“我的两只眼睛”(《爱情故事》)。

1986 年海子和 A 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起因是 A 向诗人姐夫《诗选刊》编辑雁北推荐了海子诗歌,希望能够重点推出。而雁北将海子和小姨谈恋爱的事告诉了岳父岳母。作为高级知识分子,A 的父母对于海子的家庭出身表现出了鄙夷之情。他们不容许自己的宝贝千金女儿和一位出身农民之家的大学老师谈恋爱,他们认为,这个一穷二白的诗人除了写诗,不会有什么前途。其实,我们不妨说,从此开始 A 和海子的关系就有了隔阂;此后的时光里,不过是海子一个人孤独地在一直坚持,而海子孤独坚持中的情感体验混合到他的诗歌写作里,就像血融入雪地一样十分明显。此后两者的关系冷热反复,一直到 1986 年秋天彻底结束这次恋爱。

我是1987年夏天在青岛参加完由《诗刊》主办的青年诗人笔会从北京浪迹到呼和浩特,在朋友雁北家见到A的。她冷冷地向我谈起海子的诗和海子的事,还说让我等几天,海子可能要来蒙古草原。而我1988年11月某个夜晚与海子在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校园的蓝屋咖啡屋喝啤时,海子在我面前谈起对A的深深恋情时他流出作为男人的泪水,弄得我一整夜都在同他谈论男人与女人的话题。

1986年,孤独中的海子获由昌平县文化局颁发的“昌平县1986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供职昌平县文化馆的S走近海子,成为海子文化情感上的双重交流者。

当海子与S因文学的关系而相遇时,热爱文学的S在昌平的庸常文化氛围中,似乎突然发现了一个尚未被认识的天才。这种发现是属于她的,因而有一种私密性。她要保守这个秘密,以不被别人分享。于是情感呵护中的崇拜,使S觉得她正在成为一个匿名状态中的天才唯一的精神后援和秘密的知情人。在这样的时日中,S当然不会没有就近亲昵的冲动,但她清楚自己的身份,因而严格地恪守着分寸。

海子不会感觉不到这一切,心性高远的他当然需要被崇拜,并且那种远距离的,含有一种心灵委屈的默默崇拜更能使其动情。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身有所属,已经与A有了未形诸文书的身份契约——双方都必须为此负责。也正是缘于这样一种立场,海子才在他完成于1986年5月这同一时间的长诗《太阳·断头篇》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爱情,必须向整个村庄交代,交代清楚/爱情要对大地负责/对没有太阳的夜晚负责。”因此,海子与S由此便一直处在自我克制的心灵秋波中。S成了海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友——异性朋友。这其中相互间的精神舔舐和默契,则是任何男性朋友都不能替代的。

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当海子遭遇了1986年与A重大的情感变故,心绪恶劣透顶的他,何以会于此时在那首《不幸》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四月的日子最好的日子
和十月的日子最好的日子
比四月更好的日子

“四月的日子”,正是海子被S鼓动参加昌平文化艺术节创作比赛的日子,是两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达成一种心里契合的开始。而“十月的日子”则是与A的情感毁灭后,痛苦、懊恼突然清算完毕,并因而可以正视与S的情感的日子。这当是海子内心的一种决断,虽然他不可能马上真正从A的影子中淡出,但在与S的情感线索上,事情已经突然简单、清晰起来。所以十月是比四月更好的日子。

1987年12月11日,海子在《献诗——给S》中第一次写下了“S”的名字,这可以视作两人情感上明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献诗——给S》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谁在美丽的早晨
谁在这一首诗中
谁在美丽的火中 飞行

并对我有无限的赠予

.....

谁身体黑如夜晚 两翼雪白
在思念 在鸣叫

不知为什么海子与昌平文化馆的 S 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海子 1998 年 4 月来四川不仅仅只是“以诗会友”，从相关的资料信息来看，他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见女友 C 的。这个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大学期间与海子相识，老家在达县，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工作。另外，她还是一个能与海子谈论但丁的女孩，更是一个极富诗歌情趣的女孩。海子生前两次到过达县，不过，在达县所写的几首诗，诸如《冬天的雨》（1987. 1. 11. 达县）以及《雨鞋》（19687. 1. 12. 达县），似乎并没有呈现甜蜜。这与其说是面对这位女性而写的诗，倒不如说是因这位女性与冬天的雨、荒凉的河岸川地、山顶氤氲潮湿的麦地……这些陌生而新奇的乡村自然景观的联结，唤出了海子心灵中植根于乡村的那种阴郁、原始、野蛮的情感裸露。“打一只火把走到船外去看山头的麦地/然后在神像前把火把熄灭”“你的外表是一把伞/你躲在伞中像拒绝天地的石头/你的黑发拨散在冬天的雨中”“野兽在雨中说过的话，我们还要再说一遍/我们在火把中把野兽说过的话重复一遍”“我看到一条脏脏的河流奔向大海，越来越清澈、平静而广阔/这都是你的赐予，你手提马灯，手握着艾/平静得像一个夜里的水仙”（《冬天的雨》）。海子在这里把这位女子描述成一个在冬雨中似乎是抱肩瑟缩、需要呵护，但又是内心镇定的人儿，一个神农氏的女儿般（手握着艾）和他这个神农氏之子相匹配的人儿。他因之而在这原本就是他的土地气息中顿然恢复了健康的原始野性，他们因而可能是冻得发抖，却禁不住兴奋地哆嗦着发出野兽般的尖叫——他们成了一对回到先民时代幼兽般欢畅的疯孩子。尤其是海子于此还表示了那条“肮脏的河流”从他心底终得流出，使其心境归于清澈和广阔的这一精神的陡然逆转，并且，把它归结为这位女性的“赐予”。

“青海湖”这个意象，海子的确多次用到。最早一次是 1984 年 12 月，“那时我已走过青海湖，影子滑过钢蓝的冰大坂”（《不要问我那绿色是什么》），此时海子仅仅是借用许多地名来增强诗歌的意识力量和文化氛围。第二次是 1986 年的《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那时已经感觉和 A 的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三次就是此诗，“我看见你们太中下来/蓝色的公主青海湖/我孤独的食指化为天空上的白雪的鸟地”，这里的“太阳”也许不是海子的太阳，而是在西藏工作的著名女诗人马丽化的名作《我的太阳》。第四次是 1988 年 11 月的《无名的野花》：“青海湖上的大风/吹开了紫色血液/开上我的头颅”，这里是海子回忆自己的经历而写下的幻象之辞。

据说海子爱恋的第四个女性 D 是他政法大学的同事，老家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子 1988 年 7 月 25 日火车经德令哈学写的这首《日记》应该与此人有关。

也许海子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之于女性的爱才显得特别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

1988 年 8 月 13 日，海子来到拉萨的第二天，大约是 8 月 13 日，他便找到了任职于《西藏文学》杂志社的女诗人马丽华。这位叫马丽华的女诗人出生于山东济南市，1976 年毕

业于山东临沂师专中文系,同年进藏,曾任《西藏文学》诗歌编辑。1988—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获北大文学学士学位。后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编审,现已调往北京。她早在1984年就以《我的太阳》为题的诗歌名满天下,里面有“让目光翻越那山/迎迓日出”“从未相许的是我的太阳/永不失约的是我的太阳”的句子;热烈而又大胆地诉说自己心中的追求和渴望,是一种寻找自己的过程,有女性的细腻并非纯粹的儿女情长,粗犷明朗而又委婉,深沉而不浅露。

海子为什么去找马丽华?大概是因为马丽华对西藏文化的熟悉程度,他们还是几乎同时找到“太阳”意象的。海子当时的心境有些迷狂,有一万个理由相信马丽华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拉萨河的女神”。马丽华是个理智的女性,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海子。

燎原《海子评传》对此事记载得比较详细,我们对此简括如下:1988年8月的某一天,在西藏拉萨海子和朋友一平与马丽华聊天,一直到11点多,然后同时离开;20分钟后,海子又独自一个来马丽华住处,希望借宿。马丽华拒绝了;半小时后,海子又来了,马丽华就没有回应。午夜1点多海子才离开,这个夜晚海子很悲伤。

四、走向远方的诗人

余徐刚著《诗歌英雄·海子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1964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公历3月26日)中午海子出生;边建松著《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1964年3月24日(农历龙年二月十一日)海子出生;燎原著《海子评传·扑向太阳之豹》(南海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1964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公历4月1日)海子出生;诗人西川选编的《海子诗全编》(作家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里这样写:海子生于4月2日,是白羊星座。另外还有人看过海子的身份证,说是1964年3月25日生,也有人说海子是5月生。海子1984年创作的《河流》后记《源头和鸟》中特别提到写作时间“3月13日生辰”这是海子唯一提到自己生辰的具体时间,1984年3月13日是农历二月十一,由此推算应该是公历1964年3月24日。海子父母亲反复回忆过:海子的生日是3月24日。

21年前的3月26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的传奇人物,这位4岁就能无师自通地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15岁就高分考上北大的少年大学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的海子随身带着《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4本书。下午5:30时,山海关和龙家营之间的一拐弯处,一列1205次的货车经过这里。因为火车拐弯,车速很慢。这时,海子钻到火车车轮下面,就是这次1205次货车把他拦腰轧成了两截。钻车的刹那间,他戴的眼镜毫无磕损。海子死得异常从容,他25岁的生命“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

他的同学,诗人《十月》的编辑骆一禾与海子室友刘广安获知噩耗赶到出事的山海关,见了海子最后一面。骆一禾悲痛地说:“海子死得很有尊严。”他的另一位同学、诗人西川听到这个消息,也悲痛地说:“怎么可能这样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当我在四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说“这怎么可能,他答应我1989年放暑假来四川,我们一起登剑门关、游九寨

沟……”

80年代,被中国诗歌界誉为北大的四条汉子海子(法律系)、骆一禾(文学专业)、西川(外文系)、老木(中文系)都是我的诗歌朋友,见面最多的是西川。海子逝世两个星期前由海子提议,这北大诗歌四条汉子在西川家有过一次聚会。在西川家,他们曾谈到歌德不应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过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等话题。

海子在世时能与他经常交流的,能理解他或能读懂他的只有他的这两位兄弟情谊般的同学骆一禾、西川。特别是骆一禾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骆一禾在海子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他为海子做的事情,就能看出这同学加兄弟之间的情谊。

1989年3月26日海子去世后,骆一禾同他(海子)的室友刘广安第一时间赶到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约3000千米黄灯慢车道上——海子出事的现场,亲自料理了他的后事。

1989年4月第一天,骆一禾与诗人西川联合组织了在北京诗人为海子募捐的大型义捐活动,总共募得2030元义捐款,全部交给了海子老家的贫苦父母。

1989年4月7日,骆一禾和诗人西川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上千人参加的“海子诗歌朗诵纪念会”。海子在那一天复活——从朗诵者的嘴里,走向我们的心中。

1989年4月14日,骆一禾在海子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了关于海子诗歌的推介讲演,标题为:《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早逝的天才海子诗歌总观》。

这期间,骆一禾倾尽全力推介海子的诗歌,因而当时《诗歌报》《诗刊》《人民文学》《开拓文学》《北京青年报》都陆续发表了“纪念海子诗歌”专页。

这期间,骆一禾倾尽全力投入对海子诗歌的整理和汇编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编好了海子的两本诗集:海子抒情及海子最完整的一部长诗《土地》,并可以马上出版。

这期间,骆一禾马不停蹄地继续为海子的遗稿奔走呼号……

海子是骆一禾生死相托的唯一亲人。但是,骆一禾实在太累了!

1989年5月13日,骆一禾写了一篇纪念海子的文章,标题为《海子生涯》(后载于《上海文学》1989年9期)。这篇文章成了他的绝笔,因为这天深夜,即5月14日的凌晨,骆一禾因突发脑溢血而终于晕倒在广场……他被送往医院做了开颅手术,但是无效。他昏睡了18天,于1989年5月31日下午1点31分,在北京天坛医院逝世。

骆一禾是在海子离去后的第49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五、我看海子的自杀

“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西川语)”。海子离开我们快21年了,圈内圈外大多是从形而上对海子加以判断或评说。我作为海子的诗友,从不否认海子的自杀有其形而上的原因,更不否认海子之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这些年里,国内的许多文学报刊向我约稿,让我写写海子,我都一一拒绝了,因为我怕在远乡的海子再受到伤害,我清楚,我更知道海子在世时受到的伤害够多了。20多年来,我在国内的多

所大学做过文学创作讲座,但就海子和海子诗歌的专题,今天是首例。

1990年5月,我应朋友之约,写过纪念海子、骆一禾的一篇长文《死去的中国诗人》,题记有这样一段话:“我不想知道生活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也不想知道我的灵魂深处承受着什么,我在面对现实,我在面对自己,但我更期待着能面对无数个真诚的人和他们的心灵”。我在这篇长文中谈过海子自杀的原因,这里我把几点原因作归纳如下:

其一,爱情失败。这也是海子自杀的导火线。海子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大约是1989年3月16日,海子见到过他初恋的女朋友。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那个内蒙古女孩,她在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时特别喜欢海子的诗,曾经深爱海子。我1987年夏天在朋友雁北的家见过这个女孩(雁北妹妹)。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张圆圆的脸庞,长得漂亮。海子最初一些诗大多发表在内蒙古的刊物上都与这个女孩子有关。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分手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他教研室的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醉后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并认为这是对那个女孩的最大伤害。自己简直是罪不容恕。四天之后,海子敲开朋友苇岸宿舍的门时,已是一脸憔悴,并且第一句就是:我差点死了。

这一事件,就是海子自杀最直接的原因。从海子此后的两份遗书来看,这也许的确是促成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海子深爱着的这个女孩子于1990年前后移居国外。燎原写的《海子评传》出版后的2001年下半年,这个女孩从美国给海子的父母写过一封信,据说此人现在又从国外回到国内。

其二,名誉问题,海子在世时其作品不被文学界认可。外国作家弥尔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追求荣誉是所有伟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被社会承认没有兴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后)可谓深受其害。

这里,我举两件事。一是海子继1987年的“北京西山批判”之后,他在当年北京“幸存者俱乐部”中又一次受到指责,说“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见西川的《死亡后记》)。这次发出这一指责的,是朦胧诗的元老多多。多多有自己作为中国新时期地下诗人和先驱的背景与资历,有资格指出海子长诗的不足。也许他还认为这是对海子一种严厉的关爱。然而,海子由此受到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情感伤害。我想这并不是海子的承受力太差或心灵的极端脆弱,事情逻辑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当你满怀真诚地对待一个人,尊重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根本无视你这种珍贵的情感,甚至

把这一尊重反过来当作他教训你的资格和砝码时,作为一个以善良本分之心对待世界的人,使你感到不能承受的,将不是一个具体事件的本身,而是由此映现的人性的不可捉摸。极而言之,它将使你对人性和这个世界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发生动摇。为此,海子曾在骆一禾跟前伤心地哭过。骆一禾则为此而在致一位诗人的信中表示了他的愤怒:海子的生存和诗歌写作环境,是一种没有环境的环境。

这一事件对海子大约不只是冷风擦耳性的刺伤,可以作为这一判断反证的,是多多之后为此反过来对自己的自责。在海子离世后仅7天的1989年4月2日的“首届幸存者艺术节”上,为“自己的直率而伤了海子的诗人多多痛悔不已,失声痛哭了很久”(见苇岸《怀念海子》一文的修订版,载《不死的海子》一书)。多多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强烈的自责反应,首先在于其真诚的诗人本质;此外,作为诗人的他,也无疑能体会到这一事端对海子心理刺激上的严重性。

二是成都诗人尚仲敏的刺伤。这一事件与第一件性质上类同,但却更难让海子接受。因为第一件事无论如何都还有一种诗人式的直言不讳的坦率在。而这一次呈现的,却是诗人最不能容忍的人性的阴暗。就是海子1988年4月份那次四川之旅,海子当时对尚仲敏怀有好感,回北京他对骆一禾说过“我们应该在北京帮帮他”。然而,令海子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的是,是尚仲敏在背后却沉沉地对他放了一支冷箭——1988年秋季,海子在四川的《非非年鉴·1988年理论卷》上读到了尚仲敏一篇题为《向自己学习》的约7000字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不乏俏皮色彩但却充注着刻薄阴冷的文字:

有一位寻根的诗友从外省来,带来了许多这方面的消息:假如你要写诗,你就必须对这个民族负责,要紧紧抓住它的过去。你不能把诗写得太短,因为现在是呼唤史诗的时候了。诗歌一定要有玄学上的意义,否则就会愧对祖先的伟大回声……和我相处的几日,他一直愁眉苦脸,闷闷不乐,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他的痛苦是真实的、自然的、根深蒂固的。这使我敬畏和惭愧。

他从书包里掏出一部一万多行的诗,我禁不住想起了《神曲》的作者但丁,尽管我知道在这种朋友面前应不谦虚的,但我还是怀着一种惋惜的情感劝告他说:

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

在空泛、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对旧事物的迷恋和复辟,对过往岁月的感伤,必须伴随着对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动。我们现在还能够默默相对、各怀心思,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我的敌人。

这段文字开头部分对海子原意的复述也许没有太大的出入,但他却显然做了置海子于呆鸟和蠢鹅形象的讥消化语言处理,并通篇充斥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智者悲天悯人的戏耍口吻。从纯粹的智力上而言,尚仲敏大约并不足以作为海子的对手;而且,他对海子以及自己的原话复述都是不可靠的。一个简单的判断依据是,如果他们当时真是这样一番交谈,海子是绝不会将尚仲敏引为友人,并动了在北京帮帮他的念头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尚仲敏尽可能表达他与海子相左甚至是对立的诗歌观念,但却不妨把事情干得磊

落一些,哪怕做一回江湖上的冷面杀手。但尚仲敏的行为却恰恰相反,他在当面与你志同道合,乃至“敬畏”“惭愧”,但当你怀着友情的暖意转过身去准备为这友情再续柴加温时,他却突然脸色一变,以对你进行“睿智”的挖苦。这样的“友情”和人伦行为无疑是可怕的,它足以给一个天真处世的心灵似阴冷的暗伤。

海子与尚仲敏在成都相处的日子里,尚仲敏曾为海子写过一首题为《告别》的诗。

过去年代的大师
那些美丽的名字和语句
深入人心,势不可当
但这一切多么徒劳
我已上当受骗
后面的人还将继续
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
我们痛悔的事物日新月异
看一看眼前吧;歌唱或者沉默
这一切多么徒劳

1988年冬天,我在北京与海子相处的几天里,他几次向我谈到以上两件事,心里特别伤感,有一次还哭出声音。

其三,性格悲观,缺乏交流。我在与海子相处的几天时间,发现他的性格:简单纯洁,偏执倔强和敏感,有时还带点忧愁和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海子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和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他毕业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1986年夏天,还是西川去昌平看他,西川硬拉着他去看了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四川之行外,就是去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简单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写作。而海子根本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我们在一起时,他兴高采烈地给我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

海子有时候希望与别人交流。记得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说:“我们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太缺少交流了。

1988年年底,海子的同学骆一禾、西川先后结了婚,但海子坚持不结婚,而且还劝骆一禾、西川也不要结婚。他在昌平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才离开他。海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似乎拒绝改变他生活的封闭。

其四,埋藏内心的自杀情结。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在1986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我的尸体或许已经沉下海水,或许已经焚化;父

母兄弟在痛苦,别人仍在惊异,鄙视……”另外,我们从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第1、2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他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写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海子对于死亡的谈论甚至不仅限于诗歌写作中。我们在交流时,他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要我选择死的话,我就选择自杀”。

海子选择卧轨,或许是因为他不可能选择从飞机上往下跳,卧轨似乎是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想海子是在死亡意象、死亡幻象、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海子的另一个自我暗示是“天才短命”。在分析了以往作家、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与其寿命的神秘关系时,海子得出这一结论;他尊称那些“短命天才”为光洁的“王子”。或许海子与那些“王子”有着某种心理和写作风格上的认同,于是“短命”对他的生命和写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其五,练气功走入魔。我知道国内练气功的作家、艺术家有的是,据说气功有助于创造,可以给人以超凡的感觉。海子也许从练气功中悟到些什么。我与海子在昌平相处时,他给我吹气功如何如何可以让我发挥想象力,我武断地对他说“我不相信气功”,我还告诉他,“我见过气功大师严新,什么感觉都没有”。从此,海子再也没有在我面前说练气功的事。据诗人海子的同学西川回忆:有一回海子高兴地告诉他,说自己已开了小周天。可能是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里,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海子最后几天的言行吧:

3月24日,周五,海子又去城里找过B,没有结果。到了深夜,处在幻象中的海子清醒地写下了些文字:“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A和B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海子笔记)。”海子在世的确从佛文化转移到道教文化研究,常常与A和B讨论有关知识,海子阅读《全真秘要》等书受到过他们的影响。

这个夜里,有同事被他的大叫声“我活着没意义了”吵醒。同事以为海子出了什么事,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敲海子的门,问他出了什么事。海子面色苍白地说:“不好意思,惊扰您了,刚才做了一噩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海子基本不麻烦别人。同事听他这么一说,安慰他几句就走了。

25日早上5点,海子特别强调自己“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但他已无法控制幻听、幻觉,那些身体内部“阴暗内容”的声音和图像,使他感觉两个人对他的“言语威胁”,他甚至感到自己会出生命意外——“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但是“都肯定与他们有关”,“都是他们灌输的”(海子笔记)。海子依旧无法安眠,他写下上述笔记以后,又写了三封遗书: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A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

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B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A或B负责。A:C学院;B: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A和B负责。

海子 89.3.25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C学院A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子 89.3.25

一平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A。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二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子 89.3.25

海子1989年3月25日留下的这三封遗书,写给父母的那封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第四封遗书也就是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楚。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这些句子和3月24日的表达有一致之处,幻听、幻觉,使海子不胜其扰。遗书里的A和B,曾经和海子一起讨论过神秘文化。当他们以“暴徒”的形象出现在海子的最后的文字里,他们一定感到很冤枉,因为他们客观上都没有恶意。也许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都无法对所知不多的生命做无限的发掘和测试。

海子最后的文字,是不能归还欠一平的钱。海子的诗里这样的句子,“我把天空还给天空”(《弑》),“我把石头还给石头”(《日记》),渴望一切都回复原样,只让自己独自绝望。生活里他也是如此,不打扰他人,现在因为自己的打扰而感到“遗憾”。

写好以后,海子把遗书放进了抽屉。然后又将自己的两间房子打扫了一遍,将凌乱的杂志、书籍、画册也都整理好。海子回头看了自己的房间——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刷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自己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放满了书的大书架;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自己生前珍贵的7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门后是一堆酒瓶子。这一切,使西川最后一次走进海子住处,感觉到“他的房间洁净如坟墓”。

3月25日很早,海子随身带了《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4本书。他锁好门,在楼梯口停留了一下,然后敲开一个同事的门。他一声不吭坐着,

然后站起来告别。同事说：“告什么别，你又不是不回来。”海子说：“我要出远门了。”声音怪怪的。同事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可仍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海子老往城里跑，同事就问：“你想调回城里吧？”海子没有回答。——这个细节出现在老威对海子邻居的访谈中。

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天气晴朗，海子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穿着整齐地离校，见到他的人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要相亲去。那天早上西川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西川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她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海子大概是中午便到了山海关。

海子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这个晚上不知道海子住宿何处。

26日，海子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此前一天他已没吃什么东西，胃里只有两只橘子。下午，他从墙壁上撕下一块纸片，用铅笔使劲地字迹工整清楚地写下：

遗言

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教师，我的自杀与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以前的遗书全部作废，我的诗稿仍请交给《十月》的骆一禾。

海子 89.3.26

海子自杀后医生对海子的死之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海子走了快21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父母兄弟的或悲伤、或无奈的事情，以及发生自从多朋友的那些暂时无法言明的事情，以及某些出版社随意出版海子诗集的事情，海子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海子的诗歌已经流动我们这个时代。

海子辞世后，留下大量诗稿。骆一禾、西川两位好兄弟进行了分工；西川负责整理出版海子的短诗，骆一禾负责整理出版海子的长诗。因为怀着巨大的哀痛，海子辞世后70天，骆一禾脑溢血死亡。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世纪末诗丛”出版了由骆一禾整理的海子长诗《土地》，骆一禾撰写了《我考虑真正的史诗》作为代序。此外，一些民间诗歌爱好者也自发编写他俩的诗歌集，1991年7月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周俊、张维主编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集》。

2003年6月，短诗《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必修）第一册第一单元，全国高中生都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以梦为马”的诗人。

海子诗歌稿子的全部整理工作，只能由西川一个人承担。1992年5月西川将海子诗歌整理基本全部完工。199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西川选编的《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1997年2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西川在后记中感慨地写道：“愿海子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2009年3月26日，海子辞世20周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更为全面的《海子诗全集》。

对海子的研究也在开展。有关海子生平和诗歌研究的重要著作有：崔卫平主编的

《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燎原著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社 2001 年版；高波著的《解读海子》，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余徐刚著的《诗歌英雄——海子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周玉冰著的《海子评传》（修订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边建松著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

（雨田，男，四川绵阳人，中国当代诗人，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集多部，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德、日、法、俄等国语言，曾获多个文学奖，主要从事新诗创作与研究）

植物·器物·人物

——毕飞宇《枸杞子》的生态解读

◎ 闫建华 王旭群

摘要：毕飞宇在《枸杞子》中描绘的王家庄不仅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地理景观，而且也是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经历的生态困惑与抉择的一种表征。小说中的植物、器物与人物紧密交织，在互动与“反动”中共同勾勒出乡村生态自然从“失魅”到“复魅”的曲折历程。本文拟从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破坏、探索者的盲目以及自然的“复魅”等几个方面来阐明这一点。

关键词：植物 器物 人物 生态

无论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都是典型的文学地理景观。毕飞宇在《枸杞子》中描绘的王家庄同样也是如此。尽管《枸杞子》(1994)只是作者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一个短篇，但若将其置于作者构建的王家庄这一整体文学地理空间中来看，它除了首次推出带有毕飞宇标签的王家庄这一地理景观之外，还与作者后来专注“文化大革命”和“鬼文化”的王家庄系列作品(如《地球上的王家庄》《玉米》《平原》等)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比照。相照之下，《枸杞子》中的王家庄还透着一种厚重的生态关怀，并通过植物、器物、人物的交织互动来表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所经历的生态困惑与抉择。本文拟紧扣植物、器物与人物，从原生态自然的再现与破坏、探索者的盲目与悲剧以及自然的“复魅”与未来乡村的生态之道等三个方面对毕飞宇的《枸杞子》进行解读。

一、原生态自然的再现与破坏

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说：“《枸杞子》是色彩斑斓的。汪政晓华说我喜欢炫技，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小说给他们的印象。我喜欢华美，用华美去展示悲剧，有一种说不出的凄艳。”^①作者所“展示”的“悲剧”之一便是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破坏。在被破坏之前，王家庄的生态自然就像是一幅风景画，村民就是风景画上的人物。小说题名中的枸杞子和小说人物父亲从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示”出王家庄美丽的自然风景画卷：

父亲进城以前采了两筐枸杞子，他用它们换回了那把锃亮的东西。父亲一个人哼着《十八摸》上路，鲜红透亮的枸杞子像上了蜡，在桑木扁担的两侧随父亲的款款大步耀眼闪烁。枸杞是我们家乡最为疯狂的植物种类，有风有雨就有红有绿。每年盛夏河岸沟谷都要结满籽粒，红得炯炯有神。大片大片的血红倒映在河水的底部，对着

蓝天白云虎视眈眈。^②

蓝天白云、清澈河水和鲜红透亮的枸杞子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图,再加上肩挑桑木扁担、一路山歌不断的父亲这一人物,王家庄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枸杞子,其明艳的色彩和生机勃勃的长势通过“耀眼闪烁”“炯炯有神”和“虎视眈眈”这样的字眼得到形象地呈现。这样的“华美”除了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之外,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唤起读者的文化认同感。从《诗经·小雅》的“言采其杞”到陆龟蒙等人先后所作的《枸杞赋》,枸杞子所代表的采集文明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生态自然一代代延续至今,它貌似原始落后,实则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活力的根源所在。

与枸杞子的透亮和亲切形成对比的是父亲用枸杞子换回的“那把锃亮的东西”,也就是小说中象征工业文明的重要器物——手电,它的金属外壳给村民一种陌生的冰凉感,并为勘探队的到来和盲目开采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就手电本身而言,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王家庄的原生态自然造成不小的冲击。当村民们得知父亲从城里换回了手电,便纷纷聚在皂荚树下想看个究竟。当手电在“每一颗星都干干净净”的清爽夏夜被打开时,这道不属于自然的光“横在了院子中间,穿在大门钉在院墙的脊背上”,吓得皂荚树上的栖鸟“带着长长的哨声彗星一样划过”夜空,冲击着乡村夜晚的自然静谧。^③

手电的光束除了惊吓到皂荚树上的栖鸟,还给王家庄村民带来某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当母亲问父亲手电里头是什么的时候,父亲回答说:“是亮。”^④对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而言,手电所指涉的另一个“亮”的世界无疑充满了诱惑,尽管这仅仅是一个有局限的光。这也就是说,虽然村民们从手电照亮的夜空中瞥见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希望,但在希望之余,他们又体会到一种“面面相觑”的、无知、无能和无助的沮丧。^⑤

但与勘探队带来的冲击相比,手电对王家庄自然和人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支所谓的石油勘探队在抵达王家庄的当天就开始轰炸钻井,可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经过任何调研和实地考察。尽管村民们对此十分不满和不解,但勘探队队长为他们描绘的愿景消除了他们的不满和疑虑:“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⑥就连水里都可以装上电灯,届时“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⑦这就是勘探队队长所说的“科学之光”,而这“科学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⑧受其蛊惑,王家庄人开始想象电气化时代的美妙前景,父亲还因此对勘探队队长说:“你们随便打,除了大闺女的床沿,你们哪里打洞都行。”^⑨勘探队队长的盲目自夸和村民的盲目崇拜,最终导致了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严重破坏:“即将收割的水稻和正值成长的棉花被踩得遍地狼藉”,^⑩清亮透明的河水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墨绿色,鲜活的水生动物逐一死去,以致“河里没有再死鱼,因为河里已经没有鱼可以死了”。^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据科学的解释,勘探队四处寻找的石油本身也是源自自然生命的产物,是植物和动物经过千年万年的沉积形成的产物。勘探队的盲目开采貌似与自然毫无关系,实则也是一种离不开自然的“科学”行为。

同《枸杞子》中的王家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在《平原》里描绘的王家庄,那里的“水稻长势更好”,人们更加讲究“天时”,井然有序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和收获。^⑫吴景明指出:“生态文学观念下的文学图景可能不再是矛盾深重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人与其他

生命形式的和谐共存。”^⑬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在《枸杞子》中还体现为人与动植物之间的那种“共通”性：大哥追求北京的神态像一颗麦穗，北京在柔桑下撒播着狐狸一般的目光，她在夜里的游走如同鱼一般，甚至连村民们对高楼大厦的想象都“永远离不开水稻生长的姿态”^⑭。遗憾的是，这种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和谐共存”在《枸杞子》中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一旦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也会遭到相应的破坏。我们看到，在河水被污染之后，王家庄村民“以恐怖和绝望的心情看着河里的墨绿光慢慢地变暗，最后消亡”。^⑮随后，小说中唯一有名字的人物北京也在这条被玷污的河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进一步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依存关系。

二、探索者的盲目与悲剧

王家庄的自然生态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这与探索者的盲目是分不开的。吴义勤在论及《枸杞子》时指出：“《枸杞子》中的生存‘错位’始于勘探队的到来和父亲的‘手电筒’，而北京的与人私通以及被谋杀则是这出‘近乎无事的悲剧’的‘死水微澜’，它对应的是人性的麻木与萎缩。”^⑯文中提到的勘探队队长、父亲和北京这三个人物不仅折射出整个王家庄的生存“错位”，而且也表征着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走过的那段并不平坦的探索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三位人物也堪称中国乡村的探索者，尽管他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两位男性探索者。总的来看，他们都是王家庄在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蒙昧与科学发生直接或间接碰撞的核心人物。有学者将《枸杞子》中的父亲形象与《写字》《地球上的王家庄》等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混为一谈，认为他“受权力压制且处于极度压抑和沉默寡言的状态”。^⑰《枸杞子》中的父亲显然并非如此。他不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杀过人而在村里颇有威信，而且还因此成为披红戴绿的“英雄”。当勘探队刚到村里开采石油时，村民们坚信“只有杀过人的父亲能够阻止他们”，于是父亲又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家庄的代言人。^⑱起先，父亲对勘探队的态度也是拒绝的，可当勘探队队长“用科学论证了石油和马路汽车的关系，尤其强调了石油与电的关系”之后，父亲对勘探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⑲他开始意识到，石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它所发出的科学之光是一切追求的精髓所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父亲对科学的认知完全来自勘探队队长这位科盲，一个看似掌握着科学但却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外乡人：

他说，石油就是电。有了石油，村子里的所有树枝上都能挂满电灯，也就是手电。月亮整个没用了。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电在哪里呢？——电在油里头；而油又在哪儿呢？——油在地底下。队长说，这是科学。^⑳

对于连手电都没有见过的王家庄村民来说，勘探队队长讲述的“科学”道理和描绘的光辉前景无疑迎合了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希冀。他们对科学的无知和憧憬充满了民间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殊不知这位画了“大饼”蓝图的勘探队队长自己却是一位盲目的践

行者。他未经科学论证,在进驻王家庄的当天就带领勘探队打洞“开采”,此后一直没有停歇,致使王家庄的庄稼、河流、生灵遭到涂炭,而他所吹嘘的神奇的石油却始终不见踪影,“只剩下孤寂的爆炸和伤感的回音。”^①

勘探队队长的所作所为及其必然的失败使王家庄人逐渐从懵懂中醒悟过来,他们对电气化的热情也开始消退,唯有父亲依然站在勘探队一边,对其毫无章法的开采行为深信不疑,即使当他在“黑洞洞的井底”看到的是“一无所有”的、黑暗的“科学”时也是如此。^②这种“黑洞洞的井底”或曰“黑暗科学”不正是父亲和勘探队队长盲目探索的一种写照吗?父亲所理解的科学无疑是十分幼稚的,而仅凭“电”和“石油”等科学术语忽悠村民的勘探队队长也是一个十足的科盲。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父亲和勘探队队长不仅对自己所理解或掌握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且还以权威的身份来左右其他村民,使自己成为王家庄理所当然的、盲目而可悲的探索者。与其说他们比其他人更迫切地希望实现用电灯代替月亮的“宏伟”蓝图,毋宁说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也使之骑虎难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毫无成效且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面前依然坚持“探索”的理由所在。

父亲与勘探队队长盲目的个人英雄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开发矿业”运动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对它的一种遥响。据记载,彼时的地质工作者都把“为祖国寻找宝藏”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红遍大江南北的《勘探队员之歌》就是最好的明证。如果说彼时的地质工作者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在《枸杞子》中,读者看到的却是勘探队对地质勘探工作的盲目蛮干。正因为如此,披着科学主义外衣的勘探队注定要被拉下神坛,因为他们与父亲对科学的认知实质上并无区别。勘探队队长只看到石油开采带来的好处,却全然不懂科学开采之道,更无视盲目开采对乡村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侥幸找到了石油,但如果因此让王家庄付出惨痛的环境代价,使其从此与青山绿水“绝缘”,那么这样的成功也是一种失败的成功。

我们再来看北京这位女性“探索者”的处境和命运。《枸杞子》中描绘的人物并不多,都是通过未曾露面的叙述者“我”来讲述,其中除了父亲、母亲、大哥、勘探队队长、山羊胡子老爹以及鬃毛小子等极具城乡特质的人物指称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这位女性人物。她是王家庄唯独有名字的人物。村民们用首都来为这位姑娘命名,是因为她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③这说明北京是一位既漂亮又聪明的姑娘。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首都北京对村民而言是严肃而荣耀的字眼,是落后的乡村只能在广播中听到的神圣之地。这种向往跟青年男子对村里最美的女子的向往和追求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北京的名字不仅彰显的是北京的个性,而且也凝聚了王家庄村民的集体想象:“‘北京’在我们想象力的最顶端,一过了‘北京’,想象力只能逃回原地。”^④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北京被勘探队的鬃毛小子“开了”的时候,大哥以及村民们是多么震惊、愤怒和绝望!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被“开”与乡村原生态处女地的被“开”是何等的相似!北京是村里第一个试探与城里人交往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她付出的代价与王家庄的河流、鱼儿、植物(尤其是庄稼)付出的生命代价并无二致。

毕飞宇在小说中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北京的外表有多么出众,而是反复用“狐狸一

样的目光”来描绘她。^⑤狐狸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并不陌生,如在《写字》和《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作品中,作者都对狐狸有着极为生动的描写。不论是童年经验的天真回忆还是成人深夜的哲理思考,狐狸都是一种灵性的存在,一种质疑和挑战的象征。如此看来,作者用狐狸的目光来描摹北京自然有其用意。通过人物的动物化描写,作者将北京的清纯目光与王家庄的自然生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北京的“堕落”也与王家庄自然生态的破坏之间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当北京与鬃毛小子私通被发现时,她眼里的狐狸“说走就走光了,两只眼睛变成了手电,除了光亮,别无他物”,与此同时,王家庄的自然生态因为勘探队的盲目开采也到了临界点。^⑥令人玩味的是,当大哥用手电讨好北京时,北京对这发光的器物漠不关心;可当她与鬃毛小子好上之后,她眼里的狐狸竟变成了她所不屑的手电之光;而当北京眼里的“狐光”被“科学”之光所代替的时候,北京的灵气也就丧失了。

北京对王家庄的青年男子是一视同仁的,她的目光是“等距离”的,^⑦也是“均匀”的,^⑧独有勘探队的鬃毛小子得到她的青睐。吸引北京的或许不是鬃毛小子自身的能耐,而是他留着城市标志的发型及其所指涉的城市生活与外部世界。这与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笔下的母亲何其相似,后者把脱离小镇的梦想寄托在寄宿旅馆的房客身上,这与北京将脱离王家庄的梦想寄托给鬃毛小子的做法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母亲变成了心灵扭曲的畸人,而北京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自然的复魅与未来乡村的生态之道

“九十年代以后发生在乡土大地上的经济变革,使乡村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全面转型,乡村的文化形态也由此发生重要变迁,复杂的现实为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⑨发表于1994年的《枸杞子》正是取材于中国乡村转型时期的一篇佳作,这一历史语境不仅给作者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也赋予他一种超前的批判意识,对转型时期的乡村及其生存现状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对乡村的盲目发展予以否定,并就中国乡村正确的发展之道予以形象的揭示。

那么作者是怎样揭示这一点的呢?我们且从贯穿小说始终的枸杞子这一重要的植物意象谈起。枸杞子是国内常见的茄科落叶灌木,其果实早在先秦时期就被广泛食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对枸杞子的药用价值有明确记载:“补精气诸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枸杞子“明目”的原因和功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枸杞子的“明目”功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手电的照明功效。手电虽然在小说中多处出现,但它并未起到真正的照明作用,而是起到一种“瞎亮”的、“盲目”的作用。小说中有两处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父亲用手电察看勘探队打出的深井时,他发现除了黑暗,井里“一无所有”;当手电掉进黑魃魃的河水中时,村民们立马认识到了它的“盲目”功效。而当手电的光照变得“盲目”起来时,阳光下的枸杞子却“红艳艳”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发挥着“明目”的作用。^⑪这一点在打捞北京尸体的一段描写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当村民们“把目光从北京的尸体上转移开之后,枸杞子被一种错觉渲染得血光如注”。^⑫北京的悲剧象征着整个王家庄城市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但在城市理想破灭的同时,枸杞子鲜艳的自然光亮

却始终没有泯灭,亦即其“明目”功效始终没有减弱。

除了“明目”,枸杞子还具有自我修复或自我恢复的能力。在小说结尾,勘探队队长所许诺的“科学”之光已经被“祛魅”,因而他离开王家庄的“背影成了王家庄最动人的时刻”。^③作者紧接着说:当勘探队不见踪影时,“枸杞子被浓雾乳得干干净净、水灵活现”。^④这说明,曾经一度被忽视、遭破坏的枸杞子又一次得以“复魅”,其“水灵活现”的样貌表明,以枸杞子为代表的王家庄的自然存在具有一种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勘探队孜孜以求的宝藏并不在地下,而是在王家庄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态中。这也应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所说的话:“技术并不能把我们从对自然的依存中解脱出来,而只是转变了这种依存的方式和特性:它使我们从某些对自然的依存中解脱出来,但是马上又建立起一些新的依存关系。树可以伸到土壤上面,但它往上长得越高,它的根在土壤中就扎得越深。”^⑤

毕飞宇的小说不论是在描写都市还是乡村,都在城乡互照中探求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的理想生活。《枸杞子》如此,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在毕飞宇看来,未来乡村的理想图景并不是王家庄村民所期盼的那种三十八层高的、辉光无限的玻璃大厦,也不是以科学名义对乡村进行盲目开发的所谓的发展,而是像枸杞子一般生生不息、自然而又生态的田园画卷:

我对21世纪的希望是简单而又基本的,21世纪的水是水的样子,风是风的样子,草像草的样子,天像天一样蓝……我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每一个人都像棕榈树的叶子那样,舒展、自然、常绿,在风中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的模样。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叶子,拼命指责别的叶子没有到天空去翱翔。21世纪的太阳在天上,水在脚下,风在枝梢上荡漾。^⑥

综上所述,毕飞宇在《枸杞子》中呈现出来的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破坏及其修复并不是一曲简单的哀歌或颂歌,而是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发展之道的一个缩影。尽管探索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探索创痛,人们就不会对乡村乃至整个中华大地上的青山绿水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诉求。当王家庄所经历的探索创痛最终在蓝天白云和繁星闪烁的自然生态中得到治愈时,作者其实已经形象地昭示出中国乡村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之道。这便是《枸杞子》所昭示出来的全部意义所在。

注释:

① 姜广平,毕飞宇:《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花城》2001年第4期,第189页。

②④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③⑤⑧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⑥⑨⑩⑫⑬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⑦⑪⑭⑮⑯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⑰⑱⑲⑳㉑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 ①②③④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3 页。
- ⑫ 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1 页。
- ⑬ 吴景明：《生态批评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 页。
- ⑮⑯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2 页。
- ⑰ 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6 期，第 53 页。
- ⑱ 鄢青：《论毕飞宇小说的权力书写》，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报告，2014 年 6 月。
- ⑳㉑㉒ 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0 页。
- ㉔ 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明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 页。
- ㉖ 赵允芳：《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作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 页。
- ⑳ 《中华医学名著》编辑委员会(编)：《本草纲目(上下)》，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02 页。
- ㉑ [美]霍尔姆斯·洛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 页。
- ㉒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昆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 页。

(闫建华,女,1965 年出生,甘肃静宁人,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王旭群,女,1994 年出生,浙江丽水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到世界去：从《平凡的世界》到《耶路撒冷》

◎ 卢 铭 陈衡瑾

摘 要：《平凡的世界》和《耶路撒冷》都可称为特定人群的精神史，两部作品各自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关于城市边缘青年的奋斗故事，而这些青年奋斗者，他们是典型的，他们的时代也是典型的。无论是孙少平还是初平阳，他们都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中“到世界去”，去实现自我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说这是两部作品共性所在。

关键词：到世界去 青年梦 耶路撒冷 平凡的世界

“到世界去”，是我们常提的议题，无论是现流行的“诗和远方”还是鲁迅青年时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其本质还是到世界去。梁永安曾在《人生没有真正的毕业》中讲到过，文学“是彷徨、是寻找”，他认为信仰是寻找的“终极”。^②罗兰·巴特亦于《写作的零度》中提及，小说是“死亡”，它将生命与记忆变成“命运”与“有用的行为”，将延续变成“有意义”和“有方向”的“时间”。^③然而，“到世界去”，如何去，怎么去，对我们来说还是个难题，相信路遥和徐则臣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平凡的世界》和《耶路撒冷》是这两位作家的代表作，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分析，或许幸得寻找到一条属于我们“到世界去”的路。

一、“群体无意识”烛照下的“出走”问题

两部作品关于地域的转换都是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下进行的。这结构与鲁迅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很相似，都暴露出自觉青年的“出走”问题。两部小说的地域转换由小到大，从一个群体意识到另一个群体意识，最后走向世界。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抗拒着“群体无意识”的同化，而维系着到世界去的媒介意象“形异而意同”，这些共性显然显现了“出走”这个问题，是城市边缘自觉青年的宿命。

关于归乡模式，钱理群曾于《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解释道，叙事者在亲历自己的故事同时，还在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两者相互交汇，形成一个“复调”。^④《耶路撒冷》毫无疑问是一部典型的归乡模式小说，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假如仅从少平的视角上看，这也当然是属于归乡模式小说。但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离去途中的精神挣扎，后者更侧重离去途中不断丰富精神世界。

而在他们的离去与回归之途，从乡土到城市，城市到乡土又到世界。从单一到繁多，繁多回归单一，最终又到无限，是两部作品所转换的地域意象的共性所在，而在两部作品

的地域转换中，双水村—原西县—黄原市—铜城矿场—双水村—世界、花街—淮安—北京—花街—耶路撒冷，在这两个地域转移的路径上，我们可以分为三个过程：“在”而“不属于”的乡土、迷人而又困苦的城市、永远都在前方的乌托邦世界。

乡土、城市与乌托邦，可以说是每个时代自觉青年的永恒意象，正如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人类的精神和命运都蕴含在这每一个“原始意象”当中，“每一块原始意象”都有着我们祖先在历史长河上循环往复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⑤他们都是前仆后继地从乡土逃到城市，又从城市逃到世界，他们不断地从一个群体意识，逃向另一个群体意识。李丹指出，徐则臣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充满希望的逃城”，更是一座“充满迷魅的罪恶之城”，^⑥城市边缘的人，弃乡而来，终又逃城离去。其实《平凡的世界》亦然，无论是黄原还是铜城，只是少平人生的一站，他不会停，他会一直往前。

在离去之中，无论是《平凡的世界》还是《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处在一种挣扎的、矛盾的生存困境中，即钱理群所说的“在”和“不属于”的关系，这是远大理想与平凡生活之间选择的困惑，是奋斗与回归、不甘与落寞、剧变与安定、开创与陈旧等等“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属于”是指精神上的，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平，他已经通过书本见识过了真的世界，他不甘平凡的心，怎么会是双水村这个“小天地”^⑦所能容下的呢；《耶路撒冷》中，平阳觉得他27年的生活从未如当辅导员时那样漫长，“漫长地令人厌烦”。^⑧《平凡的世界》中高中结束，少平不得不返乡务农，但见识了书中的世界之后，少平并不甘愿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挥一辈子锄头，他觉得他的价值不应该在农田上，而是在世界上；《耶路撒冷》中当烦琐的辅导员生活与自己的学术野望完全不符时，平阳毅然地选择离开。他们从“个体”进入“群体”，“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凸显”，^⑨他们与群体的意志交互融合，最终变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发觉，他们陷入一种“个人”与“群体”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们如果不愿“群体化”“平凡化”，就得选择出走。

而两部作品承载出走的媒介，形异而意同，正如荣格不断强调，意象并不是对于外界的“反映”，而是实践中“内心体验”因而诞生的“幻想”。^⑩

小说在实现地域转换时，《平凡的世界》靠的是汽车，《耶路撒冷》靠的是火车，其实所有的小说也大都有此类意象，但是这两部小说不同的是，它们自始至终串联了整部作品，它们是连接乡土与城市的纽带，也是外面世界的信使，是脱离“群体无意识”的媒介，是自由和恐慌的象征，是孙少平和初平阳出走的实际精神的载体。

《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汽车意象其实全部体现在金波父亲金俊海的职业上，对于“只走过石圪节的农民来说”^⑪金俊海是脱离双水村这“群体”的“个体”，这也是孙少平最初关于世界的印象。在那个时代，双水村确实近乎与世隔绝，而自觉青年想出走的愿望更是强烈的，在双水村，孙少平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这是孤独的、痛苦的。而金俊海的汽车无疑是少平小小世界的明灯，汽车承载了他出走的精神，他借着汽车从双水到了原西，从原西到了黄原，又从黄原到了铜城。毫无疑问，汽车是少平那一代人到世界去的媒介，亦是改革开放初期“个体”脱离“群体”的主要承载意象。

而在《耶路撒冷》中，火车是连接北京与花街的媒介。在开篇之初，平阳就是坐着火车

归来,而铜钱想用石头拦火车,通过火车到世界去,火车意象在这里是明显的,小地方的人,通过火车这个载体,到达城市,实现到世界去的理想。《耶路撒冷》的《到世界去》那一章的结尾写道:“火车确实停下来了,那个年轻人死了。围观的人一部分哭着回家了,一部分哭着继续站在那里,在想一个到世界去的大问题。”^⑫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个体”与“群体”、世界与野心、火车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吸引力和压迫感的问题。

出走意象,体现在转换媒介汽车与火车这两个载体上,而这两个载体,承载了少平与平阳到世界去的最终追求,是“个体”脱离“群体”独立化的象征。在载体的这个问题上,又无不再次印证乡土与城市二元化的情况和城市边缘青年对于世界的渴求。

杨希帅曾评《耶路撒冷》,这样平阳的出路只有不断地出走,平阳出走的意义不在于寻找的终点,而是他出走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不断行走的精神意象。这种意象象征着独立个体的人对“庸常生活的反抗姿态”,更体现了自觉青年对于自由的渴求。只有不断出走,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不再像做辅导员时感觉生命是那么漫长。出走这一精神意象其实就是“生活的自由流动与精神的自由飞翔”。^⑬

他们的出走正是要脱离群体泯灭个体的状态,即勒庞于《乌合之众》中所说,人无法在群体之中保持自我,从而由个体变成了“由意志支配的玩偶”。^⑭自觉的青年惧怕同化,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地出走,以此来对抗同化的状态。

而在归来方面,《耶路撒冷》的回归与《平凡的世界》恰恰相反,平阳回归是为了卖大和堂筹钱去耶路撒冷,少平回归是为自己、为父亲,建一孔窑洞。这里体现不同时代自觉青年的不同状态,包含了父母与孩子、人与家庭等关系的转变。一个是卖家离国,一个是建房立尊,安土重迁的观念在时代飞速发展下,逐渐淡去。他们不断靠近乡土,但记忆又不断远离,乡土成了记忆中的故土,正如不断变化的双水村与即将改建的花街,其实他们与故乡越来越远。他们的回归,无论是卖房还是建房,都成了“到世界去”前,“个体”脱离“群体”的一种意象符号。而在再次离去中,无论是《平凡的世界》中励志成为保尔·柯察金的少平,还是《耶路撒冷》中去往心中圣城的平阳,他们都无法回避,人在去向世界,“个体”与“群体”、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这个自觉青年的出走问题。

二、“到世界去”背景下他们各自的“存在主义”

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过,因为人的生活,人生才被“赋予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选择意义”,人类所需要的是,理解什么是自己“无法挣脱”的,并找到自己。^⑮《平凡的世界》《耶路撒冷》这两部作品中,无论是长子、幼子、反叛者还是沉默者,他们都在寻找中发现自己的“存在”,在寻找中发现自己“无法挣脱”的,又在寻找中选择他们的意义,然后“到世界去”。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品,幼子形象大多是反抗和斗争的代表。无论是《雷雨》中的周冲、《家》中的觉慧,又或者《平凡的世界》的少平,还是《耶路撒冷》中的平阳,他们的出走其实是寻找一种他们“存在”的凭证,他们在家庭、故土之中自我的凭证被群体化、渺小化,因而他们想要证明自我的“存在”,只能选择反抗来体现“存在”。所以他们反抗,他们

出走，回归然后“到世界去”。

关于长子，老舍曾这样说过，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⑥他们承担一切的“存在”，但这一切的“存在”却都不管他们，长子是新与旧的交界，是新与旧的缓冲，他们的“存在”是家族的延续。但是幼子则是全新的，他们完全别于旧的，因而幼子的“存在”意义更多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少平渴望出走，反抗蒙昧的生活状态；所以平阳也渴望出走，反抗无意义的生活状态。其实出走亦是新与旧的一种“存在”方式的对立。

幼子的身份似乎成了他们反抗与出走的基础，不同于长子的宿命“在出生伊始已经敲定了一大半”，^⑦幼子无须承当家族的重任，无论是延续还是复兴，这一切统统与幼子无关。幼子与生俱来有一种到世界去的物质优势与在家庭中体现自我“存在”的先天弱势，所以他们不需要太过顾忌家庭环境的因素与眷恋家庭中的细微“存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安是孙家“到世界去”的牺牲者与“存在”的承担者，他放弃了学业回家务农，放弃了“到世界去”的选择，选择了在家庭中自我“存在”。而有了少安在前的牺牲与“存在”的接替，少平才有基础与必要“到世界去”。《耶路撒冷》亦然，平阳之前有个姐姐平秋，父母有平秋照顾，祖传的大和堂的“存在”有平秋继承，平阳才义无反顾地“到世界去”。

在地域转换下看，随着人物在地域上的转移，其身上所赋予的意义，亦随之迁移。所以当家庭中的幼子走向世界，幼子身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栏作家初平阳、学者初平阳、煤矿工人孙少平。

关于身份的改变，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介入。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过，“生存即介入”。^⑧其实，到世界去就是一种对于常态的反叛、一种对于生活的介入。少平是，平阳也是，但是他们的反叛并不彻底，还是掺杂着常态的痕迹，而两部作品中最为典型的反叛者是金波与易长安。萨特又说，人除去自己所理解的以外，其实什么都不是。作者关于金波与易长安的设定也极为相似，他们的反叛既是作者想表达的另一种到世界去的“存在”，亦是对于平阳与少平到世界去的比对。

《平凡的世界》中，金波与少平年龄相同，金波长得白净与安稳，但是他的心却是生硬，他做事也手脚麻利，在班长顾养民、孙少平与郝红梅三人青春期懵懂的关系上，金波毫不犹豫地打了顾养民一顿。而又在关于藏族女子的爱情上，金波甘愿放弃一切而去追逐爱情。这是纯粹的生活的反叛者，他对于生活的“介入”便是为了自由抛弃一切。

但说到抛开一切的，易长安更为彻底。易长安为了反叛父亲的意志，自己把父亲取的名字从震生改为长安，父亲叫他学理，他学文；父亲叫他去城里教书，他去乡下教书。“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父权高压下的另类代表。”^⑨在生活前期，父亲是世界，所以他反叛父亲，之后社会是世界，他又反叛社会。他本可以在乡下安心教书，但是他偏要反抗那不合理的情形，所以他来到北京。而在北京他也是可以干正当职业的，但是他偏要做假证。这是易长安的反叛之处，处处体现着反叛的荒唐，这亦是他对于生活的一种“介入”，是新时代反叛者自我“存在”纯粹的一种体现。

关于他们的“到世界去”，金波最后去青海寻找他的藏族姑娘去了，易长安为了回来签署建立斜教堂修缮会的文书而被抓进监狱，他们“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⑩他们二者最终皆是困于情，金波困于藏族姑娘，易长安困于景天赐，但前者是爱情，后者是救赎。

这是他们的到世界去,他们为了心中所想不顾一切,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程度强于少平、平阳,但到世界去的本质又是一致的,都是实现自我的梦想和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

少平、平阳、金波、长安他们四者都为了自我强烈的“存在”出走,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顺从者润生与吕冬,卑微且懦弱地“存在”。

润生从小在“强人”田福堂的影子下长大,在家他没有话语权,在外也是少有存在感,他看似没有什么追求,走一步算一步,但是在遇到寡妇郝红梅之后,他的存在感突出了,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男人,在父母强烈的反对下,他不再懦弱,选择了爆发,他反抗父亲的意志,甚至与之断绝关系。这其实亦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体现,面对强权,润生自然地低下了头,但是在“更弱者”郝红梅面前,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男人”,润生需要一种“存在”的凭证,而郝红梅显示了润生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一种“存在”,润生的世界出现了,所以他为了世界而爆发,从而到他的世界去。《耶路撒冷》中的吕冬亦然。

吕冬也是生活在强势的母亲影子之下,面对母亲的强势,吕冬沉默,在母亲的安排之下,按部就班地生活,甚至于妻子也是母亲挑选的,而妻子也是个极为强势之人,在这两个女人强势的重压下,吕冬疯了,或者说“被疯了”。面对强权的“弱化”,精神病院反而是一种“存在”的诞生。在精神病院中,吕冬是前所未有的轻松,甚至翻墙与牧羊人谈天说地。吕冬这是一种躲避,亦是一种爆发,这一种爆发没有直面强权,而是迂回消解。但这种爆发远没有润生的纯粹。

这种纯粹是一种无所顾虑,而这种顾虑随着年龄和时代不断增加,20 刚出头的润生与 30 多岁的吕冬是有的区别的;80 年代与 21 世纪也是有区别的。当简单的 80 年代生活到了繁杂的 21 世纪,一切都变得难以决断、难以抗争。正如 21 世纪评论家们提出的“重返 80 年代”一样,21 世纪缺少了 80 年代那样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而新时代是个“无根”而“无序”的时代。^①在无序、无根的时代要么是像平阳、长安一样当一个纯粹的反叛者,要么就只能是一个懦弱的逃避者。而吕冬属于后者,所以他面对权威选择逃避,这种情感延续到今,便如现在盛行的“鲁蛇主义”或“丧文化”等以失败、挫折、自嘲为主题的青年次文化,他们对于“存在”与“意义”不以为意,反而认为无意义是最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文化现象,亦是我们到世界去的一大阻力。

三、“到世界去”的精神内核

《平凡的世界》从文本分析上来看,是一部“成长小说”,“它向每一位底层青年许诺,只要勤奋上进,就能在现实社会中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成功”。^②《耶路撒冷》亦然,他讲述了花街那一群少年的成长奋斗史。他们在描写“到世界去”的过程中,都将苦难化为前进的精神动力,小说都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普世价值观:有付出就可能会有收获,但不付出就绝不会成功。

但《耶路撒冷》本质是通过更深一层次的忏悔和救赎的寻找自我。平阳他们的出走与回归,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景天赐自杀事件,这件事在他们心底埋下出走和救赎的根源。天赐的死亡,像命运的一根线,将花街的那一群人都联系在一起。天赐发疯是因为在雷雨天

与长安比赛游泳，被雷劈而发疯；杨杰为了炫耀，给了天赐割腕的手术刀；福小因一时的挣扎，错过天赐的抢救时间；平阳因害怕或是因福小阻止（作者此时在描述天赐自杀这件事是模糊的，当时平阳具体干了什么，小说没有明确交代，其实这里体现了平阳的忏悔与难以面对）而迟疑，也错失了天赐最佳抢救时间。

平阳到耶路撒冷，是一种自我救赎，他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寻求人生的真理，其实是一场自我救赎之路。花街的那一群人渴望得到救赎，所以当听到要建立斜教堂修缮基金会时，他们都纷纷回归，他们想要忏悔，得到救赎。而这一场救赎之路，其实是一场寻找自我之路。徐则臣通过《耶路撒冷》，讲述几代人对于天赐自杀的追悔与救赎的同时，暗含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永恒的人生命题，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断裂与碎片的世界之中，“人们需要寻找自我的根本与内心解放，本质意义是重新确立与自我出发走向世界的精神自由”。^③

少平的“到世界去”亦是一场寻找自我之路，在思想被启蒙，离开农村之后，他的精神极渴望远行，但是他不知道世界的终点是何方，他只能不断往前，所以他来到了黄原揽工，之后又到了铜城挖煤。这是少平的一种自我选择，但又是现实给予少平的定向选择，是或者否。而想要“到世界去”的少平其实毫无选择。少平只有一直往前，而往前便是“到世界去”，这与平阳的多元化选择是不同的。在逐渐多元化的今天，选择越来越多。这种转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的结果。

其实，路遥与徐则臣对于现代化，都体现出一种焦虑，路遥的是若隐若现，“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他”；^④徐则臣的焦虑是明朗清晰的，“你们这辈人，不会再用火煮饭烧汤了”，^⑤到了现在，现代化则是我们需要直面的最大的诱惑和焦虑。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导言中所说，《一九四二》显示了痛苦对于人的限制，而《美丽新世界》却因过度的娱乐而丢失自由。简单来说，奥威尔的不安是“我们憎恨的东西”将会毁灭我们，而赫胥黎的不安是，“我们热爱的东西”将会毁灭我们。^⑥现代化，便是我们现在又爱又恨的东西，稍有不慎，它将会毁了我们。

而为了抵抗这种焦虑，他们都选择让笔下的人物出走，以出走来抵消现代化的焦虑，以出走来寻求现代化中最为平衡的点。在一个群体意识到另一个群体意识的转移之中，去寻找属于自己“到世界去”的路。少平的路是煤矿，他寻求参与现代化进程中来，以此来建设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平阳的路是耶路撒冷，他发觉现代化进程无法改变，也不能成为自己满意的样子，所以他选择离开，从耶路撒冷这座圣城中寻求自我的精神世界。这便是他们异而相同的“到世界去”的精神内核。

徐则臣曾在他的散文集《到世界去》中说道：“所谓到世界去，指的正是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其实在不断出走的焦虑之中，人已经开始到世界去，“站在故乡的高台上远望火车，在路上，停下来整顿和思量：此三者皆在‘世界’上”。^⑦在如今，其实在我们无所知觉之时，我们便已经开始踏上“到世界去”的路。如今的路，较之徐则臣与路遥更多，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而我們也需要面对更加强烈的现代化与焦虑感，所以我们也拥有更大的迷茫。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那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⑧

其实,归根结底,两部作品并没有跟我们说明如何到世界去,但它们都共同地叙述了如何是无法到达世界的,如少平离开双水、少平帮助被包工头欺负小女孩;又如平阳离开大学岗位、平阳不将房子高价卖给商人;等等。正如猫腻在《间客》的后记曾说过,“最爱《平凡的世界》”,他亦于其中说到,他不知道什么事是正确的,但是他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因为那些错误是那么显而易见,并不需要有多深刻的“理论知识”,而“只需要看两眼”。^⑳

注释:

- ① 鲁迅:《呐喊》,春风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自序第1页。
- ② 梁永安:《人生没有真正的毕业》,《无锡日报》2015年7月24日,第1版。
- ③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 ④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 ⑤⑩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5页。
- ⑥ 李丹:《弃乡与逃城——徐则臣“京漂”小说的基本母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
- ⑦⑪⑭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503页。
- ⑧⑫⑮ 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53页。
- ⑨⑬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语嫣译,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 ⑬ 杨希帅:《读徐则臣〈耶路撒冷〉》,《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 ⑮⑳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6页。
- ⑯ 老舍:《老舍青岛文集 第1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 ⑰ 周荣:《长子形象的文化隐喻和家国寓言兼论蒋蔚祖》,《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 ⑱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26-744页。
- ⑲ 刘琼:《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叙事策略》,《东吴学术》2015年第6期。
- ㉑ 张福贵:《新世纪文学的哀叹:回不去的“八十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 ㉒ 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 ㉓ 刘迎新:《70年代的成长心灵史——评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 ㉔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页。
- ㉕ 徐则臣:《到世界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 ㉖ [英]狄更斯:《双城记》,马小弥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 ㉗ 猫腻:《〈间客〉后记——有时候》【将夜吧】,https://tieba.baidu.com/p/1182909575?red_tag=2973522990,2019年2月3日访问。

(卢铭,男,1996年7月出生,浙江温州人,本科在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2015级学生;陈蘅瑾,女,1976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与文化)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播途径及影响

——以红杉林作家群为例

◎ 吕 红

摘 要：本文在初步梳理大量的原始资料基础上，将美国《红杉林》杂志的缘起及发展脉络呈现给学术界作为研究参考，窥斑见豹，以深入了解海外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创作与研究。

关键词：海外华人创作 新移民文学 红杉林杂志 海外传媒

一、红杉林打造传媒平台 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海外华文文学从 20 世纪初发端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近 30 年来中国世界华文学会及各地高校的积极开展通力合作，在研究方面有了丰富的成果。恰如学者专家所见，当代的海外华文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承续了中华人文传统精髓；而海外华媒发挥团队力量在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社团发展及华校互动，尤其是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更是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资源与通向未来的坐标。

6 000 万海外华侨华人，是除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华文群落。华人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精神血脉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犹记 100 多年前，梁启超在太平洋途中感怀身世：“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乡，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当今世纪，全球化趋势，网络及现代科技似无远弗届。打破族群和民族的边界，传递文明及其价值，而创造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传统被赋予新的生命，释放无穷能量而成为新的起点。新移民作家群体以开阔的视野、娴熟的笔致，构建了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学殊异的文学空间，彰显出不同的文学观，并使得华人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一脉。

自 2004 年我作为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副会长参加了在山东威海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以后就延续下来几乎每年都参加国侨办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大会与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建立广泛的人脉，为创建文化交流平台打下很好的根基。

再谈一下《红杉林》与美华文协或《美华文学》在停刊、创刊之间的关联。因成立于 1972 年的美国时代有限公司 2005 年结束营业，旗下创办 10 年的《美华文学》及其网络版、《美华论坛》均停刊。^①经反复沟通磋商，由伯克利大学亚裔系主任王灵智教授牵头，在侨界大佬支持下，由吕红任主编，王性初副主编，苏炜、陈瑞林、陈谦、施雨、刘荒田、李硕

儒、朱琦等美华作家为主力,与相关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荟萃人文思想和艺术精华,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的《红杉林》(*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s*)(ISSN 1931-6682)^②正式创刊。

社长王灵智先生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确立了《红杉林》的宗旨:“其一,提供海外华人一个文学艺术作品发表与交流的平台;其二,促进自由开放的沟通,为作家艺术家与学者们提供切磋交流园地,通过各种视角的观照和评论,让来自不同地域的创作得到进一步提高;其三,推动全美及海外华人文学艺术的发展,系统地评估艺术创作成就,包括从文学到艺术,从电影到大众文化等;其四,让更多的海外华人(譬如晚生代华裔或对华人文学感兴趣的各族裔读者或研究生等),增进对美华人历史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水准,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并借此对世界华人文学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红杉林》秉承“高屋建瓴、开放广博;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创作与研究并呈,典范与新锐兼容”之风格特色而颇受关注。特邀国际名家纪弦、聂华苓、白先勇、陈若曦、余光中、郑愁予、痖弦、洛夫、张错、张炯、公仲、单德兴、严歌苓等为顾问。南加州大学张错教授表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因要走的路尚长,需要坚持和有恒。”白先勇先生题字“祝红杉林愈来愈红”。创刊号不仅有北岛、严歌苓、苏炜、少君、沈宁、刘荒田、王性初、吕红等作品展示,同时还有公仲教授、王红旗教授与刘俊教授、陈瑞林、阙维杭等评论。诸多文坛精英加盟支持及热切关注,期冀担当起那些如雷贯耳的文学刊物担当过的责任。

至于刊名《红杉林》的选择,编委苏炜曾给予过很好的启示。^③诚如加拿大华裔学者桑宜川教授所言:“或许与美国加州湾区广为生长的红杉有关。”红杉的根被称为“慧根”,加州红杉的根在地底下紧密相连,形成一片根网,这就使得加州的红杉树都是成群结队地成片生长,而且长得特别高大。——这与华人顽强的生存信念和族群情结何其相像?《红杉林》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族裔情结在美国自诞生至今已10余年,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成为联系华人文化血脉的传媒之翘楚。^④

海外华人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发端,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大批港台留学生赴美,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一波波大陆留学生负笈游学,形成三代作家的创作高潮。聂华苓、陈若曦、於梨华、欧阳子、白先勇等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精神“迷失”和“文化回归”,体现了一批海外学人难以割舍的中华文化根的情怀。

其实,华人在海外创作肯定是有其精神的追寻求索的。这也是当年《现代文学》主力相继成为本刊顾问的内在动力。细解《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在停刊与创刊之间的重叠,一脉相承的人文情怀:“不计成败得失,以一股缓慢却悠长的力量表达对社会关切,形塑一种值得骄傲、值得维系的文化品格。”

《红杉林》顾问聂华苓的代表作《桑青与桃红》,充满强烈的政治隐喻和个性泼辣的叙事和结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的重要范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已经选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作为教材。作家洪洋认为:“美籍华人女作家的作品,走进了美国第一流大学的课堂,这就是令所有中国人自豪和高兴

的事!”^⑤

《红杉林》顾问陈若曦作品表现异乡人的失落与乌托邦的追寻这个世纪存在的症状，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无家可归，思想精神和情感个体都在流亡。其作品不断创新，突破藩篱，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开花结果在海外。

《红杉林》顾问白先勇曾指出 20 世纪 50—70 年代美华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作品热切关注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的创作对大陆和台湾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研究那个时代美华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视野中来评析海外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旅居加拿大的移民作家痖弦则说：海外华文文学无须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须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同时，华人作家在英文创作领域也取得较大成就，如江少川访谈的哈金，其作品囊括美国所有的文学奖，在主流社会打下了一片天。^⑥近年来一批以英文写作的作家如李翊云等取得靓丽成绩，获奖频频。

从老移民作家到留学生文学再到新移民作家，创作颇丰、成就骄人，并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涌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流散、迁徙的生命体验中，海内外作家学者对艺术思考对人文精神重新认识和想象，开启的探索思潮，渐成波澜迭起的文学巨流。

二、跨越语言疆界 追求卓越与独创

放眼一看，海外文坛色彩缤纷，新移民文学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在现代多元视域下，题材新锐、表现手法独特的佳作不断涌现，如哈金的获奖作品《等待》、严歌苓《少女小渔》《陆犯焉识》等、阎真的《白雪红尘》、张翎的《金山》、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陈河的《去斯可比的路》、李彦《红浮萍》系列、沈宁的《美国十五年》、苏炜的《迷谷》、少君的《人生自白》、卢新华的《紫禁女》、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范迁的《错敲天堂门》、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融融的《素素的美国恋情》、章平的《冬之雪》、瞎子的《无法悲伤》、鲁鸣的《背道而驰》、孙博的《茶花泪》、余曦的《安大略湖畔》、曾晓文《梦断得克萨斯》、袁劲梅《青门里志》、吕红的《美国情人》，还有魁北克作家的薛忆沩、郑南川、陆蔚青，还有近年非常活跃的欧华作家群等创作实绩无不折射出时代风貌的深广度，或人性开掘的厚度与深度，坚忍执着在浮躁年代愈加显现出特有的价值。

《红杉林》作为思想文化交流平台，凝聚了有影响力的海内外作家评论家，追求卓越与独创。

江少川教授与新移民文学代表查建英的访谈，^⑦详细梳理了从《丛林下的冰河》到《留美故事》*Tide Players*（《弄潮儿》）等系列创作的心路历程。挖掘了大陆留学生云游四方而是“为了找找看”，但生活和学业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如鱼得水，然而回到故土已物是人非。作品发表反响颇佳。后来作为学者的查建英出版 *China Pop*（《中国波普》）被美国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

新移民文学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对本土文学的嬗变也提供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参照。如严歌苓小说双重文化背景和双重身份导致叙事主体的暧昧并充满悖论,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无出路咖啡馆》《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等塑造了理想中的女性,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而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而《陆犯焉识》则以独特视角反思人在特殊境遇里的苦难及命运,电影《归来》、小说及电影《芳华》影响巨大。

新移民作家张翎的《金山》从清末华工方得法远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讲起,描绘了作家四代人在异国他乡的卑苦的奋斗历程,探讨国际大背景下民族身份与认同,纵横捭阖,波澜壮阔,跨越了一个半世纪浩繁的光阴和辽阔的太平洋。

以《饥饿的女儿》声名鹊起的旅英作家虹影,在接受江少川教授访谈坦承:“自我意识,叙述能力与性爱结合,三位一体,可能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叙述本能用想象力把这三者熔合成人性基础。^⑧

海外华人移民身处全球性语境的西方文化环境中,又得益于自身开放的心态,所以其创作开始呈现“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融中西文化的境界,^⑨而且视角越界较多地出现在新移民作家创作中。这种跨文化视角的复杂性带来创作思维和叙事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承接传统,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又大胆地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博采众体,熔铸百家。他们从各自的不同心理出发,寻找着共有的精神归宿,同时也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海外移民多重文化背景及人生经验,跨越地域之复杂性、差异性和变化性,为作家们提供了艺术翱翔的天地。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涵盖华人社区、美国主流。透过现代人的观点,在如此博大的情怀和视域下产生的作品,自有其深广的腹地;兼容多项素质,并且不自觉地注入了多元与跨界的必然性:海外作家以不同的方式来诉说命运的跌宕起伏和经验的细微感知,既包容又专精,既多变又执着,形成了海外创作的丰硕景观。

三、经典重构 再现辉煌 传媒影响甚广

当翻看文学史会不经意发现,或许由于机缘,有些作家是经历了大红大紫后又被时代冷落或冷藏,而有的恰恰相反,先不被重视,时过境迁却又被追捧推崇,甚至被一代又一代青睐(譬如张爱玲等)。这不能不说是文坛跌宕或文学史嬗变的奇特现象。文学是人学,谁也无法否认文学的最大功能就在于对人的描写,对人丰富精神世界的表现,对复杂深奥的人性的揭示。

《红杉林》顾问白先勇在重塑经典过程中表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认为重新评估历史文化是当务之急。他认为因内忧外患、外压及内耗,近百年来文化的发言权几乎由西方主导。期盼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重现光芒。^⑩聂华苓以创作及创立国际写作中心计划推介,探寻人生终极意义上的游子归宿;^⑪陈若曦以小说及人生自述来呈现社会文化历史反思;^⑫施叔青以跨域气魄推出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系列拓宽了创作格局;王鼎钧在磅礴人生和宗教虔诚中的大化境界,呈现的世态百相以及对中华文化资源的深入开拓,都足以在华文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篇章。

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作为一个享誉海外 20 年的文化团体,一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创作者活跃其中。协会不仅编辑出版美华文协会会员专辑,还联合华侨出版社、纽约商务出版社策划出版会员新作,举办新书发布会。2014 年经大会选举,《红杉林》总编吕红博士当选为会长,成为创会 20 年来首位女会长,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大使赋诗致贺。2015 年经理事会讨论决定,创刊 10 年的《红杉林》杂志正式成为会刊。

杂志集合海内外创作与评论的各路英豪,与伯克利大学亚裔研究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暨南大学、南开大学等联合举办“跨越太平洋——北美华人文学国际论坛”,为来自不同地域的专家学者与作家提供对话和交流平台,议题包括世界华人文学创作生态及作家作品研究等。逾百位来自海内外包括中国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昌、西安、吉林、厦门、广州与韩国等地的专家学者,与北美华人作家齐聚一堂,共襄盛举。传媒称在旧金山、洛杉矶及温哥华等地举办论坛对于推动海外作家创作、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国务院侨办宣传司致贺函,祝愿《红杉林》继续为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华侨华人、促进中美友好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致贺状,高度赞扬《红杉林》编委及作家们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促进文学发展的不凡成就及贡献。

《红杉林》不仅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肯定,北美、中国及港台地区等高等院校读者青睐,并获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当地政府要员颁发多项嘉奖。跨越太平洋北美国际论坛筹委会主席王灵智教授代表伯克利大学与《红杉林》杂志,表示北美华文文学是结合北美华人社区和美国/加拿大成一整体的;用中文来表达北美华人经历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希望跨太平洋对话将促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并鼓励年轻一代华裔积极从事写作和研究。恰如专家所言:大批海外移民致使汉语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它的疆界是不断扩大的。全球中文热是一个好现象,华文学学校遍地开花也呈现极好的发展势头,让移民培养自己的后代学习中华文化的后继有人。而《红杉林》杂志与文化团体及传媒联合主办中美青少年征文大赛恰好体现了其传承中华文化之意义。

美国国会图书馆最早将《红杉林》作为典藏;香港地区中大、城大图书馆追踪订阅,为文学研究开启一扇窗口;而国内核心期刊有关《红杉林》介绍,引起文科院系师生关注;不少学者来函搜寻刊物及电子文本;亦有读者兴趣颇浓,称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春华秋实,众多海外作家在海外创作创造了辉煌,留下精神的印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作家及团体,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独特的经历,是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作品往往就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⑩移民作家这种特征无疑体现了文化取向的多元性。因历史上的排华阴影、种族歧视、文化冲突等因素,与第一代华人移民作家相比,在居住地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华裔作家存在明显差异。文学嬗变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上,第二代华裔作家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从整体特征上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特征。

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移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异质文化的

冲突、融合的历史。而各种文学思潮及流派、现代或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为文学研究打开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路径。海外华文作家不仅承载着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精髓,更体现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融合为全新的生命特质。因此,纵观海外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丰富的移民生存体验上产生的超越地域时空的人文视角,使海外作家在较短时间内能将自身身份体认上产生的困惑推展为生命本体和人类认知上的难题,在创作中呈现出一种跨文化的视野。

四、拓展、反思、凝聚与传承

依照自然规律,世间事物都有萌生及发展,从低到高又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或传承了精神或创造了历史或留下了辉煌的瞬间。人生既需要历史反思,也需要文化传承;既需要艺术拓展,更需要以丰富的艺术创造留下见证。大师本雅明说: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北大教授、美学家朱光潜认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比一所大学的影响更大。当今网媒活跃电子刊物、网络刊物四面开花,刊物内容形式亦将多样化。

惊回首,《红杉林》这一份高品质的纯文学刊物迈入13年历程。海外文学刊物坚持更为不易,成就感与挫折感并存。仿如长跑,亟需耐力支撑。创办不易,再上一个台阶更难,或许难中才显英雄本色。

当今世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网媒与纸媒并存,与网媒优势互补,不断扩展纸媒的影响。吕红绮、屏姜雪等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及深度人物访谈,以及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北美杰出传媒评选获多项大奖;社长王灵智教授荣获终身成就奖;董事长尹集成、常务副社长陈杰民荣获特别贡献奖等等,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及人才济济的实力。

《红杉林》办刊人员既是传播者,同时也是创作者,具有专业素质及奉献精神。编委活跃在海外文坛,处在地广人博、中西交汇之处的北美华人社区,依托侨团与文化团体人脉资源共荣共生,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海内外交流功莫大焉。

迄今已发表文坛名家譬如纪弦、痖弦、聂华苓、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郑愁予、北岛、舒婷、严歌苓、查建英、张错、张翎、苏炜、喻丽清、李林德、黄曼君、潘耀明、陶然、陈楚年、卢新华、付兆祥以及王蒙的研究专题;实力派作家方方、刘震云、阿城、陈河、陈谦、少君、薛忆沔、吕红、唯唯、江蓝、范迁、施玮、施雨、沙石、王瑞云等作品;散文家王鼎钧、刘荒田以及学者型作家于文胜、于文涛、何与怀、李硕儒、朱琦、沈宁、杨恒均、鄢烈山、江迅、信力建、李剑芒、王学信、曹万生、鲁晓鹏、融融、木愉、余雪、刘瑛、绮屏、姜雪、邓菡彬、曾不容等;还有诗人王性初、阙维杭、邹惟山、史家元、蔡益怀、曹树堃、马慕远、陈路奇、雪绒、为人、小平等;还有施业荣、穗青、史钟麒、凌鼎年、杨建新、梁应麟等作品;刊发海内外评论家及学者如张炯、饶芑子、王列耀、公仲、古远清、白舒荣、江少川、朴宰雨、陈晓明、陈国恩、陈美兰、陈菊先、陈瑞琳、刘俊、李凤亮、李林德、李良、乔以钢、林丹娅、林树明、林中明、陆建德、陆卓宁、王红旗、王宗法、王文胜、吕周聚、赵稀方、赵树勤、丰云、景欣悦、钱红、聂尔、谭湘、国荣、林瑶、舒勤、周易、秋尘、林楠、郑一楠、卢妙清、徐学清、喻大翔、汤哲声、程国君、

刘海军、宋晓英、石娟、颜敏、成祖明、张朝东、李耀威、刘笑宜、庄伟杰等学术论文；女作家赵淑侠、赵淑敏、丛苏、李黎、李彦、章缘、张让、简宛、吴玲瑶、周芬娜、姚嘉为、张纯瑛、顾月华、王克难、杨芳芷、卓以玉、黄雅纯、麦胜梅、刘慧琴、甘秀霞、陆蔚青、艾禹、虔谦、海云、枫雨、张慈、张凤、章瑛、刘瑛、张棠、江岚、依娃、依林、林焯、云霞、宇秀、孟丝、濮青、梅菁、平雅、茜苓、夏姘、林美君、宋晓琪、余国英、余洁芳、徐芳芳、甄子钧、洪吕焜，欧华作家穆紫荆、老木、章平、海娆、阿朵、春阳、黄为忻，加拿大郑南川、王燕丁等数百位名家与新秀作品；还有艺术大家徐悲鸿、欧豪年、周韶华、鲁正符、徐耀、周敏华、林中明、黄炯青、何岸、卓文、伍启中、刘惠汉、何蓝羽、区楚坚等作品推介；还有专家蒋述卓教授、游江、梅国云、唐传林，名画家彭西春、周立群、邓治等书画展示；尤其是还做了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专辑、国际论坛专辑、世界华文文学专辑、世华名博专辑、海外女作家专辑、美华文协专辑、北海专辑、中美青少年获奖作品专辑、海外文轩及欧华专辑等，对海内外创作研究起了相当强力的推动作用。

著名诗人及文学主编痲弦从加拿大来函，称刊物办得很有规模，尤其在海外，更不易。“编辑不只是一种职业，而是事业、勋业、伟业。”^⑩《红杉林》之所以稿源丰沛、人文荟萃，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的延续。当今海内外兴起“国学热”，全球兴盛开花。其实早在 20 世纪就有华人教授与美国教授联手合作，将华夏文明思想史引入美国大学讲堂。《人文春秋·从珞珈山到旧金山》通过对教育家吴耀玉教授亲友的访问，^⑪钩沉史料，讲述了其如何以 12 年的艰辛努力，将深奥的东方文化精髓译介给西方读者的动人故事。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亦吸引了西人关注，詹姆斯教授以英文译介《道德经》，无疑显示出跨文化交流已成今日有识之士的共识，成为涵盖时空、地域、思维及语言的相互交融。

当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口流”速度加快，移民在世界分布越来越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资源，并愈显强大的生命力。多元文化中的“家园情怀”却恰好成为滚滚红尘纷纭繁杂的世界中的心灵栖息地。从流散、追索进入到一种自觉的身份建构，即以语言的疆界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来建构文学的历史。

有学者研究中发现：文学史上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的主流，譬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等现代文学大家，经历了海外文学活动后在国内掀起波澜。巴金在法国，老舍在英国，更是泡在外语环境中写出了大量中文文学经典。^⑫

随着发掘经典的意识增强，华人作家将时代精神、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审美特性进行全方位整合；这种整合又被推向世界，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共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有呕心沥血在海内外华文报刊园地耕耘者，或闪烁在读者众多的平面媒体中，或流动在网络纵横交错的多维时空，逐渐形成千山万壑异峰凸起的势态。^⑬语言疆界的拓展将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新的契机。面对不断嬗变的华人文学，研究模式与结论殊然相异，最终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与参照系统，将形成“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格局，进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朝着纵深方向拓展。研究者将整个华语写作纳入一个阔达的视野，对比深入，条分缕析。全球化语境下多种文化背景交错的海外兵团，势必将为文学史的重写提供参照。

注释:

① 在2005年《美华文学》随着时代公司关闭而创刊10年的杂志停刊。2007年复刊。2010年与硅谷女性合办。2011年移交由硅谷女性主办。2015年出1期之后没再出刊。

② ISS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是根据国际标准制定的连续出版物国际标准编码,可以准确、快捷地识别该期刊(报纸/杂志等)的名称及出版单位等。该系统在全世界使用,成为标准期刊的显著标志。ISSN 1931-6682《红杉林》作为国际正规的连续出版代码标识并进入ISSN数据系统。

③ 苏炜:《千岁之约》,《红杉林》2006年第1期。

④ 石娟:《北美华人的精神纽带及思考—以红杉林为例》,《红杉林》2006年第1期。

⑤ 洪洋:《高速的梦幻》,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⑥ 江少川:《哈金:小说创作的智性思考》,《红杉林》2013年第2期。

⑦ 江少川:《“找到的就已不是你要找的”——查建英访谈录》,《红杉林》2014年第1期。

⑧ 江少川:《虹影访谈:从私生女情结到母女三部曲》,《红杉林》2013年第4期。

⑨ 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⑩ 弘晓:《白先勇:以图影还原历史真相》,《红杉林》2013年第2期。

⑪ 江少川:《聂华苓:往事今生三时空》,《红杉林》2015年第4期。

⑫ 陈若曦:《七十自述》(节选),《红杉林》2010年第4期。

⑬ 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及汉语写作》,《文艺报》2004年。

⑭ 吕红:《共享这一片秋色》(卷首语),《红杉林》2011年第3期。

⑮ 《人文春秋·从珞珈山到旧金山》,《红杉林》2010年第1-2期。

⑯ 邓菡彬:《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当代海外华文写作》,《红杉林》2008年第1期,《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⑰ 参见《红杉林》V1. No1—V12. No2.

(吕红,旅美女作家,生于湖北武汉,文学博士,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红杉林》杂志总编辑,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蓉子文学创作论

◎ 白舒荣

摘要：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女作家蓉子，是从报纸专栏走出来的。从蓉子成长和经历看，她不畏艰难，勇敢坚韧，其作品也展现作者自身的这种品格。回国探亲之后，生活重大转折为其创作注入新养分、新活力。无论在他乡还是故乡，她的文学创作可谓笔笔正能量，满满家国情。她以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行进在永远的路上。

关键词：女作家蓉子 新加坡和中国 文学创作论

新加坡华文作家蓉子自称是“三国五朝小民”。1949年初，她出生在中国；8岁随养母下南洋，落足英属马来亚；半年后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建立马来亚联邦；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同沙巴、砂拉越，以及新加坡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1965年她去新加坡工作定居。三国五朝不折不扣。

一、新加坡蓉子：从报纸专栏走来

蓉子出生在潮州金石镇陈厝垵，本名赛蓉，生身父陈姓，她随养父姓李，全名李赛蓉。4岁的她被送给了不育的亲姨母。在姨母那儿最常领到的礼物是令她肝胆俱裂的“泄愤般地打打打”。8岁时离开潮州家乡，随姨母漂洋过海到马来亚与姨夫团聚。姨夫在杂货店当伙计，收入低微，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简陋大杂院。她立刻担负起洗衣烧饭、提水劈柴、养鸭洗地等繁重的家务劳动，稍有差池，小则被敲头拧脸，大则被烧火木柴痛击手指，或者用麻绳套在她脖子上，勒一勒松一松，姨母还恶狠狠地威胁：“你要死还是要活？”让她心志不死的是书本。她非常爱读书，虽然是班上的穷学生，连练习本都买不起新的，却下课后偷偷做拔鸭毛的杂活儿，挣钱买故事书看。

她以4年的时间完小毕业，勉强又念了二三年英文中学，便因家穷辍学，开始四处流浪打工。后来结婚成家，满怀希望投入新生活，担任起新角色。蓉子婚后在新加坡自家的小天地里，洒扫庭除，买菜做饭，做毛绒玩具等手工活贴补家用外，从小爱书、恨自己读书少的她，从没放下过书本。翻破了《辞源》，熟读《古文观止》《红楼梦》，民国年间老舍、张恨水等等名人著作，尽量借来阅读。看的多了，难免技痒，悄悄动了写作的念头。

1969年，她把厨艺心得写就的一篇以《食谱——猪肉蒸蛋》为名的小稿，化名雪兰，寄给《南洋商报》。不料竟被刊登了，恰逢长子出生。她欣喜万分，觉得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意，暗示写作同儿子一样，注定都是她的生命之重。

《南洋商报》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由新加坡殷商陈嘉庚于1923年9月6日在新加坡独资创刊。1965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南洋商报一分为二。与《南洋商报》并驾齐驱的另一份华文大报是《星洲日报》。除此外，还有华文报《新明日报》，其文艺副刊很受读者欢迎。《新明日报》为新加坡华文下午报之一，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发行，于1967年3月18日创刊。创办人是香港著名小说家金庸和新加坡商人梁润之。

第一篇小稿见报后，她又陆续写了一些妇女版的文章。70年代初，她试着投稿给《新明日报》的文艺版“新风”，并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几天后在“新风”版，发现有个叫“蓉子”的写了一篇《闺怨》，看内容，竟同她写的一样。再仔细读，除了改掉几个字添上两句诗，明明就是自己投的稿啊！正纳闷，发现版面当中有行黑体字：请作者“蓉”晚间与本版编辑联络。

她常读《新明日报》副刊，发现这是该刊主编姚紫的一贯作风，他喜欢在版面上给作者和读者发讯息。姚紫是新加坡早期优秀作家和编辑，原名郑梦周。20世纪20年代出生在泉州晋江安海镇，1947年12月只身南渡新加坡。两年后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南洋商报》连载，备受读者追捧；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拍成电影后，亦轰动一时。他曾担任多家副刊和刊物的编辑，致力培养文学新人。为问明究竟，她给《新明日报》副刊打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人和蔼客气的声音，正是姚紫。他说，这篇《闺怨》就是她的作品，他认为用一个字“蓉”作为笔名对读者显得不够尊重，所以做主加了个“子”，变成“蓉子”，这既不影响原意，眼看还是耳听都都比较美。听了姚紫的话，她想，自己本名赛蓉，喜欢芙蓉，却嫌“赛”字有点俗，便爱用单字“蓉”，姚紫的建议有道理，从此在“新风”发表作品就常用“蓉子”。新加坡的“蓉子”由此从报纸副刊诞生。

副刊，通常是指报纸上刊登艺术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中国的副刊出现比较早，从有了报纸以后就有副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张恨水的“鸳鸯蝴蝶小说”等，都首见于报纸的文化副刊。中国大陆外的地区和国家，华文杂志凤毛麟角，文化副刊尤为华文作家们驰骋文笔、培育成长的重要园地。

姚紫无意间把李赛蓉命名为“蓉子”。恰巧，台湾地区有位著名女诗人叫蓉子。20世纪70年代初，资讯比较封闭，没有网络，没有邮箱，更无微信，世界华文文坛远非如今这般交流频繁。直到70年代后期，西方的现代主义才从台湾地区传入新加坡，基本以诗为主，接受者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人。

姚紫是位中华传统文人，70年代初不知台湾已经有位著名女诗人叫“蓉子”并不奇怪。否则，以他的性格，以他当时在新加坡文坛的地位，断不会让自己的作者重了别人名。李赛蓉当时不过是个家庭主妇，虽然喜爱读书，对国外文坛作家的了解和认知还比较少，接受姚紫的建议换笔名全然出于尊重。同台湾名诗人之重了名，全然无心。再说，台湾蓉子从没在新加坡发表过东西。当时不知台湾有位著名女诗人蓉子也不足为怪。未料，有人讥讽她有意借名人之“名”抬高自己，常以之作为箭簇，抽冷射一箭。面对嘲讽和打击，她暗暗较上了劲儿：“我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座右铭：大石横前，弱者的障碍，强者的阶梯。”后来她索性到户籍处，加上中文名“蓉子”，将自己完完全全正名为“蓉子”。

蓉子开始写作，多因心绪无从诉，想借此给自己圈在家庭小天地、受娘家和婆家轻贱

的生命带来希望，带来力量，外加挣些稿费补贴捉襟见肘的家用，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家务消磨了蓉子的精力，而一路为命运所激发出来的要强心，丝毫未变。在主流的男权社会，女人总是低男人一等，女人的使命是婚姻、家庭、孩子、丈夫，把一个家操持得有条不紊，服侍好男人和孩子，就是全部价值体现。传统观念把女性孤立于社会之外，为此 20 世纪西方便出现了关于女性主义源源不绝的思考。

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十分普遍，非常持久的。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男性之下。19 岁时的波伏娃曾发表过她的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另一位被誉为 20 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的英国女作家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结婚生子从来不是女人的义务，而是一种权利。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至于这份自由是否值得你背负世人的疏离、道德的谴责，你是否有这般勇气去承受，只能自行掂量了。

按蓉子的环境，她当时对女性主义、西方女权运动，对波伏娃和伍尔夫未必有多少了解。但与生俱来，由于女儿身，所遭受的一切屈辱，让她天然同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坚持选择自己的生活，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她每天起早贪黑勤习写作，甚至彻夜不眠在厨房赶稿。伍尔夫有句名言，女人想要写作，必须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还要每年 500 英镑的收入。蓉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更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1976 年，她到新闻杂志社当编辑，又受教育出版社出版《电视周刊》邀约写社会信箱，以及不定期地主办座谈会、采访影艺界人物。当时她像钟点工一样，有时在电视台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抄写剧情，在《星洲日报》的专栏“她的访员手记”由此产生。1977 年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编选了她历年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文学月报》及《新加坡文艺》等副刊杂志，发表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星期六的世界》，选入 30 多篇散文随笔，主要是她 70 年代初期发表过的文章。蓉子的作品取材于生活，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文笔简明直接，叙事有己见，状物有特色。作为家庭主妇和初学写作者，蓉子的社会触角和视野难免受限，不少篇幅中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取材直接或间接多与自身相关，诸如家庭生活、孩子、丈夫、邻里、养父母、病痛、花草树木、亲情友情、生活感悟，以及对写作的想法，等等。

同年的 4—8 月，短短数月间，蓉子开始撰写三个专栏：《南洋商报》副刊《新妇女》版的“主妇随笔”，《星洲日报》妇女版，以及“江采蓉漫笔”。当时在新加坡，她是第一个写专栏同时也写小说的作家，很罕见两家华文大报同时采用她的专栏与小说。翌年，紧跟着《星期六的世界》，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初见彩虹》问世。该书出版后短短一周便售罄，很快再版。《初见彩虹》出版第二年，更有《蓉子随笔》和小说《蜜月》《又是雨季》，脚跟脚紧随着同读者见面。

1978年,蓉子有一篇小说《凯凯的日记》荣获全国小说创作首奖,颁奖者是第三任总统蒂凡那。新加坡著名作家黄孟文称道说“在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界,蓉子的名字相当响亮”。同年,她被邀请代表家长,亦是唯一的作家,上电视直播节目,与总理李光耀对话,讨论“两种语文的教育政策”。

蓉子本希望婚姻改变命运,不料仍然是苦海无边,没有回头上岸。逆境恶缘,20年的婚姻生活满含痛苦辛酸。每日以大葱萝卜干为三餐,经常被遣去杂货店为丈夫借赌本……她真想跳进大海,一了百了,寻求彻底解脱。后来终于解除了这段苦多乐少的婚姻,立志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她有个信念:“20岁以前,如有苦难,不是我的错。20岁以后,再有苦难,一定是我之过。”是艰难困苦和不绝的厄运,磨炼和造就了今日的蓉子。正如法国文豪大仲马所说:“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基度山伯爵》)雨果亦有同样的断言:“坚强,稀有的性格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苦难,经常是后娘,有时却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悲惨世界》)

从蓉子成长和经历看,她不畏艰难,勇敢坚韧,她的作品也展现作者自身的这种品格。

二、回国探亲后:生活重大转折为其创作注入新养分新活力

蓉子8岁随养父下南洋。地窄人稠,天灾人祸,靠海的地理之便,被动或主动下南洋挣钱养家,是清末民初,百多年闽粤一带百姓不得已的选择。

1983年,蓉子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的母亲获准到新加坡探亲。从她家乡到新加坡探亲的,她母亲是第一人。可见蓉子的一片孝心。如果说,8岁下南洋为蓉子开启了另一种人生,那么,母亲的到来,不啻是给自己女儿搭了一座桥。踏着这座桥,从此蓉子与故乡的联系日益密切,生活发生了又一次重大转折:新加坡—中国,中国—新加坡,不绝往返的崭新人生,为她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和动力。生活痛苦也罢,快乐也罢,她离开中国潮州故乡已经27年。被连根挖起迁徙的一棵小树,已经在移植的异国他乡成长。但无论树长得多么高大,她的枝叶总不忘向根部垂望。母亲探亲离去后不久她就回潮州探亲,从此她不绝往来于新加坡和中国。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无论前期创作,还是探亲后的创作,都与她的生命历程密不可分。

回国探亲后,她曾经营花岗石生意、房地产中介,开办信封厂等生意,生活得到保障,独力供两个儿子读书成才。同时,她“文痴欲狂”,小说、散文、信箱,什么都写。当年新加坡,她是唯一同时在三家华文报写专栏的作者,高峰时期每周7篇,其中有答复读者的信箱,有与老作家的“唱双簧”,还有“中国行”“老潮州”及“蓉记小厨”等,自称“文坛杂牌军”。这些作品按题材大致分为:

(1) 反映爱情婚姻的社会信息。爱情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容和主题。蓉子更多切身感受,对此类题材,信手拈来,故其作品相关涉猎颇多。其艺术表现比较直接。

早期的小说《轨外》,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单线条的故事结构,明明白白的警世意

义。当时曾被改编成电视剧。更多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不是《轨外》式的虚构故事，主要见之于“秋芙信箱”。她曾为新加坡《电视周报》《联合晚报》《电视广播周刊》《新周刊》《新明日报》等报刊，主持“爱情与生活信箱”（即“秋芙信箱”）长达30余年，深受大众欢迎，名闻狮城。这些信箱文字结集成《未了情（一）》《未了情（二）》《你永远是最爱吗？》和《别碰！那是别人的丈夫》。为行文方便，姑且将其统统简称为“信箱文集”。

“信箱文集”透过婚姻、爱情和家庭中形形色色的问题，直接贴近现实生活和社会脉搏，反映社会众生相。她在充当心理医生角色回答问题时，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语言风格，都深深打着“蓉记出品”的烙印，特色十分鲜明。可谓“笔下离经叛道，别有笑料”的劝善金科。信箱中的语言特色，显然受潮汕一带民间歌册的影响。蓉子的“秋芙信箱”因其涉猎广泛社会问题，释疑解惑大胆敢言、切中肯綮，文笔机智幽默、情采并茂，所以其效果作用和影响力几乎盖过她的其他作品，收获了不少好评。

（2）道不尽中国情。蓉子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她眼里的中国。《中国情》《百万之爱》《芳草情》《悠悠中国情》《老潮州》，以及《戏言》《蓉记小厨》，即此之属。这类作品亦结集自报纸副刊，具有副刊文章的基本特点：紧贴时代、紧贴生活、紧贴作者的步履和视野，为文短小，轻松活泼。

自1984年回乡探亲之旅后，她的身影便日渐在中国，有时甚至一年之中，在中国的时间多过新加坡。探亲、文化活动、经商，三位一体，相互牵绊，潮州、汕头、揭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广西、河南、吉林、西安……到2000年年底，她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接触过各类官、商、文化人及普通民众，体验过不同层次的丰富多彩生活，不免文思泉涌，话语滔滔。蓉子从小远离故乡，却未因数十年隔离断了亲情血脉的相牵。她一旦走近家乡，便如老房子着火，对潮州生出遏制不住的好奇和深情热爱。为写“老潮州”专栏，1998年她回潮州寻寻觅觅，认真做了田野调查，将老州的历史传说、文物掌故、豪宅建筑、工匠技艺、巨商宿儒、名人雅士、街谈巷议、民间俚语、贞女节妇、戏曲故事、恩怨福报、惩恶扬善、轶闻趣事、乡里风俗、语言特色、饮食习惯、山川风貌等等，整理记录，细致入微，加之自己的解析品评，通过报纸专栏一篇篇介绍给读者，然后结集成书《老潮州》。她曾为新加坡国庆献礼电视剧《潮州家族》当顾问，而耽误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学业。

这个期间的创作，与上述婚恋题材和中国题材关系不大的还有两书。《烛光请》是作者办养老院的副产品，生动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远离沸腾生活、远离青春活力、远离子女家庭的一些病弱老年人，被边缘化的另一种残阳夕照的生存图景。《阳光下的牢骚》是她既往生活和感情篇章的选集。

三、他乡故乡：笔笔正能量 满满家国情

2000年，蓉子的长子许文威被派任新加坡驻沪总领事馆，任教育与文化领事。她作为家属随行，开始长住上海，从此她的人生又翻开新的一页。她戏称自己为“沪部尚书”。“沪”是上海市的别称，“尚”有“尊崇”之意。显然，蓉子的“沪部尚书”乃自谓住在上海的爱书人。

常驻上海后,照顾三个幼小孙儿孙女之余,写专栏、兼职多种社会工作,参加文学会议和新加坡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中国和新加坡,一个是她的故乡,一个是她的家乡。站在中国的视角,她既是“故乡人”,也是“他乡人”。无论“故乡”还是“他乡”,一笔写不出两个“乡”字来。乡乡筋脉骨血相连,两国的分量在她心里,几乎难分伯仲。在中国,她为地震、为自然灾害、为贫困儿童、为家乡办学,不断慷慨捐助,屡获各种殊荣。最令她难忘的是,2015年9月27日受中国国务院侨办之邀,出席66周年国庆招待会及登天安门城楼观夜景。

在上海开办的“蓉记餐厅”结束后,她探亲和生活在中国,各种缘由,曾经去过多次医院,发现中国缺乏方便病患的全科诊所。新加坡诊所十步一间,到处林立,十分方便。中国人只信仰医院,大病小病,头疼脑热,全往三甲医院挤。蓉子怀抱一个梦想:把新加坡的全科医疗模式搬进中国。家里的二儿夫妻皆是专家级医生,是她开办全科诊所的有利条件。她以坚强的毅力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开办了“新宁诊所”。一应经营大小琐细事务,她个人一力承担。2016年3月,她的诊所挂牌上市,这是中国第一家上板的医疗门诊,可谓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新宁诊所从一间开到4间,又落户广州。医德医术颇为病患推崇。

蓉子商务和社会活动繁忙,却仍坚持写新加坡的几个专栏。她常为赶稿彻夜不眠,飞机上,甚至卫生间马桶盖上,都能作为她赶写专栏文章的座席。她身在商海,心系文苑。常驻上海至今,出版主要的著作有《上海七年》《文化钟点工》《中国故事》,主编《鱼尾狮之歌》《玄奘之路》《品味上海》《品味潮汕》《侨批里的中国情》等。

《上海七年》,内容富赡,姿彩斑斓,以轻松灵动的笔墨,短小精干的篇幅,生动描述了蓉子一家人在上海的生活情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地理、人情风俗、饮食男女、春夏秋冬等,比较全方位地展现了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的风貌。她对中国有赞扬有批评,赞扬发自内心,批评缘于爱之深。她为中国改革开放由衷欢欣赞叹,对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其情绪起伏,缘于个人情怀和探索,与一般旅人或对中国抱成见者的视角和态度有别。

《文化钟点工》是她在新浪博客5年间200多篇博文的结集。不少文章曾同时见之于新加坡报章,亦主要反映她的多姿彩的生活。《中国故事》是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为其历年关于“中国”的文章结集。说不完道不尽的中国情。《品味上海》和《品味潮汕》是她分别协助上海和广东侨办组织的海外华文作家文化活动,由各位作家撰写文章的结集。蓉子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久别祖国的海外游子重新认识中国。《鱼尾狮之歌》是她作为中国新加坡建交20周年的献礼,搜集精选了新加坡各类文体的诗文佳作。《玄奘之路》是她精选新加坡曾驻中国的华文作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辅以国内相关学者的评文。新、中两国的文化人的一次合体出现,寓意着文化的归属和认同。

同《中国故事》同时间出版的,是蓉子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教授策划,由蓉子主编的《侨批里的中华情》。侨批是清末民初百多年下南洋的闽粤一带百姓写给家乡亲人的信,因为此信同时也是汇款单,故有别于一般只有文字的信件。闽粤发音“信”作“批”,故称之为侨批。无论是写给家乡亲人的信还是同时寄的款物,其中满含着亲情、乡

情、中华情，总之“侨批”的点点滴滴皆关情。蓉子策划主编该书并邀请写作者赴潮汕共庆该书的出版，体现了满满的家国情怀。

四、结 语

蓉子的写作，可以简单分两个时期。基本以她回乡探亲为线。前一个时期，她生活在新加坡，主业家庭妇女，生活圈子狭窄，写作的内容多与家庭、婚姻、孩子、身边琐事及社会闻见感受为主。与她同时期，新加坡一些比较著名的女作家，受过高等教育，有不错的职业，在写作题材方面同蓉子类似。

女作家何濛说：“如果要女作家担负起一个重大的文学使命，狂呼时代的心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深入社会，批评现实和暴露黑暗，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①蓝玉坦言：自己的文学“圈子仍然是狭隘的，内容仍然是贫乏的甚至文笔也是粗劣的，幸好，在这些东西里，有我真挚的感情，真实的生活痕迹，它记载了我的笑，我的泪，还有我的满足和不满足，是我人生旅程上一段想抹也抹不去的生活记录。”^②虽然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们的创作题材比较普遍受限，但她们拥有特殊眼光和特别感受，笔触敏锐，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创作成绩不可忽视。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女作家，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身兼多种身份。工作压力，繁杂家务，生儿育女的精神和时间耗费，蓉子还加上生活艰辛困苦。在文学日渐式微，尤其80年代初，新加坡将英文列为国家第一语言，母语列为次要，华文学学校纷纷关停，华文普遍遭受冷遇，无疑使蓉子在内的华文写作者，受到了不小打击。但她不抛弃不放弃，依然进行华文写作，这便超出了个人喜爱、宣泄和改善自我的愿望，而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坚持和捍卫。

中国改革开放，她追着母亲的脚印回乡探亲后，一种崭新的生活、崭新的社会状态、崭新的各色人等，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飞跃，不断涌入她的脑海，她的视野、眼界大为开阔。加之，她完全走出狭小的家庭，独立勇闯世界，交游广阔，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等，为她的写作注入了空前丰富的内容。钱钟书夫人杨绛说过这样的话：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2017年7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史无前例地出版了一本硕士生论文：《潮籍作家蓉子与新中两国互动》，在发布茶会上，大学校长陈永财、陈燮荣大使、白振华议员、陈荣照教授、何乃强大医、吴多深总裁、陈再藩作家、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黄锦西大律师、国家档案馆素春等社会名流、政商要人、文教彥士，济济一堂，足见各界对她的肯定。

蓉子永远以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行进在路上。

注释：

^① 何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区域女作家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南洋商报》1982年3月

22日。

② 蓝玉：《西窗晨语》后记，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白舒荣，女，编审，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文学》杂志原主编，主要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试谈非马诗歌艺术追求与思想内涵

◎ [澳]何与怀

摘要: 本文试谈非马诗歌艺术追求与思想内涵,认为:反逆思考是非马诗作的重要特色,比现代更现代是他一生致力的诗歌艺术追求;更认为:非马的价值,在艺术手法技巧之上的,是其“比写实更写实”所表达的深刻的思想性。民族悲剧深深渗透他的诗心,他对民族苦难根源的探问发人深省。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非马通过他承传终极关怀的作品,建立了一个值得称颂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富于正义、充满人性的世界。

关键词: 反逆思考 非马意象 民族悲剧 普世价值 终极关怀

非常有幸,由于参加一些国际文学会议,很多年前就结识了非马先生这位享誉世界华语文坛的“业余”诗人。私底下,我们不时电邮往来,通常是他传来诗作让我欣赏,我则传去文章向他请教。记得相处最密集的是2008年3月那次。他与夫人应邀一起到悉尼访问,立时掀起一阵旋风。应文友们要求,我在《澳华新文苑》刊发了一期“非马专辑”,并与澳洲酒井园诗社以及“彩虹鹦”网站一起举办了几场座谈会、聚餐会,以欢迎他们的光临。其情其景,正如悉尼诗词协会会长乔尚明以金代刘著《月夜泛舟》、清代姚鼐《金陵晓发》、宋代王沂孙《高扬台》《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以及唐代高适《别董大》各诗集句所描绘:

浮世浑如出岫云,风烟漠漠棹还闻。
如今处处生芳草,天下无人不识君。

多年结交证实,这位“天下无人不识”称为“非马”的诗人,的确,此马非凡马。这是一匹长途奔驰而壮心不已的骏马。早在1978年,他在《马年》一诗曾经这样写道:

任尘沙滚滚
强劲的
马蹄
永远迈在
前头

一个马年

总要扎扎实实
踹它
三百六十五个
笃笃

这是自信,也是自许,更是自励。风入四蹄轻,现在又过了几十年,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笃笃马蹄声,总是不绝于耳,总是在我们心房回响。

一、反逆思考:非马诗作的重要特色

最初看到“非马”的名字——好像是30多年前了,总之是认识非马本人之前许多年,首先进入我脑海里的自然是“白马非马”这个典故,是战国末年名辩学派的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公孙龙和他的著名哲学论文《白马论》。我自然想到“白马非马”那个众多哲学家特别是先秦哲学家探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继而我又知道非马这位诗人是一位高尖端核工博士。他在台北工专毕业后,于1961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马开大学机械硕士与威斯康星大学核能工程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能源部属下的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能源研究工作多年。

因此,我一直最感兴趣的是:经严谨而又长期科学与工程训练的这位诗人与众不同之处何在?

的确,正如许多论者所言,对于许多诗人与诗论家来说是尖锐对立的诗与科学,在非马那里却得到了和谐与统一:文字简洁,旋律短促,是非马诗句的特征,十足表现科学家的干净利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以对科学无穷的探求的姿态写诗。他的诗既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又结合现代文学的先进的表现手法和批判精神,用凝练浓缩的语言营造惊奇的意象,表达具有多重内涵和象征的内容;他不但对社会人生热切关怀而且以冷静的哲理思考见长,两者相得益彰;人们特别用一个常常形容科学家思考方式的词来评论他的一些诗作:“反逆思考”。

试看非马写于1976年的《共伞》这首诗一个片断:

共用一把伞
才发觉彼此的差距

但这样我俯身吻你
因你努力踮起脚尖
而倍感欣喜

短短5行,34个字,却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塑造了一个饶有趣味而耐人寻味的意境。这种艺术魅力除了取材立意外,应归功于“先抑后扬”的突转结构法。恋人无意中

发现“差距”,有些扫兴;但当读者正要顺此思路往下走时,突然出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差距”,一人低头俯就,另一人踮脚趋迎,爱情经过“差距”的历练而愈显纯真,自然使人得到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而“倍感欣喜”。这就是非马的“反逆思考”,先将读者的思路引向与主旨相反的方向,然后突然扭转到诗人力图表达的正确方向上来,因而获取新奇独特、深刻有力的效果。

这种手段在《鸟笼》一诗中用得最为精彩: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还给
鸟
笼

谁读了此诗都会极其惊奇和感叹。采用笼中鸟以喻失去自由是一个相当古老而平常的意象,但在非马看来,把鸟笼打开,让鸟飞走,这不仅是把自由还给鸟,更是把自由还给鸟笼。诗人怎么想到强调后者,而且这么强烈?!这真是画龙点睛的惊人的神来之笔!这样寓意不凡的“反逆思考”,真让人叫绝。

这就开拓了审美与思考的另一空间。这是一种双向的冷静的审视。在一般人的眼里,“鸟笼”是自由的、主动的、掌握别人命运的。但现在非马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浅薄的。事物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又互相制约的动态系统,而不是绝对单一固定、不与他者发生任何关系的存在物。鸟被关在鸟笼,鸟固然失去了自由,鸟笼也失去了自在的自由,不自由是双方的。许多论者都指出,以此哲理来审视人生现象,便会因诗人新奇的想象的触发而引起多重的联想。可以把“鸟笼”和“鸟”的形象看作哲学上的代号,象征两个互为依存互为对立的事物,并尽可以见仁见智,将它们解读为诸如灵与肉、理智与感情、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奴役、社会与个人、人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足的本性、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等相反相成的概念。的确,顺着这个思路,人们其实可以恍然大悟:当社会中的某一层级、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人自觉或非自觉地担负起监视、限制、管教另一层级、另一领域内的人时,实际上他们也走上了自身的异化,他们同时也失去了本身应得的自由。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非常清楚,禁锢的施加者在钳制他人的过程中,其实自己也往往陷入无形的囚笼;唯有松解禁锢,还他人自由,禁锢者也只能走出自囚的牢笼。没有自由便没有和谐——这是起码的真理。

非马诗歌意象简练,却又内涵深广丰富,决定了人们对其诠释和演绎的多元化,《鸟

笼》一诗是一个最好的标本。这首杰作写于1973年3月17日,在台湾地区《笠》诗刊第55期(同年6月15日出版)发表后,在台湾引起轰动,后来还入选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编注的《国文选》。此诗一直是海内外论者品评非马作品的一个重点,被看成是“反逆思考”或“多向思考”的经典性作品。

许多年之后,非马又写了两首相关的诗。前者是写于1989年4月27日的《再看鸟笼》,同年7月1日发表于《自立晚报》副刊。他这样再看鸟笼: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还给
天
空

另一首是《鸟·鸟笼·天空》,写于1995年2月2日(同年10月发表于《新大陆》诗刊第30期;10月21日发表于“中央”副刊)。诗这样写道:

打开鸟笼的
门
让鸟自由飞
出
又飞
入

鸟笼
从此成了
天
空

关于《鸟·鸟笼·天空》,非马告诉我,这首诗是为一位在美国南部一个小镇上经营杂货店的诗友写的。他为日夜被困在店里而烦躁痛苦不堪,我劝他调整心态,打开心门,把它当成观察社会人生的小窗口,同时偷空写写东西。后来他大概还是受不了,干脆把店卖

掉搬离小镇，到休士顿去过寓公生活。在《再看鸟笼》附记中，诗人让人很出乎意外地写道：多年前曾写过一首题为《鸟笼》的诗。当时颇觉新颖。今天看起来，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为把鸟关进鸟笼，涉及的绝不仅仅是鸟与鸟笼本身而已。非马何以将业已还给了鸟笼的自由收回，改而还给天空？正如居住旧金山的美国华裔诗人刘荒田认为，非马是把鸟笼放到广大的背景——天空去了，天空的自由，是靠鸟的自在飞翔来体现的。因此，鸟笼剥夺了鸟的自由，归根到底是剥夺了天空的自由。

非马原名马为义，取笔名“非马”，是开玩笑说自己是人不是马，也免不了让人联想到“白马非马”这一个典故，但最主要的是含有跟他诗观相关的更深层的意义。他希望“在诗里表现那种看起来明明是马，却是非马的东西。一种反惯性的思维，一种不流俗的新诗意与新境界的追求与拓展”。他对自己诗写的追求就是：“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所谓“比现代更现代”，我觉得主要是他营造意象的手法非常现代、非常新颖独特。人们发现，非马诗中的意象大都单一、纯净，他绝不作烦冗的堆叠，他执意让意象压缩、跳接，让意象产生非确定性与多层意义，使他的诗歌获得外部形貌简约而内部意蕴丰富的诗美。顺便说，正因如此，他的诗译成外文时，可以和中文原诗一样完美，既没有杂质糅入，也不会让原味消失。还有，他有意识地反逆人们平常的观物习惯思维习惯，这是他求新的独特方式。他要从平凡的事物中找出不平凡，从而制造惊奇。创新虽为艺术的普遍法则，但通向“新”的道路却因人而异，从这里往往显示出作者的独特风貌，其高低雅俗，深刻或平庸，一比便了然于心。刘荒田说，他在解读上述这三首诗时，不禁想起了禅的三个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确，就这三首诗来看，通过诗人营造的意象，诗的意境，诗的境界，层层递进，每层都有独特的风光，实在是迭生惊奇，令人把玩不止。许多人都说了，非马的诗歌作品都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感及隽永的哲思，简洁纯朴的形式，负载着多重含意及可能性，常予人以意料不到的冲击。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专有名词：“非马意象”。

二、民族悲剧深深渗透的诗心

非马的价值，在艺术手法技巧之上的，是其“比写实更写实”所表达的深刻的思想性。就让我们从他写于1981年的《罗湖车站》(返乡组曲之八)说起。当年，他经过中国广东省深圳和香港边界的罗湖车站，写下这首兼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诗篇：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个钟头前我同她含泪道别
但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极了我的母亲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这两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这拄着拐杖的老先生
像极了我的父亲

他们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并不相识
离别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亲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着拐杖的我的父亲
彼此看了一眼
可怜竟相见不相识

非马 1936 年生于台湾台中市,不久随家人返回祖籍广东潮阳,1948 年再到台湾,1961 年到美国,迄今一直住在芝加哥。而他的双亲,至写此诗时已经离散 30 多年,一个住在台湾台北市、一个住在广东澄海县城。显然,他的家庭,又是时代悲剧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正如《罗湖车站》所揭示的深层含义。

非马在罗湖车站看见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像极了他的母亲父亲。这也许不过是他潜意识的幻觉。因为他多么希望他们是他的父亲母亲,多么希望他们能在同一个月台上相遇。但是,他立刻想到,他父母亲即使真的相遇,彼此也只会视同陌路,失之交臂。全诗语言通俗浅显,但意境却非常深沉凝重;白描淡写的诗艺相当传统;亦幻亦真甚至荒诞的意象却很现代。虽是写一家平民百姓 30 多年的离愁别恨,但是,谁又能认为诗人仅仅是表现自我一家的命运呢?诗人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希望和失望、无奈和悲哀,显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代表了由于两岸分离而骨肉长期离散的千万个家庭。这一幕以边界的罗湖车站大舞台演出的悲剧,饱含着诗人真挚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

《罗湖车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台湾文坛兴起的“探亲文学”热的先声之作,堪称“探亲文学”的序诗。而在写作《罗湖车站》之前,于 1977 年,也就是非马在刚刚跨过 40 个如梦春秋之后,诗人更写出曾被许多浪迹天涯的华夏游子奉为抒吐乡愁的经典之作的《醉汉》: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条
曲折
回荡的
万里愁肠

左一脚
十年
右一脚
十年
母亲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来

此诗把醉态十足的写实与乡愁无限的写意巧妙地结合起来。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这个借酒浇愁的游子，离家门近时却寸步难行。“短短”的巷子，竟然有“万里”愁肠的心酸。“巷子”与“愁肠”的比照，把走近门口将要与亲人相见的一段历程强化了。诗末尾的一字一句，更暗示了步履的艰难，以及路程的遥远和时间的流逝。这种近乡情怯的醉态，极为令人黯然神伤。

非马特能致力于刻求表象以外的意境。因此，一条巷子竟是万里愁肠，一脚竟然十年，这是超现实的非写实，但又比写实还写实。人们不禁对这首诗作多重意义的理解。所谓“醉汉”，可以是真正醉酒后酒入愁肠而怀乡，也可以是表现因思乡情切以致迷离恍惚，如醉如痴；其醉态可以是实写走近家门的一种心情，也可以是表现醉汉般恍惚迷离的幻觉。许多人更是把《醉汉》看成一首寻根诗，诗中的“母亲”象征诗人魂一夕而九逝的祖国。这样，“醉汉”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流落异乡的游子，这还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这表象的内涵是抒发和反思民族分裂的乡愁。人们阅读此诗时，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当时已经冰封了几十年的台湾海峡。这“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的漫长艰难的步伐，正是动荡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蕴含着咫尺天涯的悲剧意识。而“我正努力向您走来”，是对母亲的倾诉，也是对祖国的倾诉，倾诉抑制悲情叩开乡关的努力，倾诉摆脱内心困境和外界现实阻挠的曲折的努力，倾诉时代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非马一次回答提问的时候，说出一段意味深沉的话（贝《答问》，刘强著《非马诗创造》，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

写诗是为了寻根，生活的根，感情的根，家庭和民族的根，宇宙的根，生命的根。写成《醉汉》后，仿佛有一条粗壮却温柔的根，远远地向我伸了过来。握着它，我舒畅地哭了。

《醉汉》这首仅仅只有40个字的小诗,正是诗人洒下的一枕怀乡梦国的清泪,这首经典式作品的每一个字,都具有金石般的分量。甚至可以说,它的意境和象征,堪比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巨著。它把具体的现实性与严酷的历史感深刻地统一起来,那种酸甜苦辣的心头滋味,那种回肠荡气,直达心灵,震撼心灵。

非马写作《罗湖车站》时,罗湖车站几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接触的仅有的交汇点,而事实上那时海峡两岸的亲人还得不到从这里进出的“来去自由”。至于写《醉汉》时,中国“四人帮”刚刚倒台,开放改革的国策更是连影都没有。今天,三四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怜竟相见不相识”的现象可能没有了——该相见的大都早就相见了,或者来不及相见早就去世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远未结束。“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这种悲剧还在继续。澳华作家杨恒均曾在北京当时的《天益网》上发表了一篇他于2007年12月29日在台湾台中市亲身实地考察后写就的随笔,标题是《台湾海峡为什么越来越宽?》,这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的文章对台海两岸状况感慨万千。因此,即使今天,相信每一位吟读非马《醉汉》和《罗湖车站》等诗作的人,还会禁不住低回反思,感叹不已。

三、民族苦难的根源何在? 非马的探问

黄河与中华民族紧密联系。这条古老的大河承载着华夏历史,也见证着中国人的苦难,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和苦难汇聚的河。我注意到,非马作了两首《黄河》。

前一首溯“源”,作于1983年4月5日,最早于当年7月22日发表在台北的《联合副刊》:

溯
挟泥沙而来的
滚滚浊流
你会找到
地理书上说
青海巴颜喀喇山

但根据历史书上
血迹斑斑的记载
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
其实源自
亿万个
苦难泛滥
人类深沉的

眼穴

此诗两节，第一节运用极为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黄河挟泥沙滚滚而来的气魄，但在第二节诗结尾处却用超现实的幻觉手法，把黄河的源头写成亿万个人类苦难泛滥的眼穴。地理书上的“源”和历史书上的“源”，两相比较，得出诗人的独特发现——发现被俗常目光埋葬了的诗意。这样，如论者指出，就跳出了“实像”的河，不落于一般写黄河的旧窠臼，甚至包括习惯的“母亲”意象，而进入了“灵”的层次：人类苦难历史之“河”，出“虚”，肉眼不可见。原来，“苦难”之“源”，如“眼穴”意象所喻示，是“人为”的，是历史上各种腐朽罪恶的专制制度造成的。

后一首析“流”，反而是先作的，1975年1月12日写成，最早发表在《笠》诗刊第70期：

把
一个苦难
两个苦难
百十个苦难
亿万个苦难
一古脑儿倾入
这古老的河

让它浑浊
让它泛滥
让它在午夜与黎明间
辽阔的枕面版图上
改道又改道
改道又改道

诗人不直接写从黄河中看到了苦难，而是“把”苦难“倾入”，突出了苦难的积压，突出表明了这条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承受苦难的河。“苦难”的量化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数的量化。从“一个苦难”到“亿万个苦难”逐渐递增，表现了从个人到民族，从时代到历史苦难的普遍和久远。“苦难”的反复重叠几乎就像一座在成长的大山压过来，最后发展成一个种族的记忆，让全世界的华人都会联想起母亲河的灾难，灾难的场面与情绪：战争烽火、黄水患难、流离失所、无穷哀怨……

第二节则突出剖析“苦难”之“流”。这里用了三次“让”这个词，就像上节“把”苦难“倾入”一样获得同样的效果。诗末“改道又改道/改道又改道”的意象叠加最为使人震撼。这不仅仅在于抒发情感，而是要唤起读者强烈关注问题的严重性。自以为是的人类把追求表面的发展看为第一要务，一直在糟蹋黄河一直在糟蹋自己的居住环境。这个叠加的意象，紧扣历史和现实。对“苦难”实行“改道”的苦难，只是使“苦难”一再加码，而“改道”却

不改其“辙”，只是重复历史的回头路。真是令人深思！

两首《黄河》是大气深沉内涵丰富的诗章，具有雄性的美学特征，具有厚重的时代感和历史感。非马在1982年还写了一首题为《龙》的诗，外表看来和《黄河》很不同，但我发现其思想内涵是共通的：

没有人见过
真的龙颜
即使
怨卿无罪
抬起头来

但在高耸的屋脊
人们塑造龙的形象
绘声绘影
连几根胡须
都不放过

非马这首《龙》，是一首小诗，仅有10行共49个汉字，但它显示了非马诗作强烈的社会性，而且别具一格，而且甚具深意。如论者所言，诗一开头，诗人便以突兀峭拔的否定语式将龙这一千古神物推上了曝光台，这种开门见山式的表达，如一把利剑，一下子戳穿了东方文化尤其是华夏文化的神秘面孔。的确，只活在古老的传说之中的“龙”，有谁见过它的真容呢？即使是“怨卿无罪”的所谓真龙天子，也只是古代和现代的迷信而已。然而，构成强烈的反讽的是，人们却偏偏四处塑造龙的“光辉”而且具有威吓性的形象，连“几根胡须都不放过”，就像世人创造“神”然后对其顶礼膜拜，中国人也创造“龙”以作为顶礼膜拜的神物。这不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异化吗？今天“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尊贵的图腾。虽然“龙”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积淀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但谁能否认，“龙”最重要的是象征权力、专制、绝对命令——龙是天上的权威，自命的真理，高高在上。如果说古老的华夏历史最初有一个自由的龙羊对立而又共处的时代，那么，后来就进入了龙愚弄、统治、奴役羊的大一统时代。非马这首诗，如一声洪亮的警钟，将人们从以“龙”为内核的那种负面传统文化所衍生的虚妄与自傲中震醒过来，让人仿佛觉得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在震颤。诗人在这里赋予诗的意象以民主与科学的哲理思考的内涵，对迷信和愚昧予以鞭挞，毫无疑问具有值得称赞的时代精神和当代意义。

四、弘扬人道主义 承传终极关怀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说说。

1978年，非马从美返台，在一次谈及“理想中的好诗”时，明确指出：“对人类有广泛的

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首要条件……对一首诗我们首先要问,它的历史地位如何?它替人类文化传统增添了什么?其次,它想表达的是健康积极的感情呢?还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对象是大多数人呢?还是少数的几个‘贵族’?”(贝莫渝:《诗人非马访问记》,《台湾日报》副刊,1978年9月1日;《笠》诗刊第89期,1979年2月15日)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非马通过自己的作品建立了一个值得称颂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富于正义、充满人性的世界。

让我们读读他写“给濒死的索马利亚小孩”的《生与死之歌》:

在断气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后一次
吹胀
垂在他母亲胸前
那两个干瘪的
气球
让它们飞上
五彩缤纷的天空

庆祝他的生日
庆祝他的死日

这首写于1992年8月15日,同年首先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0月号 and 台北10月27日《人间副刊》的诗,是一篇催人泪下的作品。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饥荒中的非洲儿童,那种眼大无神,形销骨立的画面,使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非马的这首诗,正是以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为主题。这个索马利亚小孩临死前,渴望母亲的乳房能胀满奶水,甚至饱满得像要腾空高飞的气球。把乳房比作气球,真是奇思妙语,却符合小孩天真的幻想,表现了他对果腹、对生存的强烈渴望。诗最后用“生日”和“死日”对称,从而把悲剧气氛推向高潮,成为撼动读者情感的巨大的冲击波。诗人写出一个天真却是濒死的小生命,那么渴望美好却又那么幼小、孱弱,那么短暂的生命,充分显示了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的深切同情,深刻地实践了自己对诗歌的“社会性”的承诺。

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再加上人为的因素,特别是统治者贪婪腐败又治国无能的因素,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乱频繁,饥馑连年,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人们说,非洲是“被上帝遗忘”的地方,那么,像是美国,这个“上帝给以青睐”的地方,就没有悲伤吗?居住在这个国家的非马,以他的诗歌明确告诉我们,悲剧到处都会发生。

这是他写于1985年的《越战纪念碑》:

一截大理石墙
二十六个字母
便把这么多年青的名字
嵌入历史

万人冢中
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
终于找到了
她的爱子
此刻她正紧闭双眼
用颤悠悠的手指
沿着他冰冷的额头
找那致命的伤口

这是一个具体的场景：一位老妇在碑石上寻觅无可寻觅的爱子，她把冰冷的大理石幻觉成爱子的“冰冷的额头”，而且硬不死心地要找出“那致命的伤口”。这种哀伤臻于极顶时的痴心妄想虽然无言可是却发散出强大的控诉力量！正如论者说，这首诗所突现的心态情感极富现代人的时代特征，又由这时代特征而在历史进行中获得了时空纵深感，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这首具有“现代感”与“历史感”双重性质的诗章，统领大时代的风雨硝烟，统领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统领无数亲情的悲歌。

如果说，非马对母国文化的无限依恋凝成他创作心理上的民族情结，那么这种对全人类的关切热爱意识便是他的“人类情结”。他的诗中，常常出现意蕴的层层递散与深化，由一己、一家而推及全民族以致全人类，这不但是民族情结的漾散、扩张，而且是它的升华与入化。

对于人类，为祸之烈，莫过于战争了。诗人对于人间这个散布仇恨、自相残杀的魔鬼深恶痛绝。《越战纪念碑》是对于“人类文明一种自身反省”的卓越贡献。它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它像警钟一样将告诫悬挂在人类的头顶之上：远离战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去触摸战争。

非马以《电视》荧光幕隐喻人类奇诡并可悲可叹的记忆——即使对最受诅咒的战争：

一个手指头
轻轻便能关掉的
世界

却关不掉

逐渐暗淡的荧光幕上

一粒仇恨的火种
骤然引发
熊熊的战火
燃过中东
燃过越南
燃过每一张
焦灼的脸

荧光幕上一粒小小的荧光，会逐渐展现世界，而一粒“仇恨”的火种，也会“骤然引发熊熊的战火”。战火会燃至世界任何一个地域，这些会不断地改变，但只有一种是不受肤色、种族、国籍的限制而改变的，那就是“每一张”受难的焦灼的脸。这是“关不掉”的真相。但是有些人就是想关掉，像关掉电视机一样，动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便把“世界”关掉。事实就这么残酷。人类就这么愚蠢。《电视》这首诗的讽喻，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社会的关切和批判。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倡导“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对人存在的根本关怀，同时也体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它与自由、民主、博爱、科学等当今普世价值是相通的，都是超越一切民族、语言、肤色的差异，超越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超越一切时代和地区的差异。我们从非马的诗章中，也分明看到中华文化的终极关怀的承传与当今普世价值的弘扬。

（何与怀，男，1941年出生，籍贯广州，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曾任教于广州外国语学院，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现定居澳大利亚悉尼，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问题和华文文学研究）

朱寿桐的从俗思维和脱俗写法

——析论其散文《从俗如流》

◎ 黄维樑

摘要：朱寿桐是学者，有其学术创意；他写散文，也有其创意。其散文《从俗如流》即如此。此文写朱母在乡间去世后丧礼的“恶俗”景象：灵堂播放假哭磁带，种种配置“怪异别扭”，吹鼓手哇哩哇啦在灵堂外吹打弹拉。朱寿桐读过、看过肃穆素雅的文明丧礼，实在看不惯乡下“丧事的排场和做派”。不过，由于对母亲死亡的悲痛，以及对“恶俗”景象所隐含的孝思的体会，朱寿桐“从俗如流”地接受了这一切。此文写景叙事，据事抒情，融情入理，层次转折分明，最后归于主旨。本文连结鲁迅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的行为，加强了作品的文化底气，更蕴含着一种民俗学、心理学的深层探索，这是《孤独者》所不触及的。

关键词：朱寿桐 散文 文明丧礼 乡下丧礼 恶俗

朱寿桐教授的散文集《从俗如流》，可说是这位论著丰富的学者的副产品。^①1986年获得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戴着“珠江学者”的荣衔南下，在珠江口的澳门大学（澳大）中文系教书且主掌此系多年。数十年来著作如《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文学与人生》等，见重于学界。他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上下卷，力排众议，实行“去现当代化”——不用含混蹩脚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名称，而用“汉语新文学”一词。其名“寿桐”，听起来古老保守，而他为学，实在充满创意、新意。“去现当代化”是一例。他主持澳大中文系期间，澳门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每年都有杰出的作家获得荣衔，如金庸、王蒙、余光中、莫言、白先勇。某些大学把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颁给非文学的学者，澳大不然，获颁者都是当行本色的作家，真是名副其实。名副其实之外，还年年如是。在我印象中，名副其实且年年如是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颁发，中国的大学中，只此一家。“只此一家”中，又有别的新意。朱寿桐为每一位荣誉文学博士撰写赞词，大概是从写王蒙那一篇开始，他用了自创的“文学存在”词语，意思是作家的影响广泛，其人其文，在文学界和社会其他各界，都有影响力，都“存在”。^②对这个“自铸伟辞”（语出《文心雕龙》），我喜而引用之，如用于《金庸：雅俗广泛的文学存在》这篇拙作。^③

朱寿桐的学术创意，这里只是一些例子。名为“创作”，散文创作自然讲创意。散文集《从俗如流》即如此，以下对其标题之作《从俗如流》加以析论。数年前读此文，印象深刻。最近大半年参加了好几位学者和作家的告别仪式（新近一个是2018年10月8日送别“光纤之父”高锟教授），这些丧礼简单隆重、清和肃穆；仪式进行时，我除了默默想着逝者的种种之外，往往念及一个很不相同的丧殡情景——就是朱寿桐悲悼母亲的这篇《从俗如流》

所描述的。朱作是一篇思维从俗而写法脱俗的散文。

1958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大丰县农村,后来成为博士、成为知名文学教授的朱寿桐,44岁时撰写此文,忆述在撰文之际已是十多年前的母亲丧事。母亲去世时,作者年届“而立”,已体验过苏州、南京、北京诸大城的生活;撰文时阅历更丰,美国、欧洲各地及香港地区都待过。《从俗如流》写母亲病危,作者赶回老家见她一面。清早抵家,在病床边,“搂着她只剩下骨架的身体,一面轻轻地抹着她的胸口”。母亲在下午去世,跟着是办丧事。作为经历过城市生活的现代知识分子,朱寿桐读过、看过肃穆素雅的文明丧礼,“实在看不惯乡下那种做丧事的排场和做派”。

丧礼是一定要举行的,中国自古是礼义之邦,也是礼仪之邦。我们从《礼记》的记载知道,古代的丧礼包含各种繁文缛节,非常“琐细”;现今的电视观众,从《三国演义》等剧集可以大体看到古代繁缛丧礼的一些场面。庄子引孔子云:“死生亦大矣!”死亡可说是生命最大的事,古人认为“繁缛”有其需要。

其他国家民族也非常重视丧礼。古代埃及的帝王死了,丧礼仪式烦琐不用说,连死者在墓穴里也要读《亡灵书》,俾能一步步、一关关走向“永生”之门。古希腊史诗《伊利阿特》中,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被阿溪里斯杀死,白发苍苍的老父王皮里阿穆,冒险走进敌军营地,向阿溪里斯苦苦跪地哀求,领得儿子遗体,回去举行一个隆重盛大的丧礼。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大臣为王子误杀,死后草草下葬,大臣之子以其失礼而悲愤抗议。2018年9月,号称“英雄”的一个美国参议员去世,丧礼在其所属的州府和首都先后举行,其场面肃穆浩大,关注世界新闻者都能看到。

大半年中,我在台湾、香港地区参加过余光中、饶宗颐、刘以鬯以及高锟几位台港学者作家的丧礼,都肃穆隆重。这一切,都因为“死生亦大矣”——古今中外共同的一个思维。1998年钱锺书辞世,极为简朴的仪式只有几个亲人在场;2018年春季敖归天,家属表示不公开举行丧礼;同年10月金庸辞世,只举行“私人丧礼”。这些都出于逝者生时的愿望,但毕竟仍然有其简单的丧葬仪式。

如何肃穆隆重,如何“文明”,这里试举我参加过的高锟教授丧礼为例。光纤之父、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逝世,10月8日在香港举行告别仪式。仪式在香港殡仪馆最大的厅堂举行,厅里摆满白色的鲜花和挽词牌,挂着挽联。中间的心型花圈是其遗孀所恭放,高锟的遗像一如其在世时笑容灿烂,他留着“肯德基”伯伯一样的胡须。来致祭者穿着黑色或深色的衣服,单独一人或一群人向遗像三鞠躬,家属答礼,致祭者就坐。

告别仪式准时开始,由中大校长和高锟几位亲友先后致悼词。中间有录像播放,约十分钟里出现高锟生平珍贵的画面,包括2009年在瑞典首都领取诺贝尔奖,而那时患了“脑退化症”的天才科学家,神智已欠清晰了。

致悼词者讲述高锟的事迹及其贡献,还有其仁爱宽厚的性情,语调庄重。灵堂清雅,气氛肃穆。轻轻背景音乐,我听出来是英国民歌《绿袖子》,这大概是高校长喜欢的曲子。他的最爱则是邓丽君原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由中大女声合唱团献唱,时维仪式的尾声。

在司仪的牧师致谢词后,已盖棺的灵柩从内室推出,将放入灵车,运送到火葬场。扶灵者是香港特首等共8人。棺已盖,因此没有瞻仰遗容的行动。就藉者宁静简单隆重的仪式我们送别了高锟教授。可补充述说的是,中大现任校长先用地道的粤语致辞,继而用流畅的英语和普通话,彰显香港“两文三语”的特色。致祭者获赠的图文并茂纪念册,中英对照,也显香港特色。还有,录像播放有一小段,是已患“脑退化症”的光纤之父吹口哨,曲调是《友谊万岁》,具见这位智者的仁者风仪。

朱寿桐所述的母亲丧事,是什么个做法呢?农村的丧礼,普遍是“灵堂布置得白红相间,纸钱纷飞,巫气十足;喇叭吹得昏天黑地,丧喜莫辨,俗气透顶;丧户出入者蓬首垢面,披麻戴孝,更是鬼气瘆人”。^④朱母的丧礼,正是如此。至今村镇的很多丧礼,仍然如此。数十年前,台湾地区的一些“俗气透顶”的殡葬活动,也是如此。“巫气十足”,大哭、假哭之外,甚至有“孝子”在丧礼中加插脱衣舞表演的;有人怪而问,答曰父亲在生时喜欢看脱衣舞。

朱寿桐很想“与这些陈规陋习拉开距离”,但结果是欲“距”不能、欲“拒”不能,他不甘心抗拒。“年迈的姑母脸上挂着泪珠手中拿着白孝衣颤巍巍地来到我的身边,我本想拒绝……”,却终于接受了“拉拉碴碴的无边孝衣”。

“母亲的遗体上覆盖了白布”,还有麻丝、红线、白布包、纸钱等种种配置,“怪异别扭”。“我很不舒服”,但这正是强调母亲的死亡,“出于一种完全的善意,于是我容忍了,严格地说是我接受了”。“当吹鼓手们哇哩哇啦地在灵堂外吹打弹拉起来的时候,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找着招来吹鼓手的父亲理论:为什么不让我母亲静静地躺着?”父亲不屑解释,只说城里开追悼会也放音乐。不久,又传来男声哭腔,原来是“播放起了假哭磁带”;“岂有此理,假哭!在我母亲灵前怎能容许这种恶俗的东西?”

朱寿桐是非常擅于议论的学者,而他表现出来的叙事能力,与当行本色的小说家并不稍逊。以上几个情景,他写得细致生动;接着还有他对丧事种种后续行动的抗拒、不满、气愤。但他终于接受了。在我看来,这就好比一个听惯了舒伯特《小夜曲》和莫扎特《安魂曲》的人,起初不看、不听、不欣赏“大锣大鼓”的广东六国大封相大戏,后来大大转变了态度。朱寿桐对母亲丧事态度的转变,有他的情和他的理在。其情其理,都源于对母亲的孝心。他拒绝白色的丧服,然而,看到“兄弟姐妹人等,一律类似的白衣白帽,白袍白裙,进进出出一派白孝,真正体现了‘一堂孝思’的情景。这时我觉得,我那伟大而慈爱的母亲理应享受这样的孝思”。灵堂播出哭声,是别人的假哭,哭中有说词。假哭!作者很是愤怒。前辈亲友说词句是关于“祈求神灵护送死者过难关的……各路神官慈悲心,领着我的亲娘走西方……我的亲娘啊,神明引你上天堂……”。作者听着,“编词虽然粗糙简拙,倒也唱出了我内心的联想和期望,以致听到这儿,我的眼眶里早已积满了泪水,为我的亲娘将要遭受的这么多的磨难……”

古代《诗经》早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慨叹;后来人们用浅白的文字,表述同样的意思:“十月怀胎重,三生报答轻。”《从俗如流》中,作者一步一步接受了原本反对的丧事的“恶俗”仪式,因为他对母亲有“深切的悲悼”。

如何表达悲悼呢?“文人雅士每每以文致祭,且不说我才短笔涩做不出像样的祭文,即使勉强敷衍成文,母亲则一字不识,如之奈何?”说“才短笔涩”自然是谦逊之词;母亲不

识字,就算天上有灵,文雅的祭文她是不能明白的。朱寿桐知道表达悲悼应通过仪式,但究竟用什么样的仪式呢?“叩头烧纸,诵经念佛,便成了那些日子最好最合适的纪念方式,相信也是我母亲最能理解、最能适应的祭奠方式”;就这样,他“从俗如流”。

母亲丧礼举行之先,他知道其“恶俗”。这位现代文明的学者,在我看来,本来好像是单人匹马的唐吉珂德,奋勇向恶俗、向旧势力宣战;然而,实际上面对父亲和前辈亲戚等旧势力,面对“恶俗”,他几乎不战就屈自己之兵。他放弃自己文明的信念而就范粗鄙恶俗,这一切都因为深沉的、“昊天罔极”的对母亲的爱与哀,因为这样的方式“相信也是我母亲最能理解、最能适应的祭奠方式”。本文感人的深厚力量在此。

《从俗如流》一书中还有好几篇写母亲的生活和为人,写他对母亲的思念。读其文,知道他是个孝子。与他交往,觉得他的确孝顺;例如,六七年前的春节,我亲身体会朱教授的孝行:他放下繁忙的事务,从澳门回盐城乡下陪老父亲过年。

差不多每个写诗写散文的人,都写到母亲。写对母亲的孝思而像《从俗如流》一样不同凡俗的,非常罕见。此文写景叙事,据事抒情,融情入理,层次转折分明,最后归于主旨“从俗如流”。“从俗如流”乃从成语“从善如流”而来;然则所谓“恶”与“俗”因为作者的善导竟然也变为“善”了。这不是文字的魔术玩耍,而是文意的顺理成章。

朱寿桐是著名的文学学者,本文的起和结,都提到鲁迅小说《孤独者》那特立独行、与流俗格格不入的魏连殳——祖母之丧涉及的陈旧仪式,亲友以为“文明”的他,是会反对的,殊不知他竟然对做法“全盘接受”。朱寿桐谦称他“从俗如流”的事情可视为魏连殳行为的注脚。其实,起和结的魏连殳故事,除了加强本文的文化底气之外,更蕴涵着一种民俗学、心理学的深层探索,这是《孤独者》所不触及的。

《从俗如流》一书收集 60 余篇散文,亲子、师生、旅游等题材多样,其叙事抒情说理经常从一般不一般的角度出发。如在他曾访学的哈佛大学,特写其音乐,又从音乐引出中西文化的比较;如《给自己写信》,把一个村镇中学生的孤独寂寞——这使我想起如《寂寞的十七岁》和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之类的众多文学和电影作品——丝丝绵绵吐露出来。要窥探这位学者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要欣赏行云流水而又心灵笔巧的文章,此其书也。朱寿桐这位澳门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最近卸下繁重的学系行政职务,会否行政工作少了而散文创作多了呢?会不会从此从“文”如流?

注释:

- ① 此书 2015 年由北京的作家出版社推出,是《澳门文学丛书》的一种。
- ② 朱寿桐主编:《论王蒙的文学存在》,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书名即用了“文学存在”4 个字。
- ③ 黄维樑:《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版。
- ④ 本文所引朱寿桐此文的字句,因为原文不算长,为免烦琐,不一一注明页码。

(黄维樑,男,1947 年 10 月出生于广东;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玛卡莱斯特学院客座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文学理论、五四以来的汉语文学)

日常书写·文化溯根·原乡之旅^{*}

——论张奥列的跨文化文学书写

◎ 王小平

摘要：澳洲华文作家张奥列在小说与散文创作、文学评论与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在推动澳华文学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小说与散文创作题材内容丰富，包括对海外生活见闻的记录与描绘，对澳洲华人历史的追溯，以及对现实中的故土与心理“原乡”的探寻等，体现了作家敏锐细腻的现实书写能力，以及深邃丰厚的历史感悟与思考，充分显示出跨文化经验影响下的双重视角写作特点。

关键词：澳华作家 张奥列 跨文化文学书写

迄今为止，澳华文坛已有大大小小数十个华文文学团体，文学作品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果也蔚为可观，陆续出版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五卷）、《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三卷）、《澳华文学精选》（三卷，进行中）等显示了澳华文学的成就与活力，澳华文学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在澳华文学的发展中，集作家、评论家、编辑、学者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文学家张奥列，贡献不容忽视。他在出国前即已有两本文学论著问世，以坦率犀利的评论风格、扎实细致的作品分析见长，20世纪90年代初赴澳后又连续出版了《悉尼写真》《澳洲风流》《澳华文人百态》《澳华名士风采》《家在悉尼》《飞出悉尼歌剧院》《澳华文学史迹》《故乡的云，异域的风》等著作，创作量既丰，体裁种类亦多，包括游记散文、小说、文化随笔、纪实文学、人物专访、文学评论与研究等，体现了作者开阔的书写视野和出色的文字驾驭能力，其文学成就构成了近年来澳华文学实绩的重要部分，是澳华文学发展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与推动者。本文拟从写作内容的角度分析其散文与小说写作，将其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日常书写，以记录海外见闻、描绘澳洲华人新移民的生活世界为主；二是文化溯根，追溯澳洲华人的历史足迹，描绘其社会贡献与文化意义；三是原乡之旅，通过现实与精神上“故乡”的探寻，对海外华人的身份、文化认同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

一、日常书写

这里的日常书写主要指作者旅居澳洲时，对个人日常生活见闻、文化体验的描述，以及对澳洲华人新移民生活、情感世界的写真或想象性书写，这部分作品包括散文和小说，

* 本文受上海市“浦江学者”人才项目计划(18PJC096)资助。

大多收录在《悉尼写真》《澳洲风流》等作品集中。其中大多为纪实性散文，作者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澳华留学生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感受。譬如，《留学生的困惑》中，澳华留学生面对陌生环境时，不无惶惑却勇于迎接挑战的“洋插队”心态；在《同居的迷失》《中国女孩》等文中，留学生们在异域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在生理、心理需求以及现实利益考量等种种因素交织下，多元、精彩同时也混合着困惑、迷惘的复杂情爱世界。对于一些令人无奈的人事，作者自有感慨：“自由的天地，或许催化了她们人性的释放，而生存的空间，却有时也难免造成其人格的扭曲。”^①但整体文风坦率明快，对人事有一份清醒的洞察与体贴：“人的情感微妙复杂，难以捉摸，且受制于环境与现实，往往身不由己。”^②且体现出文化差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选择的影响：“中国的留学生，正处于两种文化不同的夹击中。他们与古老的东方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却又渴求沐浴时新的西方文化。”^③确实，澳洲幅员辽阔，生活着近百个国家和民族的移民，生活于其中的人，自然思维、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在《人种的聚会》《东方人西方人》等文中，作者即饶有兴趣地刻画不同种族、国家移民的言行，并进而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的行为模式、思维与情感方式进行比较，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澳洲多元文化图景。

虽然张奥列的整体创作以散文居多，小说仅占一小部分，但作家深知小说的分量，曾在《澳华文学史迹》中指出，“写小说最见文学功力。”^④的确，与散文相比，张奥列的小说体现出，作者思考、表现生活的力度在不断增强，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编织等方面颇见功力，对澳华留学生、新移民生活状态与文化心态的呈现、探析也更为深入。《澳洲风流》收入了大部分小说，这些作品着力描写澳洲留学生、新移民的情感世界，特别是婚恋生活。作者将之置于不同文化差异、冲突的背景下，描写男女情爱关系中的行为、心理所受到的文化背景影响与制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误解与不谐，自然，也有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包容，深刻揭示了多元文化环境中两性关系的复杂与生动。在这些小说中，有些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个人的情场遇合，其中的男主角往往深受东方文化影响，在性心理与行为上都偏于保守，澳洲前卫开放的性文化让他们感到新鲜刺激，他们对开放的两性情爱关系不无向往却也时有困惑，如《不羁的爱丽丝》《情人节》；在面对渴望的异国女性时，时常在大胆自信与犹疑自卑间徘徊，如《将计就计》《潇洒一回》等；有些则书写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跨国婚恋的失败，如《买房》《我和茱迪》《晚霞之吻》。作者的观察细致入微，笔触简洁流畅却又不失生动，往往能以寥寥几笔即精准地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体现出对人物心态的准确把握。部分作品情感浓郁、心理感受描写极为细腻，风格鲜明，如《情到深处》，延续了郁达夫式浪漫伤感的抒情色彩，是现代文学传统中海外“零余者”这一形象流脉的体现。此外，更在冷静描摹、刻画悲欢离合故事之外，显示出对人性的理解与悲悯，如《爱在深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由纯粹的性交易而相识，生理上的相互慰藉、异乡孤独感的共同体验、对彼此境况的深深同情使他们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情感。分明是不堪的环境，但性事结束后，“他望着墙上那面大镜，觉得镜中的男女有点陌生，有点像《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⑤从单纯的肉欲冲动、轻佻调笑到温情的逐渐蔓延与生长，从交易关系到相互扶持的朋友、爱人，小说写得格外细腻、真切。结尾处，“又听说，他们登记结婚了，是在秋天。那是一个金色的深秋，一个成熟的季节”。^⑥对人物的精准描写，对人性、情爱、婚姻的深入思

考,使这篇小说体现出独特的风貌。

除描绘留学生、新移民的生活之外,作者也将笔触探入华裔二代的情感世界。在《未成年少女》《苏菲出走》等篇中,作者描写华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将严肃的文化冲突主题以轻快的笔触写出,同时又能启人深思。这也体现出张奥列小说的一个特点,即通过故事性、喜剧性因素的引入,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在生动活泼的情节、轻松随意的氛围中带出对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差异的思考。这种举重若轻的文学手法体现了一种较为从容的创作心态,也与作者理解、把握生活的方式有关。即便是在一些无果而终的悲剧性婚恋故事中,主人公也多半能够很快走出来,而不是一味耽溺于伤痛。这种洒脱、清新、明快的文风,构成了张奥列文学的另一种风格。

总体来看,描写澳华留学生、新移民、“华二代”在现实环境压力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碰撞中的惶惑与迷惘,以及各自努力挣扎求生的现状,就构成了张奥列书写澳洲生活系列的重要内容,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澳洲移民的万般滋味,万种体验尽在其中。”由于作者对他们的生活较为熟悉,对其在异域生活的复杂心理状态有着细腻体会,再加上文笔的准确生动,因而读来格外真实可感。可以说,看得真切、写得深刻,是张奥列这一系列作品较为突出的特色,体现了作者丰富开阔的生活视野与敏锐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对文化差异的深度思考,为读者了解澳洲移民的生活提供了丰富可感的文学资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奥列的海外日常书写并不仅限于澳洲,还有不少散文是关于欧美亚的旅行见闻、感受。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游记,而是以中国和澳洲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对欧洲历史、文化所作的观察与描述,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比较,因而着眼点多在于社会人文,而非景点名胜,如嗜酒的德意志、与世无争的奥地利、民风淳朴的瑞士、鱼龙混杂的意大利、风情万种的法兰西等,都是抓住主要特征进行阐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的叙述平实自然,富于真情实感,也往往能令读者感受到作者个人经历、学识与眼前观感的关联,明白其来有自,虽然篇幅并不长,却寓意蕴藉,融知识与见解于一体,可谓“寸幅中有新见,尺水里有波澜”。这些游记文字记录着作者的足迹与心迹,见证了作者生命的感悟与成长,与澳洲生活见闻一起,构成了张奥列海外大文化图景的一部分。

二、文化溯根

除以小说、随感散文等方式描写旅澳华人的现实生活外,张奥列还以纪实性写作、人物专访等形式追溯澳洲华人的历史足迹,阐发他们在中澳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这部分作品主要收入《澳洲名士风采》《飞出悉尼歌剧院》等作品集中,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历史视野、知人论世的独到眼光以及出色的纪实写作能力。所书写的人物对象极为庞杂,其中,有执着于研究澳洲华人历史及中国文史的学者,如刘渭平、陈顺妍、萧虹、张典姊等;有文学家梁羽生、黄雍廉、陆扬烈、刘湛秋、洪丕柱等;歌唱家俞淑琴、书法家杜忠诤等;还有众多商界、武术界名人。他们各自背景不同,经历、性格迥异,但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张奥列对这些旅澳人士投以热忱的关注,以记者的敏锐与作家的妙笔为他们留下了一份份文化小传与人物专访,其中很多是年迈的长者,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此外,作者本人生活经验丰富,又曾任记者、编辑,视野宽广,写人纪事冷静通达,但在平实自然、质朴无华的文笔中却自有一份隽永的情味,更具文学性,“写人叙事用白描手法,简笔勾勒,稍加点染,就形神毕现,表现出精细的观察与‘写真’功夫”。^⑦

从内容来看,其纪人写作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通过材料的取舍来体现写作对象的独特性,把握其个性特征。张奥列善于在众多的材料中捕捉重点,选取人物生平经历的重要事件,在彰显其事业成就的同时,生动地呈现对象个性特点,因而能够以简洁流畅的文字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飞出悉尼歌剧院》一文记述著名华裔歌唱家俞淑琴经历重重艰难,终于登上澳洲艺术舞台并频频获得国际大奖,最终为澳洲主流艺术社会所接受。在这篇纪实性作品中,作者在表现俞淑琴求学经历之艰辛时,特别撷取了若干片段以突出其在面临困难时坚强、乐观、富有好奇心且勇往直前的个性,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她在获得悉尼歌剧院“终身艺术家”称号与职位后,毅然放弃并转而到商业艺术领域且大放异彩。如此,一位在异域闯荡、始终勇往直前、永不止步的艺术家形象呼之欲出。作者巧妙地将俞淑琴的自述与外界评价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写出了她的个性特色和对艺术的热爱,使读者充分感知到其强烈鲜明的个性。这种注重把握书写对象性格特点的纪实写作风格也体现在其他篇目中,如《澳华元老李承基先生》一文。李承基是澳洲华人界的商业领袖之一,其父亲是上海四大百货之一的新新百货创办人。李早年丧父后继承家业,独力闯荡上海滩,既经历过富贵,也尝过世间冷眼,1949年后出走海外重建家业。对于这样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商界传奇人物,张奥列在访谈与写作中,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其事业成就上,而是着重探索人物成功背后的心态与性格因素。其为人处世的低调谦和,早年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和宗教信仰,以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传统文化品质等对其所产生的影响,都在字里行间一一呈现,真实可感。

其次,在写作中,张奥列格外注重人物命运与社会发展、历史变迁、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譬如《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唐人街之王”方劲武见证今昔》一文中,不仅描写了方劲武的生平经历、地位,且以较多的篇幅讲述了悉尼华人的历史、唐人街的由来,其中穿插着澳洲华人相关政策的制定、悉尼政府对“唐人街”的认可等历史背景资料,于是,方劲武的一生成为了唐人街沧桑的见证,个体命运与历史、时代的变迁相交织,使得这篇纪实性人物散文蕴蓄了丰厚的历史内涵。而在《澳洲菜园人生——蔡氏四代悉尼种菜传奇》一文中,则以蔡姓几代人在悉尼的种菜生涯为线索,兼述澳洲中国菜种植与推广的历史,以及广东高要人向海外发展的艰辛,描绘出了一幅华人移民在贫苦动荡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出路,最终在异乡安居乐业、代代传承的动人图景。而在这些历史图景之中,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在张奥列笔下,中华文化传统是旅澳华人内心深处的情结,它融入了华人的血脉,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俞淑琴对民族艺术的热爱、李承基宁静淡泊的传统文化品质,都成为他们在异乡开拓出事业新境界的重要支撑。而即便是普通人,文化传统也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重要心理资源。如《澳洲菜园人生》中的蔡裕权,他10岁赴澳,是一位普通的菜农,但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者,不仅在为人处世、子女教育等方面恪守文化传统,还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乡下仔回忆录》。在这本书中,他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归因于“保持了中国人的特征与传统,用中华文化来约

束自己”。^⑧

在张奥列笔下,优秀的旅澳华人们一方面自觉承传优良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主动接纳、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从而在一己生活天地之外,开拓出丰富的多元文化空间。他们以巨大的文化热情、积极的行动将自己的丰厚文化底蕴、背景转换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源,不仅在向海外普及中华文化、丰富海外华人文化生活方面作出贡献,也在不同程度上与所在社会的主流文化相融,推动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他们的存在,是澳华历史的重要部分,共同构成了澳洲中华文化的多元景观。也因此,在经过了早期的旅澳生活见闻写作之后,作者说:“现在我则更多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写些与澳洲华人历史有关的纪实性作品,既想为这些真实的、典范的人物作传,同时也想为澳华历史留下些文字印痕。”“澳洲的中华文化之旅,沧桑亦悲壮,绝不会被历史所遗忘。”^⑨也正因为有这种自觉的文化遗产意识,这部著作不仅仅凸显了个体的丰富、精彩,更因文化传统的厚重、蕴藉、开放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人在天地间”的大气象,形成了作者独特的传记写作特色。

三、原乡之旅

在张奥列的旅澳系列书写中,少有对故乡的直接回忆与描绘,但作为一种精神背景的“故乡”,在其作品中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构成了作家观察、感受澳洲社会时的潜在文化视角与心理资源,这在其对澳洲华人的现实日常书写与历史溯源中都可以见到。而在最新文集《当金发碧眼遇上黑发黑眼》(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开篇《望月》则直接与“故乡”有关,这或许是作者身处海外多年后对“故乡”感悟、思考的总结。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从与大卫、丽莎夫妇的生活交往开始写起,逐渐深入,通过对“望月”“思乡”这些传统文化符号的不同理解,引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笔锋一转,写早期赴澳华人辗转几代之后的血缘混杂,带出对血统、血缘、国籍等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并赋予“乡愁”以新的内涵:在方便、快捷的国际化时代,“乡愁”早已不再是现实的感怀,而成为一种乡恋、乡情的文化符号。作家写道:“寻找家园,总在路上;追梦追月,其实就是一种修行,一种坚持。”在这样的视野中,“故乡”不再是具体的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情怀。“返乡”也不必再是具体的旅程,而是不忘来时路。一种超越性的身份意识由此产生。这种意识来自跨文化的大视野,它使得作者的书写摆脱了传统“离散”“在地”的对立性思考,而体现出开放、流动的特征,更富于时代气息。

2017年出版的《故乡的云,异域的风》散文集,收录了张奥列自2000年首次回国以来的旅行见闻,其中既有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昆明等都市的现代风光,也有历史名胜古迹、各具特色的侨乡,以及有着浓郁地域风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张奥列笔下,祖国是熟悉的,但也是陌生的。一方面,部分作品体现了今非昔比、人事尽变的沧桑感,如作家写曾经生活过的广州、北京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见证这份历史巨变后的失落与欣喜:“虽然多少有传统文化的失落感,但更多的是现代文明与时俱进的新鲜感和兴奋感。”^⑩尽管对城市的变化有着复杂情感,但作者依然体会到,虽然到处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老字号也大多改换门庭,但作为精神家园的北京依旧存在。作者写到参访中国现代文

学馆,以及在钓鱼台国宾馆宴会间的谈话,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建构着我们的精神家园”。^⑩这一对文化血脉的深刻体认,是故乡纪行散文的核心情感。

另一方面,则是对多元中华文化景观深入、立体的呈现。这部分内容以地方乡土风情描写为主,以丰富、生动的实例见证了中华文化多元共存的宏大气象,不仅充满浓郁的地方气息,且富有历史与人文的深度,情感也格外饱满丰沛。如游记中较长的一篇《彩云之南,梦幻之旅》,共分14小节,以翔实又富于变化的文笔记录了一次10多天的精彩云南之旅,横跨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红河5个州区,深入体验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等民族的风土人情。作家不仅以生动的笔触、出色的写实记叙能力去描绘、呈现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而且全方位调动自己的知识、回忆,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融入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创作。于是,腾冲、瑞丽、红河这些令人神往的边地,在作者笔下,不再仅仅是一个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人文地理空间,同时也是回忆、现实、想象相交织的深邃立体的心理文化空间。而在文字风格上,这部分散文也跳脱出以往的平实风格,笔致多变,随描写对象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致。有时是对探访对象的准确描摹,如在《游走东西南北》一文中,描写广东侨乡“四邑”之一开平的特色建筑——碉楼,从历史背景到具体结构设计、建筑背后的故事,以写真的文笔娓娓道来,带领读者细细观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时则以轻快明亮的笔触描绘节庆习俗与少数民族风情,譬如《与火共舞大凉山》一文,写激情四射的彝族火把节,以及民风淳朴的凉山热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又或者,以凝练深邃的文笔叙写边疆风土与文化,将人文景观、历史传说与现实观感融为一体,体现出富有纵深感的时空层次。这些作品在记述对象与文字风格之间达成了高度的统一与平衡,是张奥列中外游记散文中的精品。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内部差异性的细致观察与体认,与作者兼具中国与海外的双重视角有关。正如作者所言:“无论在中国游山玩水,抑或在国外观光探胜,眼前的印象总与我的生活经历、社会认知叠合融合。”^⑪如果说,在描写海外生活时是带着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背景印记的话,那么,在记叙中国行旅时,多年海外经历所沉淀下的生命体验与感知方式则成了另一种参照。如此,作者才能更为深刻地体会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变化,才能领受到当地人对海外华人的热忱情意并倍感珍惜,也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地方民众努力想要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信念与行动,这种种复杂的感受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故乡纪行系列散文的丰富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现实中多元化“故乡”的书写同时也呼应了作者所提出的新的“乡愁”理念。身处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提升精神境界,能否在面对异乡及故土时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收获更加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作者在散文《望月》中引用了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及白居易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些富于生命智慧的诗句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验证,“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多元内涵的心理概念。

以上是内容角度对张奥列文学创作进行的初步分析。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还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再具体展开,仅提出供讨论。第一,在张奥列的海外华人叙事中,有一些为数不多但特别吸引人的篇章,是关于个人家族的故事。这在早先

的《踽踽台北行》《狮城舅舅》中已有显露,在最新的散文集《当黑发黑眼遇上金发碧眼》中亦有深化,如《家史合璧》《母亲,您想说什么》两篇散文进一步讲述身世家史,兼及族人在台湾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生活。南洋华人的复杂历史与奋斗过程、与大陆天然的亲族情感联系以及由此建构出的一种华人心灵图景,构成了另一片值得开拓的文化空间。第二,张奥列的文学创作与其文学评论的关系。出国前,张奥列已是小有名气的评论家,赴澳洲后,张奥列先后任职于《自立快报》《华人日报》《澳洲新报》等,他身兼作家、评论家、编辑于一身,持续关注着澳洲文坛动向,不仅致力于搭建文学、文化交流的平台,且写下了大量的评论文字,切实推动了澳华文学的传播与研究。其评论文章主要集中于《澳华文人百态》《澳华文学史迹》两部著作,前者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介绍澳华文学的专著;后者除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分析之外,还以大量篇幅介绍澳洲华文文坛的现状,描述澳华文学的发展轨迹,可谓是澳华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对澳华文坛的熟稔以及开阔、精准的文艺评论眼光,也影响着张奥列自己的创作。可以说,对澳华文学得失的判断,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着他对自己创作的期许。正如他在《澳华文学史迹》中所说:“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⑬这不仅仅是对澳华文学的整体判断,或许也同样是对作者本人创作的一种期许、写照。而创作与评论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注释:

①②③ 张奥列:《悉尼写真》,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60、64页。

④⑬ 张奥列:《澳华文学史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2页。

⑤⑥ 张奥列:《澳洲风流》,香港开益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9页。

⑦ 江少川:《闪耀在南半球澳洲华文文学的星空——序张奥列〈澳华文学史迹〉》,《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3期,第100-102页。

⑧ 张奥列:《飞出悉尼歌剧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⑨ 张奥列:《澳华名士风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305页。

⑩⑪⑫ 张奥列《故乡的云,异域的风》,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2、238页。

(王小平,女,1980年,河南郑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关系、海外华文文学)

激情文字建构崇高审美境界

——评张忠亮散文《倾听大地的回响》

◎ 周思明

散文《倾听大地的回响》所体现的崇高之美，是张忠亮在文学写作中自觉追求的一种美学风格，其阅读效果乃是摄人魂魄且酣畅淋漓。何谓“崇高”？所谓崇高，按照西方美学家的定义，它是一个与秀美相对的美学范畴。西方哲人大多是在“美统真善”的意义上讲崇高，赋予其以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的内涵。中国哲人则更多的是在“美善合一”的意义上讲崇高，赋予其以道德的人格审美的意蕴。和“崇高”相近的美学范畴是中国美学的“壮美”。康德在《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中，讲了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在美的分析论中，康德指出，自然美是通过人们先天具有的“共通感”而具有内在的心灵普遍性，它仅仅关涉判断力。但是人对崇高的分析，不仅仅关涉判断力，而且关涉人的认识能力、关涉人的文化修养、关涉理性修养。康德认为“对于崇高情感内心情调要求内心对于理念有一种感受性”。在这里康德提出的是一种“理性情感”，是一种修养。只有这样，人面对无限巨大的自然的可怕的对象时，在人的理念世界中，才会产生“理性情感”。人对理念的感受是和一定的教养相关。人的理念，就是在理性世界中，将人的人格升华，使这种人格和“无穷、无限、自由、绝对”的理念结合，将宇宙万物置于这种人格的制约之下，并由这种人格创造和安排。这是对人的理性的一种自我保存的肯定，是对宇宙万物的蔑视，是一种永存的人格。关于这点，忠亮在他的散文中有具体的表现。虽然他的散文风格彰显崇高之美，但作者的笔触是细腻的、充满细节的，这就让读者如我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对于自己笔下的审美对象的观察之细。而能做到如此细致，究其原因，还是作者对于新疆那片神奇土地爱得无比深沉。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写景状物时，并不像有的散文那样，一味地客观书写，而是揉进了自我的情感、认知与体会，这就使得作品的意境达致一种“有我之境”。

在东方美学体系中，有一种古典美叫对称美。这种对称之美，只有中国人最懂，有人称之为中式对称之美。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追求着造物里的对称美，在许许多多中国的文化国粹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对称元素的摄入，建筑、绘画、诗歌、瓷器、楹联、图章、书法等，都比较讲究对称，这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平衡概念。所谓对称，是以一个点或一条线为中心，两边的形状和大小，是一致且呈现对称的。事物的色彩、影调、结构，都是统一和谐的。对称的事物能给人一种“安静”的严肃感，蕴含着平衡、稳定之美。对称之美源于自然，客观存在于宇宙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见。对称之所以为美，是视觉美之天性使然。而中国文人对于自然的崇尚与抒写，也常常反映在行文造句时对于对称美的自觉运用上。忠亮的这篇散文，也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对称美的形式建构。张忠亮的散文，让我感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命题，同时也让我联想到巴金先生那篇《鸟的天

堂》般的鲜活,各种生灵和它们生活的大地,浑然一体,不可分离。

对于动物的书写,尤其是对于藏野驴的细致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新疆大地的挚爱。可以说,在忠亮的心目中,藏野驴就是新疆原生态文化的一个能动的符号。因此,作者对此不惜泼墨,给予更为细致的描述:“一路的山梁上、沟坡里,藏野驴安闲地踱步,野牦牛偶尔出没。进入海拔3800米左右的山间盆地——昆仑山支脉的祁曼塔格山、卡尔塔阿拉南山和东昆仑主脉的阿尔喀塔格山之间的库木库勒盆地时,一个真正的野生动物王国出现在眼前。这儿两只羚羊在嬉戏、追逐,那儿几十只野驴驻足。沙山上野牦牛孤独蹒跚,浅水边黑颈鹤翩然起落。每行一二百米,总能看到远远近近,成群结队、三三两两的这些高原精灵。/藏野驴是最多的,也是最敢于挑战人类这些不速之客的。几十米外,几十只野驴看到驶来的车辆,远远端详一番,似乎稍稍约定了一声,待车开过去一段,忽然拔腿飞也似的奔来,不消一会儿,便超过去一大截。它们站在前边十几米处,回过头来,打量着急驶的汽车,是讥笑,还是示威?也许心想:在这里,谁能比我跑得快!这些野驴啊,体态何等矫健、优美!黄的身躯,白的肚皮,褐的斑纹,浑身上下一尘不染、光滑透亮。追逐、奔跑,似乎是它们的天性。/最壮阔的是看到成百只藏野驴,呈一字或人字形在荒漠草地上飞奔,头颅高仰,激昂无畏,趾蹄纷飞,留下尘烟浩荡。”

康德在他的《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中认为,对自然崇高的判断并不因为它需要文化修养方面的要求,从而从文化习俗中产生。他指出:“相反,崇高是在人的本性中即在人能够凭借健全的知性同时向每个人建议且能够向自己要求的东西中有其根基”——它又是健全的“道德情感”根基,有健全的“理性情感”根基。一句话,对自然界崇高的判断源于人先天本性中的道德理念的情感素质。就这一点来说,崇高也具有普遍的“可通达性”。正像心理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所说:“人类永远敬畏情感的力量。”对崇高的判断,即需要感性情感,也需要理性情感,尤其是理性情感,所以“纯粹鉴赏力”和“情感”都是必要的。康德认为这两者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必需的。在对崇高的判断中,想象力是和作为理性能力的理念结合的、关联的。而对美的判断力中,想象力是和作为知能力的形式概念相关联的。对崇高的判断中,理性的道德情感是前提条件,这是审美的必然性所要求的。崇高和善都是理性强制力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不独在散文中拥有“感性情感”,具有许多感性的、具象的、细腻的笔调。忠亮作为一位现实的思考者,我发现在他的散文中,还有着显而易见的“理性情感”,具有不少理性的、哲学的乃至多学科的文字表述。这样的表述,就使得他的散文突破了一般性的文学价值,而上升到了一定的思考性的境界。比如,他在文本中不失时机地引用了一些哲人大师的话语,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正如法国诗人瓦雷里所说:‘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秘》一书中写道:‘研究波纹就像从自动记录仪器上拷取信息,它们指出了风最后一次吹过沙丘的方向。’”“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我常常回味里面的一句话:人类作为一个族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在新疆的旷野中行走,我常想起遥远而熟悉的都市生活。喧嚣的街市,轰鸣的车辆,闪耀的灯火……忙碌而紧张的人们,周末到拥挤的公园散步,帮孩子在冰箱里制作冰块,在窗台上修剪盆景,在笼子里饲养心爱的宠物……”“我们离开人类早期

栖息的土地,是不是太久?”“繁华却孤独,自由却傲慢,时尚却荒诞。”“我想,那个安泰与赫拉克里斯的古老寓意,也许并非那么简单。如是圣语哲思的引用与生发,我以为决非赘疣之笔,恰恰相反,它的确是给这篇散文点了睛、插了翅,让它瞬间明亮起来、飞翔起来,是理性与感性的标配与熔融,是提纲挈领式的抒写与升华。这么写,避免了那种在文学的海洋里航行而找不到灯塔的盲目与混沌。”

好文章是从生活河流中打捞上来的。张忠亮是新闻人出身,他深深懂得,那些“活鱼”“鲜鱼”,都是作者于寻寻觅觅、涉水打捞的艰辛过程中采撷下的甘美果实。他的这篇散文,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晶。从审美角度看,这本散文集既有直面人生的现实情感,也有对崇高美的理想追求。忠亮在看似琐碎的大自然风物叙述中,把我们带入一个他所精心建构的美学宫殿里面,他对新疆既不刻意美化,也不妖魔化,只是想真实地告诉读者,他眼中的新疆是怎样的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这个作品还有一种启蒙价值,它激励着人们在生命旅途中更加坚韧不屈,对生命更加热爱和珍重,他有意识地将生命中难能可贵的新疆记忆、西部故事和自我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凸显了崇高与秀美、纯真与深刻、感性与理性、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艺术张力,使散文的审美性、思想性、趣味性融为一体,读之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既冲突也融洽的“心灵的辩证法”力量,为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情趣、现实感、永恒价值是优秀散文的三大要素。情趣在我看来就是情感和趣味的总和,现实感就是我们说的当下状态,永恒价值则是文本的普遍价值、普世价值。目前来看,作者这篇散文虽不能说已然炉火纯青、至善至美,但已具备了这三者的基本特征和追求诚意。忠亮的文字,可以说处处都呈现着作者对于新疆各种具崇高感的大自然风物的热爱与打量、体察与描绘,以及打造散文精品的主观意识,这是他这篇散文让我看中和看重的最根本的原因。作者发自内心地感言:“在沙漠里观察河流和风的痕迹,是件新鲜而快意的事。从昆仑山流向塔里木盆地的河流,不下几十条,最终都消散于沙漠之中。可见这条环绕新疆南部巨大沙漠的河流是多么不易。我曾在一天的黄昏,在塔克拉玛干南缘荒漠,目睹叶尔羌河缓缓流过。沿着自然冲刷的河床,隔着稀疏的红柳,闪着黄白色的波光,发出细碎的、像风中招展的旗帜般的声响,自在远去。塔里木河被称为荒漠中的脱缰野马,它无拘无束,经常变换河道。在下游,几乎无法看到宽大完整的河床,它常常分成几股,忽儿相交,忽儿分开,特立独行又相互照应。也只有这浩瀚的荒漠,能任由它就这般恣意驰骋。”

不光是对于自然风物的观察,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的观察,更是忠亮所青睐和关注的审美对象。忠亮在散文中告诉我们,他曾与几位朋友在伊犁喀拉峻草原深处,在一位哈萨克牧民家中住过一夜。牧民们在县城有自己的房子,但一到夏天还是回到草原居住。那一带能见到的就三五户人家。他们所住的木屋就地取材,用一根根杉木咬合而成,隔成三五间屋子,他们住在其中一间。旁边的木栅栏围出另一个很大的院落,棚厩中住着晚归的牛羊。晚餐,大家盘膝而坐。女主人当场调制奶茶。奶油、盐、热茶,手艺那么娴熟,奶茶清香醉人。入夜,万籁俱寂,漆黑一片。然而客人和主人没有一丝惊惧,恍若几只小小叶片,安静地躺在这巨大草原母体之中。至今,忠亮对于一位74岁老艺人吟唱的镜头念念不忘。他说,每次演出时都由那位老艺人担任领唱。鸦雀无声时,平地响起一声悠长、高

亢而苍迈的吼声。老人紧闭双目,肌肉抽搐,牙齿仿佛都要从嘴里迸裂出来。周围十几位老伙计不时和着他的声音,汇入激昂的旋律当中。乐器在他们手中翻飞,身体伴随音乐激烈地摇晃、俯仰。老人们视外界为无物,那一刻,他们的躯体和心灵都完全沉入了崇高美的世界——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民间原生态图画!

平心而论,由于忠亮的散文写作此前并不声名显赫,也许只算是锋芒初露,至少我本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散文。读忠亮的散文,让我陷入思考,回味他这篇散文带来的精神体验,当这种思考与回味在脑海里产生出对他的新认识的时候,我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搞新闻评论出身的忠亮可以写出这样情真意挚且不输文采的散文来!显然,忠亮是位有文学准备和素养的写作者。他似乎并不属于那种有意选材的写作者,一切都是热爱与激情使然,他笔下的新疆风物、新疆故事绝对富有激情,但却像水下的暗流一样不动声色地流淌。可以这样说,忠亮的文字可以化惊雷为鸟语,他的散文写作是一个滴水汇成河的过程。

美国作家德莱塞说过:“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人生往往是最真实的阶段才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特别是像新疆生活这样一段对内地人来说颇具陌生化效应的阅历和奋斗经历,往往最能体现美学的价值,也最能为散文写作赋形。忠亮这个散文,篇幅并不长,看似一蹴而就,其实是他数年新疆经历的积累与汇聚,乃属厚积薄发。他以饱蘸激情的文字呈现自我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并提炼出人生哲理,烘托出人生况味,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彰显崇高的人文精神,并以之影响和启迪读者。文字中呈现出浓厚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关怀,尤其是从具体的风物、人物出发,生动描述了新疆大地的百态雄姿,既有文学性,也有哲理性,传递真善美的社会价值,探索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倾听大地的回响》对浩茫西部新疆大地粗犷、粗粝、庞大、生猛的自然风物的描述与讴歌,强烈而鲜明地凸显了美学范畴上的崇高,同时也不乏秀美。而且我以为,其中对于崇高道德人格的隐喻与象征、描述与张扬,已然超越了一般对大自然风物抒写的直观表象。这篇散文是忠亮与新疆大地、新疆人民之间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人格的一次心灵的交流,是他对于崇高美的一次敞开心扉的审美传递。文中,作者与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新疆风物、西部人物的深度对话,凸显了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关于价值的主题,即“思”的特征;通过作者的深情抒写与历史再现,即“史”的特征,达到用艺术点亮生命,用审美温暖人心,探讨人生真谛,感悟西部文化的效果,即“诗”的特征。作品呈现一种真情、哲思、美感的执着诉求,烙印着一位融叙事与评论于一体的别样写作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忠亮散文写作的突出特征是情感充沛。情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艺术的本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别林斯基说过:“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但也并不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人:他有情感,甚至写出了浸润着情感的不算坏的诗——却一点也不是诗人。”由此不难看出,别林斯基划分了两种情感:一种是艺术情感即审美情感,一种是非艺术情感即非审美情感。只有表达艺术情感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否则就是非艺术品。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正烈”的情感,是指自然状态的未经过必要的过滤和沉淀的情感。而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起源于一个人要把自己体验过

的情感传达于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即“情感再体验”),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在我看来,忠亮的情感就是如此,是经过时间过滤、沉淀之后的“情感再体验”,这也是他的散文之所以能感动我的原因。

古罗马哲人朗吉弩斯赞美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对于崇高的欣赏乃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人的尊严的确证,意味着人能够通过欣赏不平凡的事物“体会到人是为什么生在世界的”,意味着人能够从对象的崇高中看到自身的真正崇高。所以他说,尽管我们也欣赏山间小溪的清浅和明媚,但我们更欣赏气魄宏大的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中国古代哲人虽然对于自然和社会秩序较少有追问“为什么”的知性精神,但对于宇宙人生的直觉的智慧洞观,却使他们能从“天行健”引出“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地势坤”引出“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够内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外显不畏强权的“威武不屈”,由此产生“充实而有光辉是谓大”的崇高人格美。纵然是有点玩世不恭意味的庄子,其讴歌鲲鹏而嘲讽蓬间之雀,慨叹“百川灌河”“泾流之大”终不及大海之浩瀚无涯,以及其蔑视权势的“鸱鸺腐鼠之喻”,也使人依稀可见其人格理想中有几分崇高、几分傲骨。至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更无不体现着对于崇高人格美的执着追求。正是在此意义上,我真心欣赏张忠亮的散文《倾听大地的回响》,希望他在从事文联日常工作之余,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佳作,以更为独特、更为精湛的写作姿态,向世人呈现另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周思明,男,湖北人,文学硕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诗意地找寻家园的方向

——包容冰新诗赏读四题

◎ 王小敏

翻开包容冰先生的诗集，首先是一种厚重的感觉，读罢则是一种释然的情怀。但是，如果把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制在似乎已经形成定论的佛诗禅诗上，并把写佛诗禅诗界定为他作为一个虔诚佛家子弟的“天职”，虽说也不为过，诗人想必也会欣然接受，但笔者以为如果局限于这样的界定，往往会遗漏诗人其他的一些诗趣。作为一个对佛学禅道了解未深的我，倒希望绕开这个既定的命题，另辟蹊径，把以往诸多评论中谈及的观点暂时悬置起来，而作为一个诗人或者一个普通的读者，立足于诗人佛诗之外，以俗世的角度，探寻诗人的另一个精神花园幽僻处。抱着如此“惊险的决心”，我翻阅诗人的几本诗集，发现了另外一些精美的诗境来，也进而惊讶：原来诗人的这个花园诗情澎湃，色彩纷呈，如果一句话加以概述，则可以说是“隐蔽的显豁”。说隐蔽，是因为包容冰这方面的诗不是一般评论家们品评的重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质朴诗林中的旁逸斜枝；说显豁，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些诗比之诗人其他的佛诗来说同样颇具意义。

一、贴在家园脸上的一块伤疤

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西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子弟，包容冰的诗不可避免地书写记录了自身及周遭鲜活丰富的世界，其中有对诸多现实困顿的迷茫，和对人世真情的质朴揭示。他的大量的佛诗和禅诗也自然而然地关照了人生的苦难，并以禅说的形式给了众生一个比较清楚的解说或暗示。故此，读包先生的诗，会让人把苦难的人生咀嚼成了营养，或把苦难轻轻放下，成为轻步前行的理由。最令人惊喜的是，仅读几首他的诗，你就会隐约发现一个昭然的形象：他似乎不间断地、顽强地以他自己的方式，似乎还要踮起脚尖向芸芸众生挥手，指出一条“回家之路”。虽然，似乎他自己也不能肯定“何处是家园的方向”，但他一直在努力地探寻着。

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源远流长的、最深入骨髓的牵挂。尤其在人情冷漠的空间，人们总在渴望家的温暖感觉，讴歌家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字车载斗量，回家无疑是温情而幸福的。可是如今许多家庭，在急速转换的世界里，开始像冰河遇到了春天，逐渐消融，或正在瓦解。对于家，每个人也是冷暖自知。现代都市人的家大都依附于冷冰冰的钢筋水泥上，依附在街道水管和电线上，这样的城市横陈眼前，靠在身边，可感觉却是陌生的。虽然，我们寄生于斯，栖身于斯，然而面对高楼大厦，迷离的霓虹灯，以及暧昧闪烁的广告牌这些冰冷没有生命温度的躯壳，人们会从心底呼唤城市的灵魂，可天知道城市的灵

魂在哪里！原罪依附于我们的肉身，所以我们时刻轻松不得。正如包容冰诗中所写：“在纷乱的人群中/在声色香味触发的尘埃里/我已迷失/迷失到铜臭的味道里/迷失到女人的眼泪中/迷失到贪欲的汪洋里。”（《找回自己》）^①

的确，许多人成了现代城市里的困兽，焦灼而迷惘，虚妄而失望。人们生活舒适但无实在感，行色匆匆内心却缺少方向感。诗人以敏锐的观察与感受力，写出城市的秩序归于混乱，到处是荒谬，精神贫乏，语无伦次，甚至神态疯癫。扭曲的城市家园，让我们看到了丑陋和无情。那么乡村会拥有理想中的桃园风景、诗情画意吗？诗人再次撩开传统文人称道的温情脉脉的乡村面纱：如今的乡村，温柔不再，往昔诗情乡趣的农村，曾经的水墨画般的乡村，那些国人原始情感的寄放地，情感和文化的原乡，如今似一块伤疤贴在地球上：离奇丑陋，荒凉贫瘠。乡村世界被扭曲、碾压、撕裂，村民的意识混沌。于是诗人在《定西，晨钟暮鼓的净土》中呼喊：“苦甲天下的定西哟/找不到一棵左公柳纳凉/黄土掩埋不住苍茫的历史……”而诗人的“几则飞鸿”也只能“消瘦又寂寞/在热浪滚滚的暑夏/像一丝水汽默默蒸发”。^②

在大西北这样一块干旱贫弱的土地上，诗人还是倾注了他深沉的热情和奔放的爱，他始终挣扎在牵念贫穷的家和无以回报自己家乡的心理历程中。诗人说：“这些年，我仍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家的路很短/一念之间就可以到达/回家的路好远啊/一辈子也无法企及。”（《这几年，我仍然走在回家的路上》）^③

物质的强大力量狡猾地伺机伏击诗人纯洁的心，让诗人的灵魂不断激荡、不断地沉坠，最后诗人意识到似乎《佛，沉默的圣哲》才可以“永远想的是他人，关怀天下可怜的众生，救渡世间受苦受难的人”。正因为对现实的无奈，迫使诗人搭起想象之旗，在《夜读金刚经》^④中“把心修成湖水一样安静”在“家人遭受病魔的痛苦，找不到医治的一剂良药”时，能够找寻到灵魂的安稳归处。

以笔者对现代诗的了解和阅读经验看来，现代诗人多数都有意无意地处于现实逃亡与隔离状态，有些甚至钻进象牙塔而孤芳自赏，结果不言自明，诗歌总是在门缝里看现实，或者诗人太超现实或根本麻木，于是现实成为诗歌中飘忽的影子。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处于飞速转换时期，很多人很容易被时代的巨轮抛下甚至被碾压，当代许多诗人就苦恼于历史转换中的焦灼与迷惘，可是除了焦灼与迷惘，似乎很难真正找到一种安稳闲适的归属感。

但作为诗人的包容冰则显得有些不同，在他的诗中除了真实书写自己的苦闷焦灼，还尽可能地以一种匹夫之职来担当，其不时显露出深邃的时代思虑与社会责任感。他的许多诗取代了另一种暧昧的似乎不便于言说的、说也说不清的语言游戏，有些诗句近似于扮演了精神扶贫与拯救迷茫苦痛的道德责任。而所有这一切又巧妙地以浪漫的诗意呈现出来：“孩子们啊/每人三十棵松树苗/就是你们今年，对故乡最亲切的慰问”“父亲呐，老了没事/您就多在山坡上转转/给放牛挡羊的娃娃们说/树林子是飞禽鸟兽的家/让他们远离些再远些。”（《植树节：喊一声亲人》）^⑤

当许多诗歌让读者有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叹息时，我们越发觉得包容冰的诗正在以一种质朴无声的姿态顽强地走进寻常人们的生活，走进日常的琐细工作，深入到普通人的灵魂。他力图不仅为自己还要给别人指出一条“回家的方向”。

他说“我就是我的方丈,我就是我的和尚。”(《自慰的方式》)^⑥初读类似于超然,再读,却发现超然外的醒然与自觉:我要主宰自我!

在《祥云》中他写道:“神性的高原,祥云密布/静谧的佛塔一座座/是这里觉悟的灵魂/给匆忙迷惑的路人指引/回家的方向。”

可是诗人真的指出了一条鲜明的路吗?闭目深思,我们似乎很难看出有什么清晰可辨的方向,但这正好构筑起他醒目的特色,仿佛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因为他毕竟是诗人,不是社会工作者或政治家,所以我们看到诗人最后还是躲进了他熟悉的诗的世界。何处是回家的路?可能只有诗人和那些极具慧根的人才会悟到懂得。

二、潜伏在一棵冰草底下饮露赏花

诗人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极力想解救芸芸众生于水火,可是现实是坚硬的,毕竟无法用一支笔来解救,他最后还是不得已与冷酷现实妥协,所以“不问谁在升迁/不管谁在发财/风清月朗的夜晚,独自走出来/抖落身上的泥土/和夜莺谈论赋诗觅道的秘笈”(《自慰的方式》)。

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诗人也许最喜欢或者说宁可“潜伏在一棵冰草底下饮露赏花”,而非引领大众走一条康庄大道,而这也正是我们喜欢诗人作品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诗歌毕竟不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诗有自己的进程与要素:词语、意象、神话、爱情和幽默,这些东西才是诗人能够驾驭的,这些元素在自己和世界中,生动地在一个所谓的中心里确立、培植了“我”。或者说诗是他自身命运闪烁的幻影。世界的最本真幻影在他的心中投射,诗人顽固地或继续顽固地相信:他是第一个将这种现代观念经验为感受、经验为痛苦的人。

比如还是他的《自慰的方式》中写道:“乱跑的风四处打探我的消息/我隐姓埋名/潜伏在一棵冰草底下/饮露赏花。”诗人这样的心理轨迹,不禁使人自然联想到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韵外之致”“味外之旨”。^⑦在诗中,普通人眼中乱跑的风,于诗人则化身为潜伏在一棵冰草底下饮露赏花,无影无形。它是有无相生,虚实相形,主客相通。诗人在捕捉意象时,表现手法具有特殊的魔力。他不需要用大量的语言工具,就表现出了无穷的意义,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几乎达到了“神与物游”的境界。“寺院,方丈,和尚,诵经”这些意象是真实的存在,或是作者的精神依托,但是接下来,“乱跑的风,冰草,露,花,夜晚,夜莺,秘笈,星光”这些意象则具有神秘的超现实意义,让读者心游神驰。正如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所说:“诗人是一种轻盈的,生有双翼的神圣之物。”

诗人在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灵感与形象的融合;正所谓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诗的意象超越于具体有形描写之外而暗示出来一种令人驰骋遐想、回味无穷的艺术意境。包容冰的许多短诗都精美深邃,富于形象性、思辨性和哲理性。它是有无相生、虚实相形、主客相通、诗思谐和的全息图像。它所敞开的可能性,具有极为丰富的“味外之旨”。

三、造化自然的神性特质

对自然物和自然力赋予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甚至赋予神性是包容冰诗歌的另一个特点。自然崇拜始于人类早期的原始宗教，源于人们科学知识的局限。但是包容冰赋予自然神性的特点，则源于他灵魂深处的独特认知。

包容冰的诗告诉我们，现代人在灵魂方面出了问题。当代有一个很时髦词叫“寻根”，人们被时代放逐，而有的人在自我放逐，成为“无根”的人，这是现代人的另一层悲剧性格的源头。广义上讲，现代都市里的人们基本离开了大自然而悬浮于世。自然是人类的根源，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有以大地为母亲的神话，在今天它依然存在于我们心中，所以现代人对大自然始终保有一种向往。看到花开，看到野生动物，就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春、夏、秋、冬，月圆月缺、寒来暑往具有一种天然的韵律。从自然界里我们可以发现：生命有生、老、病、死，但生命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不会永远消失。真正的诗人，“当是个好老师，好巫师，好医师，当为天地立心，为万物喊魂，为众生治病”。（刘年语）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祥云》中运用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象征性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他写的祥云密布，不是像现实主义那样单单如实地描写，而是觉悟的灵魂再现。高原已不再是泥土石头组合的高原，而是赋予了超现实的能力，是神性的高原，是人格化神化的超现实的灵魂。“神性的高原，祥云密布/静谧的佛塔一座座/是这里觉悟的灵魂/给匆忙迷惑的路人指引/回家的方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不屑一顾的泥土山石的高原是具神性的，但是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路人”却“匆忙迷惑”，在神的怀抱里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方向”，而这种情况在历史转换的现实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某种程度上有扩大的趋势。在《光明依旧》里，诗人说：“恋上神山圣水，万仞雪山，兀鹰盘旋”，这里的水、雪山和秃鹰都比人更有神性和灵性。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金钱利益是人们脖子上的枷锁，更有甚者有人异化成金钱物质的奴隶，或者成为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上的螺丝钉。从此意义上来说，在诗人笔下的山石鸟兽深具灵性神性，是因为人们陷于心盲冷漠的困境。现代人人与人来往的时候，多以利益作为考量依据，衡量朋友与人首先是看有用无用。以功能代替情义来衡量一个人。这就再次提出一个命题，就是现实世界的冷漠。

诗人所熟悉的过去与上一辈的人们，甚至是从书本上熟悉的古代人，确实大不相同。古人结交朋友讲究的是义气与情义，而这些义气与情义在当下却是不靠谱的虚的因素，聪明的现代人常以实用为目的，所谓人情薄如纸，浮世不靠谱，大概诗人敏锐地感受到这些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所以，毫不客气地把泥土石块做成的山，也看得比某些人更神圣，而且富于意义。

四、貌似不妥协的妥协主义

“生命就像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的深邃。然而肉体凡胎的我们只能通过‘个

人的存在’这细狭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⑧卡夫卡希望自己是一个群体之外的孤独者，是一个审视者和旁观者，用他那洞察圣灵的“第三只眼”来俯瞰人生。卡夫卡本人是个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孤独者，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了他的个性特点与生活状态中，而且象征着一种与外界世俗生活的对抗，一种对完全浸润于个人写作中的理想生活的想象。重要的不是在现实中到底实现了多少，而是这种生活的想象性及可能性的维度所及。

包容冰诗《自慰方式》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实际上，卡夫卡的全部意义在于问题的提出而不在于答案的获得。他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用诗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的困惑：人在这个不可解释的世界上无能为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世界是个荒诞的世界。《自慰的方式》中“我”就是想逃亡，虽然是被迫，虽然“自己诵经给自己听”，可是“乱跑的风四处打探我的消息”真乃麻烦的制造者，那些不怀好意或无聊透顶的人就是风，四处流窜无处不在，就是环境仍然不能让作者自由，于是作者想要躲起来，想要幻化得无影无踪。

卡夫卡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遭遇，即他们都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迷失在梦幻一般的世界中，充满着恐惧和不安。卡夫卡的主人公的名字大多带有一个k字，作家所全力表现的是k在充满敌意的社会面前的陌生感、孤独感和灾难感。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无论怎样费尽心机，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

这正如《两手空空》里的“我”，“回忆往事的轮子，在泥泞的路上打转滑。水桶空空，泉水干涸，我在炎热的酷暑里，咽着口水解渴”“凄风苦雨的碎片挂在墙壁，童年的奖状覆盖灰尘”。^⑨这些句子充分展现出现代人在无望空虚乃至绝望中挣扎的精神状态。

《一场雨洗去昨天的尘埃》里，“我被众多的尘埃”包围，“找上门的一场战事，在我的指掌上展开”“要知这样，何必当初，你不踏着黄昏的路径，来自讨没趣”。“灵魂依然在远方流浪，梦中的事物模糊又淡远”，一场雨后，“我心中的尘埃悬浮，还没有落定”。这些诗句的确意味深长。卡夫卡有意把主人公分为“人们”和“自我”，包容冰也是一样，他把众人称为无处不在的“尘埃”或“风”，这表达了他对世界上一切既定秩序的质疑和不适应。

再看《遗失的童年旧事》：“白脖乌鸦们比我聪明”“成群结队的麻雀，这些不请自来的穷光蛋，混在乌鸦们的行列，并不显得自卑。”人与自我的异化由此可见端倪。

包容冰的这类诗，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迷失。这本是荒诞而悲哀的，但诗人的语调却平静得近乎冷漠，他看似漫不经心地讲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而他的简洁、平淡、冷漠的语言风格，则激发起读者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而《遗失的童年旧事》的“我”所遭受的境遇与凄苦的内心世界，则进一步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因无法沟通而造成的孤独与悲凉。“我被他们挤在窑门外，像个不够格的旁听生”，越是渴望被他人理解和接纳，也就越快地遭受到彻底抛弃，最后，“我被驱逐在饲养场的门外，暗自流泪”，希望与周遭交流与沟通的渠道被阻塞。

另外，包容冰的诗也形象地揭示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

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包容冰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隔膜与孤独。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带上各种各样的面具，躲藏在这些面具后面的灵魂渴望交流却无法交流，只能陷入深深的孤独。包容冰的诗正是折射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的隔膜以及由隔膜带来的孤独，最终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要么成为“风”或者成为“尘埃”，其实也间接说明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无力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他通过个体生命体验所揭示出的恰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真实的精神世界。正如他的诗《低处行走》所言：“我继续在低处行走。走过十万道山梁/再走过十万条沟壑/最后来到洮河岸边，枯瘦如柴/捡鹅卵石为不再流浪的肉体垒家/灵魂啊，你就脱掉褶皱纵横的肉衣吧/将它深埋向阳的岷山脚下/一个人便无牵无挂/轻轻松松地回家吧……”^⑩

挑灯夜读诗人包容冰的诗作，心中是一片恬淡静谧，每每读到会意处，则心领神会，诗我两忘，此为人生的美好境界。夜深了，但耳边依然是窗外城市的喧嚣，在这样浮躁的生活里，越发觉得自己身处的城市是大地的一块伤疤。而阅读优美的诗真能让人得到片刻的安宁。这的确不失为一种优美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提高城市人的幸福指数。我多么想“不问谁在升迁，不管谁在发财，风清月朗的夜晚，独自走出来，抖落身上的泥土，和夜莺谈论赋诗觅道的秘笈”。这是诗人包容冰给我们指出的一条美好的回家的方向，至少是给我的一条分明的精神家园的方向。

注释：

① 舍利：《空门独语》(上)，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0 页。

②③④⑤⑥⑨⑩ 包容冰：《内心放射的光芒》(上)，团结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8、22、101、92、128、149、138 页。

⑦ 郭绍虞、司空图、袁枚：《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7 页。

⑧ [德]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王小敏，女，生于 1966 年，祖籍福建泉州，兰州城市学院国际文化翻译学院教授，甘肃省语言文字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新西兰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当代诗学)

山谷往海洋的心灵挣扎

——评刘剑诗集《短歌行》中的海洋意象

◎ 韩庆成

刘剑先生的《短歌行》共分6辑，前5辑是短诗，第6辑是一首300多行的长诗《献给喜马拉雅的长卷》。这首长诗具有史诗的性质。作者通过对喜马拉雅雪域高原历史与现实宗教的、神性的叙述与思考，试图寻找人类灵魂的最后皈依。虽然这种神性的、宏大叙述的史诗在海子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但作者这种探行的努力仍然显得可贵。

本文想重点谈一谈前5辑的短诗。

通读前5辑的短诗，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些诗中通过海洋意象的密集运用，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作者的心灵从“山谷”向“海洋”“挣扎”前行的这么一种轨迹（引号内文字未注明的均摘自刘剑诗句，下同）。

海洋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多有应用，自《诗经》中的《沔水》《崧高》开始，到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到了唐宋，随着古典诗歌的空前繁荣，海洋意象也进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阶段。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玺吾在《古典诗词审美建构》一文中说：“浩如烟海的唐宋诗词中的咏海之篇也如瀚海明珠，光耀夺目，在洋洋文学大观中构架起了天地、世人、幻境沉浮的碧海长天。作为一种意象，海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视野，乃至被留连、咏叹，总有特定的心理发展轨迹。唐宋诗词的辉煌不再，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涉海作品也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境，但唐宋诗词中海的意象之丰富、寓意之深厚、境界之空阔、格调之浪漫，绝非其他文学样式可以比拟的。”

那么，如何认识这个“绝非其他文学样式可以比拟”？我以为看两个唐代的诗人就足以说明。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表现的是一种入世、济世的情怀；“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则表现了诗人心目中人生、社会的最终走向，诗人要把济世情怀付诸实践，并且看清楚了天下的归宿，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我觉得，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更进了一步。这首诗顾名思义本来是一首怀思之诗，但诗人起笔横空出世的两句，写出了远远超越怀乡思亲情调的博大胸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的核心，就是天下大同，就是普世情怀，这也是海洋意象最精髓的部分。即使是今天，这个境界也还无人超越。而刘剑诗歌中的海洋意象，我认为也表现出了一种同向的价值追求。

谈刘剑诗歌中的海洋意象，需要先梳理一下中国当代新诗中海洋意象的演变。当代新诗的海洋意象，是从“文化大革命”诗歌极端意识形态化、样板化的海洋意象中挣脱出来的，海洋意象在新诗潮中最早被赋予质疑和反抗的象征意义。如北岛1976年创作的《回答》：“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这是质疑；“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

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是一种反抗。到了1981年，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中的海洋意象已经从质疑和反抗变为既有反抗也有正视：“大海，我应诅咒你的暴虐。/但去掉了暴虐的大海不是/大海。失去了大海的船夫/也不是/船夫。”进入第三代以后，海洋意象更多体现出一种对所有传统意义和语境——包括“文化大革命”正统，也包括新诗潮反正——的消解，这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是沈天鸿写于2002年的《海的解释》。它把20世纪的后50年，特别是7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中所有的海洋意象的象征意义都消解了，把海的附加全部剥离，把海还原为海，一个异于我们的习以为常但却是本真的海，一个贴近存在本相的海，让读者感受到无穷弥漫的理趣和意味，也让读者在这个无意义的海上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赋予意义。

我在主持中国诗歌流派网“重读经典”栏目时，对这首诗做了征评和推介，诗很短，引用如下，做一个参照：

许多人看见风景，而我
看见海

它与我想象的
不完全一样，它不适合做梦
也不适合弹奏
它呼啸着退去又复来

没有人饮用海水——
它里面有益，气味像血
但滋味是苦的

它自说自话
就像它哪儿也不去
它只说给自己听，仿佛
自身就是目的

没有谁能把自己加入进去
成为海的必需元素
那些正在游泳的人
也仅仅是泡在海里
相对于海
一个人什么也不保存
这就是我们

饥馑与渴望的原因

很少人懂得这一点
我幸运地是其中之一

海没有赝品

这种消解当然是痛快的,它相当于让海洋意象所象征的意义重新归零,但归零之后,时间还在继续向前,在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里(耿占春语),象征还得产生。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意象重新复活,并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状况,这实际上是对事物本身的多样性、包容性的一种回归。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背景下,刘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种声音首先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冷静的活着/在这个悲摧的时代孤独地思考。”刘剑在《思考者》中这样写道。冷静、孤独,我认为是诗人写出好作品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这样的心态下,刘剑十几年来不断打磨他的海洋意象,不断接近前面说到的海洋意象的“精髓”。2015年,海洋意象从刘剑的诗中喷薄而出。

这一年,仅《短歌行》这本诗集中,刘剑就写了近20首直接涉及海洋意象的作品,诗集中的第一首《倒影》,是这样起步的:

众人的屋顶覆盖着青青的草原
牛在月光下反刍
而我的帆船
已升入虚幻的云间

这四句里面形成了一种比对关系,众人和我,牛和帆船,草原和云间,前者是作者的来处,后者是作者的去处,我们看到作者仍然是孤独的,众人活在草原,只有我驾船远行。作者同时也是坚决的,这种坚决正如本文的标题,带着从山谷向海洋挣扎的心灵轨迹:

我在稀薄的空气中挣扎
留恋于一只失去双翅的海鸥
我难道要与她一起沉浮
水带着它涩涩的苦漫越头顶

《倒影》的结尾,作者暗示了去往海洋的过程的严酷性,陪伴他的是稀薄的空气、失去翅膀的海鸥,这样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众人”只能选择留下。但留下并不代表一种认同,作者在第二首《红日》中接着写道:

所有的山峰皆时光倒悬

所有的植物皆向海的方向生长

“时光倒悬”喻示一种颠倒的生活，“向海的方向生长”是这种颠倒生活中人心的守望和寄托。最终，这种守望会迎来它的黎明：

星辰与船儿一起隐去
人们盘踞屋顶
在等待着一轮红日
红日啊红日
我已嗅到了你淡淡的暗香

即使在这红日将出的时刻，作者同样是孤独与冷静的，冷静到一种近于“麻木”的状态，一种麻木并清醒着的状态：

还有一只承载光明的舟子在等候
啊 茫茫的海上
我麻木的头颅仿佛隐约的听到
大海深处的呼唤
在撞破黎明

撞破两个字用得非常精到，它暗示这种黎明并非仅是自然界的黎明，在它不能按照时序的指引正常来临的时候，可以借助“海洋”的力量来撞击它、催生它。这种撞击并非基于一种破坏性，而是基于艾青式的“爱得深沉”。作者是这样写的：

幸好我的双眼还在满含着泪水
还有一些火焰的灰烬

正是灰烬的“复燃”，在作者看来，“萌芽”了“撞破”的愿望和力量。因此，即使有“漫越头顶”的苦难，作者仍然要“挣脱于蒙昧岁月的枷锁”，从“麻木 冷漠 死亡”中“复活”——

我的复活得益于舟子和阳光
得益于蔚蓝色的大海
.....
激情重新燃起
那跌破山崖的波浪
总会重新聚集

在《平静》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黎明被撞破后的情景:

黎明到来 一切的喧嚣归于平静
舟子无论漂泊在何方
都会承载着花朵

这样的情景眼前只能是作者的一种梦想,这应当也是整个人类的梦想,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中国梦”。只不过他们入梦的方向不对,不应该往回走,往山谷走,而应该向未来走,向海洋走。这就是刘剑海洋意象所昭示的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发自个人经验,止于普遍价值。

这本诗集中还收入了一首《青海湖》。在这个内海面前,作者同样表现了心灵的孤独与冷静,这说明作者的海洋意象有着它的承续性。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与沈天鸿的《海的解释》同样创作于2002年,在沈天鸿刻意消解的时候,刘剑带着“安徽的蝴蝶”“陕西的油菜花”“甘肃的百合”已然开始重新建构:

倒淌河翻山越岭 自下而上
万水皆东流 唯独我向西
世上从未有过的水系
只是为了寻找你哟 青海湖

在海洋意象的重构中,刘剑既刻画了美好的梦想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世界中那些无以栖居的“流浪”心灵。在失去了精神家园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心灵的流浪图景被作者在诗中反复描述:

我又一次出离现实
进入一个未知的冥域
幻像与火鸟已成为历史
一月里 被冻僵的树随风流浪

天使在流浪 河流在流浪
大海在流浪
(《大海的畅想》)

它们的飞翔是孤独的
这世上漂泊不定的生灵
(《大雁》)

这世界长满了伤口

.....

我的呼喊穿透长夜
我的歌声使大海飘零
(《梦幻》)

我们常常丢失自己
或流连于空无一人的孤岛
或踟蹰于浩瀚无垠的荒漠
(《前行》)

人像小船四处逃散
汪洋中的惊魂 在寻找彼岸
(《咆哮》)

有多少人在饥渴中
他们在四处寻找水源
(《水的世界过于庞大》)

在这样的漂泊和流浪中,在看似漫无目的的苦难表象的背后,实际上也有“寻找”的不舍和冲动。在《自画像》中,作者更为这种“寻找”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我向神许下诺言/我远在天涯的方舟/何时才能出现//我向佛许下诺言/要有多么深沉的海/才能容纳我内心汹涌的潮汐。”这些句子出现在《自画像》中,无疑是诗人的生命告白,诗中“深沉的海”是刘剑海洋意象所象征的最深沉也是最终极的意义指向。诗句中的“水源”“彼岸”“方舟”作为海洋意象的衍生体,与海洋有着同一的象征意义,它们与诗集中的类似衍生体共同构成了刘剑海洋意象丰满而又一致的成色。

最后,也提一点建议,主要是语言方面,通读诗集中的作品,相对于海洋意象的精髓而言,感觉语言还不够精致。可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简约,要有惜字如金的“吝啬”;二是陌生化,多用新鲜的有个性的词语,以使语言与思想相得益彰。

(韩庆成,男,1965年生于安徽宣城,诗人、批评家,干预诗歌理论提出者及代表诗人,中国诗歌流派网主编,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与批评)

编 后 记

◎ 编 者

日升,日落;春去,夏至。

时间像插图,在不同季节页面上呈现不同的风格。此时夏日的阳光放射出利剑般的锋芒,炙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心静自然凉,尽管凉热无碍于烈日的延伸,也无碍于我们依然守护纯真的梦想,哪怕疲惫常常突袭而来。于是,明媚的忧伤和辽阔的孤独,连同背负的沉甸甸希冀,像骆驼在荒漠上一路摇响铃声,总是唤醒着生命自觉地走在渐行渐远的路上。

记得编者曾经说过,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庶几已走向“地球村”时代,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依然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说,科学的探索如刀,可以用来解剖世界;哲学的思考如灯,可以用来照亮世界;那么,人文(伦理)的实践应是如尺,可以用来丈量世界,谐振世界,诗意世界。诚然,此三者的关联,应是互动的、辩证的、呼应的,甚至是“化合”的。

世事沧桑。的确,自从人类有了关于人的思想以后,便有人文主义的萌芽;人文主义思想因而存在于所有文明之中。倘若说,中外历史上那些凝聚着人类智慧和心血而流传至今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可以在不同时空共享,并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那么,无论是弘扬传统、承续和流播中华文化,还是融汇中西、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是传扬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论坛特稿”特别推出三位学贯中西的资深学者史忠义、栾栋、李贵苍联袂发出的“宣言”——《新人文主义研究概观》,文章立足跨文化大视野,高屋建瓴,有的放矢,经过一番清晰的梳理,概述了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脉络。由于精神在场,因缘际会,彼此心领意会。他们团结了多位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满怀人文主义理想,明确了自身的研究思路,表明了近期的努力方向,愿意通过自己在人文学科方面的理论积累、实践和探索,自觉地参与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进程中。这与其说是一份情怀灼灼的新人文主义宣言,毋宁说是源自对人生和学问亲切洞悉之后的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重要的是,作者对过往和未来不故作姿态,而是充满激情地发出心声。或许,心怀澄明,自有花开。但愿!

一个文字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心理过程,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它融注着先人的思想、文化、习俗等诸多元素。可以说,一个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文字都有其自身的动人故事。汉字就是诞生于故乡的日月星辰、山水草木之间的文化符号,一笔一画、一波一磔都是有灵有性的。是故,文字所包含的文化气息和心灵信息,比我们笔下的线条和颜色更为诱人、也更丰富。新开设的“文字与文化”栏目,重磅推出香港学者陈藩庚的《汉字

的反向性中的华夏文明传承密码》，其文着重阐述汉字的灵魂之美，从剖析笔画结构中所蕴含的儒、道、法与阴阳家等哲思，认为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含有字德的文字。同时指出汉字的形体美与灵魂美以及在世界文字演变过程中反向性发展的活力美与固执美，共同构成汉字强大的传承基因，形成华夏五千年薪火不熄的重要密码。全文别出心裁，深耕细作，融通文史，蕴含哲思，自成一家之言，可谓洋洋大观矣。此外，周金声、王佳平的《论中华语文双轨发展机制及建构语文学的意义》，以宽阔的学术视野，对中西两种语言体系进行比较，探讨汉语独特的发展规律，认为在全球语言领域中，中华语文是最独特的一种存在，其语言与文字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独立体系。由于不同的人性假说，会产生不同的人文理论，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信息人假说”的反思与重构》一文，的确引人深思，或可留意。而在“外语与教学”及“专题探讨”两个栏目中，作者们均从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经验和视角，或结合外语教学、课堂交流、教师发展策略、高校舆情引导、影视翻译研究等不同话题，或展开探析，提出看法；或抓住问题，审慎思考。

文学的世界，是生动而迷人的；文学的世界，永远有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因为文学是指向心灵的，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中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每个民族乃至人类最高想象力的真实展示，而这种想象都必须通过对语言文字的格外动情和理解方能抵达，并最终都要落脚到语言文字上。当我们漫步在“中国文学”和“华文文学”这两个彼此联结又有所区别的艺术世界里，其潜藏的丰富资源比历史更悠远，比大千更浩瀚。作为一种巨大的存在，即使你倾尽全力，也只能触摸到沧海之一粟。每个研究者往往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个点、某个现象，或具体到一个作家、一部著作，或以微观的分析，或以宏观的把握展开学术之旅。学者朱则杰从检阅文献中发现问题，对五位清代浙东地区诗人作家予以订补，不啻是一种学问功夫。雨田在著名诗人海子逝世 20 周年的今日，结合自身经历，回眸历史，正视当下，以诗人的敏感和智慧，为我们重新展示了海子和他的诗歌世界，值得一阅。闫建华等对当代作家毕飞宇《枸杞子》的生态解读，可谓别开生面；陈蘅瑾等对当代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与《耶路撒冷》（徐则臣）的比较分析，别有情趣。面对华文文学世界，旅美女学人吕红以红杉林作家群为例，探讨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播途径及影响，文章充分调动据有的事实和史料，在梳理中展开深入的思考。白舒荣用温婉而生动的笔调，对穿行在中国与新加坡的东南亚华文女作家蓉子的文学创作历程加以描述，作为作家个案研究，文章本身可以看作是女学者与自己熟悉的女作家进行一次心灵交流和互动。澳洲华人学者何与怀抓住旅美著名诗人非马诗歌艺术追求与思想内涵，认为叛逆思考是非马诗歌的重要特色，因而“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见地的思考和解读方式。香港学者黄维樑以朱寿桐散文《从俗如流》为例，用辩证思维展开细致分析，指出其中的从俗思维和脱俗写作，可谓鞭辟入里。青年学人王小平则从多个层面，谈论旅澳作家张奥列的跨文化文学书写。此外，“序跋评述”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三位当代诗人作家的作品，不妨留心 and 关注。

置身于盛夏时分，不管天气如何炎热，蝉鸣之声说来就来。它们好像在寻找自己的欢乐和沸点，似一粒火种，一点即燃。有一种蝉声，为了博取听众的欢心，尽力抖音，甚至先声夺人，好像要掀起一阵波澜似的；另一种蝉声，始终依偎在岁月枝头自由鸣唱，或在独处

中欣赏自己的生命姿态。用心辨认,我们可以听到两种“有意味”的声音。无论如何,对于蝉鸣,只要不属于那种附和之声,亦非变异的声音,都是可以倾听的。当然,人们更倾心于那种充满个性色彩和特色鲜明的声音。

此时,极目平地,尘埃里的烟火恍若隔世。人车如流,熙熙攘攘,而独处静思时的那份闲适和宁静,又有谁能真切体味并领略得到。

走在路上,远方始终没有尽头,更远处依然存在深深的诱惑。路漫漫,意悠悠。也许,我们的心空和愿景,正在远方张开一片醉人的蔚蓝……

2019年夏日编后记之

《语言与文化论坛》基本格式说明

一、论文编排顺序

- (1) 标题(包括英译,如有副标题也需英译)
 - (2) 作者姓名(包括英译)
 - (3) 摘要(300字以内,摘取论文的主要观点或创新点,客观反映论文主要内容。请避免出现“本文”、“作者”等字样)
 - (4) 关键词(3—5个,集中体现论文主题的关键词)
 - (5) 正文内容(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数据准确,文字畅达,格式规范)
 - (6) 注引格式(采用尾注形式,集中统一放置于全文最后,一律使用“注释”,不用“参考文献”字样。无论是诠释性注解,还是单纯引用文献,在文中标于引文后面的右上角。序号用带圆圈的阿拉伯数字标识,用①、②、③、④……按照循序依次进行编号)
 - (7) 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学位、职称或职务、主要研究方向,前后加括号。同时,提供详细通讯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具体联络方式)
- 另:基金项目(如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章,应详细注明“项目级别”“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等信息,并置于正文首页下方)

二、注引格式示例

1. 专著文集
 - 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2. 期刊文章
 - ③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67—173页。
3. 报纸文章
 - ④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5日,第10版。
4. 学位论文
 - ⑤ 庄伟杰:《华文文学关键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8年6月。
5. 电子文献
 - ⑥ 詹伯慧:《把语言作为资源来认识》,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n1/2016/0626/c40531-28478957. 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626/c40531-28478957.html)(2016年6月26日),2016年6月27日访问。

(电子文献请写出具体网址,注明网页上标注的文献发表时间和访问网页的时间)

6. 外文文献

⑦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

(外文文献标注顺序与中文同,但外文书名一般用斜体以示区别,跨页则用 pp. 31 - 32.)

三、投稿须知

(1)《语言与文化论坛》为综合性人文学学术出版物,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在光明日报出版社连续出版14辑《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更名的。自创刊以来,已在海内外学术界广受好评,且产生较大影响。本刊以会通中外语言文化、关注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基础应用研究、促进人文学学术交流为宗旨,刊登人文社科各学科学术论文。特别鼓励学术创新,包括对重大学术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期冀建立一个开放的学术对话平台。

(2)《语言与文化论坛》常设栏目有:论坛特稿、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华文文学、比较文学、中外诗学、语言与翻译、文字与文化、国别与区域、序跋评述等,每期栏目有所侧重,力图打造自己固定的特色栏目。欢迎海内外从事中外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方家、学者和校内外同仁不吝赐稿支持。

(3)来稿必须观点鲜明、新颖,资料翔实、可靠,论证严密、科学,文字规范、通畅,篇幅一般不超过1.2万字,重要文章可作适当调整;书评、序跋及学术动态等文章5000字以内为宜。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提供WORD文档(附件方式)。如文中包括特殊字符、插图等,可单独发送图片文件。

(4)编辑部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同意改动请在来稿时申明,稿件文责自负。审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答复,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一经录用,将邮件或电话通知作者,稿酬从优并赠送样刊两册。

四、联系方式

地址:(312000)中国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会稽路428号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学报《语言与文化论坛》编辑部

电话:0575-89114475 89114479

投稿邮箱:yuexiuxuebao@163.com